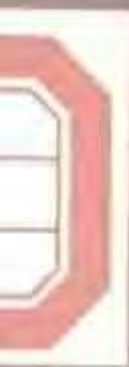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瑞典东方学译丛

丝绸之路

[瑞典]斯文·赫定 著
江红 李佩娟 译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瑞典东方学译丛

丝绸之路

[瑞典]斯文·赫定 著
江红 李佩娟 译



THE SILK ROAD

BY

SVEN HEDIN

TRANSLATED BY

F. H. LI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1938

丝绸之路

[瑞典]斯文·赫定 著

江 红 李佩娟 译

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电话:2825887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新疆地矿彩印厂

发行: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1/32 850×1168(mm)

印张:9.75

插页:6

字数:245千

版次:1996年7月第1版

印次: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5 001—1 0000

ISBN7-228-03998-X/K·453 定价:26.80元

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

(代序)

杨 谦

如今名传遐迩的辞汇 SILK ROAD——丝绸之路——与另一个英语名词 SERINDIA(西域)一样,是随着本世纪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热的升温,才广为人知的。人们对 80 年代初的多集电视片《丝绸之路》想必记忆犹新,日本作曲家喜多郎为其谱写的同名配乐,已成为现代电子音乐的经典之作。

一般认为,早期的中文文献并不曾把这条起自西安、横贯欧亚大陆的古老通道叫作“丝绸之路”。这一名称首见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的多卷本名著《中国》(1887年初版)。李氏不但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作了有关的论证,在其《中国地图集》中,还涉及了“海上丝绸之路”。另一个西方学者赫尔曼率先接受了这一名词,并将自己的一部专著题名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1910年初版)。然而,真正使“丝绸之路”有了立体感,并普遍为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是因为西域探险家斯文·赫定于 30 年代中期出版了以其为书名的一部杰作。

斯文·赫定是著作等身的人。在他已过“古稀”之年时,为什么要写《丝绸之路》这本新著,这本书对于他的“探险生涯”,对于认识中国西部、开发中国西部,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933年1月,斯文·赫定横渡太平洋,回到和太平洋一样并不太平的古都北京。并住进了“瑞典会馆”(瑞典人之家)。他是专门来主持开始于1927年的中瑞联合“中亚大探险”的收尾工作的。

1933年春夏间北京的政治形势是尽人皆知的。继1931年“九一八”,1932年“一二八”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将北京和整个华北、内蒙古视为势在必得的区域。读过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对当时古都的压抑与紧迫氛围,想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6月之交,赫定正指挥救援失踪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瑞典籍团员安博特。6月7日,获悉安博特平安无事,正滞留在和阗(即今和田),“近日常印度返回”^①,这个好消息冲淡了老朋友、德国国防军将领泽克特造访带来的喜悦。然而此后的德国驻华使馆专门为泽克特来华举办的招待会,不但使赫定终生难忘,并“强烈地影响”了他“未来的命运”^②。

1933年6月28日,北京雨季之前的一场暴雨使夏夜分外沉闷、冗长。然而,德国使馆却灯火辉煌,来客川流不息。招待会一开始,如注的大雨或多或少分散了赫定的注意力,他或许由此而想到还在野外作学术考察的中瑞等国学者的处境。很快,一个陌生的、身着白色夜礼服的高个儿中国官员吸引了他的注意,说不上是他待人的友善,还是他无可挑剔的举止,使赫定决定请使馆职员介绍与之相识。原来,此人名叫刘崇杰,是当时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那时,首都已迁往南京,但大多数国家的使馆尚留在北京,而刘崇杰的任务,就是加强各国使馆与南京政府之间的联系。

虽是初次相识,两人的交谈从开始就是热切而诚挚的。话题

①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408页。

②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419页。

离不开时局与新疆。赫定阐述了他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看法：

乾隆皇帝统治中国时，在他的庞大帝国周围建立起一个由附属国组成的半圆形缓冲带。……共和以来，你们已经失去了西藏、外蒙和热河在内的满洲。如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虽说仍属于中国，但是现在爆发了战乱。如果政府再不重视新疆事务，那么，用不了多久，你们也将失去它！^①

他的论述打动了刘崇杰。次长反问：“那么，你认为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扭转局势呢？”

赫定立即谈出了自己久经思考的见解：

我想，应该加强中国内地与新疆的联系。第一步是修筑并维护好二者之间的公路；第二步是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

其实，改善内地与新疆的交通状况，是近代关心中国西部状况的杰出有为之士的共识，早在1917年，谢彬就曾倡言：“余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②并亲自向新疆主政者杨增新面陈修筑联结内地与新疆的干线公路的必要性与具体办法^③。然而，内地与新疆的交通从来也不曾像30年代初期那样大成问题，那样梗阻难行，改善古丝路之议，从来也没有具有如此的紧迫性与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刘崇杰次长被赫定的建议吸引了，在分手时，他要求赫定就上述问题起草一份“备忘录”，并附上标有新公路（适用于汽车交通的）走向的草图。同时，他邀请赫定于次日到他的办公室再作更详尽的讨论。

① 《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第419—420页。

② 《新疆游记》，1917年4月13日日记。

③ 《新疆游记》，1917年4月16日日记。

以下的事实证明,赫定的建议是有成效的:几个月后——1933年8月中旬,南京政府任命赫定为中国铁道部顾问,并以其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1933年10月21日,赫定同他的几位中国及瑞典同事离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始了他历时3年(1933—1935年)的在中国西部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进行的多灾多难的“汽车考察”。此行不同于赫定以往的历次西部探险之处在于,一,所利用的交通工具不再是骆驼、马等,而是汽车;二,他的身份完全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籍专家,而不再是一位独行荒漠的外国探险家。而这个外籍专家“真诚地想要以自己游历中亚所取得的若干经验来给中国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丝绸之路》)。30年代中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不平静的年代之一,内战、外患、灾荒遍及中国各省区,而当时的新疆又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是自从左宗棠挥师出关平定阿古柏之乱以来最困难的阶段,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而整个政局变幻莫测,成了野心家的乐园,民族分裂分子以为有了一试身手的大好机遇,新疆也因而成为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关注的中心。“老将军”——这是塔里木地区维吾尔人对杨增新的尊称——生前曾预言:“新疆治世是桃源,乱世是绝地!”“一旦发生战火,塔里木将成为一口烧红的大锅!”都不幸而言中。就在这种形势下,年近70岁的斯文·赫定却率考察队义无反顾地向新疆进发了!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将赫定及中外助手此行比作“飞蛾”“赴火”^①,其实,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不惜为理想而献身。

关心西域探险史的人都知道,斯文·赫定的探险著作,往往比他的探险活动本身更知名。此后他一连出版了3本有关此行的新书,第一本是《大马的逃亡》,第二本即《丝绸之路》,第三本是《游移的湖》。《大马的逃亡》近年已有汉文、维吾尔文两种中译本,译名

^① 《斯文·赫定的探索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为《马仲英逃亡记》。而《游移的湖》也早由徐芸书译成中文,台湾省于1955年初版,此后多次再版,书名则译作《漂泊的湖》。两书的中文本都受到中国读者的好评。此行的压卷之作《丝绸之路》一直未译成中文正式出版。上述3部著作,都是有名的丝路探险史杰作,又被称为有关“战争”、“湖泊”与“道路”的“三部曲”。这“三部曲”总共有70余万字,后来,又由作者改写成全景式的史著,编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的第三卷,内容仅有26万余字,但首尾更完整,也对3部书中重复、“压茬”的地方作了剪裁。然而这三部曲,尤其是《丝绸之路》,绝不能用史著来替代,除了内容更丰富,更个性化外,其中对丝绸之路的探索与思考也是其独有的画龙点睛之笔。

二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的侧重在道路。在1927年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①踏上西行之路时,是以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其驼队有近400峰骆驼备用,每次宿营,营地便被称为“驼城”。而1933年,赫定及其助手配备有4辆福特卡车,一辆小轿车,因此,对路况优劣的感受空前强烈。

我在《斯文·赫定的探察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文中,称赫定为“中国西部的最后一位古典探险家,第一位现代探险家”,这一提法曾被台湾省《历史》月刊引称^②。赫定是传统意义上首开西域探险之路的先行者,又是率先把本是“单枪匹马”独行侠式的探险变为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的组织者、实践者。当汽车车队驶上

^① 有些文章称其为“西北科学考察团”。1992年我们曾就此当面向该团团员、北京大学教授李宪之请教,李先生回答:当时的确定名为“考查团”,并有团旗、公章等为证。

^② 《历史》,1993年7月号,第136页。

坎坷多阻的西行征途时，昔日的盟友——被称为“瀚海之舟”的骆驼就成了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的象征。《丝绸之路》中写到骆驼，总是带有怀旧的情愫，而伴随骆驼产生的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则往往浸润着难以言传的迟暮之感。

在再次前往额济纳河的旅途中，汽车队宿营时与专门驮运汽油的驼队相遇。这些骆驼都是1927年就往返于西部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老“成员”，左颊的烙印“H”（赫定的头一个字母）已浅淡难识了，但其中一峰曾随中国科学家陈宗器进入罗布荒原考察的老骆驼一眼就认出了久违的赫定与陈宗器（陈也是这次“汽车考察队”成员），便毫不犹疑地离开队列，“昂首阔步踱到我们跟前，就像过去一样，伸出它那美丽的毛茸茸的大脑袋，……这情景就如老朋友久别重逢，勾起了我们许多回忆”。^①——赫定这样写道。在快要进入新疆之前，一峰驼群中败北的孤零零的公驼在戈壁游荡，又引动赫定许多遐想。也许是旅途太寂寞，太难得有交流感情的机会吧，赫定在西域探险过程中分外地关注“无言的旅伴”——各种动物。除了“最老的朋友”骆驼，在《丝绸之路》一书中，他还写了由于帐篷较暖和，使一只冬眠于此的跳鼠过早地醒来，写了形形色色的狗。——他一生写的最后一本书，名字就叫《我在中亚的狗》。此外，他还写下自己倾听“无韵之诗”——驼铃时的感受：

我聆听着，深深为这古老而又熟悉的铃声打动，正是这千百年来回响在商队经过的古道上的特殊旋律，长伴着旅人商贾展开了一幅幅多姿多彩、震撼人心的沙漠生活图景。（第31页）

直到很久很久，驼铃声完全消失在夜幕中，他的思绪才回到所住的

^① 本文中所引《丝绸之路》中的文字，均出于江红、李佩娟译本，所注页码即该书页码。下同。这段文字见27页。

帐篷里。

汽车取代了驼队，虽是一个实质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但作为天生的探险家，探险生涯的真正诱人之处，从来也不曾因之消失或变味儿。

《丝绸之路》一书中时时可见赫定对探险过程特有的乐趣的描写，这些段落有些是无意中涉及的，也有著意予以刻画披露的。比如，在外人看来荒野宿营是刻板而千篇一律的，而赫定则写道：

驱车横断戈壁，在某种程度上是单调乏味的，可更有难于言表的魅力。……每到晚上，或枕清泉而宿，或伴营火而眠。夜来在铺在地上的睡袋里做做美梦，早晚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从一处营地到另一处营地，无论是沙漠或是草原，日复一日展现的都是平淡而又荒凉的景观。可是，从来没有人厌倦过，而且还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凡是到过沙漠的人，总是渴望能旧地重游。这广袤无垠的大地，如同大海一般，使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地迷恋着它。（第 56 页）

这里写的已不只是沙漠露宿的感受，而是探险家对无人荒野的征服感。

旅途是艰辛坎坷的。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宿营，才更令人怀念。在走过困苦难言的行程之后，赫定专门写到大家精疲力尽地挤在一起入睡的情景。那本来搅扰睡魔的鼾声，在他听来竟像“一支没有指挥家掌握的乐队”，有时听上去打鼾人像快窒息了，又有时候如同在“拼命吞吃一头野骆驼”——多么形象、幽默的比喻！哪怕 3 个民族混合在一起的汗臭，也成为回味美妙的沙漠生活的引信。而对丝路上汉族商队的描写（见第五章）则给读者刻画出古道日日常新的一个生动的横断面。赫定写过逃出软禁生活的放松感（第 199—200 页）；写过维吾尔人之乡为白杨掩映下那奇妙细长的木桥（第 199 页）；写过丝绸古道上“像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

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的”一座接一座的古烽火台(第216页),这些烽火台“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历经沧桑,依然不肯退出行旅的视野。一路上的道路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车行之难,车辆损坏后的苦恼,是每天都不请自来的“伴侣”。赫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但探悉了探险生涯的苦与乐,还及时把自己的感受升华为对未来的关注。作者是以古丝路的经行者、探索者的身份发愿:将来一定要在这里修建一条通衢大道,以便利后来的丝路旅人(第92页)。

可以说,《丝绸之路》一书中有关“干沟暴雨”的段落(第160—165页),是其最精彩的内容之一。

赫定本人先赴乌鲁木齐去向盛世才要汽油,一到便被拘禁于城中。他得知医生赫默尔(从1927年就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旗下工作的瑞典学者)得了重病,便不顾一切地脱身赴南疆救助。路上,在离开托克逊县城,进入著名的百里干沟时,却受阻于一场百年(也许是千年)不遇的大雨。干沟就是唐代的银山碛,仅这个地名就足证那一带是以缺少水源而知名,但1934年7月的这场大雨使干旱的天山谷地变成了“热带雨林”。长久的瓢泼大雨引发了山洪,而足以冲垮一切阻拦的山洪又险些把赫定一行吞没。在大雨来临时,他们正露营在山谷一处要冲之地,手足无措,缺乏心理准备。全凭齐心协力,有准确的判断力,才幸免于难。我读过有关新疆大风、大旱、大雪的描写,而关于大雨,再也没见过比这更令人心旌飘摇、意念难执的文字了。然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当大雨消歇,山洪退去之后,他们竟于一个阴郁的早晨,意外与已渡过危险关头的赫默尔大夫相逢在某个无名的山谷营地(第165页)。读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风光也罢,古道难行也罢,荒漠情韵也罢,那都不过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铺垫,好比撑杆跳高的助跑,京剧中各角色出台的定场诗,《丝绸之路》一书中真正令人难以忘怀,令人读之不免掩卷长思的,还是那形形色色的人物!

三

首先，赫定是把自己视为贯穿《丝绸之路》始终的抒情主人公的，他的情感，他的尊严，他的热忱，他的冷峻，那就是一个探险家面对古道万物的反顾，那就是一个经行者针对古道历史、现况与未来的独白。可以说，书中写得最成功、最丰满、最有感情色彩，又最引动读者去关注的人物，正是赫定自己。

《丝绸之路》不是赫定篇幅最长的著作，但涉及的人物颇多，有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当中有汉族学者、回族军人、蒙古汗王、维吾尔知名人士……外国人中，除瑞典人，还有白俄、苏俄红军、波兰流浪者、外蒙活佛、日本间谍、英德传教士、北欧邮政官员、土耳其籍的阴谋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当属“假喇嘛”丹宾、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尕司令”马仲英及“新疆王”盛世才等。

丹宾喇嘛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之谜”。在不同的书籍中，他的面貌各异，或是“丝路侠盗”——罗宾汉式的好汉，或是占山为王，为患丝绸之路商旅的强盗，或是外蒙古政争的牺牲品。但不管怎么说，二三十年代的丝路经行者难于忽视他的存在。据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所著《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一书，丹宾是“蒙古化的华人”，在外蒙于辛亥革命后陷于混乱时，曾风云一时，“得到一份权势”，“当苏俄积极夺取外蒙主权时，他便与部属及仆从远避他方，另图发展”，占据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明水一带，曾掘井开荒，占山为王，成为丝路上一股独立的势力。后来被外蒙派的刺客暗杀。苏联地理学家奥勃鲁切夫(1863—1956)所著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当中，丹宾(被称为黑喇嘛)是甘南藏族与蒙古族的混血儿，自幼随为甘州(即今张掖)守备当马夫的父亲住在河西走廊。后来父亲因马匹大批饿死而入狱，弟妹被掠卖到北京为奴。他聚众在古丝道河西西部路段劫富济贫，并专劫中国官员，而且准备有

钱后去北京赎出亲人。后来下落不明,据说劫了一个汉人商队,有了足够的钱,便洗手不干,带上4个部下到北京去了。

不管怎么说,赫定一行并未见到丹宾喇嘛,在大约10年前,丹宾就已不存在了,——或是被杀,或是离去。赫定见到的,只是一座空无一人的废堡——“强盗窝”。在赫定眼中,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只从阻断古道、为患过往商旅(“向过往商队勒索税钱”)这一行径上,就应与一切不利于丝路通畅的事物:匪帮、税卡、战乱、地方主义等归为一谈,根本没有考虑过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说实话,我是赞成赫定对丹宾的看法——“强盗”、“中亚冒险家”的。他的存在是丝绸之路的客观障碍。

关于丹宾喇嘛,《丝绸之路》着墨不多,书中另一个“中亚冒险家”(这是我借用的,不是赫定的原意)、苏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是赫定反复提及的人物。总的来说,由于阿布列索夫给予过赫定相当重要而关键的支持,书中对其是一再予以称赞的。要全面认识阿布列索夫其人,应该参阅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的有关章节^①。尽管如此,赫定对阿布列索夫在新疆政界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比如当赫定被盛世才拘禁于乌鲁木齐,不能去营救赫默尔大夫时,阿布列索夫竟能当着赫定面,给新疆外交署下死命令,让赫定出城。于此可见苏俄在当时的新疆政界影响有多大。

尽管行文很有分寸,但看得出来,赫定对盛世才是很反感的。他对盛世才的描写最值得借鉴、最有教益的地方,在于他毫不隐瞒地写出自己对盛世才“看不透”的困惑感与陌生感,这样反面突出了盛的阴鸷、深沉、多变的特点。逃到台湾后,盛世才写有回忆录

^① 阿氏是苏联特工人员,1937年奉调回国,死于肃反。包尔汉曾记载,1937年4月,他送阿氏回国,行至乌苏,两人告别时阿氏曾流下眼泪。回国仅一个月,阿布列索夫即被斯大林下令枪决。

《牧边琐忆》，并有英文传记《小卒与轴兵》。可惜这些书难得一见，否则能拿盛对赫定的印象作个对照，就更耐人寻味了。

无疑，赫定对另一个历史人物马仲英则抱有一定的好感。马仲英也是新疆历史之谜。肯定地讲，马仲英是个相当有个性魅力的人，是具有领袖风度的将军。尽管赫定吃尽了马仲英部下的苦头，并几乎被枪杀；尽管赫定从未正式与马仲英结识，但马仲英的确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丝绸之路》最后一章“后录”当中（系1938年6月追记），赫定对马仲英的复出所抱的希望，勿宁说是对其突然投入对手——盛世才——的盟友的怀抱感到难以理解，对这曾使西部大地久久为之震颤的不守常规的将军竟然一入苏俄之境再无声息感到担忧——或说有着不祥预感。希望马仲英东山再起，也许是希望他能有一种更圆满的结局。

马仲英的下落的确是谜中之谜。或说他在苏联学开飞机而失事，或说被斯大林杀于莫斯科郊外别墅（系出自盛世才《牧边琐忆》），或说因被指为托派而死于苏联肃反。斯文·赫定与各界都有着良好的联系，他想必也听到过上述说法的一种。正因为如此，那个本不够清晰的回族军人的形象，才在他头脑里越印越深。盛世才在《牧边琐忆》中提到，1937年初，斯大林曾计划让马仲英回国，建立回族抗日联军，但被盛坚拒。而赫定对他的复出（“再生”）所执的态度，像是盼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那样，只有一个饱经沧桑的睿智老人，才会怀有那样的信念。

读过《丝绸之路》，我们会觉出赫定这个精力过人、似乎永不疲倦的探险家的的确确是老了，与以前的著作相比，他似乎更重感情，更少决断，尤其是在与老友重逢或告别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当考察队中的两位瑞典助手随苏联车队回国，他的两个中国助手去送行时，在一个人苦思冥想中，他竟回记起许多本已遗忘的往事，他写道：

这样，就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整个院落寂静得像

坟地一样。我回到起居室，坐到一把扶手椅上沉思起来。一个人有时会忘掉一些往事，可是当随着年复一年时光的流逝，又重新回想起当年这些事的时候，仍能感到生活的魅力，这该有多好！

这种情愫的表露，我们不但在其早期著作《穿越亚洲》、《罗布泊：探险与考察》等书中见不到，在此前几年所写的《回到亚洲》、《戈壁沙漠横渡记》（中译本名为《长征记》）等书中也很难能品味得出来。

也许斯文·赫定已经意识到，这次沿古丝路的探险是他长达半世纪的探险生涯中最后一次亲临中国西部的荒野，所以，在写《丝绸之路》时，他以较多的笔墨写下了自己对西部大地与人民的挚爱之情，并且对朋友与敌人都给予较大的关注。没有患难与共的朋友，晚境会凄凉难耐；而全无敌手，也会平添几分寂寞惆怅。从这个角度来说，《丝绸之路》是西域探险家赫定写给西域探险史的告别辞与最后的留言。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讲，《丝绸之路》是古道经行者、探索者赫定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四

我们说过，《丝绸之路》第十八章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本章可以题名为“丝绸之路忧思录”或“古道启示录”。

对丝绸古道而言，旅人、商贾、释子、探险家……都是匆匆来往的过客。而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最漫长的这一条陆路交通线上，推动古道繁荣的丝绸并没有留下往日兴盛的痕迹。“中国的商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由他们的商队往西运送的数不清的大捆丝绸，到何处才是其旅程的终结”，这，就是古老丝绸之路所具有的特殊性。在赫定心目中，丝路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写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最萧条的场景：见不到

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采、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第 216 页)

作为丝路经行者,赫定面对衰败的残迹,“又一次恍然听到了如流的岁月拍打着双翼疾驰而过”,他已经站在了通向未来的门槛上,发现只有迈出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才能向过去道别,而赋予古道新的生命!“当驼铃和马銮铃被代之以喧闹的汽笛和喇叭时,昔日的浪漫风情就所剩无几了”(第 220 页)。他进而写道:

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仿佛已看到一条崭新的公路穿越草原和沙漠,一路上有无数的桥梁架在河川小溪和水渠沟壑上,……公路的路线会忠实地沿着古代丝路上商队和车轮留下的足迹和车辙向前延伸,到了喀什噶尔,也绝不意味着它已到了尽头。(第 217 页)

我想象着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情景,憧憬着技术进步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灿烂前景,幻想着人的创造力将得到空前发展,使人为之目眩。(第 217 页)

昔日的壮景一幅幅沉入西方的地平线,而新的灿烂辉煌的景象每天随着初升的朝阳,一幕幕展现在东方的天际。(第 220 页)

这就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古道的未来。在 20 世纪,“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第 219 页),而丝路的新生,正是符合这一目标的。

在 30 年代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斯文·赫定关于中国将依靠丝绸古道来与日本一决胜负的预言完全应验了。赫定指出,“中国人已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保卫自己的国家”,而只要使古道复

活，“中国就能在内线继续这场战争”（第 292—293 页）。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甘肃、新疆的公路成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的生命线，为此，苏军红八团进驻哈密，而漫长的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路段已改建成现代化的公路干线。

1996 年 3—4 月间，我只带了一本书，即斯文·赫定《丝绸之路》的中文译本，踏上往返于北京—乌鲁木齐的旅途。路上，乘坐火车、汽车，走完了甘肃至新疆的行程，也读完了赫定这本名著。而这部写于 60 年前的书的深刻内容、丰富视野、精辟预言使我的旅途充满回顾与思索。

一路上我想到，80 年代中期就有过“开发大西北”之议，相当鼓舞人心。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未能真正实施。而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国际学术界已向中国西部倾斜，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必定是中国西部的世纪，“丝绸之路热”将再次升温。开发大西北，调整中西部与东南沿海的发展速度，不可避免地会给西部大地注入生命力，使古丝路充满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披读《丝绸之路》，那就不只是“温故”，而必定能够“知新”！正如斯文·赫定所说：“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第 220 页）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总主编 宿 白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大正 杨 镰 陈重秋 荣新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厉 声 石晓奇 华 立 李春华

吴福环 阿拉腾奥其尔 林梅村

周 轩 柳洪亮 侯 灿 耿 昇

柴剑虹 徐文堪 崔延虎

顾 问

[瑞典] 罗 信 (Staffan Rosen)

伍贺庚 (Hakan Wahlquist)

[日本] 金子民雄

目 录

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代序) 杨镰(1)

引言..... (1)

一 出师不利..... (17)

二 通往百灵庙之路..... (24)

三 进发戈壁滩..... (31)

四 等待中..... (38)

五 生瑞恒归来..... (46)

六 额济纳河畔的圣诞之夜..... (60)

七 在额济纳河畔休整的日子里..... (66)

八 通向丹宾喇嘛的强盗窝..... (84)

九 穿越黑色戈壁..... (96)

十 汽车遭劫,身陷囹圄 (108)

十一 奔赴乌鲁木齐..... (122)

十二 被困乌鲁木齐..... (135)

十三 派遣救援队..... (154)

十四 赫默尔和贝格曼返回瑞典..... (169)

十五	一件令人尴尬的突发事件·····	(179)
十六	在乌鲁木齐的最后时日·····	(190)
十七	解脱的时刻·····	(198)
十八	丝绸之路·····	(209)
十九	奔向长城·····	(221)
二十	肃州和甘州·····	(230)
二十一	长城行·····	(244)
二十二	穿过险峻山岳地带·····	(254)
二十三	丝绸之路上的最后时日·····	(264)
后录	·····	(276)
译后记	·····	(294)
编校说明	·····	(296)

7296/04

丛中，离额济纳河流入湖泊^①不远的地方。我们想念沃尔特·拜克，想到他竭诚地为我们工作而作出的贡献，心中充满哀伤和感激之情。他作出绝望行动之前，在帐篷内的一张纸片上留言说：“上帝有灵，我献出了毕生力量，以求能对中亚的自然史研究有所贡献。”这些话正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2月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去看望我的一位老朋友大喜喇嘛^②。那时他住在紫禁城内中南海的瀛台。我们谈起了1907年的往事，当时我在扎什伦布寺，他款待了我6个星期。他去了趟内蒙古，现在的愿望是，尽快找到一条返回他故乡西藏的路。当他听说我和那林都希望重游冰雪之乡时，他许诺将在他那寺院之城欢迎我们。

已经几个月没有听到尼尔斯·安博特博士的消息了，我们的担心与日俱增。德中欧亚航空公司的卢茨中尉马上就要飞往肃州，我请他带封信给仍在那一带工作的格哈特·伯克塞尔和曼弗雷德·鲍肯坎普。我在信中指令他们设法和安博特取得联系。1月份，我收到驻喀什瑞典传教士发来的电报：

据圣诞节前后抵达叶尔羌的两个人的报告，11月8日，安博特在且末，后去甘肃。^③

① 此处当指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北部的索古诺尔湖。——译注

② 大喜喇嘛 (Tashi Lama)，即九世班禅喇嘛(1883—1937)。1936年《蒙藏月报》四卷四期绛央尼马著《班禅喇嘛译为大喜喇嘛之研究》一文提到，《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日喀则》条称扎什伦布寺为 Tashi Lhunpo，所以 Tashi Lama 是外国人以地名称班禅喇嘛，日本人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中也有以地名称班禅喇嘛的情况；他还提到，1929年刘光英译英国人柏尔著《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多处将原著的 Tashi Lama 音译为大喜喇嘛，其中也寓有“喜事的喇嘛”之意。九世班禅喇嘛因受英帝国主义挑拨，被迫于1923年出走内地，1925年抵北京。1937年回藏受阻，于青海玉树圆寂。——译注

③ 叶尔羌即今莎车，与且末均位于新疆南部。——译注

丛中，离额济纳河流入湖泊^①不远的地方。我们想念沃尔特·拜克，想到他竭诚地为我们工作而作出的贡献，心中充满哀伤和感激之情。他作出绝望行动之前，在帐篷内的一张纸片上留言说：“上帝有灵，我献出了毕生力量，以求能对中亚的自然史研究有所贡献。”这些话正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2月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去看望我的一位老朋友大喜喇嘛^②。那时他住在紫禁城内中南海的瀛台。我们谈起了1907年的往事，当时我在扎什伦布寺，他款待了我6个星期。他去了趟内蒙古，现在的愿望是，尽快找到一条返回他故乡西藏的路。当他听说我和那林都希望重游冰雪之乡时，他许诺将在他那寺院之城欢迎我们。

已经几个月没有听到尼尔斯·安博特博士的消息了，我们的担心与日俱增。德中欧亚航空公司的卢茨中尉马上就要飞往肃州，我请他带封信给仍在那一带工作的格哈特·伯克塞尔和曼弗雷德·鲍肯坎普。我在信中指令他们设法和安博特取得联系。1月份，我收到驻喀什瑞典传教士发来的电报：

据圣诞节前后抵达叶尔羌的两个人的报告，11月8日，安博特在且末，后去甘肃。^③

① 此处当指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北部的索古诺尔湖。——译注

② 大喜喇嘛 (Tashi Lama)，即九世班禅喇嘛(1883—1937)。1936年《蒙藏月报》四卷四期绛央尼马著《班禅喇嘛译为大喜喇嘛之研究》一文提到，《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日喀则》条称扎什伦布寺为 Tashi Lhunpo，所以 Tashi Lama 是外国人以地名称班禅喇嘛，日本人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中也有以地名称班禅喇嘛的情况；他还提到，1929年刘光英译英国人柏尔著《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多处将原著的 Tashi Lama 音译为大喜喇嘛，其中也寓有“喜事的喇嘛”之意。九世班禅喇嘛因受英帝国主义挑拨，被迫于1923年出走内地，1925年抵北京。1937年回藏受阻，于青海玉树圆寂。——译注

③ 叶尔羌即今莎车，与且末均位于新疆南部。——译注

丛中，离额济纳河流入湖泊^①不远的地方。我们想念沃尔特·拜克，想到他竭诚地为我们工作而作出的贡献，心中充满哀伤和感激之情。他作出绝望行动之前，在帐篷内的一张纸片上留言说：“上帝有灵，我献出了毕生力量，以求能对中亚的自然史研究有所贡献。”这些话正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2月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去看望我的一位老朋友大喜喇嘛^②。那时他住在紫禁城内中南海的瀛台。我们谈起了1907年的往事，当时我在扎什伦布寺，他款待了我6个星期。他去了趟内蒙古，现在的愿望是，尽快找到一条返回他故乡西藏的路。当他听说我和那林都希望重游冰雪之乡时，他许诺将在他那寺院之城欢迎我们。

已经几个月没有听到尼尔斯·安博特博士的消息了，我们的担心与日俱增。德中欧亚航空公司的卢茨中尉马上就要飞往肃州，我请他带封信给仍在那一带工作的格哈特·伯克塞尔和曼弗雷德·鲍肯坎普。我在信中指令他们设法和安博特取得联系。1月份，我收到驻喀什瑞典传教士发来的电报：

据圣诞节前后抵达叶尔羌的两个人的报告，11月8日，安博特在且末，后去甘肃。^③

① 此处当指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北部的索古诺尔湖。——译注

② 大喜喇嘛 (Tashi Lama)，即九世班禅喇嘛(1883—1937)。1936年《蒙藏月报》四卷四期绛央尼马著《班禅喇嘛译为大喜喇嘛之研究》一文提到，《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日喀则》条称扎什伦布寺为 Tashi Lhünpo，所以 Tashi Lama 是外国人以地名称班禅喇嘛，日本人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中也有以地名称班禅喇嘛的情况；他还提到，1929年刘光英译英国人柏尔著《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多处将原著的 Tashi Lama 音译为大喜喇嘛，其中也寓有“喜事的喇嘛”之意。九世班禅喇嘛因受英帝国主义挑拨，被迫于1923年出走内地，1925年抵北京。1937年回藏受阻，于青海玉树圆寂。——译注

③ 叶尔羌即今莎车，与且末均位于新疆南部。——译注

丛中，离额济纳河流入湖泊^①不远的地方。我们想念沃尔特·拜克，想到他竭诚地为我们工作而作出的贡献，心中充满哀伤和感激之情。他作出绝望行动之前，在帐篷内的一张纸片上留言说：“上帝有灵，我献出了毕生力量，以求能对中亚的自然史研究有所贡献。”这些话正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2月初的一天，我们几个去看望我的一位老朋友大喜喇嘛^②。那时他住在紫禁城内中南海的瀛台。我们谈起了1907年的往事，当时我在扎什伦布寺，他款待了我6个星期。他去了趟内蒙古，现在的愿望是，尽快找到一条返回他故乡西藏的路。当他听说我和那林都希望重游冰雪之乡时，他许诺将在他那寺院之城欢迎我们。

已经几个月没有听到尼尔斯·安博特博士的消息了，我们的担心与日俱增。德中欧亚航空公司的卢茨中尉马上就要飞往肃州，我请他带封信给仍在那一带工作的格哈特·伯克塞尔和曼弗雷德·鲍肯坎普。我在信中指令他们设法和安博特取得联系。1月份，我收到驻喀什瑞典传教士发来的电报：

据圣诞节前后抵达叶尔羌的两个人的报告，11月8日，安博特在且末，后去甘肃。^③

① 此处当指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北部的索古诺尔湖。——译注

② 大喜喇嘛 (Tashi Lama)，即九世班禅喇嘛(1883—1937)。1936年《蒙藏月报》四卷四期绛央尼马著《班禅喇嘛译为大喜喇嘛之研究》一文提到，《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日喀则》条称扎什伦布寺为 Tashi Lhunpo，所以 Tashi Lama 是外国人以地名称班禅喇嘛，日本人青木文教著《西藏游记》中也有以地名称班禅喇嘛的情况；他还提到，1929年刘光英译英国人柏尔著《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多处将原著的 Tashi Lama 音译为大喜喇嘛，其中也寓有“喜事的喇嘛”之意。九世班禅喇嘛因受英帝国主义挑拨，被迫于1923年出走内地，1925年抵北京。1937年回藏受阻，于青海玉树圆寂。——译注

③ 叶尔羌即今莎车，与且末均位于新疆南部。——译注

我要他们继续打听他的新消息。

我们认为，“大马”已经阻断了自甘肃去新疆的所有道路。还听说安博特在西藏北部就把所有值钱的行装都丢在了路边，是两手空空到达且末的。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以闪电般的速度奔赴这块在直线距离 1 680 英里以外的绿洲，但我们的资金就要耗尽了，不得不继续等待。

北京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太平了。一天，天气好端端的，城里成千上万辆黄包车却突然全不见了，原来是被征去运军火了。3 月 16 日，全城宣布戒严，晚上上街必须带通行证。

北京城内外所有的邮局顷刻之间都得到命令，要他们务必在每天傍晚将白天所收寄的邮件送到总局，因为担心一路掳掠的中国溃军随时可能冲进城来把北京洗劫一空。这种事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啊！4 月 30 日，日本军队离城已不到 50 英里了。

5 月 11 日早晨，一架日本侦察机掠过北京上空。机枪声此起彼伏。我们搞不清会发生什么事情。刘复教授将贝格曼在额济纳河一带发现的汉简^①送到了瑞典会馆，一旦发生空袭或抢劫，这些珍贵的资料或许能在瑞典国旗下幸免于难。

几天后，空中撒下日本传单，声称如果中国南京政府的军队还不撤出，就要开始轰炸了。

5 月 20 日，11 架飞机轰隆隆飞过我们的头顶。日本先头部队离城只有 9 英里了。溃败的中国士兵一群一伙地拥进北京城，强迫老百姓给他们提供住宿。

5 月 22 日，美国著名作家欧文·拉铁摩尔^②和他的妻子与我们

① 即举世闻名的 1 万多枚“居延汉简”。该简今藏台湾省。——译注

② 拉铁摩尔(1900—1989)，美国著名蒙古学家、中国边疆问题专家。1926—1937 年间多次赴新疆、蒙古、东北等地旅行调查。——译注

一起进餐。正当我们围桌而坐的时候，突然接到德国使馆的电话，向我们通报说^①：“如果听到两声枪响，请注意美国使馆的无线电天线杆。如看到3盏白灯和3盏红灯，立刻赶往洛克菲勒学院，那儿有军用车送你们到美国使馆。有迹象表明，北京城今晚可能要遭到洗劫。”

但是那一夜平安无事，没有听到枪响。白天仍是城门紧闭。所有的火车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但铁路马上就要被军事当局全部接管了。我们驱车在城北绕了一圈，看到了街垒和其他防御设施。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发为安博特担心。我通过白沙瓦^②给喀什的瑞典传教团发去了电报。唯一得到的消息是，与喀什的无线电通讯已中断，电报只能到达斯林那加尔^③，然后再由信使用11天时间骑马送到喀什。看来中国的无线电站已被穆斯林反叛者破坏了。

我们还听说，许多瑞典传教士已回国或越过边境，暂时寄居在印度。

5月9日，传教士罗伯林茨从喀什发来电报：“从10月在且末看到安博特后，再无他的消息。”

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是活着，是进了监狱，还是被杀害了？即便是在亚洲腹地，8个月杳无音讯，也为时过长了。我命令伯克塞尔设法与安博特取得联系，但命令被“大马”取消了，因为他不允许任何外来干涉。他保证亲自寻找这个失踪的人，不过后来他还是允许我们继续搜寻了。5月15日，我抱着一线希望，派艾利克·那

① 因为当时“瑞典会馆”的女主人莱辛小姐是德国籍的侨民，故由德国使馆向她发出了下述通报。——译注

②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座古城。——译注

③ 在克什米尔境内。——译注

林博士去寻找安博特，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力帮助他。

临行前，那林要求我把大喜喇嘛在 1926 年 12 月给我的金戒指借给他，戒指上刻有大师本人的图像和象征长寿的图案。那林坚信，一个“活佛”的戒指一定有一种魔力，可保佑他此行成功，那也许还真是安博特和他自己的护身符。

就这样，他带着戒指去了南京。在那里，由于瑞典总领事林奎斯特先生和德国使馆参赞赫尔·菲舍尔先生的好心帮助，转眼之间他便拿到正式通行证；而且又以同样的神速，弄到了欧亚航班的一个座位，飞往肃州，他将在那里开始行动。

我们深深感谢德国空军军官卢茨、鲍姆加特、拉特耶几位中尉和其他人。他们及时在我们和总部仍设在肃州的野外探险队之间传递书信，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新疆和甘肃部分地区的宝贵信息，——有些城镇正好在他们的航线上。

初春时，卢茨中尉去了柏林，并打算和我们的老朋友汉莎航空公司驻京代表赫尔·威廉·施密特一同经鄂木斯克、乌鲁木齐、哈密和肃州，飞回北京。

这次越过世界最辽阔的大陆的飞行本身已属壮举，何况在卢茨中尉的指挥下，整个飞行过程，又可谓尽善尽美。6 月 25 日，卢茨回到北京。不幸的是，施密特没有来，他在德国出了空难。

卢茨在乌鲁木齐了解到了哈密的情况和“大马”的行动，于是东行时没有在哈密着陆，而是直飞肃州。他在那里见到了黄慕松将军^①。他奉中央政府命令，于 5 月中旬，率部去新疆，调查那里的局势，并在交战双方中作调停工作。黄将军似乎要把乌鲁木齐的最高权力夺到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发动了一场政

^① 黄慕松(1884—1937)，历任国民党政府国防考察委员、参谋本部次长、边务组主任、陆军大学校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4 年还曾作为政府专使赴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译注

变,结果使3位高级将领送了命。当时,乌鲁木齐最有权势的人物是盛世才督办^①,正是他挫败了黄将军的计划。不过他还是准许黄慕松安全飞返南京,以示对中央政府的尊敬。后来我们结识了这位盛世才将军,与他的会面令人玩味无穷,也使人颇感激动。

4月27日,柏利博士回到瑞典。5月15日,如前面讲到的,那林也向我们告别启程了。但在11日,瑞典会馆又增补了人员。尼尔斯·霍涅尔博士和陈宗器先生从孤寂的沙漠中回来了。他们在额济纳河、罗布泊、北山和南山地区进出了4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他们首次探访了在1921年才形成的罗布泊。霍涅尔出版了一本极吸引人的书《到罗布泊去的路》,记述了他和陈的冒险经历。

5月初,我们把瑞典会馆搬到了位于中央公园西南角的一个精美绝伦的中国院落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座小小的中国式房子和一个庭院。弗洛尔·贝格曼是整个会馆的女东家。

6月初,雨水敲打在房顶灰色的瓦片上,发出单调的嗒嗒声。北京上空不时响起霹雳雷鸣。但在6月7日深夜,我的房间却如坟墓一样死寂,我光着膀子躺在床上看书。已是凌晨3点时分,我突然听到花园的柴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了,接着石阶上响起了轻轻脚步声。我书房的门悄无声息地被打开了,然后又是一片寂静。套间之间的房门原来就是开着的。

“谁?”我喊道。啊,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门房。他走过来递给我一份电报。肯定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电报局一般要到早

^① 盛世才(1896—1970),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就读。1930年任新疆上校参谋、教官。哈密事变后,任参谋长、东路总指挥。1933年任新疆督办,从此掌握新疆军政大权。1944年出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1949年逃往台湾。——译注

晨才开始发送电报。我急忙打开电报，上面写着：“安博特在和阗^①，安全无恙，将经印度返回。罗伯林茨。”

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我立即起草电文，要那林和伯克塞尔停止搜寻，并把这消息通知在瑞典的人，还有驻华公使林奎斯特和菲舍尔。我叫来了霍涅尔，他听到消息，高兴得跳起了印度舞。然后我们让仆人把贝格曼叫来。他穿着睡衣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仍是筋疲力尽，睡眼惺忪的样子。当他听到这个简短而重大的消息时，只说了声“就这事？”

安博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穿过西藏到印度，然后回到了瑞典。他在《驼队》一书中记叙了这段经历。因篇幅有限，我不可能在本书中多讲伯克塞尔和那林的经历了。伯克塞尔出发不久，收到了我的电报，就停了下来；而那林则已消失在西藏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了。在新疆东部的铁木里克^②，他几乎丧命，因为当地人认为他是个间谍。到了柴达木，台吉乃尔蒙古人也同样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他。但当他们看到大喜喇嘛的戒指后，便立刻把他奉为最尊贵的客人，此后东返时再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6月初的一个星期天，雨水噼噼啪啪地滴打在庭院的石头路上。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身着灰色大衣，大步走到我的门前。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冯·泽克特将军，大战中是麦金森的总参谋长。几年前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是我在战争年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当麦金森的军队挺进加里西亚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他刚在南京蒋介石将军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又来北京，准备住几个星期。

1933年6月28日，德国大使特劳特曼设宴招待泽克特将军。

① 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部，1959年改称和田。——译注

② 铁木里克，在今新疆与青海交界处茫崖镇以南十余公里处。——译注

这次宴请使我的命运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外面下着倾盆大雨，德国使馆内灯火通明。来客中有许多中国要人，如作战部部长何应钦^①、黄郛将军，曾任内阁总理、外长、驻巴黎大使等职的胡惟德先生，等等。一个身着白色晚礼服、相貌俊秀的中国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请使馆人员把我介绍给他。他叫刘崇杰，头衔是外交部次长。他已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负责南京和外交使团之间的联络沟通，当时大多数外交使团仍留驻北京。

我们谈起新疆局势。我最近曾去过那里，而且很久以前还曾在那里呆过几年。这位外交部次长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询问我的经历和想法，我坦率地作了回答。

“乾隆皇帝在中央帝国周围建立了呈半圆形分布的、受制于中国当局的一系列缓冲国。现在这个半圆中只剩下一个环节。民国建立后，你们就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外蒙古、满洲和热河以及内蒙古也受到严重威胁。新疆还在民国政府手上，却因穆斯林的造反和内战而四分五裂，如不采取保住这个省的行动，那么新疆也会丢掉的。”

“你认为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次长问。

“我想，第一步应该开通中国内地和新疆之间一流的公路交通，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下一步则是修筑一条通向亚洲腹地的铁路。”

我们细谈了很久。刘先生让我第二天到他的办公室去。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又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最后他让我起草一份备忘录，并在地图上标出我认为最合适的公路路线。

7月中旬，我向刘先生递交了备忘录和地图。这份文件被译成中文，并分送蒋介石将军、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铁道部部长顾孟

^①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代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译注

余。我重点谈到的是贸易和交通问题。俄国的贸易排挤了中国人,并进而严重威胁来自印度的英国贸易。在喀什、伊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俄国人的活动最多,他们在那里筑有很好的公路,并在不断完善这些公路设施,使它们一直通到新疆边境。相反,自古以来,中国的贸易主要是由驼队完成的,从归化城^①出发,穿越戈壁滩,到达哈密、古城子^②和乌鲁木齐,要用3个月才能走完全程。如果以卡车代替,时间就可缩短到10至12天,中国人在商业竞争中就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实际上,事情已经在向这方面发展,归化城的商人已经在该城和哈密之间建立了卡车运输公司。但第一批派出的卡车大多都因路况太糟而被毁坏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筑一条穿越戈壁的公路,同时还要沿着横越甘肃的古驿道南路修另一条公路交通线。

在和外交部次长刘先生交谈过程中,我从未想到过这一切会在不久的将来对我个人产生什么影响。我只知道,那林、伯克塞尔和鲍肯坎普还在野外作实地考察,等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回到北京,然后我们就一起回瑞典,着手研究我们这次规模大、时间长的探险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上帝已经为我安排了另一种命运。7月底,刘先生去了南京,把我的备忘录交给了蒋介石将军和行政院院长。备忘录引起了他们的兴趣。8月3日,我接到了一份电报: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先生希望尽快在南京与您见面,请给刘崇杰回电。”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的命运将发生崭新的变化,而且已经在梦想这次或许能为中国政府效劳,可以借此回报1890年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块土地以来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谁也不会像我一样那么真诚地想要以自己游历中亚所取得的若干经验来给中国做点

① 即今呼和浩特。——译注

② 即今奇台县。——译注

实实在在的好事。如果再有一次新的探险，或许我会有机会一睹我还不知道的那一段“丝绸之路”，即沿着 1921 年形成的罗布泊新湖北岸和塔里木新河道走向延伸的那段路。

8 月 5 日晚，我从北京起程。那正是夏季最美丽的时节，暖风阵阵低低的吹拂着村野。第二天，火车已载着我穿过一处又一处的村墟，直奔民国的首都。

在刘先生的陪同下，我拜会了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博士。他是一个从不畏惧困难、永远以乐观态度对待生活及各种问题的人。他告诉我，自从黄慕松将军失败后，他就决定亲赴新疆，平息这个四分五裂的省份的骚乱，在混战的将军中间作调解工作。罗博士还告诉我，政府拟邀请我率领一支汽车探险队去新疆作勘查工作。

如此说来，我一路上的直觉和梦想就要实现了！

一小时后，我见到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他进一步证实了我所听到的一切。他说，修筑通向腹地的铁路造价昂贵，所以他们目前只赞成先修公路。公路不仅是很必要的，而且还应该和中国北部和中部现有的铁路线终点连起来。北线公路应以归化为起点，而南线则应以西安为起点。工程要马上开始，刻不容缓。政府虽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他本人却希望尽快就此事与专家商讨。几天后我将得到答复。

又开了几次会，我又写了 5 份备忘录，详谈了诸如路线、路程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备忘录将提交专家们分析，并在行政院会议上讨论。我很快就明白自己必须安下心等待，不过我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王正廷^①的别墅中我过得像王子一样。刘先生经常和我共进晚餐。晚上，月光皎洁，气温仍高，我们坐在别墅前的花园中，一起商讨如何加强中国内地和西部边陲最大省份之间的联系。

^① 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等职。——译注

天气炎热，温度一直持续在 39 度，有时一阵倾盆大雨，天气才凉快些。高 800 英尺的紫金山矗立在玄武湖畔，山顶上的天文台即将竣工。陈宗器就住在离此不远的山坡上的地磁观察所里。我特别提出陈应该参加目前计划的汽车探险队。计划中的一些地区，他和尼尔斯·霍涅尔博士都一起游历过，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月中，外交部部长罗先生通知我，政府已就公路查勘队一事作出决定。我又从铁道部得知，已经确定以下几点原则：

这支查勘队完全是一支中国查勘队，直接受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博士的领导。整个计划要等他从北京访问回来后才能依法给予正式批准。

我将担任查勘队队长，并被任命为“铁道部顾问”。我有权带上我认为需要的瑞典人员，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地形测量员和两名机械师。这次探险预定不超过 8 个月。去的路线为穿越戈壁滩后到哈密，回来的路线走古驿道，即所谓的丝绸之路。我们有条件在 1921 年刚形成的塔里木河下游的新河道及罗布泊进行科学研究，特别要仔细考察一下在古代就已垦殖开拓的楼兰地区有无可能解决灌溉问题，可否再次移民。每个队员都将发给个人通行证、武器和汽车执照，并可免交厘金（即国内关税）。瑞典人的支出预算为 5 万墨西哥元^①，由补助金支付。中国人的费用由中国政府直接支付。我负责购置汽车和其他设备。

接着又传来了一些新指示。在新疆的内部纠纷中要我们绝对保持中立，不能和政治有任何瓜葛。其实，即使没有这条指示，我们也该明白，干预政治事务或是偏向一方，都会给整个计划带来致

^① 近代中国曾流通墨西哥银币，其币值与“袁大头”1 元相当。故书中以墨西哥元代指当时的银元。——译注

命的打击。我曾在前一本书^①中讲到,由于我们的汽车全部被强行扣住,不得已只好违心地站到了马仲英一边,那次冒险我们能保住性命已是万幸了。

另一点指示是,无论查勘队的队长、队员还是雇员,都无权从事任何形式的考古研究。这条不适宜的规定几乎破坏了整个行动,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讲到。这条禁令是南京的教育部发出的,而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这条禁令。它之荒唐可笑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丝绸之路上探险,特别是在敦煌至库尔勒^②一段,纯粹就是考古性质的。我提议唤醒古代丝绸之路,把它变成一条现代化公路,这是得到政府批准的,而在该政府中,领导教育和科学的一个政府部门,却不允许我们注意任何古迹。可是,只有凭借这些古迹,我们才能识别历经2 000年沧桑已杳无痕迹的古丝路。因此,为了达到这次探险的目的,我们被迫在某种程度上违反这条关于考古的规定,我毫不犹豫地对此承担起责任。

铁道部部长一直没有从北京回来,于是我去了北京。多亏他下了决心,所以很快一切安排就绪。京绥铁路局负责人盛昌先生负责支付全部补贴,并和我们一起商讨最后的准备工作。他向我们传达了一条新指示。为了开拓今后的公路交通,我们要在新疆调查以下3条路线中的一条:乌鲁木齐——喀什,乌鲁木齐——伊宁或乌鲁木齐——塔城。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在遍地内战、骚乱、匪患的新疆省完成这个任务。当时从该省不断传来烧杀掳掠的消息。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先生先飞到哈密,然后又到了乌鲁木齐。在历尽艰辛之后,才得以取道塔城和新西伯利亚回到南京。和黄慕松将军一样,他也辱没了“调停专员”的使命,现在轮到我们去穿

① 指《马仲英逃亡记》(The Flight of Big Horse)。——译注

② 库尔勒,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译注

越这个不平静的省份了——不是去调停，而去划定公路路线。北京的有识之士认为我们十有八九会失败，我们即将开始的探险简直是疯狂之举。有的人认为苏俄^①决不会坐视中国采取行动，把连接内地和新疆的古代骆驼商队走的驿道变成公路，并复苏中国内地与这个省份之间行将死亡的贸易。他们认为俄国人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挠我们探险队的行动。这些担心后来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新疆的俄国代表对我们非常友好，还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一个晴朗的日子，工程师尤寅照到我们的总部来报到了。不久，他的同事龚继成也来了。两人都是由政府选派来陪我们同行的。他们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和蔼善良。后来一路同行，直至最后完成探险，他们留下的始终是这一印象。接着，陈宗器先生、大卫·赫默尔博士和生瑞恒^②分别由南京、耶姆特兰和芝加哥赶到了瑞典会馆。等到招聘好蒙古司机和中国助手之后，我们这支探险队的人员就全部到齐了。

一天，我们去拜会马仲英的驻京代表白先生。他给了我们一封写给这位将军的信，并保证说，既然我们是为南京效劳，他一定会给予一切应提供的协助。

10月10日，我们驱车来到北京西直门车站。火车的货车上已装好我们的3辆卡车和一辆漂亮的都铎式轿车，都是一色的福特牌。火车将于下午3点半出发去归化城。我们的忠实助手乔格·生瑞恒、蒙古族司机敦格拉和另一个名叫卓木恰的年轻蒙古族司机负责押车，他们还带上了汽油、给养和所有其他设备。在探险

^① 本书中曾使用“苏俄”、“俄国”等代称原苏联，以“俄国人”代称“苏联人”。译文中保持原貌，未予统一。——译注

^② 生瑞恒(Georg Söderbom)，一译乔格·苏德布。瑞典驻华传教士的后裔，随团照料事务。——译注

队全部集结在归化之前,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

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的老朋友、瑞典的传教士赫尔·约埃尔·埃里克逊和生瑞恒的父亲赫尔·泽德尔鲍姆来向我们告别,并祝我们一路顺风。

又一个夜晚降临北京。我们结束了故事的一个篇章。新的篇章即将在第二天早晨开始,一次在强悍的亚洲人中进行的变化无常的、难以驾驭的冒险历程,即将拉开序幕。为了荣誉,我们都决心像雄狮一般去战斗,我们要竭尽全力完成这项在常人看来毫无成功希望的事业,否则决不回头。



一、出师不利

1933年10月21日的早晨,我和赫默尔博士驱车前往西直门车站,一路上两旁的树叶正在变成黄色。汽车探险队队员已在车站集结,周围都是赶来为他们送行的朋友,其中有刘复、徐炳昶^①两位教授和保罗·史蒂文森、波斯哈德先生、《泰晤士报》记者麦克唐纳先生和其他许多朋友。当火车徐徐驶出车站向西北方开去时,他们大概都觉得这是和我们的诀别了。

北京的城墙和壮观的城楼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身后。我们行驶在灰色沉闷的广阔原野上。不一会儿,火车载着我们穿过南口,沿着用大块花岗石筑成的古长城,在山间蜿蜒行走着。傍晚,我们在张家口短暂停留。午夜,就在我们专用的、没有暖气的车厢里,用羊皮铺好床睡觉。

早上6点钟,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说话的是瑞典人。门一下子打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兴奋地喊道“好哇!”这时,有一位稍上年纪的妇女递给我一杯滚烫的热咖啡。——火车已停在丰

^①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1919年从巴黎大学留学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古史传说和考古学研究。1927年作为中方团长与斯文·赫定共同率领西北科学考查团赴中国西北部考察。1930年出版《徐旭生西游日记》记述此行。——译注

镇车站^①，瑞典传教团有一个传教站设在这里。那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卡尔·埃弗雷姆·希尔，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20岁。经美国专家培训，他获得了汽车修理工的最高一级的证书。但因有其他任务，这次不能和我们同行了。递咖啡的女士是弗洛尔·尼丝特罗姆，1897年我们曾在宁夏相识。

车厢开始晃动起来，我们好心的同胞跳下车去，在月台上一边唱着瑞典国歌：《你，古老而自由的祖国》，一边跟着火车奔跑，向我们挥手告别。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归化的城墙和城楼已出现在西南方。火车到站后，立刻被一伙吵吵嚷嚷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围住了。

生瑞恒的高大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车窗外。赫默尔赶紧过去，生瑞恒对他低声说了点什么，他立时惊叫起来：“什么，他死了？”

我心中一紧，不知发生了什么。伯克塞尔和鲍肯坎普还在实地考察，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生瑞恒一定是听到了这两个下落不明者的消息了。是他们的驼队出事了，一个被杀，另一个被劫走了？是沙漠又发生了什么悲剧？还是我们这次伟大的探险在出发后的第十一个小时就被血影笼罩了？我把生瑞恒叫到了窗前。

“出了什么事？”

“我得向您报告，出了车祸，情况很糟。”

“伯克塞尔！”我脑中又闪过这个念头。但是谢天谢地，不是他。生瑞恒报告的这场事故和我们所属的科学探险队没有任何关系，但还是给我们这次新的行动的第一天旅途罩上了阴影。

生瑞恒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知道我们将于10月22

^① 丰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京包铁路在此经过。——译注

日星期天早晨到达,但火车常常晚点。所以他想去车站弄清我们究竟何时到站。于是备好了小汽车,蒙古族司机敦格拉带上牧羊犬“豹”,陪他一起去。敦格拉情绪沮丧阴郁,因为他夜里梦见自己和生瑞恒一起全速驶向一座架在深渊上的断桥,他觉得这预示着一场灾难在等着他。

生瑞恒坐到方向盘前,敦格拉坐在他左侧,“豹”蹲在了后排座位上。

他们沿着一条向北的街道朝车站驶去。街道前面是一片旷野,在右角处横卧着一条使用率很低的铁轨,离街尾的房屋只有6英尺,而在街尾却没有交警站岗发信号,右边尽头的一座房子挡住了铁轨方向的视野。所以生瑞恒没有看到一辆机车正从铁道上驶来,走在机车前面的是一辆煤水车。汽车和机车都开得很快,根本来不及刹车。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但就在这一瞬间,两辆车相撞在一起了。敦格拉绝望地叫了一声“天呐!”用力推开左侧的门,跳下车去,“豹”跟在他后面也跳了下去。

两辆车撞得惨极了!煤水车的车钩插进了汽车的一侧,机车又把已撞烂的车向前推了一段。左边的车轮扭曲着卡在枕木中,车轴弯得像钢丝一般。幸好有煤水车的车钩,汽车没给撞飞。要不是守护神保佑,生瑞恒早已粉身碎骨。他坐在车里,被牢牢地夹在车座、方向盘、操纵杆和撞瘪了的车门之间,根本动弹不得。机车推着被撞坏的汽车滑出枕木,向前移动了25码后,才停了下来。

鼻青脸肿的生瑞恒,慢慢从破烂的车中挣脱了出来。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能站起来,还能走路。他呼叫敦格拉,可是听不到回答。最后终于在离出事地点13码的地方找到了那可怜的小伙子。他已四肢不全,前额也被撞碎了。显然他非但没能逃脱,反而滚到了车轮下面。

这时,立刻请来了天主教传教团的医生,但他已无能为力了,不能证明敦格拉是当场身亡。警察要逮捕机车司机,但生瑞恒解

释说,他自己也负有同样的责任,警察也就不再追究,就此作罢。

我们去看了出事现场。我们出色的司机敦格拉浑身血污,一张草席盖在他身上。后来,死者被殓入棺木,放在一座庙里。他的亲属要求赔偿,我们尽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南京铁道部又配给我们一辆新车,和那辆毁坏的一样,也是都铎式轿车。

生瑞恒能生还真是天大的奇迹。他坐在车里被挤得死死的,机车顶住了他的下半身,一点也动弹不得,倒反而走运了。如果当时敦格拉能保持镇静,或者没能打开车门,他就能安全无恙,逃过这次灾难了。

我们需要一位新司机来代替敦格拉。于是给希尔发了电报,让他放下手上的差使,到我们这里来服务,从第一天起他就成了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人物。我们从来不叫他卡尔或埃弗雷姆,只喊他埃费,显得格外亲切。

我们把生瑞恒的房子变成了我们在归化的总部,在这里,“绥新公路查勘队”完成了最后的组建工作。房前的院子成了仓库和干活的工场,日夜忙碌不停。那里搭起了5座白色的蒙古包,8位中国裁缝坐在里面为我们缝制羊皮睡袋和拖到脚面的白羊皮袍,也就是说,我们正为迎接中亚冬天的暴风雪和严寒做好装备工作。

派遣一支汽油驼队先期到达额济纳河,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辎重,轻装上路。我们买了42铁桶共1260加仑汽油,将送往第一个重要的基地——额济纳,用从商人诺贡德利那里租来的40峰骆驼运送。行李都堆放在院子里,以便把到额济纳之前不需要用的东西一并由骆驼运走。所有的汽油和行李都装上了卡车,由生瑞恒开到归化西北100英里的百灵庙镇^①。诺贡德利的驼队就等候在那里。

^①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中部。——译注

我们拜访了令人愉快的绥远督办傅作义将军、瑞典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团以及内政部部长黄绍竑。部长是从南京来，到蒙古王爷们集会商讨内蒙古自治问题的百灵庙去。

政治骚乱把各地的老百姓都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在包头盘踞着土匪将军孙殿英。1928年，他盗墓劫走清东陵的许许多多无价之宝，从此臭名昭著。现在他正准备率群匪出发去青海(库库淖尔)地区，在那一带开辟一块地盘。宁夏省省长拒绝孙的部队过境，两人关系紧张，剑拔弩张。据最近的报告，孙的士兵到处掳掠，有时甚至北上到我们押送东西的先遣队西行必经的路上袭击骚扰旅客。

最近，我们又不时耳闻从新疆传来的消息。外号“大马”的年轻将军马仲英，控制着哈密和吐鲁番，现在仍在和乌鲁木齐方面血战。傅将军给马发了电报，告诉他我们将前往的事，马回电说，欢迎我们去。也许那时他还在盘算着，我们是要把汽车给他送上门去呢！

我们接到了我们的上司、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发来的令人极为高兴的电报：

获悉你们已开始漫长而伟大的探险，对你们这次确有历史意义的和勇气非凡的事业致以衷心的、最美好的祝愿，并望你们奋斗到底，以取得永垂青史的伟大成功。

他深知这次使命的艰难和危险；也深知一旦成功地标出了穿越亚洲腹地的新公路路线，此举必然会在这片广袤的土地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到处都是战乱，土匪出没乡野，征程伊始就发生了车祸，出了人命！这次探险一开始就兆头不妙。生瑞恒对前途忧心忡忡，认为敦格拉的死对我们大家都是个凶兆。

但是，没有一个人犹豫退缩。我们的中国伙伴尤寅照、龚继成

和陈宗器等人在整个旅程中,无论遇到什么危难,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和决心。

如果说 10 月 22 日是我们伤心的日子,那么 31 日则是我们喜出望外的日子。早晨,贝格曼驾着新车从北京来了。黄昏时分,大家正坐在我的书房里,陈走了进来,像平时一样平静地说:

“伯克塞尔和鲍肯坎普随乔格回来了。”

生瑞恒用了 3 辆卡车将汽油和行李运到了百灵庙。在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了这两个失踪很久的人和他们的驼队。他卸下他们放在骆驼上的行装,堆放到返回的空卡车上,然后带着探险队这两个失而复得的骄子急驶下山,直奔归化。

我们涌到了大门外的公路上。两辆卡车上堆放着伯克塞尔的收集品,这是他在最边远的亚洲那些远离文明而又危险的地区艰辛工作 4 年的成果。

第三辆车这时正从路角拐过来,由生瑞恒开车。伯克塞尔和鲍肯坎普从车上跳下来。他们一脸胡须,满身尘土,衣衫褴褛,活像驿路上的强盗。不过,两个人都精神饱满,皮肤被戈壁滩的秋日晒成了古铜色,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他们带来了正在等待我们的荒原生活的气息,他们的鞋上多少还沾着一些欧洲人不曾留下过足迹的地区的泥土。

“谢天谢地,你们终于平安归来了!”

我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般簇拥着他们穿过院子。围桌喝咖啡时,问题便像连珠炮似地向他们袭去。这样相聚真是太妙了,连小说也描写不出这样的情景。我们上一次探险考察的活动历时 7 年,而就在我们即将出发,开始新征程的前夕,两支队伍正好汇聚在作为新探险历程起点的城镇。我们再也不必为这最后的几名田野工作者忧心忡忡,再也不用派人去寻找、搭救他们。亚洲腹地的大门已向我们敞开,这场角逐已拉开序幕。11 月 1 日,出去寻找安博特的那林也回来了,在柴达木他为自己丰富的地图收藏又增

添了几件珍品。

现在,我的周围不仅有 1927 年春天开始的那次探险的全部老将,还有新探险队的全体队员。这样,在踏上漫漫的征程之前,我们又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瑞典总部了。

因连年忠于职守而获瑞典金质奖章的蒙古人赛拉特,代替死去的敦格拉,重返我们的行列驾车。他从内蒙古老家赶来的途中,遭到了土匪的袭击,随身衣物被掳掠一空,在抵达张家口的一路上衣不蔽体,身无分文,狼狈不堪。

时间不等人,我们又要出发了。几天来欢聚一堂的两支探险队不得不分手了。在告别宴会上,我祝大家幸福,祝即将返回北京和瑞典的伙伴走运,也祝那些将和我重返沙漠腹地的伙伴们吉星高照。

11 月 9 日晚,3 辆卡车准备就绪,停在大门外的路边。我们最后一次睡进了温暖舒适的被窝。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享受了。明晨,我们就要踏上茫茫荒原路,一路夜宿于蒙古包,遥望着头上永恒的星空,侧耳倾听着大漠风暴奏出的古老悲歌。

二、通往百灵庙之路

11月10日清晨,生瑞恒、埃费和赛拉特分别驾驶着3辆满负重载的卡车出发了。我和尤寅照、龚继成乘坐小汽车,跟在队伍后面,由赫默尔驾驶。又一次和伯克塞尔、鲍肯坎普以及好心的瑞典传教士们握手告别,车队随即轰响着开出古老的小镇,穿过一段干涸的河床,向一片原野进发。一个个小村庄和土坯房点缀着大地。农夫们正在一块块土地上耕作。我们经常碰到旅行者,或骑马,或徒步行走。一串串毛驴驮着煤,吱吱嘎嘎的牛车和长长的骆驼商队正把物资运往肃州或额济纳河。

牛车留下的深深的车辙已把归化到百灵庙的这段公路破坏得不成样子。司机们对禁止通行的命令全然不顾,仍坚持走这条路,使无力拉车的牲口通过的路面又增添了汽车轮子留下的两英尺深的辙迹。这种路况对汽车来说虽不妨事,不过生瑞恒还是遇到了倒霉事,车子的左侧后轮陷到一个坑里,动弹不得了。

于是,卸车,拿出千斤顶这类工具,足足忙了两小时。用石头和碎砖破瓦填平了大坑,车身才慢慢爬了出来,保持了平稳,又可以重新装车了。居然没有折损一根车轴!不过前面还有1万英里漫长的路,走完这样的旅程后,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剩下哪怕一辆完好无损的车呢?附近有一个叫坝口子的村庄,住着200户人家,百分之九十都姓寇(音译)。听说路经的驼队虽发生了瘟疫,路上的检查站倒没有找我们麻烦。我们在河床中艰难地行进,一条细细的溪流蜿蜒在砾石之间。

穿过溪口，路开始上坡，变得又窄又陡，难以行走，路边有护栏。这时，内地和蒙古来的车辆都挤在一堆，动弹不得。一排装着麦子的牛车、马车正小心翼翼地试着绕到前面去。牲口头上的角不时发出撞击声。成对套在车上的牛、马、驴时而惊退，时而扬蹄，好像在预示一场大祸临头，——跌下坡去就全完了。

我们在这条通道的最高处，眼前各路人马的熙攘景象，一览无遗，真是精彩极了！车水马龙中，中国的车把式挥舞着鞭子、棍子，尖声吆喝着，赶着那些犟头犟脑的牲口往前走。这时，一群骑兵策马冲过人群，我们马上紧跟上去，顺着他们开出的路，一溜烟开下坡去，来到了一个名叫排楼馆的村庄。

路面糟糕透顶，生瑞恒的卡车千钧一发，差点翻倒在已经结冰的河床上。当我们到达克克伊尔根这条小河时，已快5点了。过河时，埃费的卡车被卡在冰里。我们拿起铁锹、镐头在冰水中进进出出。结果还是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才算完事。又是两个小时的折腾！

太阳落山了，天色渐渐变暗变黑。夜来临了，多美的夜晚啊！这是在蒙古高原上的第一夜。

夜半时分，我们来到了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河旁。现在又轮到赛拉特倒霉了。他开车从冰层上过时，车被死死地卡住了，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车子的头灯把冰面照得晃眼睛，我们又开始凿呀，砍呀，挖呀，浮冰被推在一边。两位瑞典机械师的命令不断以中国话和瑞典话传出，喊声划破了夜晚的寂静。可是卡车仍是纹丝不动。又经过一阵徒劳，黑夜终于湮没在一片肃静之中。我们这些人天不亮就早早出发了，原野上的第一天行程就历尽艰辛，把大家累得半死，一个个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钻进驾驶室小憩，或是爬到行李堆上打起盹来。

我突然惊醒过来。车上的头灯已经熄灭。黑夜笼罩着一切，四周一片死寂。起床号吹响了，人们又振作精神开始干活，车子终

于开动了。我们连夜赶路，凌晨2点时，赛拉特的车又陷进了一条叫招河的小河里，我们索性就地搭起了征途上的第一座营帐。四五点时，在零下11度的严寒中进了“晚餐”。这时，东方已露出一缕晨曦，我们这才开始了在帐篷和睡袋里的第一觉，心中默默祈祷着往后的冬夜不要再像今夜这样熬神。

第二天，我们竟然睡了个懒觉！大家懒洋洋地端详着营地附近一座古老的城堡式建筑物——奇力格更苏木庙，看着几个来回走动的中国巡逻兵，他们的任务是保护驼队不受土匪侵袭。我们离巴卡淖尔湖只有9英里了。那里住着阿勒坦土尔扈特人阿拉西一家和他的一个做医生的兄弟。等我们出发时，太阳刚刚落山，一片火样的红霞映照在沉闷的原野上，壮丽非凡。

阿拉西^①的蒙古包搭在砖墙围起的院子里。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款待。大家围火坐在粗毡上，享受着放在小凳上的茶、奶酪、奶豆腐和糖。墙边的一个神龛上供着永恒的佛像。

这时，院墙外正忙着搭起我们的帐篷。中国厨师贾贵在瑞典传教站那里学了炸肉卷和薄煎饼的手艺。他把做好的晚餐端到了我和贝格曼、赫默尔医生住的帐篷里。

我们在阿拉西这里逗留了整整3天。我们并不担心时间，因为我们听说应先期到达额济纳河的运送汽油的驼队，由于有的油桶漏油，已不得已停在离百灵庙100里(30英里)的地方。驼队的人不敢再向前走了，只好派人给我们捎信儿，现在正等待命令。

休息时，我们重新调整了车上的行装，这样每到一个宿营地，就可以只卸下一辆卡车上的行装即可，另外两辆卡车上的东西可以不动。每日的给养、炊具、帐篷和被褥都装在一辆卡车上。我们放弃了一顶帐篷，因为发现有4顶就足够用了。一顶归3个中国

^① 阿拉西，是从外蒙古来的难民，获准居于此地，是生瑞恒的朋友。——译注

同伴使用，一顶归负责照看此行所用车辆的生瑞恒、埃费、赛拉特和卓木恰，第三顶帐篷兼厨房由贾贵和两个仆人三娃子及李使用，第四顶是我和贝格曼、赫默尔的住所。我们8个主人和5个仆人就在这顶帐篷中用餐。

到达巴卡淖尔湖之前，汽车用的都是单轮，现在我们利用歇息的时间把3辆卡车的后轮都换上了双轮，这样，车在浮土的路面上行驶要容易得多。备用的轮胎和被褥行李都捆在车子的外侧，好腾出更多的地方装汽油桶和食品箱。

时间过得好快，大家都在紧张忙碌着。医生在给生瑞恒和埃费治疗。生瑞恒的大脚趾让油桶砸伤了，埃费的右手在装车的时候被一个钉子划破了。陈宗器在测量方位和观察气象。贝格曼和两位工程师在地图上研究新公路的路线。我在一边阅读资料，做些笔记。

巴卡淖尔湖在希来特沙比地区，归土默特左旗管辖。那一带最有权势的人叫也里克钦富光。

一天，太阳下山后，我们的11峰骆驼来到营地，在微明的天幕下衬现出它们深色的身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景观。几年来，驼队一直由阿拉西照应。这些骆驼从给我们干活起，就在它们的左脸颊上烙上了“H”字样的印记。6年过去了，多数的印记已消退了，只有一头骆驼的印记还依稀可辨。这个老伙计曾跟随霍涅尔和陈宗器到过罗布泊，它一定是认出了我们，只见它离开同伙，昂首阔步踱到我们跟前，就像过去一样，伸出它那美丽的毛茸茸的大脑袋，向我们讨面包吃。我们自然心领神会，一个大大的面包卷扔进了它那垂涎欲滴的嘴里。这情景就如老朋友久别重逢，勾起了我们许多回忆。

11月14日夜，气温降到华氏零下19.8度。冬季来临了。15日晨，我们早早起来吃了早饭，扑灭篝火，卷起帐篷和睡袋，准备出发。我们告别了阿拉西，汽车轰响着开过了一个叫乌兰淖尔的小

咸水湖，来到了缓缓起伏的草原。一群野马奔驰而来，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马蹄声声，扬起阵阵尘土。渐渐，马群被甩在了车队的后面。我们还不时遇到牛车和骑手。其中有一支贩运鸦片的驼队，我估计由 100 峰骆驼组成，它们一边前进，一边响起有节奏的驼铃声。后来，又碰到一支，由 200 峰骆驼组成。驼队从凉州^①而来，有卫队跟着，保护这些昂贵的走私品。

我们到达了冻成冰的塔尔干河，顺着河一直来到了百灵庙。到了这里便再也看不到汉人开垦的土地了。内蒙古绵绵起伏的荒野漫延到西北地平线的山脚下。这里矗立着一段 6 英尺高的城墙，每隔 500 码便有一个烽火台，岁月的沧桑已使城墙成了残垣断壁。

在我们前面的一片低洼地，终于出现了当天旅程的目的地，也是我们全程第一阶段的终点站——伟大的圣城百灵庙。

寺门外的坪坝上，大喜喇嘛的由藏、蒙、汉各族士兵组成的卫队正在操练。我们驶上坪坝，车一停，立刻被人群围了起来，其中有穿红袍的光头喇嘛、军官和士兵，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一小群显眼的西方人，他们是领队“蒙古公”拉尔生^②、奥利弗夫妇（路透社）和贝塞拉特先生（哈瓦斯通讯社）。他们到百灵庙来是为了采访蒙古王公们和中央内政部长^③关于内蒙古独立问题的谈判情况。

大喜喇嘛本人这时也在圣城，他的目的是要为和平解决作出努力。我们的另一位老朋友，库伦^④的“活佛”德洛瓦格根，也出现在人群中。

① 即今甘肃省武威市。——译注

② 拉尔生(Frans August Larson, 1870—1957)，宣道会教士。中文名为兰理训，一译拉逊。瑞典人。1893 年来华传教。后经商。在 1927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活动中任领队。因结识许多蒙古王公，在外国人中获“蒙古公”译号。——译注

③ 指黄绍竑。——译注

④ 即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译注

我们在离寺院一英里的地方支起了帐篷。1929年11月初，我们曾在这附近安营扎寨，这里也是我们同霍涅尔、陈宗器、贝格曼、柏利和伯克塞尔告别的地方。晚上，在我的帐篷中，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豌豆汤、炸肉卷和咖啡，14个人还合影留念。其中有两位非常可爱的女士。一位是奥利弗太太，俄国人；另一位是嘎谢图传教站的蒙古小姐玛利·福德姆。

第二天，生瑞恒和赛拉特赶往驼队，去修理漏油的汽油桶，我和赫默尔、贝格曼及拉尔生驱车来到圣城，然后鱼贯进入寺院。苏尼特右旗的王爷^①在院中扎起了颜色鲜艳的大蒙古包。这位被汉人称为“德王”的权贵，在独立问题上蒙古人中举足轻重的发言人。他身材魁梧，外表非凡，正以其威力和权势为成吉思汗的高贵种族争取独立、自由和荣誉。

我们由一名下属引路，来到作接待用的毡包，坐在木条围起来的火塘四周的地毡上。不一会儿，苏尼特王爷走了进来。他头戴一顶小帽，身穿藏蓝色毛边长袍。他和我们很熟，曾在气派的苏尼特王府款待过我们。这时，他伸出双手向我们寒暄致意。

他先是问了问我们一路上的大概情形，然后非常详细地陈述了蒙古人的独立要求，并力图证明这样做对中国和蒙古双方都有利。拉尔生曾经是他和其他蒙古王公的顾问，为促成问题的和平解决尽过力。结果，达成的协议和决定都夭折了。日本人占领了热河，又步步进逼察哈尔。一年半后，他们又控制了天津、北京和张家口；多少世纪以来联系中国和蒙古的纽带就这样被卡断了，谁也说不准要中断多久。但就在这次见面的两年多后，即1936年1

^① 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蒙古族。简称德王。当时为苏尼特右旗札萨克(旗长)兼锡林郭勒盟副盟长。“九一八”事变后，成为蒙古王公封建上层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的主谋。——译注

月底，我们收到一份北京的电报，说苏尼特王爷已宣布内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准备称帝。

苏尼特王爷询问了我们在新疆的计划和我们的准备走的路线。他对这些问题似乎并不特别关心。也许他认为，“从归化出发经百灵庙，是去哈密的路程最短的最佳路线，我们蒙古人无论如何也是可以左右这条路线上的贸易的”。

下午，大喜喇嘛在最好的一座寺院中接待了我们。一位喇嘛把我们引进一间前室，招待我们喝茶，然后带我们到会客室。大喜喇嘛面带和蔼可亲的笑容，伸出双手前来迎接我们。他请我们坐在铺着毡垫的长凳上，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亚洲地理、欧洲政治和它还残留着的君主制等问题。我们还谈到赫默尔博士的藏地之行以及我在26年前的扎什伦布寺之行。我掏出1926年他在北京送我的金戒指，他笑了。这枚戒指肯定还会给我们这次新探险带来好运。

我没有其他礼物，只能送他《长征记》和《我的探险生涯》两书的中译本。他送给我们3个蒙古人用作鼻烟壶的玛瑙小瓶，十分精美。但更珍贵的礼物是他的一张近照，上面有中文题词和这位高僧的朱红印章。此外，还有他给焉耆（喀喇沙尔）土尔扈特部落首领的一封信。

在我们拜访大喜喇嘛一个月后，达赖喇嘛^①在拉萨去世了。在西藏与中国、俄国和英属印度的关系中，他曾在各种场合起过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位至尊人物的无情和敌视，大喜喇嘛才被迫于1923年从扎什伦布寺逃到北京和内蒙古。达赖喇嘛去世后，他的前景渐渐有了转机。1935年我们在甘肃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到阿拉善，正在前往他自己的和他佛祖的圣地的路途中。

① 即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译注

三、进发戈壁滩

在百灵庙的最后一个晚上，苏尼特右旗王爷和苏尼特左旗王爷回拜了我们。后来，我们又作了大喜喇嘛的客人。在座的还有许多上层喇嘛和蒙藏军官。

夜里，远处传来阵阵铃声，很轻很轻，时有时无。铃声渐渐移近，越来越清脆，随着骆驼迈出的步子响起有条不紊的节奏。驼铃声越来越响，当第一峰骆驼经过我们的帐篷时，那铃声直响得震耳，划破了夜的寂静。骆驼就这样一峰又一峰地过去了，我们总算听到了商队最后一峰骆驼的铃声，听着它渐渐远去。我聆听着，深深为这古老而又熟悉的铃声打动，正是这千百年来回响在商队经过的古道上的特殊旋律，长伴着旅人商贾展开了一幅幅多姿多彩、震撼人心的沙漠生活图景。过了很久很久，驼铃声才完全消失在长夜中。

11月18日早晨，卡车准备就绪，每辆车上载装42个汽油桶，每桶有30加仑汽油。我们买了面粉、骆驼粪和一个比贾贵在归化买的更为轻便的炉灶。由于生瑞恒要赶往圣城去付帐，我们出发的时间只好推迟了。

天气寒冷，我们必须把火盆放在发动机下面给它加热，催它发动。起初我有点担心会不会失火，后来每天都如此，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3辆卡车先出发了，为了避开尘土，车与车之间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乘小汽车，走在最后，开车的是赫默

尔博士,同车的有尤和贝格曼。贝格曼这时正在最后一辆卡车上用三角架架起罗盘,测定方位。我们的地图绘制人员在进入状态后,便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工作。每段旅程的目的地都用小红旗标出,到达一地便在那里插上一面小旗,离开时再拔走。和贝格曼一起干的还有陈和两位工程师。

百灵庙最终消失在我们身后。沙漠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深谷边缘行进,路上要跨过几道峡谷般的深沟。经过其中一道沟时,小汽车的闸失灵,我们一头撞到了沟里,幸好没有翻车。挥锹大干半小时后,我们又上路了。

一路上,不时可看到游牧民的车马队,他们围绕着一口口水井扎下营地。其中一个营地驻扎着蒙古兵,我们就在这里跨过了达尔罕贝尔和明安扎萨克之间的边界。

黑色的土地上,牧草漫漫,一眼望去,呈现出一条又一条黄色的彩带。一座座圆锥形石堆点缀着绵亘起伏的、引人注目的若干小山丘的顶部,当地人称之为“敖包”。其中一座叫巴音博格多,意思是“财神”。有一座叫喀拉敖包,意思是“黑色的石堆”,1927年春夏,我们的总部8号营地周围是一片浅黑色的山丘地带,喀喇敖包就是其中的一座小山丘。南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呼热尔图高勒地区了,当年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

我们周围和往西去便是广漠无边的蒙古高原,似一片汪洋大海。道路平坦坚实,荒草稀疏。一群群羚羊欢跃着从我们身边跑过,身姿优美动人。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飞快地消逝。在地图上标出路线和这片土地四周的主要特征,是要费些工夫的。贝格曼跑前跑后,以汽车为参照物测定方位。小汽车里如温室一般闷热,坐在朝阳一面的座位上,更是热得难受。现在该喘口气了!因为埃费要换轮胎。这时,黄昏张开它的翅膀,扑向沉寂的大地。我们只能借助于头灯和手电继续工作。

我们到达这一天的营地伊克淖尔(大湖)时,生瑞恒和赛拉特已搭起了帐篷。在我这个四面通风的住所,已点起了炉子,油灯照亮了里面的一切。没有床,只在地上铺块帆布,然后放上睡袋,大家盘腿坐在各自的铺位上。汽车停放在通风处,以防发生火情。

正当我们边写日记边等待开饭时,高原上刮起了一场暴风雪。篷布在风雪中猛烈地拍打着,支架给拉扯得吱吱嘎嘎地作响,油灯来回晃动,飞舞着的雪花扑打着帐篷,发出噗噗的声响。我们给汽车盖上了油布,捆得紧紧的。夜晚,整个高原一片银白,像严冬已至一般。

夜里很冷(零下24.6度),但到早晨,地上的一层薄雪已基本融化干净,天空一碧如洗,阳光灿烂。我们正走向一块声名狼藉之地。往南去,在狼山^①另一侧,土匪将军孙殿英和他的队伍盘踞在包头和五原^②之间的河套平原上。达尔罕贝尔和明安的蒙古人常遭土匪洗劫,苦不堪言。这帮野蛮的家伙常在羊肠子沟打劫旅人,而这块河谷地带正是我们此行的必经之地。在中国,往往兵匪难辨。一旦士兵对他们微薄的军饷不满,就会带上枪支弹药开小差,去过那掳掠抢夺、花天酒地的生活。反过来,土匪们又成批地为某一位有魄力的将军效劳,为他的野心卖命。

因此,当11月9日探险队再次出发时,给大家下达的命令是备好枪支,以防不测。子弹带都发给了我们的神枪手。

到达伊克淖尔湖时,我们已走完去额济纳河的五分之一路程,大约600多英里。所以,12月4日左右,我们就应该到达以前曾到过的这条沙漠河流了。但是,并非一切都遂人愿。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组织护卫队,安排日常工作,以使一切都井然有序。绘制地图也是很费时间的工作。而且,越向西走,路面越糟。除此而外,

①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境内。——译注

②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中南部。——译注

还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头4天，一切顺利，可是到第五天，别看这一天阳光灿烂，好像会诸事吉祥，不料现实却碾碎了我们的希望。

夜里，发动机里的油冻得如石头一般，必须花些时间融化它。太阳升高了，生瑞恒和赛拉特开着两辆卡车，从伊克淖尔湖出发了。不久，绘制地图的汽车也接着上路。

驿道坚硬平坦，蜿蜒在土坡和山冈间，路旁长着一簇簇稀疏的小草。到了成达门，生瑞恒意外地遇上几个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他用5个银元买了两只羊，宰杀后还把羊皮送给了牧羊人。

一路上那些用石头堆成的长方形的古墓，可能要追溯到匈奴或突厥的时代了。

在霍宁查干卓拉河河谷，一条小溪缓缓流淌着，已有一部分水面结冰。1927年，我们曾在它岸边安营扎寨，现在有些汉人已在这里安了家。从西边来了一支由593峰骆驼组成的商队，迈着稳重的步子，缓缓行进。商队的3面旗子上写着货主商行的名称。骆驼驮着的是一大包一大包的羊毛，正运往归化和沿海地区。

我们又跨过了一条叫六道沟的小河，它曲曲弯弯向西延伸至黄河河套。这条河在西部的分水岭（海拔5200英尺）已让我们甩在了身后。

汽车在小山岭间行进，在满是砾石的荒原上颠簸。我们来到了羊肠子沟河谷，一条溪流已冻得很坚实。我们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生瑞恒和赛拉特的卡车，在落日的余晖中呈现出黑黑的车影。生瑞恒的车到了河岸，便径直朝前开去。正在前轮刚要过去，后轮也跟着冲过冰壳的时候，卡车却死死地卡在了冰窟窿中。大家一齐跳下车，用镐和锹使劲凿冰。医生试着从另一处河面较宽的地方过去。他用小汽车载着我，开足了马力，冲过了冰面，然后又顺顺当当地回到了东岸，埃费和赛拉特正守着他们的卡车在等候佳音呢！

这时，两位司机激烈地争论起来，最后决定埃费从我们刚才试过的地方开车过河，然后把生瑞恒的车从冰窟中拖出去。埃费使出全身力气，踩足了油门，但他的车子负荷过重，后轮轧进了冰壳，陷进了河床，与此同时，车子底盘的左角也跟着重重地撞到冰上。真是祸不单行，两辆车都掉进了河里。我们只好一辆一辆卸车，把行李扛到左岸，在那里等着。夜幕悄悄来临，我们点起了灯，支起了帐篷。原来打算在夜间通过这匪徒出没最频繁地区的设想，彻底落空了。

燃料不够了。医生开着小汽车到一个新出现的汉人村落乌兰库都克，那里只住着几户人家，贫病交加，孤寂地生活在这凄凉的荒原上。医生给几个可怜的穷人看了病，包扎了伤口，回来时带了3口袋骆驼粪做燃料。

这时，生瑞恒的卡车已开出冰河，并把埃费的那辆车也拖了出来。经仔细检查，发现埃费的车受损严重：后轴箱已报废。晚饭时，帐篷里一片沮丧。

该怎么办？又一场激烈的争论开始了，直到深夜才结束。我们的第一个决定便是设岗哨，两小时换一次岗。显然，还得有些时候才能摆脱这块土匪出没之地。

那辆坏卡车的后部都被拆了下来，倒霉的车身用几个大汽油桶支撑着。第二天一整天都用在彻底检修汽车上，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派生瑞恒和卓木恰开小汽车经百灵庙和归化前往北京和天津，购买一个新轴箱和一辆新卡车。卓木恰的任务是到归化后驾小汽车回来，我们就在原地等他。生瑞恒将开着新买的卡车，并随车带一批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追赶我们。为使他早日归队，我们将放慢西进的速度。

在这次不顺当的勘察公路的探险中，我们不止一次需要保持只有天使才有的那份耐心。鬼才知道，今后还会有什么倒霉事等着我们！身处险境，本该把全部力量聚集一处，可一开始就给搞得

四分五裂。我们不得不在这本不该呆下去的地方白白等了5天。

11月21日早晨,生瑞恒和卓木恰向东出发了。卓木恰原该在当天晚上返回,但一天过去了,又是两天过去了,一点音讯也没有。他身上有通行证,不过这种东西对土匪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有理由为这个单枪匹马的蒙古人担心了。赛拉特试着用羊肩胛骨替他算命,羊骨在火上烘烤后出现不规则的裂痕。最长的裂纹没有延伸至骨颈处,就是说卓木恰走得再远也不过才到百灵庙。但这一卦算错了。卓木恰往返用了3天时间,而不是赛拉特预言的两天。他到底还是回来了,留下的生瑞恒在归化乘火车去天津了。等来了卓木恰,本可以出发了,可是贝格曼病倒了,高烧不止,必须休息几天。尤寅照也是病号之一,埃费的车子掉进冰河时,他的鼻子撞坏了。一时之间,营地成了医院。

卓木恰回来的这一天,运送汽油的驼队经过我们的营地。23峰骆驼每峰驮10个油桶,一侧挂5个紧紧捆在一起,每桶装5加仑汽油。也就是说,我们总共有1150加仑汽油正在运往额济纳河途中。另有14峰骆驼载着队员们的装备和一些给养。

直到11月25日,医生才允许两个病号动身,减员的队伍又开始西进。卓木恰和另一个我们在阿拉什物色的蒙古人乔克敦,被留在羊肠子沟。他们有一顶帐篷和一些给养,负责看守装着780加仑汽油的26只大汽油桶。我们的两辆卡车分载6个大油桶和25个小油桶,总共610加仑汽油。

道路在山谷中蜿蜒曲折向前伸展。一路上不断遇到纵横交叉的溪流,有的冻住了,有的则没有封冻,水还在流动。走着走着,低丘之间的山谷逐渐开阔,而河水还未流到黄河便已干涸得露出了沙子。原野越来越平展。我们开上了缓缓起伏的平地,路旁,一座坟墓上竖着高高的墓碑。狼山犬牙交错的山脊已清晰地展现在南方。我们还不时看到一堆堆骆驼的白骨。狼群经常在这一带出没。黑色的泥土夹杂着熔岩。一群野马奔驰在砾石子路上,像是

要赶上我们的车子。

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沙漠。这一带是有人居住的。我们看到不远处有几座小喇嘛庙。有时还遇到骑马或骑骆驼的蒙古人。这里常能看到大群的羚羊，令人心驰神往。

不多一会儿，我们的车就超过了运汽油的驼队。骆驼看到奔驰的汽车，显得有些躁动不安，不过还没有失去控制。两只秃鹫屹立在山头，好像在等着骆驼肉好美餐一顿。

当天，我们在海留泰河左岸宿营。晚上，汽油驼队追上来了，帮我们驮走了许多行李，这样一来，卡车过河时就可轻便些。

这里地势较低。海拔只有 5 000 英尺。气温也高些，夜里温度是零下 9 度。吃过有粥、煎饼和可可的早餐后，我们开着小汽车驶过了约 200 码宽的河床，它分成三股溪流，其中只有一条没有结冰。我们行进在土质疏松的路面上，车开起来颇有些吃力。遇到骆驼粪多的地方，赛拉特就停下来，拾上几袋，以备当晚点篝火之用。

夜里，我们宿营在洪高林高勒（“爱之河”）河畔，那里立着一个很大的敖包。离营地不远处，许许多多瞪羚跑到河边来喝水。贝格曼举枪击中了其中一只，带着枪伤的瞪羚顿时就消失在草原的灌丛之中。夜色已浓，很难追寻这只动物的行踪。但我们新得到的蒙古地区的狗“彼来”紧追不舍，等我们赶到，那头瞪羚正躺在地上痛苦呻吟。埃费一刀下去，永远结束了它的苦难。

四、等待中

又是一个寒冷之夜，气温达到零下 23.9 度。11 月 27 日，天还没有破晓，我们借着灯光起了床，驼粪都已用光了，帐篷里刺骨地冷。黎明的晨曦渐渐映亮了晴朗的天空。西边大地的阴影在地平线上形成了一个深蓝色的半月形。太阳渐渐升高，阴影向西退却，最后终于消失了，阳光描出了沙漠的轮廓，绘出了沙漠的色彩。我打开帐篷的小窗，阳光照了进来，却没有一丝暖意。在冬日的早晨，没有噼啪作响的炉火，冷得缩手缩脚，要钻出睡袋，穿好衣服，实在是太为难了。

汽车的处境似乎更糟，燃料没有了，无法融解发动机上的冰。一辆卡车总算发动起来了，我们用它牵引另一辆卡车，直到这第二辆车也能开动了为止。

“彼来”爱上了附近一个蒙古包的母狗，不知和它的爱侣躲到哪里去了。我们正要出发时，母狗跑来在快熄灭的营火边找吃的。紧跟在它身后出现了在“爱之河”岸边向它大献殷勤的“彼来”，可惜，它给套上了皮带，被牵上了小汽车，回到原位，一段爱情故事就此结束。

四周是一片草原，我们驶过了几条已封冻的小河和沙砾铺底的淤积的冲沟。几条商队走的路在此纵横交错。有几条只是短途的，通向几座小庙。时而还可遇到汉族商人在毡包或帐篷中开设的店铺。很少见到牧民的毡包，他们绝大部分住在路两旁的低坡地。

我们在嘎谢图宿了营。那儿有 8 大堆用帆布盖住的从归化运来的货物,原定要运往哈密,可是快搁置一年了,因为新疆的暴乱阻断了一切贸易往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中国商栈和 3 座半面毡房半面石墙的奇特建筑。一个蒙古兵站驻扎在四面土墙围起的院子里,负责看守蒙古领主东大公的资产。还有一个关税卡,向来往的商队榨取厘金,即内陆税。但我们到达不久,南京派来一名官员,他的任务是取消嘎谢图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关税卡。

我们继续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路向内陆腹地进发。这一带的草长得很高,可是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入了高低不平的荒原。现在海拔又高到了 5 660 英尺。一群群羚羊,有的在路边吃草,有的在山顶上游荡,它们纤弱的身影十分动人。它们奔逃时的举动很奇怪,总爱在飞驰的汽车前横奔过去。

通过一个山顶上垒有敖包的小山口后,我们放弃了以前走过的老路,开始往南行驶。1927 年夏,我们曾走过一条通过狭长的莫尔古奇克山谷的路,往南边看去,不远处是一片深暗色的山丘。1926 年,欧文·拉铁摩尔也曾走过这条称为“曲折之路”的路线,而且出版了一本书,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这次旅程的经历。^①我们现在走的是 1889 年荣赫鹏爵士^②曾走过的路。还有一条路,往北走得更远,但现在已没有人走了,因为有一段路要穿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或称外蒙古)。

眼前的景色荒凉单调。西边的天际堆起一团团灰蓝色的云,一丝清爽的凉风徐徐吹来,这风吹过原野上稀疏的几丛草木,旁侧的风口处立时出现了一堆堆小沙丘。

我们的帐篷又一次扎在温音乌苏小溪旁,溪名的意思是“牛之

① 该书即《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

② 荣赫鹏(1863—1942),英国军人。19 世纪末期曾赴中国东北、蒙古、新疆等地活动。1903—1904 年率侵略军进踞拉萨。——译注

水”。随后不久来了一辆载着 11 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汽车，显得有些奇怪。他们既无帐篷，也无给养，更不知走哪条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宁夏。他们一路上边走边问，晚上就寄宿在商人或牧民那里。他们从归化出发，路上要经过阿拉善的王爷府。汽车是在天津为马鸿宾^①买的，他负责抵御孙殿英的军队，其堂弟马鸿逵^②是宁夏省的行政长官，也是大名鼎鼎的马福祥^③的养子。目前，马步芳是青海省的地方长官，坐镇西宁。这几个姓马的同属一族，都是东干人和伊斯兰信徒。“马”姓既意味着穆罕默德，也是马匹的意思。人们当前常说“五马”，即指以上几人。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要和他们同族的另一位成员——“大马”成为亲密的朋友。

当晚，一支由 32 峰骆驼组成的商队也来到了温音乌苏河畔。它来自额济纳地区，是将毛皮运往包头，准备到海留泰河找一个从包头来的人，来人会告诉他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孙殿英将军和他的匪兵所把守的地带。如果没有可能，商队就去归化，到那里卖掉皮货，买上做饭锅、平底锅、桶和其他一些铜铁器，然后返回额济纳地区。商队的主人是两位商人，这趟路一年可走两个来回。他们情绪激愤地告诉我们说，从额济纳河向西走 7 天路程，就会遇到外蒙古打劫商旅的强盗，到哈密的一路上也随时都会有土匪出现。

① 马鸿宾(1884—1960)，回族，甘肃临夏人。1912 年随其叔马福祥进驻宁夏。1930 年后由南京政府委任暂编第七师师长、甘凉肃州边防司令、甘肃省代主席、主席等。1949 年在宁夏中卫一带率部起义。此后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译注

② 马鸿逵(1892—1970)，回族，甘肃临夏人。1933 年任宁夏省主席。以后历任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甘肃省主席等职。1949 年后逃至台湾。——译注

③ 马福祥(1876—1932)，回族，甘肃河州(即今临夏)人。早年曾护卫慈禧太后等西逃。历任西宁总兵、宁夏镇总兵、绥远都统等。1921 年投靠蒋介石后，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译注

我们觉得有必要休息一天，于是作出了决定。贝格曼又病了。有一两个仆人也在头痛发烧，卡车也该上上油，检修一下了。

气温有所升高，11月29日夜里达到零下10.5度。查理十二世^①纪念日那天早晨，阴云密布，午后才渐渐转晴。

我开始整理笔记。赫默尔把小汽车变成了一间明亮、舒适、温暖的小书房。我可以看到前面是我们的帐篷，后面是汽油驼队，正准备卸货。我们升起了旗帜，庆贺查理十二世纪念日。

12月1日，碧空如洗。夜间温度高达零下6.3度，在这个季节有些反常。贝格曼病得只好躺在睡袋里，黄疸不是一下子就能恢复的。我们本来出师不利，从一开始就百般遭难，除了耐着性子，又有什么办法？好在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驼队的4个人要在20天内把汽油运到额济纳河，决定让他们到瓦音托尼宿营，在那里等我们。可以肯定，在我们到达额济纳河以前，不会再碰到他们了。

曾在百灵庙遇到的那一伙土尔扈特香客和他们的53头骆驼来到我们的营地，他们共20人，身着红、蓝两色的皮袄，这种色彩绚烂的服装，看上去似一幅画一样。其中一个古铜色面庞的活泼可爱的小伙子，来到我写笔记的车前，毫不犹豫地坐到了车子的前排座位上，直到他父亲喊他出发才离去。这群人也渐渐消失在西边的山里。

医生从我们附近的几个汉族商人那里借了一顶大毡房，给贝格曼搭起一所临时的医院。

12月2日晚，气温升到零下4.9度。大家都在惦记生瑞恒：他怎么样了？在哪儿呢？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一轮满月把银辉洒在寂静的原野上。听不到丝毫声响，没有商队经过，无论是东方

^① 瑞典国王。——译注

或西方,都音讯杳然。基督降临节^①的第一个星期天,拂晓时分,便迎来了万里晴空,仅在远处地平线上轻飘着几缕白云。

埃费载着陈宗器开车向南,来到1927年我们曾走过的老路,以便和那林一道完成三角测量。车很快又回来了,但陈是步行回来的,好边走边画些草图。

赛拉特用羊肩胛骨算卦,预言生瑞恒会在12月16日返回。他离开我们已经两个星期了。长时间毫无结果的等待往往会涣散军心。但大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烦躁与不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3位中国朋友——陈宗器、尤寅照和龚继成,他们在任何境况下都那么镇定自若。他们是哲人,是乐观主义者。汽车深入亚洲腹地的探险,虽然从一开始就屡遭各种挫折,但在他们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埃费买了3只羊,宰了,又和赛拉特一起打了3只羚羊。我们又有了足够的肉食供应,向西去的旅程不必再依靠游牧民了。

花了一天时间收拾帐篷,卡车之间拉起绳子,睡袋、毯子和枕头统统拿了出来,好好拍打了一番。等晾晒完毕后,我们觉得自己的窝舒服多了。

12月4日晚,周围死一样的寂静,片片白雪在帐篷四周飞舞。我们会被雪埋起来吗?生瑞恒会不会困在途中?我们没能好好利用初冬的好天气和月光皎洁的夜晚。现在却迎来了漫天大雪。沉住气!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为了中国政府,我们必须出色地完成已承担的使命,这可是有关荣誉的事。

整个夜晚,雪花像一顶顶从天上掉下来的小降落伞飘落在帐篷上,耳畔只有极微弱的窸窣声,几乎很难听得清楚。积雪渐渐压弯了帐篷布,封住了所有漏风的地方,帐篷中反而比平日暖和了。

^① 基督教的节期,指自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的星期日起,至圣诞节为止。——译注

第二天早晨，雪仍在继续下，不过接近正午时，太阳破云而出，覆盖一切的白雪很快便消融了。

医生还是个出色的厨师，晚餐时，他做了个排骨。离开北京时，我们忘了带扑克，尤寅照的一双巧手却用我的名片制作了一副。在中国，必须在每一个关税卡，每一处哨所留下名片，更不要说遇到新疆有地位的人，可是谁也没想到它还会派上这个用场。好在我有足够的储备，因此欣然贡献出了我的名片，以飨我们之中的桥牌爱好者。牌一做好，他们就玩了，牌局在贝格曼暖和的毡房里展开，一直到凌晨1点30分才结束。

后半夜，我被一场西南方向刮来的风暴惊醒，帐篷眼看有被狂风掀翻的危险。于是，全体动员起来，有的用锤子把拴帐篷的桩子往冻硬的地里打得更牢固些，有的把油桶滚到帐篷那里，把四周的边压得紧一些，这样就可使我们这四面通风的窝增强些抗风的能力。狂风吼叫着，撕扯着；帐篷布呼啦啦地拍打着，不时可以听到我们同伴的喊叫声、警告声。不一会儿，一切重又平静下来，只有风的哀嚎声划破长夜的寂静。

第二天早晨，天阴沉沉的，空中充满寒气，令人郁结。我们迟迟不愿爬出温暖的睡袋。我叫醒埃费，让他把汽车开到上风处，以防早晨营火的火星把汽油点着了。

埃费完成任务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点起营火，起床穿衣，到“医院”去吃早饭。晚上，医生为我铺床时，一只跳鼠蹦了出来。在别的帐篷以及毡包里，也发现了这些被从冬眠中吵醒的小东西。或许暖烘烘的营火使他们误以为春天已来临，甚至会误以为今年冬天出奇地短。

7日拂晓，埃费和赛拉特开着一辆空卡车，出发到羊肠子沟河畔的营地去，卓木恰和乔克敦在那辆坏车旁等着生瑞恒。他们的任务是在营地呆上3天，然后装满汽油回到我们这儿来，这主意纯粹是想让生瑞恒减轻几天负担。

一支由 12 峰骆驼组成的商队从额济纳河出发,路经我们营地,准备前往包头。我们把信件交给赶骆驼的汉人,托他们交给包头的邮局。圣诞卡早些寄出,以便能及时到达我们家人手中。在这无垠的荒漠深处,只有东去的商队才能把消息带到外面的世界去。

11 日晚,一辆卡车的头灯,如同野兽的眼睛一般穿透黑暗,由远而近,是埃费和赛拉特载着 16 大桶汽油回来了。他们在那辆坏车旁找到了久候得已不耐烦的、情绪沮丧的蒙古人。

当晚,悠扬动听的驼铃声告诉我们,又从西边来了一支商队。被指定负责邮政的龚继成赶忙招呼大家把信件准备好,因为第二天早晨商队就要继续往包头赶路了。这支商队共有 169 峰骆驼,满载着羊毛;一行共 25 个雇工,一名商人以及他的妻儿。两个月前,他们从安西^①出发,沿着北山南麓的一条人迹稀少的路,来到额济纳河岸的巴音博格多。他们看到,河没有结冰,流成一条水道,深三四英尺,骆驼通过时很费劲。他们继续行进到毛目^②,然后沿着额济纳河,穿过沙漠,来到了温音乌苏河畔。一路上,他们在两个地方不得不缴纳 1 300 银元的内地关税,到包头之前,还得被这样的吸血关卡盘剥一次。他们在安西以每 4 元 100 斤的价格买进羊毛,运到包头后,可以 21 元的价格售出。如果没有关税盘剥,每年跑两趟这样的生意,本来是可以赚大钱的。

这支铃声悠扬的商队有一个厨子,帐篷搭好后,他为大家做了顿可口的肉末拉面。按照商队的老规矩,厨子是可以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例如,他可以把他的全部物品、水罐等放在走在前而的骆驼身上,这样,别人在卸货和搭帐篷时,他便可做饭。一路上宰羊剩下的羊皮也都归厨子所有。

① 县名,在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译注

② 旧县名,在甘肃省西北部,后并入金塔县。——译注

商人告诉我们，安西平安无事，那儿和“皇家驿道”即“丝绸之路”上的肃州、甘州^①一样，是马步芳将军控制下的一片绿洲，他已封锁了甘肃到新疆的各条道路。

他们还听说，入侵者马仲英将军——号称“大马”——已在吐鲁番设立自己的司令部，并有3 000部下由他调遣，哈密还有他的一个小分队，他们极力劝阻我们，如果没有确实是马仲英亲自签发的通行证，千万不要去哈密。他们还告诫我们说，额济纳以西的山区维吾尔和哈萨克土匪到处出没，但又说，也许土匪不敢袭击我们。

我们商量着是否能走经过毛目的那条路，但现在做出任何决定，都为时尚早。我们一定还会继续得到更多更为可靠的消息。我们最感兴趣的倒是获知北山南麓有一条从安西到毛目的沙漠之路。

现在我们在温音乌苏河畔已经呆够了！尽管白天像春天一般的微风吹着我们的帐篷，赛拉特还是警告我们，这里的严寒和大雪之吓人，是很有名的，其厉害程度，在蒙古的这部分地区的所有驿路中是首屈一指的。贝格曼已肯定了这一点，在这一带他曾有过两次遇到大雪的亲身体验。

贝格曼体力已恢复，至少可以乘汽车坚持到额济纳河。我在12月13日下达指令，让大家作好一切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旅程的新阶段就要开始，我们又要向幅员广袤的新疆省边界迈出新的一步了，这是一块令我们充满梦幻的土地，还不知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结局呢！

^① 即今张掖。——译注

五、生瑞恒归来

大地的阴影渐渐退到西边,呈现深蓝色的月牙形,天边映衬出一片晨曦,鱼肚色的天空清澈如水,当我们走出帐篷时,已是12月14日的早晨了。

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边吃边整理帐篷和行装,并把它堆放到卡车装载物的上面。上车后,车队开始的方向是向南,再转向西南,准备从北路绕到从莫尔古奇克延伸而来的南路。出发地离南路仅9.5英里之遥。

我们行进在花岗岩的小山间。路右边,竖立着约由30块石头组成的一排石阵,足有50码长。贝格曼讲了一个关于石阵的故事,这是他从一位年长的旅人那里听到的。老人去过大汗的汗廷。据说这些石阵是突厥人竖起的,标志着他们在一场战斗中杀死了多少敌人。这是蒙古地区东部常见到的现象。

汽车颠簸在杂草丛生、凹凸不平的路上。马达声惊动了一群正在安静吃草的野马和羚羊,它们机警而飞快地逃开了。南面的群山是狼山的一部分,干涸的河道从山间向西南方向蜿蜒而去。河床是沙质的,很松软。夏天要通过是相当困难的,常常花上一个小时才能前进3英里。

到达南路时,我们遇到喀尔喀部的两名香客,一男一女,正在路边休息。他们是步行而来的,既没有牲口可骑,也没有牲口为他们驮行李,看到他们背负的行囊,令人惊诧不已。一个用羊皮包得好好的婴儿正躺在背袋里,还携带一顶小帐篷、衣服、食品等物。

手上还拿着行路人拿的手杖。

走着走着，来到了老虎口，峡谷里满是硕大的圆石，牲口拖拉的大轮子车也很难走过这条道。我们现在行进的这条峡谷，两边是风雨剥蚀得光秃秃的山丛。

1929年12月20日，当贝格曼经过此地时，积雪深达一英尺，气温低到零下30度。但是昨夜的温度是零下15.7度。

在谢列本山谷，一支来自凉州的东行商队正在休息。我们在这深深的山谷经历了一番艰难困苦后，终于摆脱了老是盘旋在头顶的乌鸦，又来到了开阔的原野，总算松了一口气。荒原上的草长得挺高，就在这荒草丛里，我们竟又遇到了一支从凉州来的羊毛商队，汉人骑手们身穿色泽鲜艳的衣服，坐在高大的骆驼上，显得好自在。

接着经过了达尔乌兰散包。1929年，贝格曼、柏利、霍涅尔和伯克塞尔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圣诞节，然后分道扬镳，去从事各自的考察。由于道路崎岖，土质疏松，我们行进的速度很慢。

路上还遇到一支经额济纳到肃州去的商队，满载着衣服、蜡烛、茶和哈德门香烟等货物。和他们同路的还有一群骑着马和驴的旅人。附近有几座毡房，住的是一个汉族商人。他向过往商队出售牛奶等东西。一支从宁夏来的规模很大的商队，显然是在走私鸦片。他们把鸦片放在小盒里，然后藏到大捆大捆的羊毛中。

左侧的天边高高屹立着巍巍狼山，近处是一座深色的平顶小山特布奇。在过去的探险中，曾在那里发现异常丰富的化石，其中有生活在沼泽或湖泊中的巨型蜥蜴类化石。5点半时，车停在哈拉陶勒盖即“黑头”，——因附近一座黑黝黝的山丘而得名。

夜间温度降到零下19.1度。早晨，太阳如同一颗闪烁的钻石升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9点钟，车子里边仍是暖暖的，但外面却是刺骨的冷，要是接触到金属，那就更冷了。这里的原野起伏低缓，似波浪一般，一眼望去，线条十分清晰。我们一会儿跨过一条

只有夏天雨后才有流水的宽阔的河道，一会儿又在低山间颠簸，有时还遇到宿营的商队和一群群吃草的羚羊，在山顶上常可看到它们那轮廓鲜明的、文雅的身影，直到向西远去，才消逝干净。

向东望去，给人以辽阔之感，如同在汪洋大海上一一般。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只需两天功夫就可到达大名鼎鼎的寺庙之城三德庙，1927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舒心的时光。

途中，我们发现路边有两顶帐篷，就停了下来，一边休息，一边等候落在后面补车胎的赛拉特。一支由100峰骆驼和12名雇工组成的驼队，也在这里休息。他们一个月前运着中草药，从肃州出发，准备到归化去。据说货物的卖价可高达每100斤20块银元。骆驼的主人是两个汉人，是租骆驼运货的两个商人。他们把我们请进一顶烟薰火燎的大帐篷，挂在铁环上的两口锅正在火上煮吃的，热气腾腾。主人用装在瓷杯里的茶和肉面汤款待我们。到汉人商队的帐篷中做客，总是令人非常愉快。帐篷里可能满是烟尘，但你总感到自己很受欢迎，而主人也把你的光临看做是一种荣幸和体面。在中国的漫漫驿道上能体验到，在商人和骑手们的帐篷里度过的光阴，就如同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引人入胜，令人神往。这些上天造就的商人，多少世纪以来就是这样生存和奔走在块大地上；他们的商队生活，一如苍茫的往昔，可追溯到神话时代，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远古时代，在响彻亚洲广漠空间的阵阵驼铃声的伴随下，他们一步一步前进着，本质没有丝毫改变：仍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骆驼，一样的原野，一样的天气……没有一点点值得一提的变化。中国人的商队，是完全特殊的一群，是凭借古老的规章、传统和习惯结成的兄弟关系，谁要胆敢触犯这些规章、传统和习惯，谁就将永远声名狼藉。

中国商队的每一个骑手都有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幽默感。他的生活可能总是充满艰辛、困顿，然而他却又从来都是快乐而满足的。他能满足于每月仅两先令的工钱和最简单的食物，令人不可

思议。他要走无穷无尽的路，牵着骆驼缰绳，洒下一路歌声。他的耐心和坚韧是无与伦比的。在冬天，他常常在夜间行走，因为骆驼需要借白天的光亮寻找又硬又干的骆驼刺^①充饥。

终于到了下一眼井边。骆驼被一串串牵过来，一眨眼工夫，货物便全都从卧在地上的骆驼驮鞍上卸了下来。然后，骆驼被牵出去在白天的光亮下去寻找草吃，吃完便牵到井边饮水。水是用柳条筐汲上来的，再倒在木盆或木槽里供饮用。渐渐地，商队的人都聚到帐篷中，锅里在沸腾，茶壶在冒蒸气。有一种长长的旱烟筒，烟窝是用白色金属做的，一旦人们拿出点燃并抽起来，顿时便对生活心满意足。这时候再也听不到歌声了，人们吃着，喝着，抽着烟，聊着天，讲讲故事，谈谈每天的见闻。接着一个个铺开羊皮袄，倒在帐篷的地上，呼呼入睡，任凭虱子在他们身上大开血宴。

日落西天，分手出发的时候到了。这些睡眠惺忪、衣衫邋遢、常年不洗澡的过路客，站起身来，到草场牵回骆驼，熟练敏捷地把它们赶往行李旁，使劲一拽缰绳，骆驼立时跪下，卧倒在地，这时人们用力把货物抬到驮鞍上，再用绳扣捆牢。

对一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来说，几百峰骆驼的商队整装待发的过程，如此神速，真如魔法一般。几分钟功夫，帐篷也收起卷好，搭到了骆驼背上，连同营地的全部用品都由它来驮。一串串骆驼出发了，响起了阵阵铃声。弯弯曲曲的、长长的行列静静地上路了，向远处荒寂的、历经风霜雨雪的群山走去。

我们的车队来到已干涸的察罕高勒即“白色的河”那里，河床很宽，先向北然后向西北蜿蜒伸去。过河后，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车在一簇簇草木间绕来绕去走着，路面变得很糟，我们横穿了3道深深的峡谷，颠得够呛。我们离开了左侧的狼山支脉，山显得黑沉沉的。在北方，远远地可看到淡蓝色的群山轮廓，其中一座山峰高

① 分布在中国西北和内蒙古的一种灌木，可作骆驼的饲料。——译注

耸入云,可能在蒙古共和国境内。又过了几道险谷,车队到达了位于松杜尔的11号营地,一个做买卖的中国商人正在卖羊肉,不过3个星期以来,我们已经吃够肉了,便纷纷到不远处去拣了许多干柴。

第二天,迎接我们的是暗沉沉的阴天,不过将近正午时又转晴了。我们的邻居——那位商人告诉我们说,去年这时候,积雪有3英尺厚。我们的运气算是相当不错了,已安全度过了三分之一的冬天。尽管有人生了病,车子也出过麻烦,但这些不经摔打的车子已经算表现不错了,能完全经得住蒙古高原折腾的车子还没有造出来呢!

来了一伙蒙古人,共20个,其中有妇女和孩子,他们从我们的营地前走过,刚进完香,正赶着回家。

下午4点钟,从西边传来汽车的马达声。3辆卡车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摇摇晃晃地颠簸过来,不一会儿,裹着厚厚的尘土,嘎然停在了我们的帐篷前。这是归化一家汽车公司的车子,在哈密被扣了两个月,到底也没有获准去乌鲁木齐。最后,马仲英将军放了他们,司机开足了马力,像逃命一样,只用了8天时间就从哈密开到了松杜尔,从额济纳河赶到松杜尔却占了3天时间。

车队行李不多,上面有19名旅客,其中有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莫(音译)先生。我们请他和另一两个人停下来喝杯茶,但他们执意要以同样的高速继续向东赶路。因此,我们也没能打听到多少消息。他们离开哈密后,沿北山南麓而行,没有遇到土匪。莫先生曾坐车到马仲英驻扎的吐鲁番,将军对他彬彬有礼,对建造公路颇为关注。莫先生说,我们不必怕他。他还说,新疆很平静,所有的军事活动都已停止了,盛世才将军驻守天山以北的边界,马仲英则把守南疆。总的来说,莫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是令人安心的好消息,并给人一个感觉,一切都会顺利的。不幸的是,莫先生对我们撒了谎,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人跳上车，踩足油门开走了。车子如滔滔大海中的几叶扁舟，时隐时现，不一会儿便消失在深山幽谷中。

17日凌晨4点半，我们就被叫醒了。好在用放在铁制火盆中的烧红的煤块，给冻冰的发动机加热要费些工夫，所以我们每次都有充分的时间爬出被窝，穿衣，吃早饭。我准备停当，帐篷也已收好，这时我照例钻进小汽车，好躲开这刺骨的晨风。

我们正要出发，一群阔绰的蒙古香客姗姗而来，他们身着蓝色羊皮袄，头戴体面的羊皮帽子，煞是鲜艳悦目。他们去了狼山脚下三德庙以南的隆巴奇，现正在归途中。10峰骆驼供人骑乘，另10峰驮行李。这些骆驼在牲畜中可算是雍容华贵，尤其那惹人注目的直立驼峰，更使它仪表非凡。香客们点起旱烟，一边抽烟，一边好奇地打量我们。

又到了出发的时间，我们各就各位，沿着前一天客车走过的路，向西驶去。时而通过砂砾地段，时而横越沟壑，时而出没于草丛。路过一道沟壑时，只见两边都是海滩一般的斜坡，一边还有一个目标明显的敖包。到了这里，我们的车只好一会儿用最高档，一会儿又换到第三档或最低档，完全要取决于我们所在路段的地质，不停地换挡。

羚羊随时可见，已不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渐渐地，在我们前面升起几座轮廓清晰的小山峰，叫巴音温都尔，意思是“富贵之巅”。往下走，我们还是绕过带有峡谷状分支的可怕的深沟。在这一带丘陵的南面，也就是我们的左侧，便是圣城三德庙。我们驶过也在左侧的巴音温都尔。在右侧，只有那么一棵孤零零的树，好荒凉。

穿过低山丘陵，又是一马平川。地面多沙，又软绵绵的，车速最高也只能达到每小时3英里。路旁零星散落着一簇簇梭梭树丛，或叫“扎格”。北边的地平线起伏着一个又一个光秃秃的流沙堆，彼此相隔的距离都差不多。

太阳如一团烧红的火球，徐徐落下。到天快黑时，我们就在贡

库都克(“深井”)搭起帐篷宿营。这天夜里的温度是零下 13.5 度。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已是乌云密布,还飘着几片雪花,冷得都不敢出气。我们反正不会受冻,搭帐篷的山沟里全是柴火。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真正的沙漠。到额济纳河的一路上,我们不断碰到旅人行客,在水井边,常能看见汉族商人的帐篷和蒙古人的毡包。神采奕奕的骆驼和精神抖擞的马群在附近悠闲地吃草。

我们尽找坚硬的砾石路走,可惜有的路段已被破坏了,成了一段一段土路。我们的右面,是缓缓起伏的美丽黄色沙丘,有着如海豚脊背一般光滑的曲线。出发不久,便刮起了强劲的北风,霎时间,暴风雪铺天盖地而来,我们都辨认不出是在何处,唯一的标识——西北方向的一座山——如今竟一点也看不见了。地势越来越低,到昨天为止,我们已经下行了 1 000 英尺。在低洼地,生长着许许多多怪柳,走在前头的赛拉特停下来折了几捆,要不是他,这时谁也想不起来要找些柴火晚上取暖用。我们还不时看到以前留下的车辙,有的是亨特和菲施巴赫尔两位传教士在 1932 年留下的,有的则记录着古斯塔夫·蒙杰尔和生瑞恒于 1930 年留下的足迹等等。

大地一片洁白,几棵冷冷清清的榆树的枯枝从雪中探出头来。道路沿山脚向东伸延,非常好走。在察罕库都克(“白井”),长着一些树。还有一个水槽,是用一根树干凿成的,骆驼和马可以在此饮水。一道穿行在坚固的峭壁之间的河床,为行人提供了一条很好走的路。路旁长着许多树,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显得非常悦目。

到了霍亦儿阿玛图,我们又踏上了开阔的原野。那儿有一个较大的村子,大约有十座毡包和几户住帐篷的商人,还有汽车公司的一个汽油桶。不久,车队驶过了一段完全荒漠的戈壁滩。在我们右侧,仍然绵延着起伏的沙丘,只是此时海豚般的金黄色曲线,已被雪染成银白色。在几座孤零零的高高的土丘上还长着些灌

木。萨格拉林是一条直通阿布德尔的河床。路上看到了几处树丛，十分讨人喜欢。等到达沙漠中的第 13 号营地时，我们总共才走了 50 英里左右。

夜里温度降到零下 20 度。12 月 19 日早晨，空气格外清新，天空格外晴朗，我们甚至能看到远在西边地平线上群山清晰的轮廓。车队沿着骆驼踏出的路继续前进，地面如最结实的水泥路那么坚硬，在有些路段上，车速竟能达到每小时 30 英里。开始我们看不到任何植被，后来原野上又出现了一丛丛杂草。如果到新疆的路都像这样，就完全没有再筑路的必要了。

在阿布德尔（“盒子”），一座山峰拔地而起，像一座碎石块拼成的金字塔，在周围荒原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南边的远山中，有两座高峰，看上去像一对驼峰。那里有一口清水井。我们很熟悉这个地方，探险队中有几个人曾在过去的冒险中在此收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工具。

道路在巨大的峡谷中延伸着，两边都是被风雨侵蚀成奇形怪状的红色斜坡。经风雨剥蚀的石头随处可见，却看不到一丝绿色的生命，整个景观在荒凉之中给人以悲壮的感触。我们渐渐走入迷宫般的曲径，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的走廊夹在红色和黑色的丘陵斜坡中缓缓向前延伸，正在疑无路处，突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片平坦戈壁沙滩，一堆一堆沙丘绵延起伏在它的南边。我们刚刚跨过蒙古共和国的边境，今日行程的终点站音根^①井就外蒙古境内。一向是探路好手的赛拉特，领着车队向一座孤山驶去。他的卡车和小汽车顺利地通过了淤满泥沙的河床，但埃费的车却沉沉地陷了进去。我们把一尺宽的长长的帆布铺在沙质的河床上，卡车才在它上面重新滚动起来，开了过去。

没走多远，又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只不过麻烦更大，耗去的时间

① 原文为 Yingin，应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部。——译注

间也更多。拦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洼地，沙里长着梭梭树。好一会儿没有听到埃费的车声，我们便回过头来去找他，担心会出什么事。果然，他的车在灌木丛中被卡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他是沿着我们在沙地中留下的湿湿的车辙行进的。现在，用帆布已是无济于事了。大家把干柴枕在车辙上，可车一压，就像玻璃一样被碾成碎片了。赛拉特想法用车把埃费这辆倒霉的车拖出去，可牵引的绳子像线一样不结实，拉几下就断了。好吧，看来我们只好卸车了。埃费把车子发动起来，赛拉特开车在前面拽，众人在后面推，车终于开上了硬实的地面，又重新装了车，有一两个人利用这功夫连晚上用的干柴也拣好了。

车队继续向前。周围死一般沉寂。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见不到一点人的踪迹，听不到一点响声。这就是戈壁，这就是沙漠，这就是死寂之源。在西边和西北边的地平线上，低低的犬牙交错的山峦，似幻景一般，忽隐忽现，仿佛是悬在空中的一串黑色珍珠。

我们在音根井畔沙土地上支起了帐篷。这里的井也叫“母驼”井。北头的一口井在外蒙古，南边一口在内蒙古。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旅程在外蒙古土地上通过，两口井之间正好是边境线。

地上铺着厚厚的沙层，而沙子常给人们一种净化的感觉。到处都有梭梭树。天暗下来时，年轻快活的埃费点起了一堆篝火。这也许会引来蒙古边防骑兵的注意，他们受命于苏俄，常在音根井一带巡逻。旅客要是落到一群边防骑兵的手里，那就要倒霉了。他们会被押到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红色勇士之城”）即过去的库伦，然后接受审查，甚至可能有被长期扣押的危险。

但是我们没有见到骑兵，实际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见到。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还是决定在音根停留一天。陈宗器要在这里测量方位，而尤寅照和龚继成要带着司机赛拉特去探探是否还有一条更靠南的路线，因为我们绝不能鲁莽从事，将来提出的中

国公路路线是绝不允许跨上外蒙古领土一分一厘的。

晚饭后，“母驼”井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如同坟墓一般。埃费的篝火余烬冒着几缕青烟，缭绕盘旋升向星空。

12月20日夜，温度计上水银柱降至零下22.3度。我们的休息日，常用来完成各种工作。机械师修理轮胎，工程师去探寻靠南边的路线，贝格曼则收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第二天晚上，我们度过了零下23.3度的寒夜。隆冬就要来临。埃费点起了火，柴火噼噼啪啪地作响，给我们带来无限暖意。朝阳刚刚从沙丘后探出头来，宛如一颗硕大的宝石，我面朝火堆，背对着太阳，大地的阴影渐渐西去，直至最终消失。柴烧完了，留下了一堆余烬。梭梭树的影子在渐渐缩短。原来打算趁早出发，却未能如愿。有一台发动机发生了短路。贝格曼查出了毛病，原来发电机被震松了，碰了电线接头的地方。这样，很快就修好了，车子总算嗡嗡启动，又上路了。我们离开了沙土带，开上了硬实的路面。南面是一块有些发黄的灰色土地，地势很低，它一直延伸到离额济纳河很近的地方。低地再过去一些，能隐约看到3条深暗色平行线，可能是原来的河岸阶地。

寸草不生的红色丘陵、敖包和偶尔发现的骆驼遗骨，成了这条路的点缀。有时可看到山顶上堆着一个有骆驼头骨的敖包，也像点缀似的。还看到两块歪歪扭扭立着的石板，也许是碑石。看不到一点生命的痕迹，只有沙漠。

在音根时，我们呆的那块洼地海拔只有2100英尺。现在开始慢慢爬升，走过12.5英里后，我们所在的地方已高达2300英尺。一支小小的商队正在霍龙博硕克井边休息。往前去，是布满小山丘的一座迷宫，穿行在山间的路很好走。通向井边的一些小路常有敖包作标记，它们都有名字，商队的人是很熟悉的，不过遇到暴风雨或沙暴，便很难找到了。我们又穿过了一座迷宫，里面布满了一座座黑色的小山岭和严重风化了的深绿色石板岩。绕出这

座迷宫后,地势又平坦了。

到了班特陶勒盖(“秃头”),我们稍事休息。那儿有14座毡包和一个简陋的小铺子。店主把茶、皮革、羊毛等货物都堆放在稍离地面的架子上,以防流沙。我们接着沿一条沙带急转南下,沙地里满是枯枝残木。我们索性就地宿营,又点燃了一堆篝火。和往常一样,我们都随身带着水。晚餐很简单,只有汤、口条和茶,因为在班特陶勒盖时,店主已经用大概是一流的小肉包子招待了我们。我们的厨师贾贵也是制作这种亚洲佳肴的好手。

驱车横断戈壁,在某种程度上是单调乏味的,可更有难于言表的魅力。穿越这无垠的沙漠时,呈现在眼前的是犬牙交错的小山岭,在那低矮的山丘顶上竖着像术士化石般的敖包,无数干涸了的浅浅的河道,纵横交错在广阔的平原上,一座座沙丘好像波浪一样有规律地随风流动,真是景象万子。每到晚上,或枕清泉而宿,或傍营火而眠。夜来在铺在地上的睡袋里做做美梦,早晚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每天过着只吃两顿饭的简朴生活。从一处营地到另一处营地,无论是沙漠或是草原,日复一日展现的都是平淡而又荒凉的景观。可是,从来没有人厌倦过,而且还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凡是到过沙漠的人,总是渴望能旧地重游。这广袤无垠的大地,如同大海一般,使人就像着了魔一样地迷恋着它。

远处的群山渐渐变蓝,呈现出一幅蔚为壮观的景色。微微起伏的大地似大海波涛汹涌,一浪推向一浪。人只有在疲乏不堪时,才能在车中入睡。可睡不了多久,不是被颠醒,就是被驼铃声吵醒。不断有各种东西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轻快跳跃的羚羊,老鹰,野兔,偶尔出现的狼,等等。唯一需要我们耐下心来做的,便是绘制公路的路线图。这是必须做的事情,虽然耽搁时间,但我们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每天的旅程都那么单调乏味,很少能出现像间奏曲一样令人振奋的事来打破这沉闷的气氛,而车胎被扎破、卡车陷进沙地里这

类倒霉的事倒时有发生。不过我们对此类小事故也早习以为常了，采取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

然而，12月22日早晨，出现了极不寻常的情况。8点钟，我们准备就绪即将出发，就差把已卷好的帐篷和支架捆到车上去了。我和贝格曼正在令人舒服的营火边闲聊。突然间，贝格曼转过头去，凝神静听，好像东边寂静的沙漠里有什么动静似的。

“怎么了？”我问，

“我好像听到有汽车声……等等，现在听得很清楚了！”

“是的，没错，是辆汽车！”

过了一会儿，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顶部出现在东边最靠近的一片台地上。

“是生瑞恒！”贝格曼喊道。

“他只弄到一辆车吗？”

“不，又来了一辆！”

卡车沿着我们留下的车辙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不一会儿，就停在了营火边。大家都跑过来，欢迎他们思念已久的伙伴。自从11月21日早晨生瑞恒和卓木恰离去后，我们一直在失望中苦苦等待他们归来。当然，卓木恰很快就回来了，但生瑞恒总是杳无音讯。最后，我们干脆把他“排除在外”，不再去思索是什么神秘的原因使他如此姗姗来迟，——因为想也没用。他也许在北京或天津病倒了，也许在归途中遇到了土匪，反正无法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现在，12月22日早上，他却如此出人意料地出现在这荒寂的沙漠里，而且按我的命令带回了两辆卡车！这时，他的车已停下，人也跳了下来。

大家用欢呼迎接了他。

“出了什么事？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们在营火边坐了下来，听生瑞恒讲他的经过情形。他在归

化买好所需物品后,便急忙赶到天津,从福特的代理人那里得知,我们从归化出发后,艾赛尔·福特给我发来电报,说愿送我一辆1933年型8汽缸卡车,作为对公路勘察探险队的捐助。我当然不必多说我们是多么感激他这番好意的话。

“你带信来了吗?”

“当然,一大捆呢,还有报纸。”

生瑞恒简单讲了讲旅途的情况。至于详情且听下文。11月21日晚,他和卓木恰到达归化,卓木恰当即起程返回营地。24日,生瑞恒到天津,找了福特的代理人,并听说了艾赛尔·福特捐助汽车之事。但车还没有准备齐整,驾驶室和顶篷还没有弄好,所以生瑞恒只好等着。12月4日,他开着新卡车^①到北京,载着500加仑汽油,有的装在大油桶里,有的装在方形的马口铁桶里。在北京停留了4天,设法弄到了一台车架,好把卡车装上火车运走。

10日,他带着备用的配件、绳子、铁锹、水泵等全套新的装备、用品返回归化。12日,他驾着满载的卡车过了山口,路上又带上了我们的蒙古老熟人乃丹给自己作帮手。14日,他与已经等得快发疯的卓木恰和乔克敦会合。由于河水上涨,他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在坏车四周筑了一道防水堤。这辆车如不修好,根本动弹不得。生瑞恒和3个蒙古人苦干了一番,终于在17日早晨,为上路作好了一切准备。19日,他们到达松杜尔。20日夜间到了霍亦儿阿玛图。12月21日,他们天不亮就出发了,辛苦地赶了一天路,天黑后,在班特陶勒盖宿营,并听说我们是在前一天离开的。这消息使他们兴奋不已。第二天,他们拂晓前出发,顺着我们的车辙追赶,终于在22日早晨8点钟和我们会合了。

生瑞恒只能和我们谈上一小时,还要忙别的事。大家兴高采

^① 这辆汽车被斯文·赫定命名为“艾赛尔”,探险结束后,转赠给生瑞恒。——译注

烈,欣喜无比。我们车队的阵容加强了,现在有 4 辆卡车,一辆小汽车和 15 个队员。离额济纳河还有 132 英里,这不算什么,也许我们能在圣诞之夜抵达这条古老的沙漠之河呢! 等我们读完信,确知家人一切平安后,便各就各位,向西进发了。



六、额济纳河畔的圣诞之夜

车队的5辆车成一路纵队排开行进，很是壮观。路面挺糟，又有些凹凸不平，车子开起来直摇晃，只好慢慢前行。车子驶进了满是沙子的浅沟，能看到一簇簇的牧草。生瑞恒本来是我们车队的开路先锋，可他的车陷进了沙子里，这样，我们的车就开到了他的前面。路上印着深深的车辙，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比我们早来的人们留下的痕迹。

哈拉木克珊代井位于一片渺无人烟的地区。我们的左侧，即南面，隆起一块台地。再向南，便是我们前一天见到的一长条低地。深色的山丘点缀在这平地的两侧。秃鹫正围着一头死去不久的骆驼大饱口福。我们驶过了土墩、山冈和黑色熔岩地带，开上了一道陡坡。我们在一座小山岭高处焦急地等待其他人到来。赛拉特开足马力上来了，接着是卓木恰和埃费。生瑞恒开着那辆取名为“艾赛尔”的新车，远远地落在后面。

在山岭的另一侧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我们接着穿过了一条干涸得如枯骨一般、砾石铺底的宽阔河床，它顺着那长条低地向南延伸。看不到一草一木。一路上都有敖包作标记，通常都堆在小山丘上。有的敖包上还放置着骆驼的骨头。

诺戈鄂罗博克是沙漠中的一口井，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长在山冈上的灌木丛。刚才穿过的那片平原，一直伸向北面叫做察罕乌勒（“白山”）的群山脚下。我们在毕儿车儿井汲好了晚上用的水。路在低低的黑色山岭和陡峭的板岩间伸展着。许多山都像黑

亮的金字塔一般，矗立在黄色的沙带之上，真是如画一样的景致。日头向西移动着，天色渐渐暗下来，给这片沉寂的大地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到德烈森库都克，我们看到一辆新绥汽车公司废弃的破车，还有从新疆运来的一堆堆皮革和从归化运来的汽油。一个商人掌管3个毡包，有几个喀尔喀蒙古人正来这里采购。西沉的太阳射出的光束，似熔融的金子那样耀眼。北边，察罕乌勒的顶峰映照在染上一层淡紫色的晴空中。

晚上到宿营地时，我们刚走了62.5英里的路程。一整天只走这点路，似乎说不过去。但在这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里，我们的行程却是出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了。你要是也到中亚来颠簸几次，就领略其中的滋味了。何况我们还要花很多时间绘制地图。

帐篷刚刚支好，大家便拿出了才接到的家信。我们这四面透风的驻地在这个晚上格外安静，每个人都在读信，等贾贵准备好晚饭，才算告一段落。大家的情绪格外的好，都从家里得到了好消息，彼此毫无保留地说出来，让同伴们分享快乐。

12月23日一早，天空晴朗，没有一片云，没有一丝风。气温是零下20.3度。卫拉特部蒙古人曾在察罕乌勒地区住过。1928年，喀尔喀蒙古人来到这里，对卫拉特人说：“你们必须统属于乌兰巴托城(库伦)方面！”

卫拉特首领和喇嘛回答说：“那我们就离开这儿了，回头我们再派兵接走我们的家眷和喇嘛，带走我们的骆驼和财物。”

就这样，卫拉特人南迁了，喀尔喀蒙古人来到了这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完全是一片荒漠，只有骆驼才能生活下去，于是只好把喀尔喀的界地往北推移30—70英里。大概就在这时候，卫拉特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地。他们的首领叫尼亦密格西奎，是察罕乌勒寺一个非常富的贵族喇嘛，他以自己的实力和权势保护自己的部属。喀尔喀蒙古人捞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汉族商人开始和他们

秘密通商，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允许的。

在我们前面高耸起雅冈海尔罕山的圣峰。在蒙古，如果失口说出一座神山的名字，就会招来灭顶之灾。你可以说海尔罕（“神山”），但不能说出山的名字。要是说了，便会失去骆驼或马，迷失道路，得头痛病或碰到暴风雪。

山脚下长着一种叫喀拉布尔嘎斯（“黑柳”）的灌木，蒙古人和汉人砍下它的嫩枝，穿在骆驼的鼻环中做鼻夹。商队常停下来收集喀拉布尔嘎斯树枝备用。山脚下有一眼泉水，叫雅冈乌苏。

路时而坚硬，时而布满沙砾。到了下一眼泉水处，我们遇到了一支正在歇脚的商队，他们要把烟草、茶叶、面粉和其他货物运到额济纳地区去。

又向前走了一会儿，一道黑色的小山岭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山坡陡峭，有一道沙沟可做通道。再往远处是一马平川，我们砍了一些梭梭树枝，备作晚上点营火之用。当晚的宿营地是库库陶勒盖。

圣诞节前一天的早上，医生一反往常的习惯，早早把我们叫了起来，他自己已急急忙忙开着小汽车，还让赛拉特也开着卡车和他一起去寻找一块合意的圣诞之夜的宿营地了。早饭后，我和埃费都坐到了生瑞恒的驾驶室里，打开了取暖器，又暖又舒服。

太阳冉冉升起，西移的深灰色阴影和金黄色的晨曦交相映照在这一片荒漠上。我们的营地给这死气沉沉的王国带来了生机，可惜只有一个晚上。现在我们要走了。沉寂将再次降临，我们的痕迹也会随着时间逝去被流沙和风暴抹掉。

刚上路时一切顺利，但不久路面又变得松软起来，而我们的每辆卡车都至少载重两吨半。有一辆车陷进了沙地，这时就一定要铺上草垫才能通过。一到这种时候，乃丹就可大显身手了。他对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在他的指点下，车队又开上了坚硬的地面；接着，他很快就找到了骆驼常走的那条路。沙地是通向额济纳河最大的障碍。如果要排除这旷日持久的通行障碍，不采取根治的

办法是绝对不行的。

眼前的荒凉景观如朦胧月色一般：仍是黑黑的山脊，一座座陡峭的山崖，重重叠叠的灰白色的砾石堆。在绵延不断的小山丘之间伸展出一片浓暗色的铺着砾石的平地，穿行在其间的驼道如一条灰黄色的丝带。在巴嘎洪果尔奇地区，我们穿过了黑色土丘和像金字塔般的山峰之间平坦发亮的，却又是寸草不生的砾石地，两旁山脊最高也不过 30—60 英尺，山与山之间则宽不过 100 码左右。

一过正午，我们就跨过了阿拉善和额济纳之间的地界，过了此地就是土尔扈特蒙古人的天下。这个重要地点有敖包作为标记。不时可以看到红黑色山脊上映衬着严重风化的石英岩块，十分惹人注目。我们还看到白色的石灰岩，这是土尔扈特人建造寺庙当作水泥用的一种材料。我们接着盘旋在低低的山丘间似迷宫般的曲径之中，快绕出来时，终于发现了额济纳河边的一片小树林，真是令人赏心悦目，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了！

我们调整了方向，开向瓦音托尼，赛拉特和卡车在那里正等着我们呢！小汽车不在旁边，显然又开出去探路了。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典型的额济纳景色：非常松软的沙地，光秃秃的或是长着桤柳的沙丘，以及小白杨林。重新看到树和灌木丛，实在令人高兴，我们又能伴着绿色的生命宿营了。和往常一样，大家把所需的行李卸下，放在帐篷外；然后把车排成一行，停在安全的地方，防止失火。

大家开始忙碌起来。努力使每件事都准备得井井有条，这次圣诞节是值得好好庆祝一番的。生瑞恒开着小车去找水，回来时，不仅装满了几桶水，而且还有两只野鸡。这时，我坐在“艾赛尔”的驾驶室里写东西。

我们的汽油驼队已从瓦音托尼出发到诺贡德利的营地去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我们决定在原地休息几天，然后绕过索古淖

尔去奥宾河,这个地方必须赶在山上的雪融化之前通过。我们还打算派生瑞恒开卡车去肃州取回邮件。但眼下是圣诞之夜,这些计划要先放一下。从归化出发后,我们已走了 630 英里,在瓦音托尼的营地是我们的第 18 号营地。

等天黑得无法继续工作时,我走进了尤寅照的帐篷,生瑞恒和埃费也在里面,已收拾好东西。我们围火而坐,一边闲聊,一边等赫默尔和贝格曼为我们准备的意外节目。

一直到 9 点钟,才把我们叫到圣诞帐篷中去。我们迈步走出帐篷,行进时,有一盏灯在前面引路。帐篷入口处画了一个门神,瑞典人都欢呼“圣诞快乐!”帐篷里,留声机正放着轻快的进行曲。我们的医生很有创造性,他把两顶帐篷合并成一顶,中间是用粗糙的木板搭的长桌,油桶作桌子的腿,这些木板原是生瑞恒带来准备在汽车过沟坎或松软的泥沙地时当作桥用的。帐篷的正中挂着瑞典和中国的国旗,布置得非常隆重。

桌子的中央放着一棵漂亮的圣诞树,最上面的树枝上有一张小卡片,上面用瑞典文写着:“嗨,我祝你们快活!”这是我父亲多年前用花体字写的,它使我们想起家人的祝愿和昔日的圣诞。圣诞树用的是桤柳枝,而不是习惯上用的杉树枝,树枝裹着银纸,挂着小玩偶和金银丝,在小红蜡烛的火光中熠熠闪烁。我们把各自的全家福照片都放在树下。在桌子铺的布上又放上了一块狭长的台布,作装饰用,上面摆着纸做的小矮人、娃娃和小猪。一进这间绝妙的房间,就会被这五彩缤纷的小天地搞得眼花缭乱。在一个个小纸盘里堆满了糖果、巧克力和蛋糕。

医生还当上了厨师,菜谱精彩丰富:羚羊汤——就像 1927 年在谢别斯廷泉边度过的圣诞一样,鱼肉丸子和沙丁鱼,斯德哥尔摩的火腿配豌豆和别的蔬菜,炸肉卷配豆荚和菜豆,杏、桃、李的果脯,还有咸味面包,黄油和奶酪。还端来了饮料,有酒、柠檬水和咖啡。在戈壁滩上还能企求什么呢?这可是圣诞之夜,必须好好庆

贺一番。大家站起来祝酒，祝福家中的亲人圣诞快乐，并向我们在瑞典、中国和蒙古的至亲好友致以衷心的祝愿。

这时，蒙古族司机和汉族仆人都被叫了进来，请他们和我们同坐一桌。我特意向他们致祝词，由尤译成汉语，生瑞恒译成蒙古语。赛拉特代表他自己和他的伙伴们致答词，讲得很好。他说他们深知这次探险的重要性，并为能参加探险队感到骄傲。我们相信他们每个人都会克尽职守的。

埃费和贾费用汉语唱起了圣诞赞歌，真挚朴素，十分动人。留声机播放着《欢呼，明媚的晨光》^①、贝多芬的《欢乐颂》、亨德尔的《广板》……和欢快的民间乐曲。我们给仆人们端来了茶、蛋糕、糖果和香烟。所有的人包括乃丹在内，都聚集一堂，纵情欢度圣诞良宵，谁也不会去想在西行的路上还会遇到什么危险，这时，除节日，一切苦恼全都抛在脑后了。

圣诞树上的小红烛燃尽了，桌上点起了白蜡烛，这是在白天买的。我们到达了古老的额济纳河，完成了第一段旅程，但愿今后的时光也会一帆风顺。离开归化时，我们只有4辆车，而到达额济纳河畔时却拥有了5辆，创下了奇特的纪录。

午夜，尤、龚和陈回去休息了，仆人们也早已散去。我们5个瑞典人仍围桌而坐，朗诵诗歌，欣赏音乐。最后，我们也各自钻进睡袋，结束了圣诞之夜的狂欢。

① 一支很受欢迎的瑞典赞歌。——原注

七、在额济纳河畔休整的日子里

这一天晚上的温度是零下 21 度。等圣诞节早晨我们一觉醒来时,发现从东南方袭来一股猛烈的风暴。空中尘沙弥漫,四周一片昏暗。迷雾中,树木、灌木丛、沙丘、帐篷和汽车全成了若隐若现的神奇的怪物。我坐在“艾赛尔”驾驶室里读报纸。生瑞恒已开着小汽车去看望过去的熟人阿布丹的母亲。1927 年秋天,她每天都提着一罐奶来看我。

这是我们离开归化后遇到的第一次真正的风暴。风还说不上大,可四周已是昏天黑地,令人透不过气。风沙中出现了一群骑在很有气派的骆驼上的土尔扈特人,是来营地拜访我们的。

我们从生瑞恒带来的一份英文《北平时事日报》中得知,马仲英将军已占领乌鲁木齐,不知这件事对我们是否有利。

暴风穿过白杨树丛发出阵阵声嘶力竭的哀鸣声。我们都洗了手,然后津津有味地吃火腿、甜点心,喝咖啡。

我们的第 18 号营地设在翁策音河畔,这条河要到暮春才有水。节礼日^①早晨,生瑞恒和带着商队在我们旁边宿营的几个汉人谈了谈,商定由他们把我们近 10 吨重的行装运到仅 22 英里远的奥宾河三角洲水湾处的第 19 号营地。我们开着空车,绕道索古淖尔湖。那条路线,全长 53 英里,要经过土质疏松的地带,载重的

^① 圣诞节的次日,这一天要向邮递员等赠节礼,因称“节礼日”。——译注

汽车根本无法通过。

说走就走，一刻也不耽误。车队立时驶离了植被带和稍许坚实的沙丘，开上了平坦的软沙地，在暗灰色的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淡黄色的车辙。我们继续向北行进，经过了1931年圣诞时霍涅尔、郝德^①和陈宗器的宿营地，这也是欧亚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曾着陆的地方。

左边是一条长度相当可观的沙丘带。河在这里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又出现了。西南方20英里以外的地方，是著名的喀拉浩特^②的遗址。离开这座遗址后，我们穿过几座孤零零的沙丘，这就是左边那条颇具规模的沙丘带拓展出来的支脉。它们的形状很规则，有的是半月形，有的是盾牌状。一年前，霍涅尔和陈就是在这里研究沙丘形状的变化规律。我们还看到已被三两个零落的沙丘盖住，但仍依稀可辨的一条很久前汽车留下的车辙，这大概是一年前曾到这一带旅行过的传教士亨特和菲施巴赫尔的两辆卡车留下的。

上一次探险时(1927—1933)，我们曾几次遇到死神。那几年间，死神带走了7个人，奇怪的是，其中6个人都死在额济纳河附近。更出奇的是，两个探险队员竟是自杀在相隔很近的两片林子里。

其中之一是年轻的中国学生马叶谦，他在极端绝望和沮丧的情况下，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中国仆人，自己也因为被斧子砍伤，流血过多而死。另一个是沃尔特·拜克，我们此时在路上可远远看到他的坟墓。

6人之中，有一个中国仆人死于疾病，还有一个赶骆驼的，找不到骆驼常在额济纳河边饮水的地方，迷了路，误入深水处淹死

① 郝德，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当中的德国气象学家。——译注

② 喀拉浩特为蒙古语，意为黑城。系西夏故城，即黑水城。——译注

了。

最后一个是生瑞恒的兄弟约瑟夫·泽德尔鲍姆。他当时只是临时受雇于我们，随队从肃州跋涉到额济纳河边的营地。他已病了很久，仍坚持工作。沿河向下游走时，他的病情恶化了。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不行了，便叫来仆人，对他们说：“我今晚要死了，不必为我的遗体费神，不必运回家，也不必埋葬，把我扔进河就行了。”

他死了，仆人们草草掩埋了他的尸体。

当然，对那些浪迹天涯的人来说，死在旅途，说不上有什么不寻常。但谁又能解释，两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何以在同一个地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呢？是一种奇怪的巧合吗？那位姓马的青年死后一年，一位土尔扈特的女孩子经过死者最后宿营并杀死仆人、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时，竟突然倒地死去，在迷信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眼里，可不会认为这是巧合。

我们自己虽然能以较为冷静的态度看待这类悲剧的发生，仍不免为这种死亡事件感到神秘和奇怪。我们倒是没有去信当地人的万物有灵之说。据他们回忆，很久以前就有人在额济纳河下游死去，此后，常有鬼怪幽灵出没在他们死去的地方。这些幽灵神出鬼没，常在黎明和黑夜施展诡计，让活人中他们的圈套，作出绝望的举动。

1927年和1934年，我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在额济纳河下游度过几周时光。经过了在东部戈壁滩长途跋涉后，我觉得这里简直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人间天堂，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看，古老的杨树令人心驰神往；夏天，可以在树荫下小憩；冬天，寒风掠过秃秃的树梢时，发出悦耳的沙沙声。沙丘起伏的曲线如同巨大的海豚，有的光秃秃的，随风流动，有的披满植被，被怪柳团得紧紧的。春天，怪柳绽出紫色的嫩枝，十分秀丽；茂密的树丛常是那些腴腆斯文的雉鸟藏身的地方。在这神奇的、地地道道的中亚景色

中，额济纳河道就像一把剑，劈开这块世界上最壮观的沙漠而流贯其中。

过路人常在休息片刻后便离开这块到处都是清水、草场和干柴的地方，走向西部荒寂可怕的黑戈壁。这时，他们仿佛感到，自己是在扬帆起航，离开南太平洋上的丰饶小岛，驶向茫茫无边的大海。

尽管如此，我还是理解亚洲人为什么坚信有藏在树林中、灌木丛里和沙丘后的鬼怪，我也承认我是不愿在月夜，更不愿在沙暴袭来时独自穿过那儿的树林的。你会看到到处是飘忽的幽灵，仿佛鬼怪伸展着弯曲的四肢，想伸出来把你撕成碎片。身后那悄悄的脚步声，使你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往前走，会冷不防一头撞到了一个妖怪的怀里，可是在满天飞沙中又看不清对方的面目。在寂静的夜晚，可以听到悲凄的哀鸣，令人毛骨悚然，——这是死者不甘寂寞的灵魂在作祟呢，还是狼和野猫的嚎叫声？

沃尔特·拜克宁愿死，也不愿回到一望无际的沉寂的沙漠中去了。有些人则认为，在亚洲腹地度过了15年的孤寂生活后，他更害怕的是重新回到人声喧闹的沿海地区去。他宁可孤独地躺在沙漠边缘的坟墓里，也不愿陪我们回北京了。

在一条略有起伏的、铺着黑色砾石的平平的沙带上，车轮陷了进去，发动机用力吼着。西北方，索古淖尔湖已展现出全貌。湖的长度有6英里半，在大漠中却显得微不足道。1927年^①，我曾和亨宁·哈士纶一起，划着拉尔生做的独木船，泛舟在这片盐湖上。

1点30分，湖面已甩到了我们的西边。在西北偏西方向可以看到博罗敖包，在它的平顶上还可看到堆着的敖包。

车队越过了满是枯死的梭梭树的小沟。路面有时看上去平坦、坚硬，而实际上却是极疏松的，我们不得不继续小心从事，绕着

^① 原文为1929年，当为英文版的误排。——译注

道迂回行进。又遇到一条小沟，也长着梭梭树。一路上，我们一直沿着霍涅尔和陈宗器标出的古代湖界的外侧而行，因此看不出在我们右侧的湖从前究竟伸展到何处。左边是山脉，上面有苍白色的敖包。车队向山脚方向开去，地势渐渐升高，我们行进在细沙土的路面上，里面还夹杂着黑色或深绿色的石板岩，边沿尖尖的，有的薄，有的厚。

最后，连小汽车也卡在地里了，只好步行到博罗敖包了。站在阶地形山脊的边沿上，可以看到索古淖尔湖的全貌，十分壮丽；这和泛舟其上看到的相比，湖面显得小了许多，可是看起来十分秀美，结冰的湖面上闪烁着蓝绿色相间的光彩。这里杳无人烟，没有帐篷，没有畜群。可是向东望去，看到4辆卡车排成一行，正缓缓前进，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一片阶地的后面。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博罗敖包和它的美景，回到小汽车旁，使出全身力气，把它推了出来，然后继续西行。这时，太阳已西沉，再也看不到索古淖尔湖了。接着，我们穿越了布满怪柳灌木丛和枯木的软沙地带。后来又通过了几段这样的地带，而地带之间又隔着细长的寸草不长的荒原。没有比这更难走的路了。

我们停下车等后面的伙伴，不一会儿便听到车子的马达声，4辆卡车的头灯划破黑暗，像狼的眼睛一般。

情况变得更加不妙。我们停车的地方是一条沙子铺底的冲沟。那四辆卡车停停走走，又搁浅了。我们赶到后，发现3辆都陷到了沙里。于是，草垫、千斤顶、铁锹一齐上，终于一辆车一辆车从沙坑中挖了出来，可是，发动了不一会儿，又陷了进去，简直是无休无止，令人绝望。看来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了。尽管皓月当空，但仍难在黑夜准确地对情况作出判断。于是我命令就地宿营。生瑞恒和赛拉特开着小汽车去找水。这里离我们设在奥宾河河岸边的下一个营地已相距不远。

帐篷支起来了，晚饭也准备好了，只是没有喝的。大家又累又

渴，特别是坐卡车的人，他们的车这一天里陷了有 50 次左右。刚吃完饭，找水的人就回来了，提着满满 3 铁皮罐水。大家喝了茶。直到半夜，才一个个睡去。我们了解到，公路不能筑在索古淖尔湖的北边，而必须架桥跨过三角洲的支流。

第二天早晨，谁都没有早起，还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中午，卓木恰刚发动卡车，没想到走了 50 码就陷进沙地里。只好又在沙地上铺开了能逢凶化吉的却又是很重的垫子。生瑞恒、赛拉特和埃费也依次驾车出发，也一个个陷进了沙地，动弹不得。车队花了几个小时，才终于解脱了出来，在一片片怪柳丛中和杂草丛生的沙丘之间上上下下穿梭行进，车后扬起厚厚的尘雾。

置身于这种令人窒息的尘雾中，连离得最近的车子也不过是一团模糊的阴影。汽车左摇右晃，上下颠簸，最后终于来到河边，开始沿着河的右岸行驶。在这个季节里，奥宾河干涸得连一滴水也没有。我们行进的这条小路紧挨着遭剥蚀的阶地的边沿，走不多一会儿，便变得非常狭窄，一不小心，就会滑出边沿，车轮子就会悬空翻入干涸的河床里。我们停了下来，拿出全部铁锹来铲掉路面上高出的地方，清除障碍，拓宽道路。第一辆卡车刚好通过，其余的卡车也安全驶过。

车队终于开上了较宽的路面。这时，我们已驶离河岸，在茂密的怪柳丛林中绕行，这儿大概是最容易晕车的地方了。人在车里被晃得东倒西歪，只好紧紧抓住扶手，这时车外的景观完全淹没在飞扬的尘土之中，一点也看不见了。当眼前又展现出一片旷野时，我们才踏上坚实而荒芜的高原。

我们朝着土尔扈特王爷的衙门驶去，等到了，就把车停在院子外面。王爷不在，他的司法官出来接待，把我们引进一座搭在院子当中的毡包。

我们坐了下来，主人盛情款待了我们，端上了茶、糌粑、黄油、奶豆腐和糖。在毡包的正中央，对着入口处，有一个低低的宝座，

王爷就坐在上面为他那不足百户的百姓执法断案。我们对这位官员讲明了来意。他点头称是，并要我们只管放心，说在他王爷的领地内，我们是受欢迎的人。实际上，土尔扈特王爷是否真的欢迎建筑一条通往新疆的公路，还是个问题，因为一条可以自由使用的交通要道从他的辖区通过，可能会给他的百姓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在某些方面限制他的权威和自治权力。

这时，我们起身告辞，钻进汽车，继续赶路。后来，埃费的车陷进地里，耽搁了一会儿。太阳渐渐西沉，夜幕渐渐降临。我们摸着黑，冒险行进在矮树丛和灌木林、深沟和沙丘之间。车轮滚过干枯的树枝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汽车又一辆接一辆地抛锚。月亮躲到了云后面，很难看得清楚四周那令人好奇的地貌。车队花了几小时时间，结果只走了没有几里地。好不容易才重新回到奥宾河干涸的河床。等到达巴列尔时，已是晚上9点了。我们原来就计划在这里宿营，而且要住上些时间。

经过一天的辛劳，大家都睡得很沉。新建的营地在白天的亮光照射下，景色十分诱人。一顶顶帐篷很别致地安扎在高高的白杨林木下，远处映衬着桤柳覆盖的沙丘带。我们宿营在干涸的奥宾河的左岸。据说，沿河上行6英里就有水，还飘浮着大块大块的冰；一个月后在巴列尔会有一场冬季冰洪。医生向附近的土尔扈特邻居借来一座宽敞的毡包。晚上，我们在树下搭了起来，这座毡包成了我们进餐、读书和写信的集体活动场所。我们曾在圣诞节用来做桌子的橡木硬板，此刻成了餐桌兼书桌。桌边搭起了长凳。一只铁皮炉子给毡包带来了温暖。我们在这块宝地用了第一次晚餐，接着，一边听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一边热烈地聊了起来。

几个土尔扈特人来拜访我们，把他们骑来的漂亮骆驼拴在帐篷外的白杨树上。客人中有人告诉我们：不久前，肃州当局已派警察到这里，禁止土尔扈特王爷放行任何经过其领地去新疆的汽车。我们原来打算派生瑞恒开一辆卡车去肃州寄取信件，现在看来车

到了那里有可能被没收,不如让土尔扈特信使骑着矫捷的骆驼去办更安全些。有一个客人表示,6天之内就可到肃州。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得等上两星期才行,也就是要等到信使返回。在这段时间里,尤和龚可以去三角洲考察,找出架桥和筑路的最佳位置。

大家对这顶供集体活动用的毡包都非常满意。它还是我们的会客室。赫默尔和贝格曼又租用了一顶;接着,中国朋友尤、龚和陈也租了一顶。头几天,大家都忙着写信,都是一封封长长的家书。我还得给我们的顶头上司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和行政学院院长汪精卫写报告。

12月29日夜,气温降到零下28度,30日下午2点钟,温度仍在零下10度。生瑞恒、埃费、赛拉特、卓木恰和乔克敦,带了两名汉族仆人转移到离巴列尔1.5英里以外的地方,那儿的地平坦坚硬,修车更为方便。他们在地上挖了个长方形的大坑,以便钻到地下修车。我们的两位机械师一般在自己的帐篷也即他们的工作场所用餐,但也常常是我们的座上客。这不仅是为了进餐,更为了好好享受一下留声机放的音乐。

30日晚,信件准备好了,缝在一个袋子里。蒙古族信使察克特尔是我们多年前结识的老朋友。一个姓梁的汉族小伙子与他同行。他们那两头精瘦矫健的骆驼都训练得很出色,跑得很快。夜幕降临时,它们撒开肌肉发达的长腿,载着能吃苦的骑手,消失在南去的路上。

随着新年的临近,天更冷了。12月30日夜里的温度是零下30.7度。除夕夜,我们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有汤、炸小牛肉排、野鸡肉、芦笋、甜点心、白兰地和咖啡。在红色的台布上摆着两个三叉烛台。宴会上照例是少不了简短的新年祝辞的。生瑞恒和埃费是大家的座上客,很受欢迎。他们带领仆人挖了12根枯死的杨树木头,在帐篷和毡包之间的空地上,像架枪一样支撑成堆,中间还扔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树枝和杂七杂八的东西。午夜到来之前,

我们每人手上拿着一根蜡烛，排成一行走了出来。12点一到，一声枪响向大家鸣报了新年的到来。这时，大家一起走上前去，用手中的蜡烛点燃了篝火。

我们围火坐了下来，耀眼的火光映红了近处凋零的白杨树。密集的火星不断飞向夜空，烧成木炭似的大木头噼噼啪啪地响着，一根根倒在地上，又扬起一串串火星，就像彗星的尾巴一样闪烁着。这时的温度还在零下20度以下，但篝火却把我们烤得暖烘烘的。林子里到处都是干木柴，寒冬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旧岁最后一夜的最低温度是零下30度。每当我起来或钻进我的睡袋时，都把用汽油桶做成的炉子烧得通红，从帐篷中伸出去的烟囱发出一股烧焦的气味。我仍旧住在自己的帐篷里，但白天都在供集体活动用的毡包中度过。后来，我们又租了第四顶毡包，给厨房的人用。

在奥宾河另一侧河岸的沙丘上，正对着我们的营地，长着茂密的柽柳，里面藏着许许多多野鸡。佛教徒是不杀生的。这些野禽好像知道没有人会去抓它们，居然敢径直走近帐篷，送上门来。可惜它们错了，我们的枪口是不信佛的，住在额济纳河畔的这段时间里，我们顿顿有野鸡肉吃。但是，我还是禁止在营地的附近射杀野鸡，因为我喜欢它们，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出神地看着这些美丽高傲的野禽沿着陡峭的河岸大摇大摆地向厨房踱去。在河床有一口人工挖掘的井，井边结着冰。每当新来一群野鸡时，这口井总是它们首先侦察的目标，走在前头的是一只负责探路的公鸡。它一边沿着弯弯曲曲的路线慢步靠向井边，一边警惕地观望前方。它身后跟着另外几只公鸡。当这些羽毛华丽的卫士完成巡逻后，母鸡们轻快地踏着公鸡的足迹，袅袅婷婷地向前走去，那一身灰黄色的装束，完完全全像沙土一样。于是野鸡们会合在井边，兴许有20来只，在冰上又啄又咬的。

粪是野鸡的公开盟友，爱用米粒和面包屑犒劳它们，使它们一

只只吃得好开心。仆人们在几码远的地方劈柴，野鸡们也不为所动。在三娃子到井边提水时，它们才后退几步，不过等他一走，便又立时聚拢过来。公鸡对待母鸡并不那么客气，要是母鸡上来啄米，公鸡就会把它赶走。

野鸡是形状美丽的鸟类，举止优雅，可惜它们大大咧咧，容易轻信。几天过去，它们竟深信我们是些体面的人，不会伤害它们。如果它们察觉到我们已经偷偷地宰杀并吃掉了它们神圣的野鸡国度里不少公民的话，恐怕就会另眼看待我们了。但它们没有一丝猜疑，更不知道从厨房帐篷里冒出的香味是来自正在我们锅灶中受熬煎的它们的同类。

在额济纳河畔住着 70 户喀尔喀蒙古人，他们是从外蒙古逃来的。据说，他们的首领和住在马鬃山^①中的喀尔喀蒙古人有秘密联系，那里是额济纳河至哈密的必经之路。马鬃山的喀尔喀蒙古首领叫那拉瓦钦活佛。土尔扈特王爷允许喀尔喀人在他的额济纳河畔住下来，条件是他们必须自食其力，并养活家人，否则，他们就另找栖身之地。后来我们拜访了他们的首领昌格鲁普梅林，他曾在库伦（即乌兰巴托）蹲过多年监狱，当苏联开始统治这座“红色勇士之城”时，他逃了出来。

元旦平静地过去了。人夜时，没有一丝风，甚至可以点着蜡烛坐在门外，而不必担心烛火被风吹灭。蓝色的天穹笼罩着这片寂静的树林，灰色的毡包，以及灰色的树木、灌木丛和沙地。落日的景致总是那么壮观。在火红的天幕上映衬着白杨和桤柳那黑黑的影像，十分醒目；这时在河的东岸，一座座覆盖着草木的沙丘，和它那看上去十分优美的弧线形斜坡，在慢慢消退的最后一缕余晖照射下，更是耀眼夺目。

^① 即甘肃北山。在甘肃省河西走廊西北端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边境。山形破碎，如马鬃状，故名。——译注

生瑞恒和埃费在前一天晚上已向我们祝贺了新年,因此在新年的头一天便没有露面。他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干活,擦洗着5辆汽车的每一个螺丝。在他们的露天修理厂,支着一座毡包和一顶帐篷。每天光顾那里的客人都是我们探险队的成员。土尔扈特妇女也常去看他们,帮他们烧饭洗衣。

前途多舛的1934年开始了。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呢?对新疆的局势仍是一无所知。北京报纸上的消息都是些谣传,而且漏洞百出。从那神秘的新疆省出来的商队、旅人或信使中,没有一个是走额济纳河这条路线的。我们只见到了从肃州、安西或凉州来的人。要是有关于新疆的可靠消息,我们是否要掉头返回呢?当然不能。我们既然已经承担并且已在执行这项任务,就决心闯过一切可能遇到的风险,直到完成为止。

太阳出来后,三娃子就来给我生炉子。我醒了一会儿,又沉沉地熟睡起来,好像打了麻醉药似的。去年秋天实在太劳累,在新的探险开始前,似乎真是需要大睡特睡,才能解乏。也许我们也和动物、植物一样,需要在大陆的严冬里长眠一番才行。这样的冬眠显然是有好处的,要是有一天,我们真觉得已经睡得足足的,那该多好!

一路上,喜鹊、乌鸦、麻雀、渡鸦、鹁鸽和野鸡一直是我们的伴侣。

在巴列尔,野鸡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天天端详它们,使人情趣盎然。每每看到这些常客饱餐之后慢慢回窝时,就像是欣赏一出喜剧。它们从来不飞,总是一只公的在它女眷的陪同下,率先踱过河床;接着,另一伙又跟了过去,井边很快就成了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地方了。野鸡们消失在怪柳树下茂密的草丛之中,无影无踪,也许在元旦的宴席之后,它们已亲昵地进入了梦乡。

新年第一天的太阳在徐徐西沉。一个汉人牵着10头没有负重的骆驼走过河床。落日给这一行添上了一层红红的色彩,黑沉

沉的影子长长地拖在沙地上。

机械师们对汽油的用量作了估算。现在还有 263 桶 5 加仑装和 38 桶 30 加仑装的汽油。5 辆汽车的油箱里还剩 27 加仑。我们已消耗 760 加仑,平均每加仑油走 4.2 英里。这么一算就可知道,到哈密还要 450 加仑,最后可剩下 2 030 加仑。有了这样的储存,完全可以走完该走的路程。我们也希望能在乌鲁木齐买到俄国汽油。

风舞动着秃秃的树梢,在我们头上嗖嗖作响,像是一曲大漠之歌,悲壮凄婉,似在告诫我们不要继续西行,最好留在额济纳河畔的树林里,或是往东去,回到更安全的地方。

一天,我开车去察看设在雅门察罕的汽车修理厂。我们的蒙古族队员也住在那里。他们的帐篷前面,瑞典国旗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整修汽车拆卸下的零件那种细活,是在帐篷里干的。他们自己砍来木头,临时雇了一个木匠,在户外打制箱子,剩下的碎木料当柴用,火烧个不停,大汽油桶里的水总是热的。

我们曾经打算只开小汽车和一辆卡车到新疆境内离我们最近的城镇哈密去探探路。只准备让尤、赫默尔、生瑞恒和赛拉特陪我同行。这个诱惑人的计划,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都觉得不错。但当我们重新考虑时,还是决定等信使从肃州返回再说,他们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重要指示和消息。

1 月 5 日晚上,陈从南京的广播中听到一条消息,说哈密大概有 2 000 到 4 000 维吾尔人已反叛马仲英将军,迫使他退到吐鲁番去。这更促使我们按兵不动,等待察克特尔和梁从肃州回来。

1 月 6 日,又从哈密传来可靠消息。昌格鲁普梅林不知是从难民还是从密探那里得到的一份报告中说,哈密平安无事。这有点难以置信。但更重要的是陈从南京广播中也听到如下的消息:“哈密已完全恢复平静,南京政府将派代表团去谈判。”

一天,生瑞恒开着“艾赛尔”,带我们去拜访土尔扈特王爷。他

住在巴列尔以北6英里的村落里。道路几乎不成其为路。如果是习惯了欧美的通衢大道的人，准会赌咒说，这样的路开不了车。但是生瑞恒没有其他选择，车子压过沙地，翻过杂草丛生的沙丘，穿过冲沟和芦苇地，通过灌木丛、碎石地和倒下的枯树。人在车中没有一刻不给颠得前仰后合，等到达目的地时，简直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颠簸一路后，我们停在了6座灰色的大毡包前。毡包掩映在怪柳丛和沙丘之中，有的旁边堆放着很多烧火用的木柴。土尔扈特王爷手下的两个随从把我们迎进会客用的毡包，里面的一张矮桌子上摆了常吃的那种茶点。

我们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这位大人物才屈驾光临，接受了我们的哈达（一条月白色的长巾，有致敬之意）和一些肉罐头。他回赠一副望远镜，这是我们以前路过这里的探险队员送他的礼物。谈话中我们提到了这次探险，王爷还询问了几年前曾到他这里作客的那些人的情况。哈密方面什么消息也没有。两年前还有商队经过这里，悄然离开后再也没有听到驼铃声，仿佛新疆和额济纳河之间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回来的路也够呛。土尔扈特人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比我们来时走的路要好得多。可是生瑞恒也许听错了土尔扈特人告诉他的路线，因为没走多远，车就陷进地里，花了好几小时的功夫，才摆脱了困境。

1月9日晚，我和赫默尔正坐在公用毡包里写家信。夜是那么宁静。12点左右，这位医生突然一振，喊道：“有汽车声！”我们赶紧出门，没有几分钟，就看到了车灯。生瑞恒开车过来，车上坐着察克特尔和梁两位信使。生瑞恒跳下车，匆匆说：“没有我们的信，只有中国队员的。”

大家在公用帐篷里，打开了邮包。所有信封上都是用汉字写的。我们只有几份包好的英文《北平时事日报》。汽车开到帐篷边

时才醒了的龚，边读边翻译了铁道部的官方来信。其中一封告诉我们，已向肃州邮局汇去 2 000 银元给我们。另一封说，肃州和宁夏的地方长官已接到指示，要给予我们所需的保护和帮助，他们已答应尽力。作战部长给我们的指示是，每个探险队员在 1934 年内都可携带武器。欧亚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很有把握地告诉我们，据可靠消息说，有 1 000 名维吾尔士兵驻守哈密，马仲英仍在吐鲁番。信中还说：“哈密并不十分安全，骚乱可能再起。”听了让人有些担心。

我们瑞典人没有收到家信是很平常的事，因为 12 月 9 日生瑞恒离开北京时，已取走所有的邮件，而此后到达北京的信，现在还没有到肃州。察克特尔和梁还听说，已有 4 个月没有飞机抵达肃州了，而从兰州发出的邮件如果在古代驿道上走，要 12 天才能送到肃州。显然，我们现在的确不可能收到什么信件。

两位信使的任务完成得太出色了。从巴列尔到肃州共 240 英里，也就是说，他们来回要跑 480 英里。两人总共用了 10 天时间。而且，在肃州还被扣留了一天。察克特尔的骆驼过冰河时又用去了整整一天。因此，实际上他们 8 天跑了 480 英里，平均每天 60 英里。进肃州时，俩人被卫兵拦在城门外。他们把尤写的上面盖有我们红印章的字条给邮政所长看，他才保证说，这两个人来路清楚。于是，他们有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巴音博格多，两头骆驼夜里拴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受了惊吓，挣脱了缰绳，逃到近处的山里去了。这次意外事件也耽搁了一些时间。

尽管连日赶路，两个信使依旧精神饱满，未留下一丝疲惫的痕迹。他们的酬劳是每天一块银元，外加 4 银元的食宿费。然而整个旅程他们只花了 2.45 银元。那么，骆驼得到了什么奖赏呢？毕竟它们是最劳累的。一路上像过着斋戒似的生活，不吃一点东西，不喝一点水。现在，它们悠闲地站在那里，显得那么超脱、安详，漠然地看着我们。它们要休息，要吃草，以便养精蓄锐，再次踏上征

程。

既然已收到从肃州取回的邮件,我们就不必再呆下去了,于是决定全体立刻出发,直奔哈密。我们选择的路线要经过明水^①,也就是说,是在1927—1928年冬天我走的那条路线以南。不过郝德、哈士纶^②和袁复礼^③也走过这条路的。在上匪出没的地区开足马力赶路,该是万全良策了。

1月10日晚,气温降到零下28.4度。这时,陈到德烈森库都克去测量方位了,龚也到松杜尔^④去了。

1月14日,我们离开巴列尔,前往设在雅门察罕的修理厂,那儿是全队集合的地点。我们邻近的朋友都来道别,只有野鸡们没有露面,它们被汽车的马达声吓得躲了起来。我们在这块宁静的地方安安稳稳度过了18天,真到离开的时候,不免为离去黯然神伤。日落时,我们已经看到了新营地,4辆卡车载满了油桶和箱子,停在那里准备出发。

当天夜里的温度是零下33.2度,也是我们出发以来最冷的一个夜晚。大家认真做好第二天出发的准备。同时,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写信,乃丹要回归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托人送信了。尤寅照已写信给肃州的邮政所长,要他留住并保存好我们的邮件。

16日晨,刚过5点钟,我们就起身了。这时的气温是零下32

① 在甘肃西北角上,临近新疆。——译注

② 哈士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丹麦籍学者。著有《蒙古的人与蒙古的神》。——译注

③ 袁复礼(1893—1987),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之一。解放前历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技师、清华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北京地质学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译注

④ 松杜尔位于额济纳河边,在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抵达额济纳时,曾是其大本营所在地。——译注

度,冷得刺骨。我们在露天生了一堆大火。装车的收尾工作用的时间要比往常多,等一切准备就绪,已是10点了。

我们沿着奥宾河左岸向东南行进,继而又向南驶去。河的总走向是东北偏北,但也常有突然转向的情况。开始时,路很难走,不多一会儿就好走多了。灌木丛中到处可见野鸡,车队在尘土弥漫中隆隆驶过时,它们吓得直往后缩,不过仍躲在灌木丛里,我们的车一过去,又探出头来张望。

从路的左边已可见到堆垒在那硬实的沙丘顶上的达什敖包。我们顺路在昌格鲁普梅林的府地拜钦呆了半小时,拜访了这位首领人物。他和属下的24名喇嘛有8座毡包。其中支在墙内的两座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座是作寺庙用的,巨大的圆顶篷由8根红漆木柱撑起,内部的布置与一般寺庙差不多,喇嘛们坐在垫子上念经。我们之中有人进去听了听这悠扬而神秘的诵经。另一座是昌格鲁普梅林的会客室,主人用茶点款待了我们。

左边1.25英里以外的地方,有几片白杨林,还可看见一座座高高的沙丘,上面长着茂密的怪柳。这就是松杜尔地区。1927年秋,我们的总部就设在那儿,还设了一个气象站,使用了两年时间。

我们抵达了额济纳河左岸的玛宁查干,车队停下,稍事休息。此处,是一条单一的河道,没有分汊,150码宽的河面上覆盖着20英寸厚的冰,冰上有一条用沙子铺的、供骆驼用的路。在我们这一侧河岸上散落着矮矮的白杨树丛,对岸是罩着植被的坚实的沙丘。这就是计划中该架桥的地点。

我们继续向西南偏西方向行进,戈壁滩上寸草不生,遍地细碎光滑的砾石。3辆卡车远远地驶在前面,透过戈壁滩上那种如同海市蜃楼般的雾蒙景象,这几辆车似在地平线上悬空浮动,看上去就像刚刚起飞的飞机一样。这时,在右边出现了一座古堡的废墟,那里还留下了土坯砌成的黄褐色断墙残垣。古堡的名字叫“木杜尔伯尔金”,意思是“糟糕的方阵”。它和其他古堡连在一起,在

2000年前形成了一道防线。

白尾巴羚羊飞快地从我们身边跑过去。西边和西南边,广袤无垠的大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像湖面,又像雪地,然而,这不过是海市蜃楼景观中变化多端的幻象而已。这就是商队通往哈密的大路,所经之地全是地地道道的戈壁,地面展现了一幅蔚为壮丽的奇观。我们经过了叫做纳林河^①的干涸的河床,继续飞驰在这坚硬而又平坦的大地上。每每端详前面的3辆卡车,乐趣无穷。你看,一辆辆成了倒置的三角形,忽而飘到一起,忽而又散开,忽而看上去是暗影,忽而又成了地面上冉冉升起的亮点,真是变幻莫测。

不久,我们便看到了木林河^②伸向东面的支流。木林河的支流在几个地方从额济纳河^③分汜出来,然后又与它合拢,最后形成了有两股支流的河。我们很快到了龚考察过的第一股支流,那里的三角洲河面宽173码,但冻冰的河面却只有127码,河深最多只有4英尺,坚冰的厚度为2.7英尺。我们可以看出冰是分层冻成的,底下的水先结了冰,后来流到冰上的水又结了一层冰。

木林河的第二股支流即西支流,在两英里以外,河面比东分支即第一股支流要宽阔得多。河床宽203码,结冰面宽173码。河深最多为4.3英尺。贝格曼和霍涅尔以前曾绘制过额济纳河及其三角洲的地图,陈宗器绘制的是木林河的地图。

第22号营地设在左侧支流的河岸上。生瑞恒提议休息一天,我们欣然同意,理由有两条:第一,我们可靠的朋友乃丹要带着我

① 纳林河,又称东河,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之一额济纳河下游的东支,向北流入索古淖尔。——译注

② 即穆林河,又称木仁河。为额济纳河下游的西支。向北流入嘎顺淖尔湖。——译注

③ 一称弱水,是黑河自甘肃金塔县天仓到额济纳旗湖西新村一段的别称。——译注

们写的信件返回归化；第二，必须为去哈密长途之行作一定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用斧子和镐凿开冰面，装上9袋冰块，作为我们穿越黑色戈壁的水源。

河对岸是一座关税卡，那里有二三十个鬼鬼祟祟的无赖、恶棍，但没有武装，他们实际上是给额济纳河沿岸不同商行办事。在中国，关卡是众人深恶痛绝的东西。额济纳地区不仅有甘肃也有宁夏方面来的“鲨鱼”，对商贾驼队敲诈盘剥。谁出价最高，谁就会谋到这份差事。这些人搜刮一切所能得到的，主要部分上缴主子，余额收进自己的腰包。

沿河往南去16英里处，有一座寺庙，叫额济纳喇嘛音苏木，通称“西庙”。

在额济纳地区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每个人都格外忙碌，因为第二天早晨就得把自己写的信交给乃丹带走了。当我们把一包包信件裹在油布中包扎时，心中不无一种庄重的感觉，因为谁也说不准这是不是我们给家人送去消息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第一阶段探险的繁重任务已经胜利完成，我们穿越了内蒙古和甘肃北部戈壁，来到了额济纳河畔。一个崭新的阶段将在神秘莫测中揭开序幕。明天早晨，我们就得破釜沉舟，迎对漠漠荒原了。在过去的探险中，我们对它已很熟悉，不同的是，当时的亚洲腹地笼罩着一片宁静的气氛。而现在，有人警告我们说，来自喀尔喀蒙古辖地的匪帮在沙漠四处流窜，同时还听到一则传闻，新疆又爆发了新的叛乱。

当我们掩上门，熄灯就寝时，心中却在想，1934年1月17日——也就是我们在额济纳河畔的最后一夜，会不会也是我们能安静入睡的最后一夜呢？营地上，像坟地一样的寂静。在我们行进途中的“城市”上空，星星又一次忽隐忽现地发出惨淡的青光。

八、通向丹宾喇嘛的强盗窝

1月18日晨,车队整装出发。尽管温度在零下15.7度,但强劲的西南风凛冽刺骨。我的司机,也就是我们尊贵的大夫,无需为木林河结的冰发愁。冰层足有20英寸厚,车子开过去不会有问题。我们沿左岸驱车来到一座关税卡,4个关税吏走出来,给我们指了路。他们当然很想对我们的行李勒索一番,不过没敢说一句话。

刚刚离开这蛇蝎所在,我们便驶上了光秃秃的戈壁,路上经过一座用木头砌成堆的大路标,这是为防止商队遇有沙暴或暴风雪时迷路而设置的。道路状况很好,它伸展在深色的大地上,如同一条灰白色带子。

一个孤独的行客牵着一峰白骆驼走了过来。沙漠杳无人烟,蒙古人把这片地方叫做“喀喇戈壁”,意思是“黑色荒漠”。除偶尔在一些小土坡上可以看到几簇枯死的小草,几乎寻不到什么植被的影子。原野开阔平坦,只有当前面的卡车突然消失在眼前时,我们才意识到地面的起伏。有的地方,商路如同几条用脚踩出来的羊肠小道。现在走的这条大路还是民国初年杨增新将军^①任职时开通的。

^① 杨增新(1867—1928),云南省蒙自县人。曾任清廷的新疆按察使(臬司)兼镇迪道。辛亥革命后长期担任新疆省省长。1928年遇刺身亡。——译注

前面的3辆卡车停了下来，采集晚上宿营时烧水用的干柴。所有的路标都是用捆成小捆的梭梭树的干枝做成的，一捆捆竖在路边，就像海上标明航道的航标。

我们继续向前行驶，稍靠右浮现出一座座小山，山顶似悬在地平线上颤颤巍巍地飘动，这又是海市蜃楼的怪诞景象。

不久，我们便来到了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一片高高的沙丘中，长着梭梭树，还有几棵白杨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关税卡和一座关帝庙。关帝庙在一个小山坡上，是4年前盖成的，站在坡上往西看去，景色美不胜收。建关税卡时，有人偷了关帝——关羽——庙附近一座路标的木头，其中一个小偷因此得了重病。关羽是三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将领和忠臣。

在庙不远处是芦苇井，周围是一片茂密的芦苇。离开关帝庙，就像又一次投身茫茫大海一般。

路一英里一英里向前延伸，然而景致却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偶尔还可看到沙丘上有那么几处小草丛，至于怪柳则已非常少见。眼前一条早已干涸的河床，明显的冲蚀痕迹依然可见，表明曾有水流经这冲沟。

我们刚看到的山丘非常非常低矮，路就在这黄黑色的山岭间盘绕着。眼前是浅浅的小沟、深色的砾石、白色的石英斑岩、低矮的坡坎和山口，没有植被点缀。大白天盘旋在曲曲弯弯的丘陵中还不是难事，这时太阳已在西沉，夕阳余晖的射线直刺我们的眼睛。3辆卡车在前面开道，我们顺着车辙向前驶去。可是，当太阳沉到地平线以下，仅有的一点微弱光线也消失殆尽。黑暗终于笼罩大地时，就很难再找得到测绘队员们插在地上的小红旗了。要在我所形容的地形上行进实在是太难了，道路是如此弯弯曲曲，而且常是急转弯，除非有一双鹰眼，才能发现路边的小旗子。要是在较开阔的地方，太阳落山后，我们可以借助前面车子的灯光辨认方向，可惜这里不行。不过，我们终于看到了远处的火堆，在可爱的

月牙下闪着红光。接着,我们抵达了营地,那里已为迎接我们做好了准备。

夜里的气温为零下 23 度。第二天我们沿着清晰可见的商队走的路继续往前走。一路上,不时可以从一堆堆驼粪和搁锅煮饭的火坑上辨认出昔日商队的营地。

地面几乎寸草不生,坚硬而平坦,汽车通过是再好不过了,修路工人无需再费什么力气。有时我们驶过干硬的泥地,这是雨水把泥土冲到低洼处形成的,它像上等的镶木地板,平滑得如柏油马路。我们车队的左右两侧远处都可看到低低的山丘。

这一天的最初 6 里路走得很顺利。就在这时,赛拉特驾驶的最后一辆车按响喇叭,示意我们往回开。车队聚拢后,赛拉特告诉我们说,“艾赛尔”一直没有跟上来,在 23 号营地出了事故。就在我们刚刚离开营地,卡车也即将出发的当口,生瑞恒发现“艾赛尔”的发动机被冻住了,根本发动不起来,于是请卓木恰用车牵引一段。卓木恰的车刚开出几步路,“艾赛尔”却死死地卡进河渠中一条尖硬的石缝里,车的前轴被猛的一下撞弯,再也走不动了。生瑞恒给我们捎口信说,他至少需要两天才能把车修好。

大家商谈了一番。到下一口井边宿营时,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呆上几天,好让陈宗器有机会测量方位。于是,大家决定,卓木恰和埃费开车返回 23 号营地,帮助生瑞恒修车,赛拉特则开着他的卡车陪我们到下一个宿营地去。

接着,我们继续西行。地形变得很糟。汽车穿过许许多多又浅又窄的河道,河道间仅相隔二三米远。所以,车子颠得很厉害,严重影响了行车的速度。地势渐渐往上,但起伏不很明显。

向南望去,景色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在不到 5 英里以外的地方,横卧着一条非常低矮的深色山脊,仿佛是一条十分逼真的海岸线。再往远处看,还可看到 3 条以上的山脊和 3 处以上的高地,颜色随着远近由淡蓝而灰白,十分惹人注目。这一带的荒漠就像大

海的惊涛骇浪一般,变幻莫测。我们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如大海般的奇景,可惜耳边听不到海潮拍击峭壁的涛声。这里是一片寂静无声的世界,只有西风在车窗外尖叫呼啸。四处见不到一滴水,只有似波峰浪谷一般起伏的石块。

路继续在低矮狭窄的石板沟坎上向前伸延。一条山岭上竖立着3座敖包,有的地方竖着的只是一块大小合适的石头,用作路标。右面两三英里以外,是连绵的黑色山脉,无数狭窄的冲沟从山脚下向南边舒展出去。

又走了一程,赛拉特停下车来,向我们征求有关宿营地的意见。他知道路左边不远处有一块低洼地,那里有梭梭树,不愁没柴烧。于是我们向这块低洼地驶去。抵达后,很快支起帐篷,然后就去拾柴。这时,卓木恰也开着卡车来了,车上还坐着龚。龚对我们说,23号营地的情况看来相当严重。生瑞恒已经作了打算:先把“艾赛尔”上的东西卸下来,撞弯的前轴两端搭在两块木头上,要不就悬空挂起来,像拱桥一样;然后,用千斤顶把一辆满载的卡车后轮顶起,压在“艾赛尔”前轴撞弯处的顶端,再慢慢往下压,好让卡车的重量把前轴压直,恢复它原来的形状;为防止冷钢断裂,还须在压的同时,用喷灯加热。我很怀疑,在沙漠之中能否成功地完成难度如此大的作业?我作好了失去“艾赛尔”的充分准备。

除东边以外,我们四周全是丘陵和脊状地形,这一路上上下下颠簸着翻过一个又一个小冲沟。路上我们看见一种好似鹌鹑的小鸟,这是死气沉沉的荒漠中唯一的生命之光了。这时,眼前呈现出一片奇特的景致。我们行驶在坚硬的渐渐隆起的橙黄色土路上,直奔前方的山脚。车子翻过一道小山岭,靠西往下去,开进了一个形状如竞技场的山谷,那里稀稀落落长着些麻黄一类的灌木。又翻过一道山岭,便进入了另一个竞技场形状的山峪。这样的地形一直绵延重复。山丘的颜色不断在变:有灰色、黑色,也有红色和黄色。连土地也是橙黄色的。道路继续蜿蜒前伸,路面又变得坚

硬无沙，非常好走。有时可看到骆驼的白骨。近来的战乱阻断了贸易，这些骆驼一定是几年前倒毙路旁的。

翻过一道低矮的山岭后，我们驶进了一座丘陵、山谷和干涸的溪沟纵横交错的迷宫。又过了一道山岭，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大片平地。驶过平地，找到了一口井，后来我们才搞清楚这井叫“红柳疙瘩井”。井边还有几年前商队留下的驼粪。井水有股难以忍受的咸味。

等了一会儿，其他的车还没有跟上，我们觉得可能出了什么事，于是，掉头回去找。在刚才经过的最后一道山岭，我们发现了一面指向北面的红旗，还在这里意外看到了我们那两辆卡车的车辙。旁边的一道小侧谷通向“野马井”，除赛拉特这样曾经来过的人以外，其他人是根本无法找到的。这里就是已安顿好的 25 号营地，四面环山，很有特色，我们如同钻进了口袋一般。

到了新营地，我又动开了脑筋。龚和卓木恰来报告了“艾赛尔”的情况，听起来非常棘手。他们告诉我，生瑞恒自己认为也许有必要派埃费带着损坏了的前轴去额济纳河畔，他想埃费有可能在那里赶上要出发的乃丹。然后由乃丹把车轴带到北京去，彻底修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作出判断。尽管生瑞恒完完全全出于好意，但我必须阻止他自作主张，草率行事，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挽救“艾赛尔”。虽然距离只有 60 英里，但在没有一滴水的沙漠中，这可是长途跋涉。何况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土匪的袭击。如果开小汽车去，3 个半小时就可跑完全程，因为我们没有绘制地图的任务，路上就不会耽搁了。

我带着尤，由卓木恰驾驶小汽车，在正午前出发了。眼看太阳偏到了一边，后来又落在我们身后。大漠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更像浩淼无际的海洋。周围寂静无声，展现出一片没有一丝生命气息的荒野。但是，不对，那天的沙漠并非完全没有生命气

息。尤从东边远处发现一个黑点。

“是生瑞恒的车吗？”他猜测着。

拿出望远镜。不一会儿，我们便看清那是一峰在路边缓缓移步的骆驼。又过了几分钟，我们看到骆驼既没有骑手，也没有鞍子。这是一峰野骆驼，显然是驼群争斗中的败将，大概是因为向年轻的母骆驼表示了过分的激情，遭到了驼群中长者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被驱逐出来，过一段独居的生活，等交配季节过去，才可重返驼群。

这头牲畜看看我们的小汽车，可能在想，那难看的“黑骆驼”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的，但它很快发现这不是自己的同类，立刻加快步伐，像一阵风消失在南面的丘陵之中。

我们从车内看到傍山而设的 23 号营地有一顶帐篷和两辆卡车。太棒了！看来埃费还没有给乃丹送去损坏的车轴。卓木恰向帐篷开去，这时生瑞恒正坐在帐篷外锉一个螺丝钉，另外 3 个人在安装轮子。他们没有看见我们也没有听到汽车的马达声，等我们离营地很近时才发觉。

“怎么样了？”我问道。

“怎么样？一切顺利。”

“车轴还能用吗？”

“完全可以用。我们没有加温就把它弄直了。”

“什么时候可做好出发准备？”

“晚上 6 点钟。”

“我们必须凌晨出发，赶快干吧！”

“头儿，你晚饭想吃什么呢？”

“肉包子和茶。”

乔克敦立即揉面，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厨师。

埃费、生瑞恒和卓木恰重新装上车轴，拧紧了螺丝。我和尤在一旁看着。

晚饭好了！我们7个人——瑞典人、汉族人和蒙古族人——围火而坐，乔克敦端上了他的拿手好菜，味道的确不错。面包、黄油和草莓酱使这顿在沙漠心脏中的晚餐显得格外丰盛。

大家借着电筒和油灯的光亮安上了车轮。我们一直围着火堆聊天，到11点才去睡。7个人挤在一顶小帐篷里。我和尤被安排在圣坛前并排躺着。其他人则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成一堆。“艾赛尔”把他们折腾得疲惫不堪，帐篷里扬起一阵阵有节律的鼾声，好似一支没有指挥家掌握的乐队，淋漓酣畅地奏出种种稀奇古怪的曲调。有时鼾声听上去就像他们快窒息了，有时又像在拼命吞吃一头野骆驼。帐篷门关着，没有一丝风，只有肉包子的余香和3个民族混合在一起发出的汗臭。最后，我终于入睡了，心中还回想着美妙的沙漠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被“艾赛尔”重新响起的马达声吵醒了。这辆卡车正绕着营地试车，绕的圈越来越大。“艾赛尔”救活了！可是小汽车却成了伤兵！支撑汽车整个底盘的横杆有断裂的地方。他们对我说，如果不想翻车，就必须临时加固一下，也需要两天时间。

“不，现在不修了。马上装车准备出发。”

下午两点钟，一切准备就绪。我们走得很慢，怕小汽车出问题。天色暗下来，夜幕降临了。8点钟，我们已经来到山口指示方向的小红旗处，路从这里拐向北面的“野马井”。小汽车走在前面，每小时只能走12英里。我和尤不时回头，看两辆卡车是否跟在后面。卡车的头灯像黑暗中的猫眼，发出微弱的光亮，有时我们只能看反射过来的光线，可是无法看清车灯本身。

从小红旗处到野马井只走了7分钟。一听到汽车的马达声，营地的人纷纷从帐篷里迎了出来。谁也没有料到我们能这么快返回，而且“艾赛尔”居然得救，运转情况会如此良好。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们就在周围闲逛，消磨时光。贝格曼从一座高坡上拍下了一张鸟瞰图，那种饱经风霜剥蚀的丘陵、山脊、山谷交织在一起

的迷宫般风光和可怖的荒漠景象,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里没有一丝生命的痕迹可见,甚至连一点野生动物的踪影都无处可寻。这口井也是名不副实,因为根本看不到什么野马亦或野驴。

晚上,陈宗器收到了南京的广播,我们听到了中国内地的重要消息,但有关新疆的报道,一点没有。

我们只好在野马井再牺牲一天的时间。因为小汽车的横杆必须加固,才能让它继续“服役”。营地又一次成了露天修理工场和开拓者在荒野中的栖身处。

1月24日夜,气温低至零下25.6度,但是,第二天早晨无风无云,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发动汽车费了一些时间,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利利索索驶上了漫漫古商路。车队的右边是这一地区的制高点,海拔4940英尺。医生和龚继成还在顶上垒起了一个敖包作路标。野马井营地的海拔也在4680英尺以上。

一路上,我们穿越了许许多多因土壤侵蚀形成的冲沟,说明这一带干旱地区有时也会下暴雨的。此后,我们回到了红柳疙瘩井,周围散落着一个个披着植被的碎块小岩锥。眼前又是高耸的山脉。我们跨过了山脚下一条深深的水道,绕过了第一条如海岬一样从高山伸展出来的山脊。接着,路过了山边一条条冲沟。然后,我们又经过了另一处“海岬”。路从山脚向前延续,越来越难走。车队出没在深谷、山沟、丘陵间,到处都是粗糙尖利的黑色砾石。为了寻找一条好走一点的路,我们顺着从山脚延伸出来的一条令人讨厌的黑色砾石小路往下走,结果进入了一条顺山势陡然滑坡的冲沟,窄得连卡车都无法通过。我们向卡车发出了信号,他们另找一条道开了过去。此后,我们便再没有偏离紧靠山脚的道路,不过仍时常遇到毁损轮胎的石子路。有些路段,卡车倾斜得非常厉害,似乎随时都有翻车的危险。小汽车小心谨慎地慢慢爬行,4辆卡车跟随其后。右边又是从高山伸展出来的黑色支脉。我们不止一次停下车来,等后面的卡车,生怕哪一辆车会出毛病,又要拆卸

等等。将来一定要在这里修建一条通衢大道。

后来，路好走些了。虽然土质疏松，但路面平坦。我们是行进在蜿蜒曲折的峡谷中，两边是黑黑的高山，比我们上路以来看到的山都要高。

一群小鸟飞向空中，转眼又无影无踪。它们靠什么活呢？到哪里喝水呢？要知道这里就像月球表面一样荒凉啊！

南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谷，和我们脚下的路平行，也许是这山谷形成了保持水土的盆地。

我们走的那条峡谷越来越狭窄，最后窄得连一头载货的骆驼都无法通过。我们只好回过头来，再找别的路。走到山谷较宽的地方，路面积沙很厚，两辆卡车陷了进去。大家七手八脚忙着把车拖出来，这时，太阳渐渐西沉，于是就支起帐篷，点起营火。储备的冰块没有用完，所以我们一直不缺水。这里有梭梭树，还有一种蒙古人称之为喀拉布尔嘎斯（黑柳）的灌木。沙地上有狐狸的脚印，真不知这位“列那”^①到这块很难觅获到猎物的地方有何贵干？

离营地不远处有一个山口，向西望去，是无边无际的平川，景色十分壮观。另一侧是沙层很厚的陡坡，飞快转动的汽车轮子经过的地方，尘土弥漫。

我们来到长着梭梭树的平坦的沙地上，有的树已枯死。南边是绵亘的群山，高度适中。车队转向西南，不一会儿驶上了较硬的路面，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小小的灌木丛。有一个地方，梭梭树竟长得跟通常的树一样高。路在红色的圆形阶地间沿着一条浅沟盘旋。此后，我们的四周全是低低的红色丘陵地，中间夹杂着一条条浅浅的冲沟。有时可看到散包，它是死气沉沉的商路的标志。

^① 即欧洲著名的民间传说《狐狸列那的故事》的主角——列那狐，此书早在 50 年代就译成中文，它和狼在冰上觅食打鱼的故事还引入中国小学课本。这里代指狡猾的狐狸。——译注

在一些背阴的地方,还残留着积雪。车子向上驶进了一条峡谷,两边是灰色的、怪石嶙峋的悬崖绝壁,谷底露出一块岩石的尖顶可能是崩落下来的岩块。休息时,埃费在像神龛似的石缝中照了张相。

峡谷越来越窄,景致也更奇更美。两侧的峭壁像粗犷的雕塑,灰色的山顶呈金字塔形状,沙丘上长着怪柳和梭梭树。背阴处的雪越来越多。车队继续在灌木丛和嶙峋怪石中行进。山坡两侧都有堆起的沙丘。又向前走了不远,开阔的原野代替了山地。地面缓缓地 向西北方向倾斜,一望无垠。只有北边和南边可以看到山。

赛拉特、卓木恰和生瑞恒驾驶的 3 辆卡车并排走在我们前面不多远的地方,像 3 头灰色的大象。他们停车等了我们一会儿,闲聊了几句,便又钻进驾驶室,向着和车子一样灰暗的沙漠开去。卡车消失在一片低洼地里,不一会儿,又出现在洼地的另一头,停在那里似一动不动的、轮廓清晰的影像,这是在呈波浪形地势的最高点,不然就看不到了。低矮的圆顶小山,只有 10 英尺左右高,有的是孤零零的一个,有的是连绵在一起,就像古代的坟墓。这片荒漠完全是不毛之地,可是我们竟然还看到了几头羚羊。南面,远远地绵延着一片山丘,笼罩在美丽而柔和的蓝色雾气中。在这死亡王国中唯一可见的生命痕迹,便是骆驼的白骨了。这话听起来自相矛盾,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常常会估计错物体的远近。有时一座山看似很近,但要几小时的时间才能走到;有时我们又会把近处的丘陵视为远山。

我们驶过几条稀稀落落的植被带,开上了又一座高约 5 000 英尺的山岭,山那边又是平川。这里离“3 头大象”的伙计们扎下的营地已是不远了。

第二天,路上的草木丛比原先多得多。我们经过了几处商队的旧营地,看到了几具骆驼骸骨。周围是一大片低洼地,从沉积的黄土看,这以前是一个湖底。南面的山叫“马鬃山”。我们知道这一个地区也用这个名称。

眼前是鬼斧神工凿成的红色平川，一块块长满怪柳、铺上黄沙的低地，被覆盖着坚硬砾石的、像高原一样的高地（即戈壁或地地道道的沙漠）隔了开来。南边离我们不远处，绵延着低矮的黑色丘陵；再往南，是较高的紫灰色山脉，山上的积雪像条纹一样顺着一个方向悬着似的，看上去像马的银色鬃毛。两群正在低洼地吃草的羚羊——一群有5头，另一群有8头——被马达声惊了，蹦跳着向沙漠高原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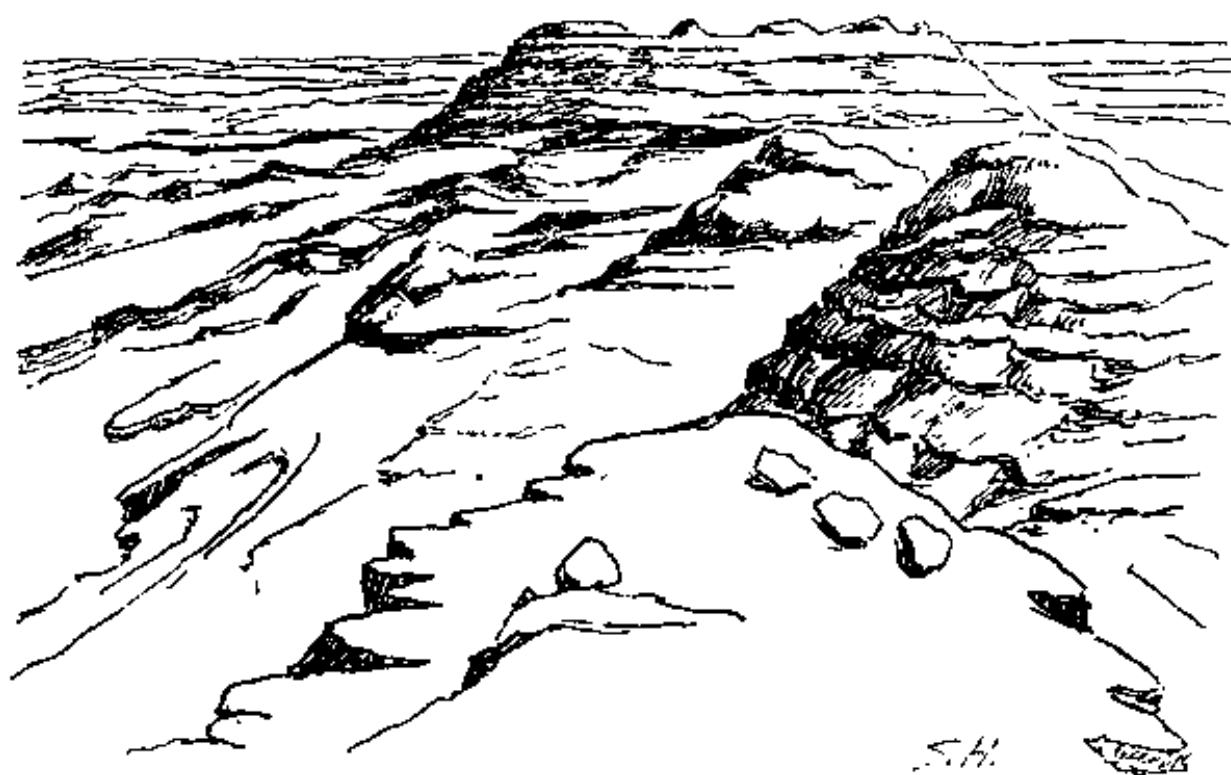
我们的探路专家赛拉特宣布说，“火烧井”离这里不会远，因为他看到了小土坡和长着高高的怪柳的圆锥形土丘，认定井就在近处。井并不好找，有好几条商路在这里交叉，朝不同的方向延伸。但我们还是找到了。这口井看来已有很长时间弃置不用了。井里满是沙土、碎木等杂物。

要从井边再回到路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穿过一片低洼地，那里长满了挺拔秀丽的梭梭树。最后我们找到了路。离井不远处的海拔是5260英尺。现在正向西爬坡，越向西走，马鬃山上覆盖的积雪面积看上去也越大。

11点时，我们在公婆泉处停了下来，泉水涌出的洼地里，长着水草，还有小甲壳虫到处爬着；泉的下方，大块大块的浮冰向四周飘去，像一个微型的冰湖。

在这景色迷人的泉边，我们吃了一餐简单的午饭，然后启程去丹宾喇嘛的古老城堡。它坐落在南边高山山麓的丘陵中，四周围着石头和泥砌成的灰墙，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庭院。用怪柳树等木料搭的屋顶已不复存在，看上去像一座废墟。房屋之间由细长的甬道、走廊、狭小的楼梯连结在一起。院子一边竖立着一个方形瞭望塔。围着审讯室的墙有一排固定在地上的石凳。另一间房是会客室。通过又陡又窄的楼梯就到了丹宾喇嘛的私室，房间很小。从室内的窥视孔可眺望辽阔的沙漠。还有一个厨房，里面有石头搭的炉灶、锅台和排烟口。

丹宾喇嘛，人称“假喇嘛”。他就住在这座坚固的城堡中，向过往的商队勒索税钱。十年前，喀尔喀蒙古人袭击了这里，杀死了丹宾喇嘛。古堡中留下的痕迹表明，今天只有狐狸和小鸟才是这座具有浪漫色彩的城堡的主人。而遗址留给人的是无边的遐想^①。



^① 拉铁摩尔在其《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一书中，曾较详细地记述了丹宾喇嘛这位中亚冒险家的生涯。罗列赫(Roerich, 1902—1960)在其《亚洲腹地行纪》一书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原注

九、穿越黑色戈壁

我们匆匆参观了一度是“假喇嘛”的强盗巢穴的废墟后，必须开车越过一条令人不悦的覆盖着植被的低丘带，还要穿过灌木杂草丛生的土疙瘩路段，这是骆驼喜欢的所在，可对汽车来说是很糟的。赛拉特停下车来，察看了一条冻住的河道中冰的厚度。这条河道宽6.6英尺，其源头显然是一眼泉水。察看的结果是车在冰上开过去没有问题。

走了一程，又遇到了很糟的地面，赛拉特只好停下来，和另外两个队员一起，挥锹动镐，平整路面。这里，一路都是沟坎和灌木丛生的土坡。土壤是疏松的粘土，夹杂着盐碱的成分，地面都快成白色的了。

“跳湖”是一个典型的芦苇沼泽，水面上一块块浮冰泛出绿色的光，有的冰上还盖了一层薄雪。羚羊来这里饮水。这个时节，可以看到大片大片颜色黄得刺眼的、长得很高的草，蒙古人把这种草叫做察罕德列逊。

赛拉特又一次陷入困境。他和车上的人不得不再一次跳下车来，用镐和斧子开路，要铲除几个又硬又碍事的小土墩很费劲，因为草木根茎在里边缠绕蔓延，要铲平相当困难。这时，医生想把小汽车开过去，我和尤、陈都跳下车，好减轻车子的重量。即使这样，医生驾驶的空车的底盘还是结结实实的贴在一个山包上，被卡住了。他坐在那里一筹莫展。赛拉特的运气好些。他驾车穿行在烦人的疏松的粘土地和土坡上，压着盘绕其中的草根和茂密的矮树

丛行进,车身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有几次,车子差点要翻了。在我看来,车轴和弹簧居然都没有断裂,简直是一大奇迹。

他驾车驶上好一些的地面后,又步行回来找我们。大家一齐挥动铁锹、镐头,铲平卡住我们车的长满杂草灌丛的山包。这当口,生瑞恒、埃费和卓木恰驾着另外3辆卡车走到前面去了。有我们平整道路,他们的车子就好开多了。碍事的土包铲平了,大家一起用力猛推,小汽车终于动窝了。

经过这一番费时费力的折腾,我们又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地上路了,终于驶出了这个鬼地方。我下了车,宁可步行一会儿。不久便有人报告说,小汽车的前轮簧板断裂,最长的簧板丢了,必须换上新的。当时我们能找到的燃料只有草木根。

南边的马鬃山显得越发巍峨壮观了。山峰耸峙,从山顶到山脚都覆盖着积雪。太阳很快沉至地平线以下,暮色苍茫中,怪石突兀的山影显得格外鲜明。我们所在地的海拔已超过5500英尺。

1月28日夜的温度是零下20.3度。第二天,天气阴沉沉的。整个上午都用在安装新簧板上了。出发时,已近12点了。埃费和贝格曼乘的卡车与我们的汽车同行。每当要测量方位时,贝格曼都得跳下车,支好测量仪,然后开始工作。3头“大象”走在前面,摇摇晃晃地行驶在起伏的荒漠上。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两口井边,中国队员认为这井恰好是在宁夏和甘肃的边境上^①。如果能确定此地是在明水以西20华里或6英里处,那么我们离新疆的地界就不远了。

我们从6.6英尺深的井里提了一些储备水。井边还有商队在此休息过的痕迹。车队继续向前,开过一个宽50码的通道,两边是惹人注目的丘陵地,再笔直往前走,又通过一个通道。这里的海

^① 原文如此。这里的“宁夏”,似为“内蒙古”之误。——译注

拔高度已达 5 915 英尺。

路南边，站着一群野驴，一个个竖着耳朵，张大鼻孔，眼睛盯着我们一动不动。这些驴的毛色不是浅褐，就是深褐的，腹部是白毛。它们的举止就像西藏的野驴和柴达木的鹅喉羚，有着帝王般的高傲，又不失温文尔雅。当它们终于断定我们不是它们的同类时，便像触了电似的惊跳起来，急忙向南边窜去。

路沿着一条河床在低低的丘陵地中曲折前行，山上灌木丛生，十分茂密，积雪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在爬坡，现在的海拔已达 6 080 英尺高，路正伸向西北方向。车队显然已临近一个作为分水岭的山口。一条曲曲弯弯的谷道正通向那里。这一带最高点的海拔是 6 435 英尺。

分水岭的另一侧是一片覆着星星点点白雪的平原。现在车队的方向大体是向西行驶。我们在海拔 6 800 英尺的高地建立了第 29 号营地。

离明水至多只有 9 英里行程了。熬过了一个气温在零下 24.3 度的寒夜，迎来了一个格外晴朗和宁静的早晨。我们继续向明水进发。那儿离决定我们命运的城镇哈密，估计有 162 英里。南面耸起高高的雪山。地上的一块长着呈螺旋状大角的盘羊头骨，在阳光下像积雪一样洁白耀眼。几头羚羊向南奔去。在每丛草窝子的东边，积雪都成了箭头形状，显然刚从西边刮来了一场暴风雪。

我们翻过了两座高山之间的一道低矮的山脊。面前出现了一片向西伸展的平原，坡度微乎其微，很难察觉出。稀疏的几处杂草，几块雪地，点缀着隐约可见的红色和黄色土壤。有几处雪地还印着野驴的足迹。南北两边是从头到脚裹在雪中的高山，就像一块块巨大的白色大理石丰碑，在阳光下泛着神秘诱人的光彩。景色巍峨壮丽，令人难以忘怀。

下午天色尚早时，我们停在了明水历经 2000 年沧桑的古堡和

烽火台的遗址旁，这里至今仍留有汉代皇室在西北抵御匈奴帝国的最远的警戒线遗迹。

大家开始支帐篷。我们跳下车来，巡视着墩实依旧的古堡遗址的残垣断壁。墙根有几处小缝，似告诉我们此处还有地下洞窟，顺着雪地上的狐狸脚印就可找到。埃费提着枪，蹑手蹑脚地钻进洞去，我们的狗“豹”也被放进去搜寻。但里面寂静无声，——狐狸全都出去串门了！

我们将在明水住几夜，这样，陈宗器就有机会在额济纳河和哈密之间建立起第二个天文观测点。

经过刚才的那道山脊时，我们已到达海拔 6 900 英尺的高度。根据等高仪所显示的数字，那儿该是通往新疆的北段公路的制高点了。

在去明水的路上，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遇上喀尔喀蒙古人或土匪，因为这一路有水，有草，有柴火。也许马仲英将军派驻了巡逻队或边防骑兵，把守新疆这个他想征服的省份的出入口。然而，我们看不到一点人影马迹！平原上，除了几头在吃草的羚羊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生命的踪影。

一座座土坯砌成的古代要塞，已在这个形似竞技场的山谷中屹立了 2 000 年，经受了无数沙暴和暴风雪的磨砺，然而岁月却没能把它们摧毁。我们看到了 7 座结实的堡垒废墟，或许还要经过几百年才能把它们夷为平地，直至无影无踪。总有一天，考古学家会再也找不到这些遗址，到那时候，连狐狸也得另觅栖身的巢穴了。

据说目前明水井一点水都没有了。自从商队不再路过这里后，也许这井就被尘沙埋了起来。我们还算幸运，大约一星期之前，这一带刚刮了一场暴风雪。我们的帐篷外正好都是积雪，因此，水源丰富，在一些冲沟和低洼地，积雪达 1 英尺厚。十分奇怪的是，地上依然有一行行驼粪，让人想起当年这些牲畜夜间被成行

拴在一起的情景。两年的日晒、雨淋、风吹、酷寒，竟没能使驼粪荡然无存。

1月30日晨，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正刮着西北风，风刮得还不算太大，风速只有每秒23英尺，气温在零下17.5度左右。尽管如此，天气仍然很冷，很不舒服。天空浓云密布，阴沉沉、暗洞洞的。我们很不情愿起床，有点懊丧，心想碰上这样的天气，陈宗器的气象观测任务怕是完不成了。入冬以来，天气一直晴朗美好，一路上感觉很舒服，现在这种好光景过去了。

傍晚6点钟，开始下雪，到了晚上10点，雪仍在不停地下着。大地白茫茫的一片，像无边的裹尸布。雪下得很急，四周寂然无声。这样的雪暴只要持续几天，我们就会被困在雪中，而现在我们离目的地已很近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大雪困在明水，耽搁上几星期，也许会有更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倒是有利的。到那时，一场血腥的骚乱已经过去，那位残忍的将军可能在向我们伸出魔掌之前，就已不得不撤离新疆了。因此，我一点也不担忧，只是安闲地听着雪花从帐篷布上唰唰地滑落。

陈和他的无线电使我们多了点消遣。前一天晚上，他收到的消息说：“中国一切平静，孙科^①告诉记者说，没有收到来自新疆的任何消息。”30日，南京方面广播说：“黄慕松被派往西藏斡旋。盛世才通知南京说，南疆尚未脱离新疆省独立。”

我们从这两条消息中了解不到什么。“西线无新闻”，很可能意味着边疆战乱地区被严密封锁一切消息，一点儿真实情况也走漏不出来。后来，我们很快发现，南疆脱离新疆省独立的说法，比起1月30日南京方面对此事的否定更要接近事实些。两条消息都只能说明我们进入新疆地界的前景还是有希望的。我们本该为新疆之行更加忧虑，但大家相当冷静地估计了未来的形势。我们

^① 孙中山之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译注

所有的疑问得到解答的一天，也就是离我们必须作出决定的那天只有一星期了。

1月31日，最低温度为零下26.5度。大地洁白一片，我们置身于肃穆孤寂的冬季景色之中。天空布满厚厚的阴云，但到下午，太阳终于冲破云层露了出来。贝格曼画了一幅明水古迹的草图，别的人都在写日记。西北风仍在刮着，大朵的云彩向太阳聚拢过去，已到了暮色临近的时分。

从明水废墟的状况可以看出，在过去2000年中，西北风一直比东南风更为强劲，因为向着东南方的古建筑依然直直地挺立着，而朝西北的一边则受到风的严重侵蚀，只剩下外围的残垣断壁。

1月31日晚，温度剧降至零下29.5度。空中仍是阴云密布，没有一丝放晴的迹象。太阳沉入了云堆里，西边的地平线上如火焰一般，一片桔红，渐渐褪成淡淡的紫霞。后半夜时，天空清澈明朗，陈宗器可以观测星星了，但他还需要一夜时间，才能完成观察，我们也就不得不再耐心等待一天。

2月2日早晨，我们听说陈一夜未睡，一直干到早晨7点20分，而这天夜里的温度降到零下32.5度（即华氏冰点下58.5度）。尤寅照、赫默尔和龚继成帮陈看管帐篷中的炉火，让他可以不时地暖暖双手，一直忙到凌晨两点钟。他们还给他准备了茶和吃的，让陈不断补充点能量。后来就由三娃子照顾他。

这是一个明媚的隆冬之晨。天边飘着几片薄薄的云。地面大部分积雪很快就会融化，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贝格曼发现一座汉代古堡，里边是一个边长80英尺的正方形结构。外面有七八座20英尺高、底座直径为17英尺的烽火台，看上去很敦实。北面的建筑物由一道长49英尺的低矮防御墙保护。南面是一条自然沟壑形成的壕沟。四周的地上可以找到汉代惯用的根据弓的不同尺寸而大小、形状不同的铜制箭头。

2月2日晚，天气仍很冷，记录的温度为零下31.1度。清晨，

如溢出的奶油一般的乳白色薄雾，随着微弱的东南风，飘浮在平原上。天空湛蓝，群山藏身于晨雾中，只露出一个个顶峰。杂草、灌木丛、箱子、汽油桶都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看起来像雪花石膏制成的模型。古堡废墟在漂浮的薄雾中显得神秘莫测。整个景观在大自然梦幻般的装点下，更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奇特的美。

我们离开了汉代皇室的边塞古堡，又上路了。右边，一座耸立 在高山支脉山梁上的、孤零零的烽火台被甩在了车后，接着又经过了明水地方的一口井，车队便向西北方驶去。不一会儿，我们便插入了群山之中。一条覆盖着厚厚积雪的小溪横在路上。为了躲开积雪，我们不得不向北绕行。所谓的路，实际上是很糟的，到处是一些沟坎、土墩、梯形地、杂草、灌丛等等，而上面又尽是一些迷惑人的积雪之类的遮盖物，致使我们判断不清塌下去的地方有多深，常常倒霉地陷进积雪之中。

第二口井是在山谷中，周围是几处现代房子的废墟。一些露在外面的花岗石已被风沙磨蚀了棱角。

地面上到处都是软软的细沙，车队行进得非常缓慢。不是这辆车就是那辆车陷进坑里，只好又挖又刨，连拉带拽，才能把车弄出来。有时只好停下来，全体动手清除峡谷里的积雪。

我们缓缓地爬上坡，向又一个山口驶去。雾气升得没那么高，高处的空气相当清新，但回头张望时，仍可看到明水近处的宽阔山谷底部笼罩着白色的面纱。我们到达了高出明水仅 120 英尺的山口。

从山口高处向下的路非常陡峭，所有的车都踩上了刹车，慢慢滑行，进入了夹在板岩间的又一个像竞技场形状似的山谷。远处已隐约可见天山的轮廓。山口向西的地方，积雪更多了。

在前面走过的 300 英里路途上，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人的踪影；因此，当我们看到雪地上印着人的足迹时，都很好奇。这个人 是向南走的，还牵着一峰骆驼和一匹马。这位行客究竟是谁，要到哪儿

去,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四周出现了一座座不高不矮的暗色山丘。在一片片平地上覆盖着浓密的草木丛,其中还有梭梭树。6—7英尺宽的道路蜿蜒在广阔的平川上。高度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往下降。这时比上一个山口已低了1140英尺。呈起伏状的地面相当硬实,雪下面是无数纵横的小沟。赛拉特的车陷进一条小沟里,又得花力气把它挖出来。

第31号营地就设在这片旷野的居中地段,海拔比明水低1300英尺。这里群山环绕,沟壑纵横,积雪甚厚。有一条冲沟比我们一路上碰到的都要深。第二天早晨一定要从积雪、沟壑中开出一条路。我们通过的第一个低矮山口,在明水以东。这是一座分水岭,它的东西是几条小溪,西边往远处去是位于哈密以南的一条较大的槽谷。另一个山口在明水西北,也是个比较重要的通道。靠近明水的深沟一直通向哈密以南的槽谷状盆地,并在那里和别的河道汇合。南边的群山属北山的高耸部分。

2月4日早晨,天空晴朗,四周寂静无声,但西南偏西的喀尔里克山^①(意为“雪山”)的上空一片阴沉,令人担心。群峰四周已密集着团团乌云,但见阴云继续向上翻腾,如滚滚向东的惊涛骇浪朝我们涌来。南边仍能看到披着呈细条状白雪的群山,东方一片蓝天很快被黑云遮没了。总之,哈密的上空阴沉昏暗,或许这正预示着 we 前途的艰险。

路上的积雪比以前少了。我们踏上一条非常明显的驼路,只是雪还没有化,这条路已被践踏成一条白色缎带了。有的地方,积雪较厚,盖住了路面,我们只能凭感觉把握车的方向。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完全迷了路,不得不停下来探路。后来我们又陷到沟里,5个队员又得挥锹把车弄出来。有时候,路面情况变幻莫测。小汽

^① 位于哈密盆地北缘,属北天山东段,东西走向。——译注

车本来走得好好的，突然会陷入几英尺深的雪坑之中，还得费上一番功夫才能上路。

又下起了小雪。阴云已布满整个天空，在刚才两小时的旅途中，车陷进雪坑里竟达 20 次之多。每辆卡车都配备了两把铁锹，小汽车只有一把。

后来，地面情况好转。沟变浅了，路也很好走了。横向地带上长着一簇簇杂草灌木。我们看到一座用怪柳树干和骆驼骸骨搭起的特大敖包，顶上放着一个骆驼头骨，它昭示着众生的共同归宿，也昭示着大漠旅人处境的险恶。积雪层变得越来越薄了，也越来越难看到大片的积雪了，即使是可以看到的，也和流沙尘土掺和在一起了。

北方预示凶兆的乌云开始散去，天山的峰峦以至山麓丘陵地已隐约可见。

车队又驰下一个坡形的阶地。我们就像下台阶，越下越低。在台阶的陡坡上堆着一堆堆流沙。在一条横卧路上的小山谷中，长着一棵形影孤单的白杨树。这里已看不到一点雪了，最后一场雪显然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下的。

傍晚，我们到达了梧桐窝子泉^①，这是一片被冰封住的水塘，宽 15 码，长 100 码，地下水泉是其水源。生瑞恒装了满满两袋冰。我们随后又继续赶路，顺着一处阶地的顶层行进，灰色土壤上光秃秃的。天有一点放晴了，但喀尔里克山仍裹在云层中。我们路过的最后一道河床的最低处海拔约为 3 360 英尺，也就是说，自越过明水以后，地势已低了 3 250 英尺。

我们面前展现出一片平原，广袤无垠。云层已散去，夕阳隐约可见，不一会儿，它就沉下地平线，我们借着灯光测量方位。经过这一天近 60 英里的旅程，我们终于在这片平原居中的地方安下营

^① 位于新疆东端。——译注

地。

夜间,气温为零下 17.7 度。在清晨那段时间,喀尔里克山显得十分壮观、雄伟,一座座巍峨的山峰覆盖着皑皑白雪,闪烁着眩目的光芒。不一会儿,来势汹汹的浓云又像前几天一样吞没了群峰。西边,天空晴朗,荒漠上空仍不时飘来一块块乌云,在地上投下片片阴影。

车队在荒漠中行进着。我们很少看到敖包,也很少看到骆驼的骨骸,偶尔可发现以前一些商队宿营的痕迹。从明水出来后,我们一直往西北方向走,现在是朝西行进了。

路上,我们看到在一个小土坡上堆着 5 个敖包。又走了一程,我们认出了坐落在低矮的丘陵地之中的庙儿沟,这是新疆最东边的一个村落。1928 年 1 月 19 日,我们曾到过庙儿沟,这是我们穿过戈壁后见到的第一个真正有人居住的地方。医生甚至认出了建在最高的小山坡上的一座呈圆顶型的圣人墓(“玛扎”)。1928 年,庙儿沟仍住着几户维吾尔人。如果这些注意礼仪的人还住在他们那简陋的土坯房子里,我们就会重逢故人,还可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问问马仲英和盛世才之间是否还打得难解难分,和解了没有。因此,在我们用望远镜向西搜寻丘陵地的目标时,心情多少有些激动也就不言而喻了。

半小时后,玛扎已清晰可见。眼看就要抵达绿洲了,那里有一条长满苇子和灌木的小溪,水面上结了一点薄冰。我们驶上了右边的山坡。6 年前,我们曾在左边的山崖下看到坐落在高大的丛林之中的一座汉族寺庙,现在它已不复存在。路在低低的山丘地之中向前延伸,最后爬上了高地的顶部。一群羚羊从我们眼前飞奔而过——这里竟然有羚羊!脚下就是那小村庄了!

1 点钟,车队到了村里。我们立刻发现,战争的风云也席卷了这座偏僻村落。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只剩下光秃秃的残垣断壁。在休息的一刻钟里,我们走进去,四处看了看,一个人影也

没有。听不见狗叫，也看不见有鸡在房前屋后觅食。又一群羚羊跑了过去，它们竟敢径直走到村舍跟前。村子已被洗劫一空，村民都已弃家远去，房子里连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不过，无论是马仲英还是盛世才称雄，在庙儿沟至少应该留个人探探风，因为这里不仅是新疆通往甘肃和宁夏的前哨，也是它连结中国内地最大的一条商路的前哨，至少不久前还是如此。我们猜不透这内中何有蹊跷，在离开这座静悄悄的废村时，对未来充满了忧虑。

车队从岩石间的路口驶上了平坦的荒漠。一群在路上吃草的羚羊，在我们第一辆车前面穿过，向南边奔逃去。我们驶过了右边的一座烽火台和一间孤零零的土房。

车队经过了位于台地上的一孔泉水。眼前是寸草不生的旷野。偶尔能看到一座圆锥形石堆，这里已不叫敖包了，我们现在是在穆罕默德的领地上，这种石堆在维吾尔语里直接叫做“Nischan”，意思是“标记”。

海！海！一望无际的平川像大海一般又展现在我们面前。地平线已是可望不可及。路很好走，3头“大象”在滚滚尘浪中向西狂奔，好像被追杀着一般。一座小土屋孤寂地立在路旁，大车的车辙一直通到屋前，四周有大片大片的苇子地，这也许是很久很久以前留下的印记了！大车车辙足有一英尺深。两行车辙之间牲口踩下去的蹄印，正是昔日车水马龙繁忙景象的见证。然而，现在呢？一个人影都没有，更没有任何新近留下的人、畜或大车的踪迹。我们已置身于一片被人遗弃的土地，这里和沙漠一样荒凉，只有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山野。

车轮扬起阵阵令人窒息的尘浪，我们很难看清伙伴们在哪里。赛拉特走在我们前面，卓木恰瘪了一个车胎，生瑞恒又到哪里去了？噢，原来他也跑到了前面。我们加快了速度好赶上他。我命令车队就地扎营，因为天色已晚，摸黑开到哈密是不妥当的。生瑞恒还在向前开，整个车队已经七零八落。这时候，车队要集中起来

才好。医生和陈宗器爬上了路边的土堆，挥动红旗，打出“转弯”的信号。他们看到生瑞恒超过了赛拉特，两辆车正在两边都布满深深的沟槽和密密层层苇子地的路上十分吃力地掉转车头。

大家渐渐集中到我们停车的地方。在一棵白杨树旁安下了营地。这里是第33号营地，比前面一个营地低1270英尺。实际上，我们自离开明水以后，一直在往底处走。营地有一处露天的淡水泉。我们不知道这儿的地点，但知道离黄芦岗只有2—3英里地。

4顶帐篷支好后，点起了篝火。和往常一样，大家在我的帐篷里用茶点。又等了几个小时，贾贵终于做好了豌豆汤和炸肉卷。从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人的踪迹至今，已有18天了。现在我们离哈密绿洲最外围的村庄已相当近了。

但是，仍渺无人迹，也没碰到哨兵巡逻。这里见不到骆驼、马匹或牛群在茂盛的黄草地吃草，也听不见狗叫。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这一带彻底遭到洗劫，人都逃光了吗？当前由谁统治这块被遗弃的地方？在东边土匪出没的地区，我们夜里是放哨的，但这里却不需要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大家情绪很好，在我的帐篷里谈笑风生，散去得比往常都要晚。

我们不会放弃这次探险，除非确已证实再没有任何进入哈密的通道。如果被赶出哈密，我们打算沿通向安西的古道折向东南，再在半路改道向西，争取越过北山到达阿提米西布拉克^①和库尔勒。总之，不到万不得已时，我们是不会撤回南京的。

星星在空中闪烁，篝火渐渐熄灭，在这背水一战的前夜，我们平静地进入了梦乡。

^① 阿提米西布拉克，含意为“六十泉”，是通向罗布泊古道的必经之地，上世纪末，斯文·赫定曾在那儿停留过，后又通过那儿前往楼兰古城。——译注

十、汽车遭劫，身陷囹圄^①

2月6日早晨，我们开始了进入哈密之前的最后一天旅程。至于叛乱、内战四起的新疆，情况究竟怎么样，一点也不清楚。在额济纳和明水时，我们通过无线电零星收到了一点消息，说新疆已是一片和平景象，只有一则简短的公报提到，在哈密以东的维吾尔人中发生了局部性的叛乱。不过，这场叛乱现在也该平息，我们或许能平安无事地越过新疆的地界。

大家对此毫无疑虑。探险队中的汉族人和蒙古族人，也像瑞典人一样，信心十足。我们甚至在快到这块绿洲的边沿地区时，都没有开个会商量一下。路边偶尔看见几处农舍，三三两两的农民站在门外凝视着车队，我们也没有怎么在意，只管一个劲儿往前驶去。如同凯撒越过卢比孔河^②一般，纵有千难万险，在所不辞！尽管这是举足轻重的一步，我们仍坚定地继续前进。

前面的路分成两股叉道。右手一条道通向黄芦岗，左手那条道要经过支有一顶帐篷的地方。我们在两边都看到了士兵，约有20名左右，有的骑马，但多数是步兵。他们冲到路边，端着枪，随时准备应急。和赛拉特坐在一辆车上的尤寅照立刻意识到情况严

① 这一章是我上一部著作《大马的逃亡》（即《马仲英逃亡记》）的概要。为使经过情况连贯，故插入本书。——原注

② 卢比孔河位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凯撒越过此河与庞培决战。——译注

重。让车停到了帐篷边。如果他和赛拉特再开出几码,肯定会倒在近在咫尺的枪口下了。这时,尤忙打开车门跳下来,举起双手,表示没有武器,士兵们的枪口也放低了些。尤要求见他们的指挥官。指挥官手指扣着扳机,小心翼翼地来到车旁。

“你们是什么人?”他厉声问道,“从哪儿来?那哪里去?有通行证吗?带武器了吗?”

尤镇静地作了回答。这时,车队赶了上来,我向他们出示了通行证。哨兵们围了过来,检查了我们的通行证,还在上面盖了印。

接着,我们的武器被拿走了。他们命令我们停在原地不动,等候哈密方面关于如何发落我们的命令来了再说。不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说我们可以继续前进。于是,我们回到被士兵们占领的车上,沉重的车队又上了路,在尘沙弥漫中进入了黄芦岗这个村庄。一路上,我们又两次遭到荷枪实弹的士兵们的阻拦,最后终于平安抵达哈密,车停在了张司令^①的衙门外。我们又照例出示了通行证,并受到了礼遇,被收走的手枪、步枪都还给了我们。现在我们的命运已见分晓。我们的处境至少是令人兴奋的。无线电广播的什么新疆平安无事之类的消息完全失实。正相反,战争显然刚刚进入决定性的、也是最残忍的阶段,我们正好一头栽到了这场战争的漩涡之中!

有一条途经肃州和安西的横贯甘肃的路,它在黄芦岗与我们离开额济纳地区以后所走的路汇合,所以,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从黄芦岗的哨卡那里往回走,这样就可直奔安西和中国内地。但根据南京的指令,我们必须对通往塔城、伊宁和喀什的3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进行勘察;而在探险队中也没有一个队员想在完成肩负的这项任务之前东返。

此外,现在回头也晚了!我们已经越过界线,落到马仲英将军

^① 即卫戍司令张凤鸣。——译注

也就是“大马”的手上了。他一个人就能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请求张司令打听一下我们能否通过去吐鲁番的路。得到的回答是欢迎我们去。

于是,我们出发前往吐鲁番。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到的款待和礼遇。沿途各地都为我们安排好住宿,连我们需要补充的给养也不让付钱;一切事情的安排都由我们自己作主。当局让我们参观了吐鲁番的武器库,视察了征兵活动。我们行动自由,无拘无束。只有通往乌鲁木齐的路是关闭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马控制了达坂城^①的各个山口,即该城镇和吐鲁番之间的通道,那里正是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了。换一句话说,要是走从焉耆、库尔勒、库车、阿克苏到喀什这条路,我们大概可以通行无阻。所有这些城镇的指挥官都接到了按马将军命令下达的指示。

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况且也没有人敢暗示我们,马将军自己的命运也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几周之后,他就要率部放弃阵地,沿着我们准备西行的那条路,向库车、阿克苏和喀什撤退。这么一来,就使我们处于更加窘迫的境地。

从吐鲁番经托克逊到焉耆这一路上,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被洗劫或烧毁的村庄,遇到了三三两两逃难的百姓。焉耆的司令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并提供了各种方便,帮我们把5辆车运过刚刚开始解冻的开都河^②。

时值3月。自1885年我第一次在亚洲这块大陆上探险以来所经历的最险恶、最野蛮的一段生活,也在这时开始了。如果把马仲英将军的部队对我们采取的暴力行为都归罪到马的身上,这是不公平的。部队的大部分是东干人,也有少数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汉人。在以往的东干人暴乱中,他们留下了残忍无比、嗜血成性

① 位于乌鲁木齐东南部,是天山南北的交通要道。——译注

② 一称海都河。位于焉耆盆地。东南流注博斯腾湖。——译注

的恶名。对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汉人，人们格外憎恨。

3月4日晚，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到达库尔勒。我们发现占领这座城镇的军队正是这部分人。他们都是些职业刽子手、经历过甘肃最后几次战乱的老兵；几年前，就在那里的沙漠南缘地带的绿洲屠杀了至少1万平民百姓。当车队借着几盏前灯的光线轰隆隆驶进库尔勒镇上的主要街道时，我们等于一头栽进了一个匪窝，把自己交给这支残酷的军队发落了。

我们离开吐鲁番时，马仲英的参谋长、驻守当地的黎将军^①给我们配备了一支5人组成的护卫队。他请求我们在到达阿克苏——最好到喀什——之前，不要离开护卫队。但不久我们就发现这支“护卫队”是危险的旅伴。一路上，他们忽左忽右乱开枪，纯粹是逗乐胡闹。在库米什村时，他们中有一个人疏忽大意，差一点开枪打中赫默尔博士。他们的长官姓张，是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对我们非常傲慢，身后总是跟着两个恶棍似的随从。

3月5日，护卫队要我们“借”给他们一辆卡车和一名司机，说他们接到命令，要送一份重要文件到阿克苏前线去。我坚决拒绝了。车辆是属于政府的，我们没有权利随便处置。上午10点钟，他们来了两个人叫我们立刻去总部，给焉耆来的重要电讯回话。我带上尤、生瑞恒和埃费去了。我们开的是小汽车，随身没带武器。

到了目的地，埃费留在车上，其余人都走进了总部。张以命令的口吻再次提出“借”一辆卡车的要求。我一口拒绝了。他继续厉声说：

“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今晚我一定要用一辆你的卡车。”

我站起身来，朝外面的车走去。尤陪我一同走了出去。我坐

^① 即黎海如，曾任塔城民政长、东疆剿匪司令等职，后投降马仲英部。——译注

进了车里。尤也扶着车门把，刚要开门进车时，却被3个冲过来的士兵强行拖走了。他用力挣扎着。我一边对他大声嚷嚷：“镇静一点，跟他们去！”一边赶紧下了车，不想也被几个士兵抓住，用枪托把我往回推进了院子。埃费和生瑞恒也被抓了起来。一双粗硬的手像钳子一样死死抓住我的手腕，准备把我反绑起来。其他3个人已用绳子紧捆起来，绳子都勒进肉里了。一个家伙扯下了我的外套，另一个扒我的衬衫，要撕了它。总共有40来名野蛮的士兵挤在这院子里。屋里燃着一根蜡烛，投来的昏暗光束是这院子里唯一的一点光亮。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怖的一幕就在这里展现了。

处决的准备已一切就绪。他们端着的枪卡嗒卡嗒直响，好像马上就要开枪了，只差还没有把我们推到墙边结果了。下一步就轮到枪毙留在营地的赫默尔、贝格曼、龚、陈、司机和仆人，然后没收我们的汽车和财物，彻底消灭探险队，一点痕迹也不留下，反正可以在东干军队中找到新司机。

死不过是几秒钟的事。包围我们的40个士兵不是人，是野兽，是恶魔，对他们来说，人命，不管是一条命还是一千条命，都算不得一回事。我的脑海中闪过自己一生的历程。如果月复一月没有任何音讯，家里人会多么悲伤啊！库尔勒的维吾尔人只能证实我们在3月4日晚到过那里，然后便失踪了。不会有谋杀的人证，杀人犯自然会装聋作哑。从北京和南京到新疆的公路，真值得我们舍弃生命吗？我和同伙们真该这样蛮干去白白送死吗？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杀人者的枪口，而且在扒衣服、捆绑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的胸口都顶着两支毛瑟枪。如果这时有哪个匪兵失手，不小心扣动扳机，我们就会有一个人最先倒下，那么其他人的命运也就无法改变了。我极其清楚地看到，最多只剩一分钟了。不！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也许也太晚了，但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已到了每个人屏住呼吸，等待他

们发出“准备，射击！”这种命令的时刻了！哪怕一点点火气都会使张发出开枪的命令。我对生瑞恒大声喊道：“要枪毙我们了，答应他们今天晚上用这车吧！”

生瑞恒镇定地说了我的决定，张于是下命令把我单独带进房里。我坐了下来，两边站着持枪的士兵，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时间像是凝固了。我随时都在担心院子里会响起枪毙我同伙的阵阵枪声。不过，尤终于被强行推进了屋里，接着又进来了两个瑞典人。谈判开始了，结局是将汽车开到了大门口，并同意生瑞恒明天一早开车去阿克苏。

那一晚，我们真是无法入睡！分手前，生瑞恒请求我念诵几首瑞典赞美诗。那情景仿佛我们是在最后诀别。按原来的计划，探险队到库尔勒后便分头行动。贝格曼和陈开两辆卡车去新河——库姆河^①和罗布泊，其余的人驾着另外3辆车沿着去喀什的公路，勘察建设一条公路需作些什么准备。

现在情况发生了突变。我们清醒地察觉到，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妙，如果让去罗布泊的小组单独行动，他们一定会一去不复返。生瑞恒一再恳求，要我们一起行动，要向东远走罗布泊沙漠，要寻找既没有路、居民，也没有村庄的地区。但我向他保证，探险队的队员没有谁会胆小到置伙伴的生命于不顾。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第二天向库车和阿克苏进发。

我们离开了轮台^②这个大村庄，经过两天跋涉，来到群帕克村。正在给我驾车的贝格曼突然喊道：

“生瑞恒来了！”

我们停了下来。只见大路上卷起了滚滚尘浪，渐渐看清了一

^① 库姆河，意为沙河，是孔雀河下游的一个支流，自本世纪中期以来，已完全干涸。——译注

^② 即今轮台县县城，今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译注

辆卡车的轮廓。车一直开到我们跟前，生瑞恒跳了下来，顿时，大家七嘴八舌嚷嚷开了。生瑞恒对我们讲了他的历险记。当那 12 个野兽般的乘客在库车下车后，生瑞恒趁其不备，掉转车头，向着库尔勒的方向飞也似的开走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都证明，我们整个车队往库车方面去是极危险的。在群帕克，我们已钻进了捕鼠夹子。库车以西的村庄拜城^①的驻军属伊犁派来的北方军，即原属盛世才将军和乌鲁木齐方面的部队。在东边通往库尔勒和焉耆的路上，我们会遇到马仲英的东干人溃兵。

我们在大路中间停了一个多小时。我主张还是去库车，然后冲过拜城的防线，前往阿克苏和喀什。但在讨论的时候，我发现同事们，特别是生瑞恒，一再坚持应折回库尔勒，然后争取去罗布泊地区。最后决定按照他们的主张行动。我们处在战争的中心，虽然目前这一带尚属平静，但也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我之所以倾向去喀什，是因为如果那样，我们就可以完成本次探险的一项重要任务，即分别在通往塔城、伊宁和喀什的 3 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进行详细考察。如果不去造访乌鲁木齐，我们到哪里去弄汽油呢？但如果我们用上几小时从群帕克直奔库车，情况又会怎样呢？也许我们的卡车，连汽油、机油、司机在内都被弄走，车子用来往返于库车和前线之间运送军需品、弹药和部队。也许败军会在最后时刻烧掉车辆，杀害司机，免得落入获胜的乌鲁木齐军方手中。

我们处在两股火力的交叉点之上，往哪边去都会有生命危险。新疆东部地区仍然归属马仲英将军，正是因为按照他的命令，我们才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只要能避开库尔勒的逃兵，就不难找到往东去罗布泊沙漠的路。到了那里，我们便可摆脱一切战火威胁，静静地隐居一段时间，并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一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新河即孔雀河新河道进行灌溉，如何勘察和复兴从 2000 多年前

^① 拜城，今为阿克苏地区的属县之一。——译注

的汉朝起就闻名于世的古老的丝绸之路。

3月11日下午，我们驱车回到了库尔勒。乡下的人似乎全走了。有几个农民告诉我们，库尔勒只剩下十几个东干人了。整个驻军已沿着通向焉耆的路向北挺进，那里正在打仗。

我们真是碰上了好运气！我们用半小时拜访了城镇当局，然后驶出库尔勒，沿着通向西尼嘎村的路向南驶去。走了3英里后，大路两旁出现了行行柳树，树边有狭长的灌渠，夹在低低的渠岸之间。突然，一群骑手出现在车队两侧，显然是在监视我们。当我们开到一处长满灌木的地方，他们翻身下马，向我们猛烈地开起火来。我们跳下车，躲到渠岸后边。一颗子弹从尤和生瑞恒两个人的头之间呼啸而过，吓得他们赶紧把头缩了回去。另一颗子弹打中了我身边的一棵柳树，打落了几根树枝。子弹穿透了我们的汽车和行装。

“不要打枪！”我立刻发出了命令。要是还击，我们中间谁也不能幸免于难。枪声持续了9分钟，有55次都是冲着我们来的。谁知竟没有伤一个人，真是奇迹！是上帝在保佑我们！看我们没有还击，一个东干兵向我们走了过来。他停在100步以外的地方，让我们去一个人和他们谈判。龚继成走上前去。

“你们必须立即返回库尔勒！”东干兵发出了最后通牒。

要是拒绝，就意味着要打上一仗，只好答应了。我们回到了库尔勒的住处，这是一座属于一个名叫阿布都克里木的维吾尔人的房子。于是探险队第一次在库尔勒被马仲英的东干驻军监禁。十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派兵看守我们，但由于形势危急，败下来的东干兵开始不断从北方撤下来，我们便雇了3个维吾尔人守夜，队员们也两人一组轮流值班。说实在的，这几夜我们睡得很少。库尔勒的狗此起彼伏地整夜狂吠。我们可以听到枪声、喊声和马的嘶鸣声。一群群野蛮的士兵用枪托撞我们的门，一边大叫大嚷：“开门，要不就开枪了！”他们想乘乱抢走我们的食物、钱和武器。

3月13日,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一天。早晨,镇上到处是一群群东干军队。据说,败将马仲英也到了这里。他派几名军官到我们住处,抱歉说他不能亲自来看我们,并说他不得不借我们4辆卡车用一下。赫默尔也被叫去给他一个腿上受伤的部下^①看病。

这时,我们院子里挤满了军官和士兵。军官是来接收卡车的,士兵们则把机枪和其他军用物资装上了两辆卡车。正装车时,头顶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对库尔勒这个小镇的轰炸开始了。院子立时变得空空荡荡,像有魔杖施了魔法似的。轰炸机当然会注意到卡车,所以我们和仆人赶紧撤到我们这座维吾尔人房子北面的一大块空旷地里,觉得那里最安全。飞机是苏制的,扔下了29枚炸弹,只炸死了一两个人和几头驴。

轰炸过去后,几辆卡车准备出发。生瑞恒、埃费、赛拉特和卓木恰这4个司机坐到了驾驶室里,我们和他们握手告别,目送他们驶出大门,愿上帝保佑。令人最担心的是他们的安全,因为东干兵惯用烧杀、毁灭痕迹的办法掩盖罪行。

出了镇,车队直奔马仲英住处。马仲英本人上了埃费的车,坐在驾驶室里。据埃费说,他们这两个年轻人——一个23岁,一个21岁——在去库车的路上,相处得不错。到了库车,马将军抱歉地说,他不能给我们补上他用去的汽油。他交给生瑞恒同样数量的煤油,还送他一张照片,并请他向我转达歉意,因为他强征了我们的汽车。但在他给生瑞恒的几样东西中,最重要的是那张通行证,这样就可禁止东干军队在车队返回库尔勒的路上拦路或征车。不管别人怎么议论马仲英,但他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是无可非议的。

3月13日晚,又有一些东干败兵涌进库尔勒,在镇上穷凶极恶地抢劫财物。马的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再无任何纪律可言。我

^① 指马虎山,是骑兵将军。——原注

们在自己的住所继续保持高度的警惕，还听说有飞机正掠过小镇，在通往库车的大道上空盘旋。路上都是溃逃的败兵，有的骑马或驴或骆驼，有的坐大车，有的步行。运送食物和军用物资的一列列队伍和驼队堵住了路，农民带着妻儿老小也混杂在其中往前涌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上空弥漫着淡黄色的尘雾。这时飞机正好向密集的人群扔下了炸弹。有一两架飞机在库尔勒南部上空盘旋，轰炸在那里的东干兵残部。

3月17日晨，两个队员去镇上，看到大街上挤满了骑着马匹的蒙古和俄国兵。他们是获胜的北方军。他们到达库尔勒后，又要立刻去追击马的溃军。据说，在从达坂城到库尔勒的路上，马损失了7000人的兵力。

同一天早上，一个哥萨克兵到我们这里来，要我立即去见指挥先头部队的将军，总部就设在几天前马仲英占用过的地方。

沃尔金将军审问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他认定我们不管以什么身份出现，都是马仲英的部下，尽管我出示了南京签发的通行证，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晚上，沃尔金将军派了4名士兵到我们住处，命令我们不许走出大门。3月11日，我们第一次成了在押犯，汽车也被征用，几个东干兵一直把我们关到3月16日；而在北方军的先头部队进入库尔勒后，又开始第二次监押我们。

3月17日下午，两位白俄军官光顾了我们的住处，要和我谈谈，于是把他们请进了我们的陋室，当时我们正在喝茶。其中一个普罗希库拉科夫上校，身材修长，但很结实，脸晒得黑黑的，长着一个大鼻子，样子很严肃。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北方军总司令别克迭夫将军的副官，司令本人刚到库尔勒，命他到我这里了解情况。

查问开始了，用的是俄语。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介绍了与问题有关的各种情况。谈了一个半小时后，上校站起身来说：“最后，我必须向你转达别克迭夫将军为你们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为一个

危险的叛乱分子服务,而感到非常吃惊和遗憾。”

我很平静地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别克迭夫将军的意思是,你们把卡车借给了马仲英,是帮助他逃脱我们的手心,不然,我们差一点就抓到他了。”

他的话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回答。

上校笑了,回话的语气也缓和了:“我只是执行命令,现在要去向将军报告了。”

第二天,普罗希库拉科夫上校又来了,问我是否愿意去拜访别克迭夫将军。我欣然同意,本来我已经向他表达过这个愿望了。

将军在先前沃尔金将军曾审问我的那间房子里接见了我们。

他对我讲述的一切很感兴趣,对昨天他的副官以那么不客气的措词向我们表示的遗憾,竟连一个字也没提。到分手时,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我回去时还有一名哥萨克士兵护送。但他们对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心,所以没收了我们的无线电装置,实际上那不过是一台接收机。在吐鲁番时,我们设法把它藏了起来。我和别克迭夫会面时告诉他我们有一台接收机,他宣布说必须由他来掌管一段时间。

第二天,别克迭夫将军来回访,告诉我们他立刻要动身去库车。我请求他尽一切努力保住探险队两名瑞典司机和两名蒙古族司机的性命,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卡车还给我们。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说他会尽快让我们了解到几位司机的下落。我问他是否觉得司机们有生命危险,他答道,以他对东干人打仗方式的了解,是无法向我们作出保证的。他认为司机们的困境远不止是糟糕。

我们只剩一辆小汽车了。我把它交给了别克迭夫,供他短途旅程使用。他非常感激地接受了我们的好意。

第二次监禁的几个星期显得漫长而又乏味。至少有6名哥萨克士兵严密监视着我们。他们都带着步枪,有时在门口站岗,有时在院子里巡逻,有时也到我们的起居室来坐坐,看看,聊聊。我们

即使去北面的空旷地溜达一下,身边也得跟一个士兵,手上还端着枪!

初到库尔勒时,赫默尔博士每天都要给受伤的东干人和生病的维吾尔人治疗。他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个大大的红十字标记。病人越来越多,常常使他应接不暇。东干部队从镇上撤离后,便没有东干人来了,但库尔勒的维吾尔人仍不断来这里看病。北方军开进库尔勒后,便禁止赫默尔看病了。目的很清楚,就是彻底孤立我们。俄国人对我们的看管比那时候的东干人严格得多。

3月22日,我们碰到了喜事。赛拉特和卓木恰这两位蒙古族司机突然在几名士兵的护送下出现在院子里。他们刚到这里,是要给北方军送两卡车军用物资去。他们还带来了生瑞恒和埃费的信。我们这才得知马仲英将军及其部下乘我们的卡车顺利到达库车。他们非但没有采取任何暴力行动,而且还让司机完完全全恢复了自由。

在返回途中,司机们自然遇到了北方军。又轮到按别克迭夫将军的命令征用4辆车,是为前线提供运输。无论愿意不愿意,我们也帮助了北方军。这样,我们事实上处于两军之间的中立地位。

这一天下午,赛拉特和卓木恰返回库车,给两个瑞典人带上钱、食物和信,对于他们的安全,我们已不必再担心了。

无线电还回来了,不过已弄坏了。对方要求我们10天内不得使用。

3月27日,4名俄国上校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纳雷卡、萨洛马金、尼古拉耶夫等。纳雷卡上校以军人的姿态、军人的口气宣布,刚收到新疆省最高当局盛将军来电,命探险队全体人员到罗布泊去,因为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路上不时有流窜的东干逃兵和强盗以及哈萨克和蒙古土匪出没,还不太平。因此将军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不过,两个月之后,残兵和土匪都将被剿灭,到那时我们去省府便十分安全了。他建议我们在罗布泊地区停留两个

月,这样我们可远离战争导致的各种危险和麻烦。

“盛将军要求你们马上出发。”上校补充说。盛世才将军的这一指示,显然不是作为命令,而是作为一项善意的建议来宣布的。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于我这个早就渴望一睹新形成的罗布泊的人来说,它可以改变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是一件大好事。我曾向别克迭夫将军谈起过塔里木的新河道和罗布泊,或许是他帮了我一个忙,劝盛将军派我们到那个地区去。我们认为,盛的命令可证明乌鲁木齐当局的高层领导是很赞同我们和探险队的事业的。

然而,我们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了。派我们去罗布泊,只不过是让我们尽可能远离战争舞台,无法看到在库尔勒周围调动部队追击马仲英的情况,也无法看到战争的结局、战线的收缩和部队撤离的情况。他们是不会愿意未经认可的人目睹这些行动的,更不会愿意中央政府的使者看到**俄国**的军队、飞机、汽车和其他战争物资在被用来为中国内战的一方的利益服务。

3月29日晨,我被院子里的嘈杂声吵醒。只见院子大门敞开,生瑞恒、埃费、赛拉特和卓木恰驾着4辆卡车回来了。大家欢呼雀跃,拥抱,握手。早餐桌上,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向刚回来的伙伴投去,在一问一答中,我们听到了他们的精彩故事。

4月1日,我们准备离开库尔勒了。一辆卡车和所有能甩掉的行李,都托给了当地卫戍部队指挥官迪维阿申上尉。其余3辆卡车和小汽车将沿着库鲁克山山脚,驶向这条新的孔雀河,并在雅尔丹布拉克附近设大本营(第70号营地)。

我和陈一起,从尉犁开始,沿着新的孔雀河,走了两个月,到达新形成的罗布泊。5月底,龚驾着小汽车,到罗布泊北岸把我们接走了。

4月,尤、龚和埃费驾着两辆车考察了阿提米西布拉克;赫默尔在雅尔丹布拉克上方的河岸采集鸟类、昆虫和植物标本;贝格曼则沿着孔雀河三角洲的一个支脉向南作了一次沙漠旅行。总之,

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考察结果非常重要,为此,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就这方面内容另写一本书。^①



① 这里指的是赫定另一本著作《游移的湖》。——译注

十一、奔赴乌鲁木齐

5月30日晚上,我让赫默尔博士和他的仆人留下,自己则从设在雅尔丹布拉克附近库姆河沿岸的第70号大本营出发,驾车穿过沙漠,来到尤的临时营地,营地旁有一辆在一次探险中损坏的卡车。我到达时,刚好快9点了。小汽车的头灯在很远的地方就告诉他们我要来了。他们都走出帐篷用欢呼声迎接了我。

进了帐篷,还没坐稳,我就问尤:“明天早晨,你能跟我去库尔勒吗?或有可能的话,去乌鲁木齐,怎么样?”

“可以,我很乐意,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走。我就这么样跟你去。”

我们一直聊到深夜。由于帐篷里太挤,我和另外一两个人情愿睡在露天。我还没有睡着,东北偏东方向刮起了风暴,营地上顿时尘雾弥漫。我钻到毯子底下,接着睡我的。温度降到21度。我们肯定不会挨冻。

5月最后一天的早晨,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一直忙到11点钟,我才和赛拉特、尤上了小汽车。尤坐在赛拉特旁边,我一个人坐在后面,边上放着汽油桶、铺盖、食物和个人随身带的一些小器材。

我们的目的地是库尔勒。“大马”和别克迭夫刮走了我们储备的汽油,剩的油只够车子开到乌鲁木齐了。润滑油也已经用光,没有它,车队只能困在第70号大本营,动弹不得。俄国司令官答应在5月中旬可以给我大量的汽油和润滑油,但直到5月30日,也

没有听到一句下文。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亲自去库尔勒,调查一下那儿的情况。如果润滑油还没有运到库尔勒,我就准备直奔乌鲁木齐。

现在马上就要描绘我和尤碰到的事了,好以此说明在中亚的荒漠里再简单的事也会弄得混乱不堪的。在地球的这一部分土地上的生活和发生的各种事情,外面的世界连一点点风声都听不到的,我们的亲身经历正好是这方面的一幅图景。

赛拉特载着我和尤驾车向西北方向行驶。左边完全是光秃秃的沙漠,时而可以看到一处处隆起的雅丹地形^①,断裂的岩块呈不规则形状。右边是山岳。我们顺着水路来到一条直通营盘的横道,两边都是桌状山^②。沿途见到一处圆锥形石堆和一具骆驼骸骨。快到中午时,孔雀河出现在左边2—3英里以外的地方。几只羚羊正向河岸走去,可是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马上掉头逃跑了。

这时,发动机出了点毛病,车不得不停下来,但赛拉特对车子很熟悉,很快排除了故障。我们的车子又回到去兴地的路上,沿着布詹图布拉克干涸的河床而下,这时在右边路过一处泉水,泉边有几棵绿油油的白杨树。接着来到了铺满粗糙的砾石和小岩块的纵横交错的冲谷,处长着茂密的怪柳,我们在这里迷了路,不过,我们还是从缭乱的地形中找到了路,然后向西驶去。

3点钟时,路面又开始好转。我们停下来,吃了午饭。车子开上了由无数河道形成的冲积层平坦地段,这说明在库鲁克山一带也曾经有雨水的;多少世纪以来,雨水把土冲下来,填平了山脚下凹凸不平的砾石滩地(维吾尔语称为“萨依”)。

① “雅丹”为维吾尔语,特指罗布荒原的风成地貌,被赫定等探险家引入其著作后,已成为地质学的名词之一。——译注

② 即迈塞(Mesa),原为西班牙语,原意为“桌子”。迈塞地貌是地质学术语,特指顶部平坦的土丘,又称“平顶山”、“方山”。——译注

已是薄暮时分了。我们一会儿行驶在坚硬的砾石地面上，一会儿穿梭在山谷间。如同进入了仙境一般，落日余晖已把东边簇簇云团染成血红，向大地投下一片深紫色的霞光。入夜后，车在库尔班奇克山谷中绕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建起了第93号营地，这时，我们已走了65.5英里地。

时间已近10点，天空乌云滚滚，不时掉下几滴雨珠。营地四周一片田园风光，密密丛丛的怪柳，郁郁葱葱的灌木，从中还伸出一些枯木朽枝。我们折了些枯枝，在灌木丛边生起了一堆火，火焰冲得好高，照亮了营地周围的一切：河水冲蚀出的阶地、低矮的丛林和那辆被火光照亮的汽车。我们借着明亮的火光，搬走了几块碍事的石头，在火堆旁铺好了被褥。只见火焰熊熊，火舌不受约束地向上蔓延，匍匐在地上的小树杂草竟也一下子噼噼啪啪地燃成一片，顿时火花四溅，把讨厌的小蚊子也薰跑了。我们也只好急急忙忙把自己的铺位挪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摆上我们的晚餐——羊肉、鸡蛋、馕和茶，与火堆保持一定距离。库尔班奇克那清澈的溪流流经岩石块时，发出淙淙的流水声，更使这迷人的景色增添了几分情趣。

6月1日晨，我们在清澈冰凉的溪水中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下，真是舒服极了。吃完早饭，我们驱车爬上了一条冲沟，最后到了右边那块经剥蚀的阶地的最高层。现在，我们左边是断裂的丘陵地，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右边是连绵不断的群山，犬牙交错，嶙峋起伏，笼罩在变幻无穷的山色之中——灰色、茶色、金黄色、紫色……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营地的痕迹和驴的蹄印，但我们卡车留下的车辙却被5月14日的一场大雨和后来的几场雨水冲得一千二净。

汽车开到一条深深的似刀斧削砍成的丘壑，然后驶上一条大路，卡车在春天曾走过这条道，用大捆大捆干枯的树干和树枝堆成的路标仍在路边分段竖立着。

大约正午时分，我们经过了右面从阿勒登布拉克流下来的河

道,过河的地方有许多干枯的白杨树干,表明在高处的山谷中还有林木。

不一会儿,我们又跨过了一条冲沟,经过了昆泰布拉克。从一两条山谷的入口望去,山上的景致极美。又过去半小时,看到苏吉特布拉克在我们右边。在一条小河的河床中倒着 100 来根白杨树干,这里却叫“柳树泉”。

我们走的路线是西南偏南,山脉的走向是西北方向,随着车子一点点远去,山色也渐渐淡起来。

下午,我们遇到了 3 个从昆其到吐鲁番的维吾尔人,他们赶着 150 头羊、一匹马和一头驴,准备在阿勒登布拉克阿格西宿营。我们在高高的圆锥形山丘上的怪柳荫下吃了中午饭,稍事休息。我们刚走过的地带尽是覆盖着典型的密密层层植被的一个个土丘,有些地方我们不得不在矮树丛中匍匐而行。

车子开始向西驶去。远处已可看见白杨树林。5 点 1 刻,我们到达萨依契克河,车子没有停下来,这条河的大部分都让沙丘、土丘和树遮住了,等我们往西北方向走时,就再也看不到河了。

又过了 1—2 英里,我们经过了一座古代丝绸之路上的烽火台,路旁有时掠过一两棵怪柳,有时闪过一片片怪柳。在格里尔罕,我们穿过的地带长着浓密的苇子、白杨和灌丛。1896 年,我曾骑骆驼通过这条路。现在,车子在一片又一片白杨密林中绕行。在通过令人口干舌燥的沙漠后能看到这样美的景色,的确使人心旷神怡。6 点刚过,我们驶过离孔雀河左岸只有几码的地方,沿着一条小路直插下去,很快又回到了河岸上的路行驶。我一眼便看出,和两个月前我们划船渡河相比,水位已下降了。大本营附近,当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水位下降了 9.5 英寸。

道路开始在茂密的苇子地中延伸,树木渐渐稀疏。我们在“萨特玛”——即牧羊人的茅屋里找到了一个年轻的牧羊人,他给我们指了指路。我们又顺着河道绕了两个弯,终于穿越在草滩和沙漠的

中间地带。路两边可看到一棵棵孤零零的白杨树，有的挺立着，有的倒伏着。沿路还经过了雅丹地带，时不时可发现一些枯死的怪柳。地势越来越低，最后，在这暗色的土壤上再也没有呈起伏状的黄土坡了。雅尔卡拉乌尔烽火台的地基是一座已经崩裂了的桌状山。

到了第二个名叫苏吉特布拉克的地方，我们的车子陷进了一条深沟，动弹不得，时间已是晚上9点半，这时，车子已经走了84英里了。我们想不如就在这里过夜。没有柴火，只找些枯草烧点开水沏茶。经过一天的劳累，大家很快入睡了。

第二早晨，我们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走不远便到了西尼嘎村外的农舍田园，紧接着就有人走上来，把我们带到临近的一间农舍去看我们的朋友赛都勒乡约(村长)的伯父。他请我们喝了茶。

近两个月来，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关于战争的消息，根本不了解目前局势如何。现在我们开始了解到一点情况，尽管不那么确凿。我们听说从乌鲁木齐来的俄国军队占领了库尔勒、阿克苏、沙雅和巴楚，东干军占领着喀什和莎车，并且正在同和阗方面作战。我们看得出来，情况很糟，萨洛马金上校曾预言说，从4月1日起的两个月后，战争就会基本结束，看来他过于乐观了。我们的维吾尔朋友不能也不敢多说，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像4月1日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库尔勒目前的状况或许仍和3月份一样，是个危险的去处。

休息几小时后，我们穿过沙漠地带，到了库尔勒绿洲和3月11日曾遭到袭击的那条柳树林荫道。2点刚过一点，车子停在了俄国卫戍部队司令部外面。我们见到了态度和蔼的司令官迪维阿申上尉。他简单谈了几句，就陪我们到阿布都克里木的住处。在我们谈话的时候，6个士兵一直在巡逻，看守着我们的东西。上尉建议把原来留下的那辆卡车和箱子都移至俄军司令部，那儿会更安全些。发动机的有些关键部件留在第70号营地，卡车不得不由

30名士兵在6月3日早上拖着走。我们只拿出一些在乌鲁木齐需要的衣服和给养。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在库尔勒找不到一滴汽油或润滑油,给当地的信至今也没有回音,我们立刻意识到,去乌鲁木齐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为留在第70号营地的人买了米、烟草和许多别的东西。我给赫默尔和贝格曼写了信,并捎给他们4000两银票^①。我们用维语和阿布都克里木订了口头协议,由他亲自把信和钱带给在西尼嘎村的乡约赛都勒,然后和赛都勒一起安排送交至我们队员手中的事。据说,如果不订这样一个协议,这笔钱就会被偷走,等到手时已剩不下几个钱。

上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那条路是安全的;还说最近发生几起商人和旅行者遭到哈萨克和蒙古土匪抄袭杀掠事件。所以他出于对我们负责,要求我们带上一名俄国军官做护卫。我说小汽车太小,已没有地方了,再说车开得很快,土匪追不上我们。但是他仍坚持,并给我们介绍了那位护卫。他叫雅罗斯拉维耶夫,是个少尉,人壮得像头小象,全副武装,不过人很随和热心。等行李装好,“小象”坐上座位,我被挤得几乎动弹不得。没办法,我别无选择。好在路程不过400英里,而且一半路程很好走。

我们在库尔勒只停留了一个晚上,也就是6月2日的晚上,我们睡在过去关我们的那间当餐室用的屋子里。第二天早晨,一位衣着楚楚的欧洲人走进屋里招呼我们,把我们叫醒了。我没有认出他是谁,但当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是普拉夫斯基时,我想起他便是2月份我们在吐鲁番遇到的两个波兰旅行者之中的一个,3月份我们从轮台返回时曾再次相逢。他本打算取道喀什回国,但未成功,因此决定走乌鲁木齐这条路。

^① 新疆官方当时印发的纸币,称官票。——译注

要做的事太多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正当我们准备出发时,有一个不祥的预言者出现在我们面前,警告我们不要去乌鲁木齐。

“如果去,你们不是被投进监狱,就是在那里困上一年半载,甚至更久。”他说。

他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令人十分丧气的图景,但没有对我们起多大作用。无论我们有多少汽油,也不能就此罢休,经阿提米西布拉克和敦煌回到甘肃去。我们是带着官方使命来到新疆的:为筑路和改善中国内地与新疆这个西北最大的省份之间的交通做准备工作。我们应该去拜访省府首脑盛督办,他打败了马仲英,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挫败了马的种种计划。我们无法预料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但可以肯定我们又要开始新的冒险了。

我在给留守大本营的队员的信中暗示,要他们别抱幻想,或许要等上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会尽全力争取在乌鲁木齐搞到卡车需要的润滑油——6 普特^①。我和尤、赛拉特打算把这油运到库尔勒和孔雀河边,然后乘船顺水而下,送到第 70 号大本营。与此同时,所需汽油也会运到焉耆或库尔勒。

3 点半,我们坐上各自的座位出发了。汽车驶过一座桥,又通过山口,开进了风景如画的孔雀河河口。我们不时可以遇到骑着马或驴和坐大车的行旅。当问他们路上是否安宁时,都说他们自己还没有遭到袭击。

汽车穿过了芦苇丛生的平原,这条路和 3 月 4 日我们看到的情形相比,如今尽是东干军溃逃时留下的深深的车辙,已成了一片烂泥地,他们当时如洪水一般蜂拥至库尔勒,然后又冲向库车。

快到 6 点半时,焉耆开都河岸上壮观的白杨林高耸起绿绿的树冠,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我们只用了半个小时乘船渡过了开都河的主干和一条小河汊。

^① 普特是俄制计重单位,每普特相当于 16.38 公斤。——译注

安全抵达左岸后,我们便直奔土尔扈特蒙古的一位年轻王爷的住处。他不但是个上层喇嘛,而且还是焉耆的一位司令官和一个师的指挥官。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在家。他的一个亲属告诉了我们去他衙门的路。到了那里,我们送上名片,王爷在他的副官陪同下到院子里迎接我们,并把我们请到一间大房子里,在一张长桌旁就坐。

王爷询问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并说他将我关于汽油的一封信送交乌鲁木齐最高当局,但至今没有回音。

我向他讲起我们上一次探险时他伯父多布顿活佛对我们的盛情款待,特别提到多活佛为了表示对瑞典国王的敬意,送给他一顶完整的作喇嘛寺庙用的毡房,由亨宁·哈士纶转交给国王^①。国王回赠了一幅肖像和一件贵重的礼物,以表示答谢。

多布顿活佛的年轻继承人表示这一切他都知道,国王的礼物现在由他看管。但他突然打断了关于他伯父的谈话,转到另一个与此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我们此行的目的上去了。显然他不愿意谈起这位亲属。我们已经听说,——后来也得到证实——在焉耆土尔扈特的权力更替的背后有一段隐秘。

几年前,东干人进犯新疆,当时的省长金树仁是在能干的杨将军^②遇害后上台的,其上台过程多少有点蹊跷。他曾使出浑身解数,动员了省内的各种力量。他也约请土尔扈特王爷多布顿活佛,要他率领自己的蒙古骑兵上阵去打入侵者。那时多布顿活佛不仅是“活佛”,而且掌握土尔扈特部的最高世俗权力,而他的侄子即真正的王爷^③还未成年。多活佛当时没有听从金的安排,但后来金

① 这个帐篷现在完整地保存在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译注

② 即杨增新。——译注

③ 即接待赫定的土尔扈特最后一位汗王满楚克扎布(俗称“满汗王”)。——译注

省长又约请他去乌鲁木齐一起开会，他却没有在意就去了。

他只带了几名随从来到省府，受到了礼遇。当他和省长见面时，他的随从被安排在外面的院子里等候。现在活着的人中间可能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商议了些什么，只有省长本人清楚，可是后来因种种罪名他也被关进了南京监狱。当时谈话结束后，金陪着客人穿过内院，还没有到门口，外面的院子里便有人朝里面开了几枪，王爷一惊，赶忙问这是怎么回事，他立时得到了回答——一颗子弹正打中他的脑袋。

为什么他的百姓、那些焉耆的土尔扈特人对用这种卑劣的方式谋害他们尊敬的首领一事不起来反抗呢？

相反，他们保持了沉默。后来，刚满 20 岁的王子满楚克扎布成了他们的汗或王爷。我们现在就是和他坐在一起谈话，对他的伯父只说了寥寥数语，而对其被谋害一事则只字未提，我们所讲的完全是与此不相关的事。其中包括关于我的朋友大喜喇嘛的一番长谈。我们在百灵庙拜访这位高僧时，曾问他是否能给焉耆土尔扈特部的这位活佛写封亲笔信，他欣然同意了，并在信上盖了他的印章。

可惜我忘记把这封信带在身上，好在这并不影响什么。这位年轻的王爷对我们的探险帮不了什么忙。在新政权下，他只是徒有虚名。如果我们和这位土尔扈特王爷有什么密切关系的话，或许还会引起对我们的怀疑呢！在目前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也许大喜喇嘛也最好不要和担任中国军队师长的王爷有任何来往。

最后，王爷命县长给我们解决过夜的住宿问题。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住的房间是上乘的，还吃了一顿中国晚餐。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向王爷辞行，因为他没有来回访。后来我们在乌鲁木齐见到了他，从当时情况看，他在新疆内部政局中的分量是无足轻重的。

临走前，我们坐车去向那位和蔼的县长辞了行。过去来焉耆

时,这座城是在马仲英和东干人手中,而现在则是在盛督办和中国人控制下。一些温和的东干人,诸如店主、农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仍留在镇上,还有 8 个俄国人和一个卫生员,都在给中国人做事。

我们又驶上了已很熟悉的道路。路边倒毙的牲畜骸骨比过去更多了。4 点半,我们到达卡拉克孜尔(榆树沟),一小时后又到了库米什,那儿住着 4 户人家。路在这里向右延伸出一条小路,往南通向库鲁克山。经兴地、营盘和铁干里克向库尔勒挺进的 500 名俄国军队,走的就是这条路。

又过了不到一小时,我们驶过了分水岭,从这里到阿尕依布拉克,一路上的地面一直往下倾斜。我们在晨曦中到达了奇妙的喷泉边,这是从陡峭的岩壁上喷射出的一股明如水晶、粗如碗口般的清凉泉水,我们的营地就设在这里。

我们已走了 112 英里,这里的营地为 97 号。来喷泉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几辆大车。5 月 14 日的大雨严重破坏了峡谷硕大岩石高地上的这条奇特的路。但赛拉特还是把车安全地开下了达坂,车身只在突起的砾石层上擦了几下。山谷中散发出一股死马和士兵尸体的恶臭。我坚持宿营地必须远离尸体。但到 6 月 5 日清晨,我们却发现在离营地 8 码的地方就有一具东干兵的尸体。这里根本没有柴火可拣,但晚上很安静,没有一丝风,可以在露天燃着蜡烛。夜间气温降到 21.5 度,与白天的酷热相比,似已很凉爽了。

早晨,赛拉特在灌汽车的油箱,已经往里倒了半桶,我们原以为桶里装的是煤油,结果却发现是水。于是只好把油箱倒空了,这样一来,只剩下行驶 120 英里的燃料了,而到乌鲁木齐还有 141 英里的行程。

8 点半钟,我们出发了。车沿着泉水流经的地方,在峡谷中走了一小时,到了泉水的源头——苏巴什。沿途,我们见到了一辆

“装甲车”，这是乌鲁木齐制造的，马仲英弄到手后因缺乏汽油才丢在这里的。

我们很快就要驶出山地了。在托克逊，我们只搞到了 17 个鸡蛋和几块馕。小镇外的平原上，背阴处的温度为 41.3 度，是这次探险过程中的最高纪录。

我们没停留多久，便又出发了。车子渐渐爬上了光秃秃的戈壁滩，面前开始呈现出低矮的山丘，那里的路被水淹没了一段。我们翻过红色山丘和黑色山丘之间的一道山脊，又驶过了从吐鲁番伸展出来的商路和我们走的这条路的汇合点，我又一次来到了自 1928 年以来就熟悉的这个地区。路在荒山野岭中蜿蜒向前，沿途风景如画。汽车开上了坡路，沿一条小溪在灌丛和树林间穿行。我们在一小片矮树林处折向右行，顺着陡坡驶向达坂城的山口。到顶上时已是 7 点钟了。几个士兵守护着一长列大车，不过他们没有阻拦我们。博格达山^①（“神山”）被云层团团裹住，似乎预示着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命运。这一天，我们走了 80 英里，晚上在破城子宿营。

和往常一样，我们就在露天睡觉。夜里 3 点半时天下起雨来，一开始淅淅沥沥，后来越下越大。我们不得不卷起铺盖，钻到汽车里。

6 月 6 日，即瑞典的国旗庆典的纪念日^②的早晨，从西北方吹来一丝清凉的小风，天空晴朗。气温降到 15.4 度，我们已经到了气候较为凉爽的地区。不到 10 点，我们就开始了前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旅程。车在四面环山的开阔的草原上行驶了一个小时。

①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是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界山，属北天山东段。这里指的是乌鲁木齐附近的天山山峰——博格达奥拉峰。——译注

② 6 月 6 日原为瑞典王国国旗日，今为国庆节。——译注

路很不好走。风追着车子旋转、呼啸，好像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一个后车胎被扎破，耽搁了半个小时。路真是糟糕透了，一路上都在杂草丛生或坑坑洼洼的地面上颠簸。

现在走的路线是西北方向。尘土钻进了沟通油箱和马达的油管，只好又停车，花了3个小时才排除了故障。看起来小汽车也在故意捣乱似的，不愿意把我们送到乌鲁木齐那前途莫测的地方。

我利用这机会和雅罗斯拉维耶夫闲谈起来。他是奥伦堡的哥萨克，战前曾在哥萨克禁卫军团服役。1914年他在圣彼得堡，后派往荷兰和英国，返回时途经挪威、斯德哥尔摩和芬兰。1919年他沿奥伦堡、阿克摩林斯克和卡拉萨里山口这条路逃到新疆，与他同行的奥伦堡哥萨克首领杜托夫，后被红军击毙。第二年，他来到乌鲁木齐，从此一直住在那里。

他和别的白俄一样，参加了反对马的战争，曾经是上文提到的从库米什经库鲁克山向库尔勒挺进的俄国军团的军人。马将军曾在乌鲁木齐夺得11门炮，后来在撤退时埋在吐鲁番附近。最近，盛督办已派人去寻找。有6门炮已找到，就放在我们在达坂城山口看到的那些大车上。

车终于修好了，我们又驶上了山路，在起伏的山岭之间蜿蜒前进。一支20峰骆驼组成的商队驮着棉花也在这条道上行走。我们在过一道小山岭时又遇上了大雨。天阴沉沉的，令人郁闷，显然，我们来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只剩下3.5加仑汽油了，也不知够不够用。我们继续往前走。车子驶过山脚下的小溪，顺利穿过了达坂城这个大村庄，又经过了带有窥视孔的城墙，马仲英曾在里面设过司令部，时间还相当长。

6点半时，我们进入了乌鲁木齐城郊，通过城门进入维吾尔—俄罗斯街，在原俄国道胜银行旁边驶了过去。1928年我们曾在里面住过，而那林、安博特和袁复礼教授还在那里住了几年。10分钟后通过了回城的门。最后，我们来到了汉城的第一道门。总算

一切顺利,但到了第二道门时,几名持枪的士兵跑出来大声喝道:
“停车!”

我们不想吃枪子,立刻停下了车。一名军官走上前来,用严厉的腔调盘问我们。一大群人把车子团团围住,狭窄的入口处挤满了士兵和破衣烂衫的人。他们去给盛督办的衙门打电话,我们只好等着。这时,雅罗斯拉维耶夫获准拿着他的东西下了车,从此再也没有出现。

一名年轻的军官坐在原来哥萨克人的位置上,给赛拉特指路。车停在了盛督办衙门的门口。军官拿了我们的通行证和名片,急急忙忙走了进去。他很快就出来了,带来了这位新疆统治者的回话。他说我们长途跋涉,一定很劳累了,该早早休息才是;又说明天会约见我们,还要邀请我们与他一起进餐。

随后,军官送我们到盛督办的宾馆,我们在乌鲁木齐期间就是他的客人了,一切食宿都不用我们花钱。一个设有5张床铺的大房间归我们使用,房里已住了一个汉人旅客。军官叫人给我们打来了洗用的水,并告诉我们,他已接到命令,专门负责照顾我们,有什么要求向他提就行了。

我们的故事到此又结束了一章,又要开始新的一章了。从第70号大本营起,我们仅用了7天时间,走了491.5英里。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下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已和探险队隔绝了,可以肯定的是,一天也不能多耽搁了,除非情况迫使我们改变主意。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我自己,或是尤和赛拉特,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困在新疆首府的这几个月时间。

十二、被困乌鲁木齐

在新疆省府的第一天，是漫长难捱的一天。下了整整一晚上的雨，白天也一直在下，而且下得很大。但这不是我们一整天呆在屋里的原因。省长盛世才——平时人们叫他盛督办——派他的副官来通知我们，说他希望在晚餐时会见我们。我们等着他下请柬，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显得那么冗长，雨单调地打在庭院的石子路上。从我们的房间和其他几位官方客人的房间都可看到这个庭院。晚上，8点钟，我们给盛督办衙门捎信，打听一下情况。盛督办答复说，第二天早上8点钟接见我们。

我们在8点一刻到达盛督办衙门。一名副官告诉我们，督办阁下在8点半要到军官学校发表演说，要我们下午5点再来。我们策略地询问，可否利用这时间先去拜访苏俄总领事和邮电局的丹麦籍局长。答复是可以，我们只管去好了。

于是我们直接驱车到俄国总领事馆。总领事加列金·阿勃拉莫维奇·阿布列索夫立刻在两名官员陪同下，接见了我们。总领事直率、和蔼、乐观，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使命，他认为南京政府决定开辟通往新疆的公路是有道理的，对我们提出的去伊宁和塔城的设想未提任何异议，只是告诫我们最好在一星期内成行，否则玛纳斯河涨水，会阻断道路。我问他是否能在乌鲁木齐搞到汽油和润滑油，他回答说只有督办才能批准这件事，并建议我和他谈谈。他对我们在库尔勒一带的历险记非常感兴趣，还祝贺我们能活着逃出马仲英军队的手心。但是，阿布列

索夫也和其他曾同我们交谈过的俄国人一样，毫不掩饰自己对“大马”的勇气、胆量和魄力非常敬佩的心情。

我们这一方显然也给俄国总领事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他请我们6月11日去他家吃饭。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他怀疑我们有什么秘密企图，想损害俄国在新疆的利益，他完全有权力逮捕并无限期地扣留我们，使整个探险活动成为泡影，只要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说句公道话，我们不能不承认总领事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南京方面以前派来的两位特使黄慕松将军和外交部部长罗文干都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显然，这里既不希望也不需要他们来起调停者或“和平使者”的作用。如果把我们看作是第三批使者，怀疑我们是打着筑路的幌子来执行秘密使命，难道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因此，从一开始我们的处境就很微妙，我们必须非常敏锐机智。我们的策略非常单纯，我和尤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事情都亮在桌面上，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监视我们。我们在南京得到的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与或探听新疆省的内政外交。因此，我们的原则简单明了。然而，我们这次是在时局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在乌鲁木齐滞留的，完全像走入了炼狱一般，对我们的耐心是一次最严酷的考验。我的经历可以反映出当时的风云变幻。在乌鲁木齐只呆了几天，我们便意识到，这里纯粹就是一个阴谋的巢穴。

我们和阿布列索夫交谈了两小时后，便开车去邮局，局长在院子里迎接了我们。哈拉尔德·基尔凯奥尔德和我是老相识了。在以前的一次大探险中，我们经常通信。他常在艰难的时候帮助我们，在安博特失踪的那段时间里，更没少出力。他伸出双臂向我跑来，我们拥抱在一起了，像在戏剧中一样，把尤都逗乐了。

基尔凯奥尔德是一位48岁的白发绅士，像大多数丹麦人一样，活泼、风趣、和蔼。几分钟后，我就发现为什么他言谈举止中洋

溢出那种情不自禁的喜悦。原来他的任期已满，一星期内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像瘟疫一样可怕的乌鲁木齐了，反正今后不管到哪里，都是他的天堂，总比这鬼地方强多了。

我们来到他的书房，结识了基尔凯奥尔德的一位同胞埃格托尔普先生。他是一位工程师，本打算开办一家化工厂，而且当局又一口答应了此事，但白白等了6个月，毫无进展。他认为不会再有什么希望，决定和基尔凯奥尔德一起回哥本哈根去。

我们还结识了基尔凯奥尔德的助手陈先生，他已被任命接替邮政局局长的工作。多年来，新疆的邮政一直由欧洲人管理。在我们以前的大探险时期，邮局的负责人是英国人麦克隆，他的前任是位意大利人。现在，盛督办要结束这种惯例。陈先生安详、诚实、可靠，是个好人。自结识后，我们之间很快就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我们从库尔勒发出的信安全送到了基尔凯奥尔德这里，他不加检查就把信送了出去，一般来说，这样做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耳闻了一些在乌鲁木齐、喀什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令人毛骨悚然。俄国鞑靼人格米尔肯竟被枪毙了！我们是在1928年认识他的，他是汽车库的头头，后来步步高升。他的继任伊凡诺夫是我们的老朋友。基尔凯奥尔德送了我们一条金玉良言：逢人什么都不说，听别人说，样子要装得漠不关心；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全是骗子、探子、告密者和叛徒！随时都可能有人失踪，最好不要去打听失踪者的下落。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该是去盛督办衙门的时候了。盛督办衙门，也和基尔凯奥尔德的寓所及我们住的官方宾馆一样，在汉城的城墙内，所以距离并不远，只是沿途情况令人震惊。

穿过几个庭院后，我们终于看见这位大人物亲自出迎了。他把我们带到了会客室，请我们在桌边坐下。盛督办的外表让人一看就喜欢。他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打量着什么，但却避开了我们的

目光。他先开口询问了我们旅途的情况。他已看过了我们的通行证,认为一切都符合要求。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他一一作了简洁明了的答复。他答应派人把汽油和润滑油经过阿克苏送到孔雀河畔的探险队那里去。在3个月之内,我们不能去塔里木,在此期间他要扫清那里的土匪。他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善和发展被遗忘在黑暗中的新疆省。他很高兴我们能在这一使命中给他以帮助。他听说我们愿意住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便下令给我们一套3居室的住房,并有西餐和中餐供应。如果我们需要什么汽车部件,只管到车库的废车上去取。钱要多少给多少,反正钞票是他自己的印刷厂印出来的,想印多少都可以。

在一个即将与祖国割断一切联系的省份,能受到它最高领导人如此的礼遇,我们该心满意足了,何况前两位特使都被毫不客气地赶走了。

回去的路上,我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我斯德哥尔摩的家人,一份给我们的上司铁道部部长。在两份电报中,我都强调我们在这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我们必须字斟句酌,因为任何一份电报都必须盖上盛督办的红印才能发出,而红印只掌握在盛自己手上。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置身于最严格的监控之下。如果电报中流露出一丝埋怨的情绪或透露一点新疆的真实情况,就别想发出去。

第二天早晨,一个叫保尔·阿列克赛德罗维奇·包的俄罗斯上校,奉盛督办的命令来找我们。中国人称他为包饭鬼。他是省长的首席翻译,精通汉语。他看上去极度虚弱,像快要死的样子,显然已到了肺结核晚期。1934年初,乌鲁木齐被围困期间,他昼夜不停地守在电话机旁,所有命令都是从他这里发出去的。盛督办要他为我和尤准备两间舒适的卧室和有两张写字台及地毯的起居室,并将为我们供应俄式饭菜。3天内就会安排停当。

我们在车库见到了老朋友伊凡诺夫。汽油一滴也没有。他正在等从玛纳斯运来的50吨汽油。汽油一到,就可满足我们的要

求。这一切都非常动听,不过给我们另找的房间从来也没有兑现,玛纳斯的汽油从此也没有一点下文。

我们又拜访了 1928 年就认识的另一位朋友安东诺夫。当时他不过是个商人,而现在已是将军,掌握着一支俄国移民组成的队伍。1933 年 4 月,正是他们冲进了衙门,赶跑了无能的金树仁。伊凡诺夫是俄军代理司令,而别克迭夫则在战场上与东干军作战。

在基尔凯奥尔德家吃饭时,我们还遇到了两个老朋友,一个是德国圣言会的希尔布雷诺神父,另一个是佩达森科博士。

谣言就像夏日牧草地上的蜜蜂一样到处流传。有人说,“大马”亲属中有一个人正率领一支精兵由安西开往哈密,准备再次进犯新疆。如果这支军队在哈密吃了败仗,可能沿南线撤退,就会给我们留在孔雀河畔的汽车构成威胁。不过,这也像别的谣言一样,无法相信。

总领事阿布列索夫非常帮忙。他把我准备发往斯德哥尔摩的电报统统发给了驻莫斯科的瑞典公使馆。电文是俄语,但为了方便发报员,用的是拉丁字母。我们给中国内地发的电报,由尤用汉文写出,通过盛督办发出去。

6 月 10 日,我们在德国天主教传教团那里和希尔布雷诺、勒德尔曼、哈贝尔 3 位神父一起消磨了一天。他们给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叛乱和内战的故事,离奇古怪而又很可怕。

6 月 11 日,我们经历了几件非同寻常的事。首先,生瑞恒的兄弟赫尔·古斯塔夫·泽德尔鲍姆来看我们。他在乌鲁木齐的处境可能比我们还不稳定。几年前,他驾着车第二次从北京来到这里,希望能在乌鲁木齐和归化之间开辟一条交通路线,但也没有成功,困难重重,到现在也无法离开这个省。不久前,他谋到了一个差事,和一个有钱的汉人合伙,准备用进口机械改进农业生产。

一点钟,俄国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和夫人邀请我们去赴宴。在他们的客厅里,我们看到了 20 来位客人。其中有陈德立先生,是

当时新疆地方政府的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①。他身穿西服，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场的有领事馆的全体人员，此外还有基尔凯奥尔德、埃格托尔普和几位中国要人，都偕夫人前来。3点钟，省长盛督办偕夫人出现在大家面前——遵守时间在中国并不是一种美德。我和尤是特邀来宾。

主人是来自巴库的亚美尼亚人。阿布列索夫先生曾在伊朗任职5年，先后在那里的雷什特和迈谢德任领事，在德黑兰任代办。在德黑兰期间，曾和国王礼萨汗下过棋。他还在塔什干住过。1933年11月，也就是7个月前，他被调到乌鲁木齐任职。不过，他在这一带任职太久，早就盼着回莫斯科了。

我们围餐桌坐下，面前摆满了各种酒，有白兰地、伏特加、利口酒、马德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和各种高加索葡萄酒，还有丰盛的各种冷菜小吃。我们已经吃饭了，可又端上来主菜，有卷心菜汤、酸奶酪、鸡和黄瓜配米饭、炸肉排配蔬菜、布丁、水果、果酱和桔子酱。

客人们都像过节一样，这种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我们是在亚洲腹地、在战乱中心享受这顿美餐的。女主人美丽迷人，讲一口漂亮的法语。男主人十分殷勤地招待客人。大家一起聊天，开玩笑，讲故事，频频举杯祝酒。盛督办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那双眼睛一直在打量我们。他只开了一次口：“你们一定是老朋友了。”

“的确是老朋友，”我们回答道，“我们过去见过两次面。”

饭后，我们来到客厅，面前堆着果料馅饼、蛋糕、咸味和甜味的杏仁，还有咖啡和饮料。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来到公园，参观了领事

^① 在赫定的著作中，一般都将陈德立误称为“外交部长”，在当时，新疆不可能（也没有）设立此职，陈的正式身份是外交署署长。盛世才“四·一二”政变后，又委任他为省银行理事长，故赫定将其称为“兼财政部长”。——译注

馆新建的俱乐部,最后大家停在露天场地上,那儿正开始一场足球比赛,盛督办也参加了这场比赛。

阿布列索夫先生告诉我们,4个月前,当我们到达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的消息传到盛督办的耳朵里时,他感到恼怒、吃惊,满腹疑虑。不过,这位总领事对他作了保证,并向他讲了我以前在这个省的几次旅行。按照尤寅照的说法,由于阿布列索夫的盛情款待,我们在这一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位有权有势的新疆边防督办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把我们当作间谍来对待。

这是一次非常盛大的宴会,是在黄昏时分开始的。督办终于起身告辞。我们也随他起身,并表示愿意用我们的车送督办和夫人回衙门。他们接受了我们这一邀请。赛拉特开足了马力,督办的50名骑兵护卫队很吃力地追着我们的车。在两边都是维吾尔店铺的泥浆地上,响起阵阵马蹄声、枪支和马刀的撞击声。镇上那些担惊受怕的老百姓,一定在猜又发生什么事了。

第二天,我们拜访了“省维持会主席”即文职省长李溶。他是个矮胖和善的老头儿,坦率而健谈,66岁,留着山羊胡。他出生在巴里坤^①,过去是富商,拥有银矿,曾任哈密道台即地方长官。杨增新曾派他到北京,去争取段祺瑞总统对开发新疆、建设公路和铁路等等的支持。办这些事是需要钱的。大概也在这时候,英国归还了相当于2000万墨西哥元的“庚子赔款”,段答应从这笔钱中拨一部分给杨。但是段下台了,他的继任张作霖需要用这钱打仗。李溶回到新疆省后,成了杨的顾问,后来又成了金树仁的顾问。

1933年春天,盛世才夺取了最高权力,当上了掌军权的省长,并让刘文龙任文职省长,但刘因为和黄慕松来访有牵连,被赶下了台,从此被软禁在乌鲁木齐家中,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因此,我无法看望这位1928年结识的老朋友了。李溶是在3个月前即

^① 在新疆哈密北部。——译注

1934年3月初接替了刘的要职。他没有对我们掩饰自己对金树仁的仇恨。他认定新疆1931年夏以来的种种不幸,都要归咎于金。

我答应了阿布列索夫的请求,到俄罗斯俱乐部大厅去讲演,内容是我在1895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行。大厅挤满了250个布尔什维克和几个懂俄语的中国人,其中有陈德立。阿布列索夫讲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套话后,我便站起身来发表演讲,听众是那么友好而又那么有兴趣。在我身后的上方,墙上挂着一块红布,上面用闪闪发亮的金字写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战争是该诅咒的,我们愿意和地球上所有的人和平中生活。”

我讲完话,一支巴拉莱卡琴乐队走到台上,一群男女青年舞蹈演员身着乌克兰服装,跳起家乡优美的舞蹈。

我们在俱乐部餐厅坐了一会儿,边喝茶边聊天,又说起了汽油和润滑油的问题。我们原计划到巴赫特^①旅行一趟并在那里采购,结果没有成行,因为在战争期间,用牲口和大车运输的方法是办不成任何事的。阿布列索夫先生建议,由他发电报给库车的俄国领事,再请他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经天山运到库尔勒,这样就可以在20天内走完375英里行程。这个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但是,盛督办已答应给我们汽油,我们是相信他的,于是,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了。

中国式的婚礼真是非同寻常,太令人激动了!盛督办的弟弟是新郎。我和尤应邀参加了在水磨沟村举行的婚礼。这个村子在城的东北方向,坐汽车需走一刻钟。那里一派田园景色。能在35.2度的气温下享受浓密的绿荫,真是爽心怡人。路两旁挤满了盛督办卫队的步兵和骑兵,我们还看到了老式交通工具的风貌,有北京的蓝色小马车、俄国式四轮大车和敞篷四轮马车。我们的车

^① 位于塔城以东的中俄交界处。——译注

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一辆时兴的小汽车。省长更喜欢骑马，而不是坐汽车，他的下属也就无法享用最舒适的交通工具了。有一次我曾问他为什么只骑马，他回答说，因为汽油短缺，只供给军用，所以他要以身作则，带头节约。

眼前出现一座大帐篷，有一条阶梯通向那里。帐篷内的后墙挂着孙中山的肖像，四周装饰着彩旗。篷幅用柱子支起，地上铺着地毯。请的来宾中有几百名中国人，其中有李溶和陈德立，还有许多苏俄军官，其中有几位将军，是盛督办的军事顾问。

新郎走向孙中山肖像下的桌边，随后新娘在伴娘的陪同下出现了。她身穿轻柔的粉红衣裳，头上罩着粉红色面纱，像是新娘的一顶王冠。她年轻美貌，手捧一束鲜花，害羞地低着头走过来。

一对新人和他们的傧相在伟大的革命家的像前站成半圆形。接着宣读结婚证书，新婚夫妻向盛督办鞠躬，然后夫妻互相致礼。督办、新郎和一二位来宾讲了话。

新郎新娘离开后，宴会开始了。席间，陈德立谈起我在俱乐部的报告，督办请我找一天讲一讲罗布泊的情况。我答应了。但我一直没有等到邀请，其他类似的邀请也都一样，再无下文。

我和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基尔凯奥尔德的邀请，搬到了他家里去住，随身只拿了从孔雀河和库尔勒带来的一些杂物用品。房子是由上海邮政总局建造的一所带走廊的平房，凉台很大，右边是一间宽敞明亮的起居室，左边是餐厅，还有几间卧室和会客室。

我们在盛督办的宾馆里不得安宁，总是有人大叫大嚷、赌博、喝酒。我们房外走廊上的电话铃声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但最糟糕的还是老有密探监视。我们的东西随时可能被偷。一天，有人给我们捎来了盛督办赠送的2000两乌鲁木齐钱币，约折合8英磅。这笔钱我们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只好寄存在基尔凯奥尔德那里。

一天，我到包上校那里，请他告诉盛督办，我再不愿意住在他给我们安排的那糟糕透顶的房间里，打算搬到基尔凯奥尔德那里

去。第二天,包告诉我,省长对我的批评很恼火,不愿意我们搬到邮政局长的房子去,因为这位局长和镇上所有外国人一样,不受信任,也在被怀疑之列。

一天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我和尤搬进了基尔凯奥尔德的住所。显然,这件事立刻有人向盛督办报告了,他别出心裁地报复了我们。4点钟,他亲自光临我们刚刚离开的、也就是他原来给我们安排的房间,要在那里拜访我们。他一连坐等了几个小时,和其他官方客人攀谈。最后还请他们所有的人吃了晚饭。我和尤当然失去了这份荣幸。

我们在新主人家里过得非常愉快。他生动地给我们讲了许多我们来乌鲁木齐之前发生的种种血腥事件。这一切同样表明,我们也不能认为自己是有人身安全的。1933年,中国军队在满洲吃了败仗,被日本人赶到了西伯利亚前沿阵地,又被俄国人缴了枪,送去了新疆。大致有20名军官被关进了乌鲁木齐的监狱,后来又被枪决,原因是他们密谋反对现政权。

一个名叫赫尔·多恩的年轻德国商人,1933年来到乌鲁木齐,准备打开和新疆的贸易渠道,并在这里销售汽车。上文提到了一个叫格米尔肯的人,1928年我们曾在他家作客。他是车库负责人,一切与汽车有关的业务都归他管理,因此多恩就找到了他,并在他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12月初,“大马”的部队眼看逼近。10日,省长在衙门请客吃饭,格米尔肯也是客人。他被怀疑与“大马”有密谋,席间就被抓起来,投进了监狱。接着,搜查了他的住处,发现了一些达成妥协的文件以及“大马”征服新疆后担任高层领导的名单。据说,格米尔肯于3月初被枪毙了。

与此同时,多恩也被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并在中国监狱中忍受了整整一年的痛苦煎熬。最后,他终于获准回到北京,1935年3月,我在那里见到了他。他形容憔悴、意气消沉,已经一无所有。格米尔肯和多恩的牢房都在一个小院子里。多恩告诉我,早在1

月20日,格米尔肯就被杀害了。他听到这个倒霉鬼的最后几声惨叫。行刑者把他绑了起来,用一把锋利的刀砍下了他的头。

6月17日晚上,一位姓王的外事官员来找我,并转告了盛督办提出的一项要求,要我写一份关于如何发展新疆省的生产和交通的备忘录。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忙此事,基尔凯奥尔德兴冲冲跑进来,大喊道:“我和埃格托尔普今晚就要走了!”

“你说什么?出了什么事?”

“怎么了?几天前运货来的27辆俄国卡车就要空车回塔城了,已经批准我们搭车走了。”

我为这两位善良的丹麦朋友高兴,但是,一旦他们离开了这悲惨的巢穴,我和尤的生活该多么空虚乏味啊!在这样的境地,可信赖的人实在难求啊!

在邮政局长离开前的最后几小时,他屋子里上上下下下一片忙碌景象。他忙着打点行装,把他的全部藏书和一捆捆报刊以及一些我们也用得上的日用品都交给了我们。

来了几位欧洲人,向已在这里住了几年的基尔凯奥尔德告别,其中有赫尔·西蒙、佩达森科博士、希尔布雷诺神父和一位叫沙尔特的德国工程师。沙尔特被召到乌鲁木齐筑路,但他现在唯一的梦想就是离开此地,因为已不给他发工资了。

最后,邮局的全体职工都来向他们的局长告别。分手的时刻就要到了。这时送来了香槟酒,大家频频话别。已是临近城门要紧闭的黄昏时分了。两位丹麦人坐上座位,卡车载着他们走了。

他们走后给我们留下的是空虚,是孤独。我和尤坐在凉台上聊了好久,这时夜幕已悄悄爬上亚洲这座最令人绝望的荒凉的城镇。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和四五个邮局雇员守着这所大房子了。待到睡意袭来时,我们才在梦中得到了解脱。

1928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新疆省府时,一枚银元可换2.5两乌鲁木齐纸币。实际上,如想换银元,行情是3.5两。1934年6

月16日,要240两乌鲁木齐纸币才能换到一个银元。但是到了18日,只要140两纸币了,因为印刷厂已陷入了混乱。如果印刷厂停机的时间更长,纸币还会继续升值。有一天,赛拉特想修一下汽车,但修不了,因为车库的全体工人都在印刷厂忙着呢!

一般来说,这个印刷厂每天印700 000两纸币。为了4月份的庆祝活动,一共印了2 000万两。1928年只有一两面值的纸币,所以,如果是100两纸币,就已是厚厚的一捆了;但现在印的却是5 000和10 000两面值的纸币,这就更降低了兑换率。那些手上积攒纸币的人,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破产了。

总领事告诉我们,基尔凯奥尔德和埃格托尔普是在凌晨1点钟离开的。省长想劝他们多住几天,好在他们走之前在他的衙门举行一次盛大的送别宴会。他还订购了一些工艺品,想作为礼物送给基尔凯奥尔德。但是,基尔凯奥尔德在电话中答复说,他对这大人物的宴会和礼物一点不感兴趣。最后,他终于在阿布列索夫的帮助下脱身走了。在渡河时,这两个丹麦人差一点淹死。等他们历尽艰辛到达塔城时,总是热衷搞阴谋诡计的盛督办又一次想拖住他们,这一次又是俄国总领事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我一直也弄不明白,盛督办表示出的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盛情,究竟于他有何好处。出于各种各样原因来到新疆的外国人,都被一个月又一个月地阻留在这里。久住乌鲁木齐的居民想去北京,总是等不来通行证。基尔凯奥尔德去斯德哥尔摩时,曾对我的亲属说,他认为我会被无限期地阻留在新疆。

整个气氛令人不痛快,我们感到很不安全。18日,尤给盛督办写信,问他何时能会见我们,因为我们想尽快把事情安排好,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何时能买到汽油和润滑油,何时能允许我们到孔雀河畔的探险队那里去。

省长的回答是:“今天和明天都不行,后天我通知你们何时见面。”

到了21日,我们还是没听到任何回话,于是又写信去问他何时能接见我们。这次,他干脆不作答复。

谁也没来找我们,我们也几乎不出门。大别墅里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谁也没有心思工作、读书或写点什么。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结果总是落空。我们与外界隔绝的状况越来越明显,就像囚犯一样。邮政局长的别墅的四周是高墙,夜间大门紧闭,这里就是我们的监狱。时间显得那么冗长,为了消磨时光,我们做了一副15子游戏棋,一直玩到深夜。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昏暗的油灯下下棋,忽然听到门外一声枪响。我们心想:“要出事了。”可是那一夜倒平平安安过去了。

基尔凯奥尔德的继任陈先生,现在是这幢别墅——我们的监狱——的合法所有者,但他宁愿住在离这不远的俭朴的家里。不过他常来走动,看看我们过得怎么样。21日下午,陈先生来了。我们一眼就看出他有心事。他低着头,神情严肃,在屋子里来回踱方步。最后,他还是开了口,说省长衙门里有一个官员去找他,提了许多问题,详详细细查问了我们的情况,诸如:我们有多少人?国籍是什么?武器装备情况如何?探险队的各类成员过去都做过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等等。其实,我们的个人通行证、汽车通行证和武器许可证,已透彻地回答了大部分问题。

拇指夹^①越上越紧了,我们已受到怀疑了。不知从前线传来的报告是怎么说我们的?马仲英(即“大马”)进犯了新疆,并包围了乌鲁木齐。如果他得胜,盛督办和他的人一个也休想活着出去。当然,乌鲁木齐方面也知道我们把卡车借给了战败的“大马”,帮他逃跑了。所以,我们受到怀疑不足为奇,奇怪的倒是我们没有马上被抓起来。这十有八九肯定是阿布列索夫先生从中帮的忙,才使我们轻而易举地逃出了这场我们已被卷进去的军事—政治大漩

① 古时的一种刑具。——译注

渴。俄国总领事是个机智而有教养的人。他很明白我肩负的任务除筑路外，别无他图。但要使新疆的领导人也持这一看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省政府始终把我们看成是南京派来的间谍，昼夜都派人跟踪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终日神经紧张，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

6月22日，我们收到一张大红请帖，请我们第二天下午8点到盛督办处赴宴。被邀请的52位客人的姓名按职位高低列在请帖上，这种方法可一目了然地获悉你将见到些什么人。我们没有找到俄国领事的名字，其他都是当地政府各部门官员、南京来的使者及新疆边沿地区的代表。后来才发现俄国人的名字另列了一个名单。

我们驱车到了盛督办衙门，当即有人领我们穿过庭院，走进里面一座用四方形的墙围起来的花园，旁边的屋子里已摆上宴席。人行小道两旁站着手持步枪或腰挎手枪的士兵，从他们中间走过，多少有点不自在的感觉，我们知道，在乌鲁木齐的中国式宴会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接着，穿过餐厅，我们被引进到旁边的一间屋里，桌上摆着茶水、糖、水果。宾客们先聚在这里。有几位中国客人已经到了。我们坐下来等着。周围的气氛仍然使人感到不舒服。两间屋子有12扇大窗户，窗外有士兵站岗，他们有的倚靠在窗口，有的摸弄着枪。

我们的主人盛督办走了进来，和我们打了招呼。随后进来的是文职省长李溶和南京的两位使者郭和高。这两位使者已等了几个月，还没有办成事，至今仍只得在此滞留。当我和尤看到阿布列索夫先生率俄国领事馆全体人员出现时，才松了一口气。只要有他在，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菜谱上是一色的俄国菜，喝的是白兰地、白葡萄酒和香槟酒。我们的主人起身作了像餐桌一样长的演说，提到了每一位应邀而

来的贵宾。他转过身来对着我,对我的旅行大加赞赏,然后对尤寅照和包尔汉讲了几句,接着是对阿勒泰哈萨克的几名重要代表人物和进入新疆的东北义勇军的军官,最后他又对几名从日本留学回来、现在又到新疆来找工作的满洲学生讲了话。

盛督办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和蔼可亲。他的话由一名翻译译成俄语。然后,那些被他提到的人都要一一致答词。如果客人讲俄语或哈萨克语,也有人替他们翻译。整个宴会进展顺利,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我们设在高墙中的“监狱”。

6月的最后几天平静地过去了。我们去拜访了外交部长兼财政部长陈德立,他庄重地保证说,我们几天之内就可得到润滑油和汽油。

然后,我们在苏联—新疆商会买了一批粮食和其他用得着的东西。这个商会由俄国总领事馆的商务专员、奔萨鞑靼人特斯科洛夫负责,由一个叫鲍罗杰辛的经管。他们都很有礼貌,也很帮忙。俄国人和盛督办都对我们的车感兴趣,想从我们手上买上一两部。我们对此不反对,手头的拮据状况可能还会迫使我们卖汽车呢!

乌鲁木齐有一家官方报纸《天山日报》,这是城中唯一的一份正式报纸,大小事情无所不登。报纸上有半年前就已在北京和南京见到的“新闻”。只有那些被认为是适合当地居民的或无碍治安的消息才能见诸报端,很少有什么真话。6月30日的报上说,马仲英已占领和阗,并和当地的穆斯林政府结成了同盟;后来又闹翻了,双方开始巷战,“大马”被打败,带着60名亲信逃到青海去了。这则报道通篇失真,编造这段谎话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乌鲁木齐政府的声望。

这一天的报纸还报道说,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的孙子承袭了他父亲的职衔。我们无从核实这条消息,但不管它是真是假,穆斯林们读了一定会很满意。

乌鲁木齐有一所飞行学校，飞机每天都在城镇上空演习。在库尔勒和3月份的旅途中，我们也有幸看到了几架这一类飞机。从俄国运来的汽油是供给飞机用的，我们只好靠永远也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等下去。

食品价格在飞涨。3月9日在轮台，100斤面粉的价格是75两乌鲁木齐纸币；3月22日，在铁干里克已涨到550两；而6月26日，乌鲁木齐的标价已是5000两；后来一直涨到14000两，谁也买不起饷了。6月2日在库尔勒，一只鸡蛋是半两纸币；3天后在托克逊，已是5两了；到了6月底，乌鲁木齐的价格涨到了30两。通常很便宜的水果价格也不断上涨，而且越来越少。买一个甜瓜要用60两纸币，一根黄瓜5两。

我们的伙伴还在70号大本营等候援助，他们的食品只够坚持到6月底。我们口头和书而一再要求给探险队一些润滑油。在70号营地，我们还有些汽油，够3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行驶930英里，即从库尔勒经哈密和安西至肃州的路程。但是如果没有润滑油，队伍也就只能困在70号营地。我们首先要求能租一辆“阿罗瓦”（两个轮子的大车），由赛拉特带队把润滑油和食品经库尔勒送到大本营，然而，这项要求也同样没有下文。

现在，我们只得再次提笔给省长写信，用激烈的措词谈这个问题。如果他想把探险队饿死在这杳无人烟的沙漠河岸上，再这样做下去就可以达到目的。探险队目前的处境还不危急，他们有钱，可以从铁干里克买到面粉、大麦、鸡、蛋和羊。当局一次又一次答应给我们汽油和润滑油，实际上是使我们陷于瘫痪状态，从而困住我们的一种方法而已。我们听够了漂亮的许诺和彻头彻尾的谎话，但抗议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我们“撂蹶子”，表示愤怒，他们会平静地回答说：“我们现在处在战争状态，不仅要和马仲英打仗，还要镇压各地的暴乱。我们的汽车和飞机需要从俄国运来的每一滴油。我们从来没有请你们来，所以你们还是凑合着等吧！”

严格地讲，我们根本顾不上埋怨这里的单调乏味。我已经说过，我们一直过得神经很紧张。6月29日，我接到了家里发来的一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电报。自从1月17日离开额济纳后，我们还没有收到过外界的一个字。我们被笼罩在坟墓一般的死寂之中，生活在监狱般的房子里，据说周围还有密探监视我们。我们的仆人，或者连同邮局的职员也有可能是密探，在监视并向上报告我们的行动。

这一天晚上，邮政局长陈先生来到我们的起居室，我们正在玩15子游戏棋。他神情焦虑地在屋里来回踱步，最后终于停下来，对我们说：“当局得到消息说，一支南京派来的大军已在前些日子从额济纳出发，随时可能到达哈密。他们相信哈密的人会立刻和南京军队合在一起，直捣乌鲁木齐，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弄到一张上海的英文报纸，上面公开说，一场反对盛督办的战役已经开始。难道乌鲁木齐会第三次被围困吗？果真如此，情况就严重了。”

我们继续镇静地下棋，对这则新闻没有在陈面前作出任何反应。小孩子都可以看出，他也是个密探。他每天来看我们，然后把他所见所闻报告给省长。因此，我们都闭口不言，没有流露出焦虑的心情。但是，有一天我还是忍不住对陈说，如果省长害怕外国人，就不应该扣留他们，何必给他们机会详细了解省内的情况。更明智的作法是根本不让外国人入境，如果像我们一样已经进来了，就应尽快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邮政局长离开后，我和尤就可以放心交谈了。南京进犯的传言，我们早有耳闻，但这次传言似乎可靠的成份增加了，已不大可能说这不是真的了。马仲英被打败，别克迭夫将军率领的北方军正越过阿克苏，在通往巴楚的路上追击败军。盛督办依靠苏俄的帮助成了全省的唯一主宰。只有从喀什经莎车和和阗至蜡

羌^①的一带绿洲,他还没有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很可能担心,新疆会不会也像外蒙古一样,逐渐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如果南京军队真的会占领哈密并进攻乌鲁木齐,那么探险队又会怎么样?我们知道,探险队的大部分人员及全部卡车都留在孔雀河畔的大本营,而我这个探险队的负责人和中国工程师尤寅照却阻滞在乌鲁木齐。别人肯定很容易怀疑我们是先遣人员,是为南京军队及其后勤运输车队绘制出一条合适的路线图。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才不准我们返回孔雀河的呢?他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扣作人质呢?有朝一日,南京军队真的兵临城下,他们会不会立即逮捕,甚至枪杀我和尤呢?3月份,我们用卡车帮助马逃跑了,如今我们当然要受到怀疑,以为是我们为这支新进犯的大军指引了穿越沙漠的道路呢!

我们的处境不妙。我用含蓄的语言给赫默尔和贝格曼写了信,但把它装在给库尔勒司令官的信封里。

此后每天都传来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和流言,我们真是吉凶莫测了。局势令人十分忧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时间已是那么难熬。我们玩着15子游戏棋,静得出奇,连仆人偶尔蹑手蹑脚的细微动静都能听得那么逼真。日落时,我们坐在凉台上闲聊。天上浮动许多变幻莫测的铅灰色云团,向着天山峰顶滚滚涌去,是那么随心所欲,真让我们妒忌,恨不能随它们一起快快飞向戈壁沙滩。仲夏的太阳在金灿灿的残照中向西沉去。每晚,总是在老时间,有一队中国士兵在乐队吹吹打打的单调乏味的伴奏下唱着歌,从我们门前走过。

在我们第三次被困的持续几个月之久的日子里,我再也找不到比尤寅照更为忠诚和无私的朋友了。他耐心而又镇定自若,堪称典范。遇到有事想提请最高当局关照时,我们总是先用英语交

① 婼羌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东端,1959年改称若羌。——译注

谈,然后由尤用他那一手秀丽的字写成中文信。但我不能不遗憾地说,几乎每次都是白费力气。事实上,凡是遇到诸如汽油之类的事或要求上面准许我们返回探险队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时,连一线希望都没有。关于我们的处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自由。

我们常在黄昏时分在室外坐上一会儿。待到夜幕降临时,可以听到远处、近处的狗叫声,有时还有猫头鹰的叫声,还听得到一两声枪响。又是谁被枪毙了,是罪犯还是无辜者? 等我们回到起居室,坐到桌旁的扶手椅上,过道里便会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墙上显现出暗淡的光线,一个勤杂工拿着一盏油灯走进屋里。我们又开始用棋子拴住我们漫无边际的思绪,可是老鼠在角落里东窜西跳,搅得人心烦意乱。



十三、派遣救援队

6月30日晚,我和尤如同往常一样,坐在屋里玩15子游戏棋打发时间。这时俄国总领事馆的一个仆人送来了一封信,信封上是赫默尔博士的字迹。这封信显然是通过驻守库尔勒的俄军司令官送来的。

我最后一次匆匆见到这位医生,是5月31日在70号大本营,那里的3辆卡车都等着润滑油。那天我刚从罗布泊赶回来,立刻又要动身经库尔勒去乌鲁木齐。十分凑巧,赫默尔也在同一天回到营地。从4月初起,他一直带领着船队和仆人在孔雀河和库姆河一带收集沿岸的动植物标本。

他在船上办的小小展示会上还有3头小野猪。几星期前,一头小猪咬了他的右手,开始他不在意,可是不久,胳膊肿了起来,人开始发烧,身体虚弱。显然,这是严重的血中毒。赫默尔知道,如果想保住命,必须立刻做手术。他咬紧牙关,用自己的左手对着伤口做了必要的手术。这以后,他觉得好多了,但还是在床上躺了一两个星期。5月31日我们见面时,他已经起床走动,可以进行正常的工作了。他自己宣称已没有危险,其实,那天晚上真应该让他跟我和尤一起坐小汽车到库尔勒和乌鲁木齐来。

我读着他的信,越来越感到不安。血中毒情况在恶化,热度一直不退。他觉得自己不能在河畔度过炎热的夏天,决定坐马拉担架经辛格尔去托克逊,那里会有汽车接他。信是6月10日写的,11日动身。他认为有必要飞回北京,或乘汽车和火车去动手术,

这就进一步证明情况是严重的。

赫默尔 11 日出发,现在已是 30 日了。按理说,他早就该到乌鲁木齐了。显然,一路上他的病情在继续恶化,需要急救,也许他已死了。

我读完信,并把它译给尤听后,立刻开车一起去俄国总领事馆。仆人告诉我们,总领事病了,其他官员出去了,不过一小时后就会回来。我们停在路边,刚决定等着,这时一个身穿白色夏装、个子不高但很魁梧的人走了过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脱帽致意。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萨波什尼科夫博士,外科医生,是总领事馆的医生。我简直要扑上去拥抱他,一定是上帝派他来的。萨波什尼科夫博士刚从得头痛病的阿布列索夫那里出来。他陪我们来到在领馆区的副领事科罗洛夫家,他的夫人出来迎接我们。副领事是个很和蔼的人,他夫人是个地道的法国人,又漂亮又讨人喜欢。

等科罗洛夫先生出来后,我把赫默尔的信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他听。萨波什尼科夫对情况的分析却非常乐观,不过他也暗示,如果有第二感染源,病情就可能复杂化。他很遗憾,正有许多病人要他治疗,而且在他诊所和两家医院中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帮不上赫默尔的忙了。赫默尔走的路线要越过库鲁克山,行程 312 英里,对汽车来讲,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一个没有汽车的病人来讲,却是一段长得吓人的路程。

科罗洛夫先生令我们非常感动,他立刻奔到电话机前,先要通了陈德立,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要他立刻给 10 普特汽油和同样数量的润滑油,不得耽误。他又以同样的语气命令车库的伊凡诺夫先生立刻尽一切努力帮赛拉特先修好小汽车。明天早上,也就是 7 月 1 日星期日,将一切准备就绪。

眼前,一切进展顺利。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地方当局又玩起花招,找我们的麻烦。外事部门的王先生来看我们,并转致了省长

的问候,但却说没有特别通行证,我们是不能离开乌鲁木齐的。

“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们一个通行证?这事关人命啊!”

“明天上午 10 点钟再告诉你们是否发给通行证。如果有了通行证,汽油也会给的。”

星期日,我们起得很早。关于通行证和汽油,一点消息也没有。我给阿布列索夫写了封信,答复是他不在家。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赛拉特开着已经修好的小汽车从车库回来了,汽油也有了。我们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通行证了,有了它,才可能前去搭救我们的探险队员。我们熟悉赫默尔走的路线,应尽快赶到他那里。

下午,王先生来了,这出鬼把戏正是这个老油子一手导演的。他用近乎神秘的口气说:“如果你们卖给盛督办两辆卡车,你们想要什么,他都会给。”

“等车子到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商谈这件事,我们现在要的是通行证,有了它才好上路去救赫默尔博士的命。”

“明天上午 10 点钟,给你们送通行证来。”

“可是你要知道,这是要去救一个人的命。凭什么还要再耽搁我们一天?”

他站起来,笑了笑,躬躬身,走了。

正在这时,一位意大利人奥尔兰逊尼博士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 1933 年 11 月初在归化认识的,当时他正在山上打猎。他是陪同“大马”的土耳其顾问凯末尔·阿凡提来乌鲁木齐的,4 个月前,我们曾在吐鲁番见过这位顾问。“大马”失败后,凯末尔把他甩了,又跑到乌鲁木齐去为盛督办效劳。

我们如坐针毡,根本无心听奥尔兰逊尼讲他的历险记。天色晚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 10 点钟拿通行证。

一夜过去了。我们 7 点钟起了床。到了 10 点钟,哪里有通行

证的影子。毫无疑问，王一定到下午才来，然后答应我们星期二送通行证来，如此周而复始，一直到我们不耐烦了，又没有别的办法，然后就听天由命，随它去了。这是他们惯用的磨蹭办法，只要这上当受骗的一方无法得到其他方面得力的帮助，他们这种办法总是能得逞的。据我们所知，在乌鲁木齐只有一个人的权力可以压倒盛督办，他就是阿布列索夫先生。

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小时，所谓的诺言根本无兑现的可能。我和尤驱车去找俄国领事。阿布列索夫正有客人，我们在小凉台上等了一会儿。突然门开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高个子在一个秘书陪同下走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凯末尔·阿凡提。他低着头，神情严肃，心事重重，显然没有从总领事那里得到什么好消息。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也在。

现在轮到我们的了。我们被直接带到办公室，阿布列索夫先生正坐在写字台前。他幽默风趣，精神饱满，见到我们时的样子，就像是在演戏。他站起身来，异常吃惊地大声说：“怎么？你们还没走？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的医生病了，等着你们去急救呢！可你们还坐在这里浪费时间！我要向瑞典政府谴责你们。你们有了汽油和润滑油，小汽车也修好了，可你们还不出发！真是莫名其妙！”

“对了，你说得对啊！加列金·阿勃拉莫维奇。但是，外事部门通过王先生告诉我们，只有拿到盛督办签发的通行证，我们才能动身离开这里。尽管我们一再提醒，他也再三保证，但就是不兑现。”

“哦，我马上处理。”

他和那位看来和气却是不可靠的外交部长陈德立通了电话，像对下属一样，用命令的口吻说：“赫定博士在我这里，准备出发。我听说，他因为等待特别通行证，一直没有走成。这一次不需要任何通行证。我请你现在就在电话上通过我准许他出发……那么说，他完全可以出发了？”

陈德立满口答应。然后，阿布列索夫先生又做了一件使我终

生难忘的好事。他突然大声说：“你们为什么不把符拉基米尔·伊凡诺维奇(指萨波什尼科夫)带上呢？他是外科医生，如果需要马上动手术，他是很有用的呢！”

“这行吗？他不是有许多病人要照顾吗？”

“你们需要他多久，就让他去多久。他的夫人也是医生，可以在他离开的时候接替他的工作。去找他吧，让他立刻作好准备！”

我真想拥抱总领事，此时此刻，还有谁能像他这样帮我们的大忙呢？我几句话就把情况告诉了尤，尤毫不犹豫地表示，他可以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这位俄国医生，尽管他知道原来留下的空地方是用来放食物和睡袋的。

我们向阿布列索夫先生表示衷心感谢后，直奔就在附近的萨波什尼科夫博士的医院，候诊室里挤满了病人。我把总领事的决定告诉了他，他非常高兴。他还从未到过乌鲁木齐以南的地区。他一小时后就可准备就绪。这时我们开车回到住处，打点好行装，吃了饭。然后我向尤告别，车来到医院，医生已在院子里等着。他带了行军床、毯子、枕头、一包外科用器械、注射器和药品，还有一大包香烟。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一条小溪的岸边。6辆大车在这里等着，拉车的马、骡已卸下了车轡，正在吃装在口袋里的饲料。3个身穿黑色和灰色中国服装的天主教传教士向我们的车走来，同我们打了招呼。他们是莫里茨神父、默勒神父和范·奥尔斯夏特神父。莫里茨以前被派到肃州传过教，曾在那里帮我们几个探险队员做过许多事。现在能有机会向他当面致谢，真令我高兴，尽管是那么匆忙。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一辆俄式敞篷四轮马车，里面坐着一个名叫路易的新疆传教团的新主教和阿尔罗根神父。最近德国圣言会中有一些人事变动。

我们驱车通过丘陵地带，驶上了漫长的沙漠和草原之路。博格达山就在左侧。这座神山被终年皑皑积雪和泛着蓝光的冰川覆

盖着，保持着它永恒的美，在这亚洲的心脏，它高高耸起三座雪峰，给人以庄严、华丽的观感。

我们把5加仑汽油留在达坂城，回来时好用。夜晚我们是在一家已被战争破坏得不像样子的客栈的院子里度过的。这是我们的第100号营地。我们找了一堵挡风沙的土墙。风刮得很大，尘沙在我们身边盘旋飞扬。我们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然后就裹上毯子，倒在汽车边的地上睡了。

7月3日早上刚过4点，萨波什尼科夫就把我和赛拉特叫醒了，他觉得我们的肺吸的尘土太多了。我们继续在熟悉的路上驶向托克逊，车子穿过一个个狭窄的集市，停在了县长家门口。县长叫喀西木伯克，是个开朗、聪明的年轻人。他在种着金合欢树和桑树的花园里热情接待了我们，大家围桌坐在树荫下。上茶时，我不安地问喀西木伯克，有没有听说一个生病的瑞典医生的情况。不，他根本没有听说！太好了！这说明赫默尔可能还活着。如果死了人，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很快传遍这片荒寂的土地。

现在是早上7点3刻，透过浓密的树叶已吹来阵阵热风。我们刚要喝茶时，一个仆人给喀西木伯克递进来一张欧洲人的名片。我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福尔克·贝格曼”，我的天哪！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我转身站起来，看到大门刚打开，走进来的是贝格曼，高高的个子，还像平常那样，举止文净，脸上带着微笑。我快步迎了上去。

“这简直是到了天堂！”他叫道。

“是啊！赫默尔还活着吗？”

“活着呢，好好的。至少我前天见到他时活着，身体显然已在恢复。”

“谢天谢地！他在哪儿？”

“在克尔吉斯坦，库米什东南10里地。”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他都可以了。”

“牲口都完了，既找不到草地，也没有饲料。我们用卡车把他从孔雀河畔的营地送到库鲁克山里的辛格尔，就这样，生瑞恒用完了最后一滴油。辛格尔那里凉快些，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恢复体力。从那以后，我一直一步一步穿行在酷热的沙漠大山中。”

尽管我们在中亚旅途中经历了种种苦难、烦恼，经受了耐心的磨炼，然而这一切完全让不时出现的令人难忘的欢快时刻抵销了。贝格曼也忘不了我们在喀西木伯克花园中共进早餐的情景。他已得知斯德哥尔摩家中一切都好。

喀西木伯克接到命令，要准备 3 匹好马和 150 斤饲料，由一个叫康斯坦丁的年轻哥萨克送往在库米什的赫默尔的驼队。康斯坦丁曾和赫默尔沿河而行，现在又和贝格曼一起到了托克逊。

我们可要赶路了。和贝格曼、喀西木伯克道别后，车子驶进了苏巴什山谷。两边都是高山，车开上了谷底松软的细沙路，在蜿蜒曲折的小水渠中行进。下午 1 点，车卡住走不动了。正好从山口下来了两辆大车。我们花了不少钱，才借了他们两匹马，把车子拉了出来，但走了不久，车子又在水渠正中地方被卡住了。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没有用。我们在那儿商量了几小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是否该回托克逊租几匹马，骑上到库米什呢？最后，还是精于手术的萨波什尼科夫想出了办法。他堆了一个小石坝，渠道里的水随即改道从车子边流过去，我们这才把车子拖了出来。

我们渐渐往上行驶，山谷的小溪也随之消失，完全成了沙和砾石堆积成的干旱地。这时黄昏来临。我们经过从左边峭壁上喷射下来的一股清泉，然后到了堵住山谷的溶蚀岩柱脚下。车子开上了第一个陡坡，夜色已浓，我们是不会在这样的地面上拿汽车去冒险的，汽车头灯的亮光也很有限，最好等到天亮再说。

我们在一处悬崖的壁龛旁停了下来。

车轮后面搁了大石头，防止车子下滑。我们边抽烟边聊天，一直到 9 点钟才躺在砾石中睡去。大概在 4 点半钟，我们让小雨给

浇醒了。雨越下越大。天亮时，我们朝悬崖上驶去，有一个地方的通道宽只有60英尺左右，一道由坚硬碎石堆成的坡坎横跨在路面上，路被夹在巨大的岩块之中，从谷底隆起的一段很高的台地又尽是沙子和水。汽车是根本无法通过的。

雨可是越下越猛了，我们回到车里躲雨。雨停后，我们又回到坡坎那里，这时赛拉特极小心地往上开车。他在通道的左边发现了一块较平的岩石地，也许可以从那里把车子拖上去。正在我们修路的时候，一辆大车迎面从山口下来，来到这难走的坡坎时，马被卸下了车辕，由几个人往下牵到了山谷，并把马拴了起来；另外7个人则在巨石之间的通道上把大车左拐右拐，连抬带拽，居然成功地走过了这一段。

我找到车主阿布都赛米，向他借车马，还要借一两个人力，送我们到库米什去，并保证给他一笔重重的酬金。可是不行，他已没有额外的饲料了。不过，他手下的人倒是愿意在这段难走的地方修石桥，并动手干起来，但我们很快看出这不是个办法。路中间凸出一块块尖尖的石头，要想把这盖住，就得填满整个山谷。再说，车子在这样糟的路面上折腾，已耗掉了我们许多汽油，现在只剩9加仑了。我们决定暂时不作任何举动，又小心地返回坡下的泉水处。

阿布都赛米在沙地上铺开一块毯子，摆上切成片的冷羊肉、馕和茶。我们也拿出了糖、俄式糕点和香烟。几个月前，阿布都赛米在喀什一战中受了伤，被收留在瑞典传教士开的医院里。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在那里受到的精心护理。

我们交谈着，商量如何对付这条“绝妙的路”出的难题。我们弄不懂为什么人们年复一年走这条路，却始终无动于衷。其实，用爆破的方式在山谷中建一条很好走的水泥路，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只需铺上几百码长就可以解决问题。此时此刻，如果有足够的人力，我们就能用细沙石铺出一条好路。2月初和6月初，我们经

过阿尕依布拉克时,看到那儿山谷中的路就是这样铺的,但后来暴雨把细沙石都冲走了,只剩下大的和较大的石块。在和平时期,这样的路会阻碍交通和经商;而在战争时期,则可以卡断后备供给,造成致命的后果。如果省长金树仁能把他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用在筑路上,那他就做了件好事了,可惜他只为自己打算。

3点钟左右,来了一驾3匹马拉的蓝布作帷幔的北京式样的篷车。里面坐着一个维吾尔妇女和她12岁的女儿。她们是阿布都赛米的亲戚。他将坏消息告诉了这位妇女,她大声哭起来,哀嚎声响彻了整个山谷。后来他们换了车,妇人乘他的“阿罗瓦”上了山谷,他乘妇人的篷车朝相反的方向往下走。他答应从托克逊给我们送点燃料和羊肉来。我们预支了钱,可是后来我们要的东西一样都没送来。

那一天,还有其他过路人也聚在阿尕依布拉克泉边休息,饮用那沁人心脾的甘泉。他们当中有3个商人,从吐鲁番来,要到阿克苏去。有一个人答应把我的一封信捎给赫默尔博士。下午,人群渐渐稀少,有的往上去山口,有的往下去山谷。大概还留下10个人,他们坐在那里喝茶聊天,或是饮马,不过已不像刚才那样熙熙攘攘。峡谷中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悬崖峭壁之间的回声也随之荡然无存。这是暴风雨前的寂静。

转眼间,天空阴云密布,铅灰色的云团滚滚涌向峰峦。天色一片昏暗,其实还只是薄暮时分。渐渐听到远处低沉的雷声,这声音越来越近,霎时间雷声大作,震荡着整个峡谷。一声霹雳,如同前方战地上重磅炸弹在顶空爆炸一般。随着阵阵巨雷的轰响,仿佛整座山都要被震得粉碎了,一道道急促耀眼的闪电划破了黑沉沉的天空。风暴越来越猛烈,真有摧枯拉朽之势,让人觉得正面临一场可怕的灭顶之灾。

豆大的雨点开始噼里啪啦掉下来,这时已可听到峡谷的远处下开暴雨的声音。我们3个人都钻进了汽车。刚才还悠闲自在的

过路行客，都急忙卷起自己的东西，靠到了正好与泉边几乎是垂直的峭壁那儿去躲雨。4点05分时，下开了瓢泼大雨，雨水哗啦啦从天上直泻而下，榛子粒大小的冰雹打在谷底的砾石上，像小球一样蹦跳着，我们的车顶像轰炸的目标，被砸得乒乓乱响，随时都可能被砸塌，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几个维吾尔过路人贴在峭壁稍往里凹陷的地方，躲避这一场冰雹，可是雨水顺着岩壁哗哗流淌下来，把他们淋得像落汤鸡，倒霉透了。以前这个地方有间小客栈，战火已使它成为一堆废墟。

几匹马耷拉着脑袋，身上盖着的粗毡片也在往下滴水，在这场雹子的鞭打下，显得那么惊恐不安。

我们的汽车离这陡直的峭壁只有几码远，我估量了一下我们面临的险情。岩块随时都可能从峭壁上崩塌下来，把我们砸得粉碎。峭壁脚下，雨水汇成一股像豌豆汤一样黄浊的溪流，正往下流着，已淹了我们的左车轮。赛拉特发现情况不妙，就把车倒回山谷的正中间，那里的地势比两头都要高些。

我们原以为这里很安全了。谁知从峡谷的右边又有一条雨水积成的溪流向下涌来，水流十分急速。我们就被这两股溪流夹在中间，困在这面积不大的孤岛上。接着一股巨大的激流从小岛上横冲了过去，水就在车轮下涌过。水势以惊人的速度奔泻翻腾，只半分钟的功夫，就和左右两股溪流汇合在一起，成了一片咆哮汹涌的洪水，溢满了整个谷底。泡沫迸溅的喧嚣声真是难以名状，哪还听得见我们的话语声。又是雨，又是雹子，不断重重地打在我们的车顶上，落到这怒涛澎湃的洪水中。

萨波什尼科夫看到了我们的危险处境。滚滚河水每一分钟都在上涨。水已经淹没了汽车的踏板，已一点点渗进车身。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全完了！我们会像老鼠一样被淹死，就是侥幸爬上河床中突出的巨砾，车也没救了。峡谷只有不到30码宽。如果这场大暴雨不停，洪水还会再涨几英尺，我们就只能等死了。

但是还有一线希望。砾石密密麻麻铺成的河床很坚实，汽车发动机还没被水淹没。赛拉特跳下车去，看了看地面，发现砾石铺就的河床高处有一个地方的水比较浅。他湿漉漉地回到车里，手握方向盘，用最高速度倒车。发动机轰鸣着，车子却纹丝不动。如果他开不动车，我们就必须爬上车顶或蹚水找一块岸边高地或突出地面的巨砾。

——先等一等！汽车动了！它逆着进出黄色泡沫的汹涌洪波，横冲直撞地往山谷高处开上去，不一会儿，就到了水比较浅的地方。左边可看见一处废墟，是以前过往行人歇脚的地方，那里有一块从谷底突出在外的岩石，还见到几匹马的骸骨和衣服、军服的碎片。赛拉特又一次开足马力，驶上了左岸的阶地，那里的地面比水位高出3英尺。这时的雨已下得小些了，不过山岩的每个裂缝处仍在倾泻出条条白色的小瀑布。在那圆锥形悬崖的陡坡上挂着奔泻的瀑布，景观奇丽，这就是我们昨天过夜的地方。如果这场暴风雨发生在昨天晚上，我们的处境就没有什么希望了。阿杂依布拉克泉是四面八方的侧谷与大山谷的汇合地，遇到山洪时，每一条侧谷激增的雨水都同时奔涌到这里，泛滥成洪水。

多亏俄国医生的警觉和赛拉特的熟练的驾驶技术，我们现在总算平安无事，可以松心地观赏这令人难忘的景色了。我们当时被围困在大水中的情景，想起来真感到后怕，要是这场暴雨再持续一小时，我们找的这块安全地方，也会像峡谷中别的地方一样被水吞没。

6点左右时，雨停了，岩缝中流出来的小瀑布变细了，黄色的溪流很快退了，一小时的工夫，峡谷中便再也见不到流水了。汽车接着往下开，来到河床中央，坐在露天闲聊，吃了顿便饭。没有柴火，也无法煮茶了。等天色黑下来时，我们又钻进车里，因为又下起雨来了。在我们眼前又重演了可怕的一幕。一道道发青发白的闪电，一刻不停地掠过山颠的上空，一阵阵狂风从山间向汽车呼啸

而来，厚厚的云层像棉垫一样笼罩着山峰。我们随时准备逃回那堆放着死马骸骨的地方。不过这次的雨还不算太大。午夜时分，大家不再聊天，都靠在车垫上入睡了。恐怕在我们之前，还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在亚洲的这块罕见狂风暴雨的地方，亲自目睹今天这样的奇观壮景；也没有人会在旅途中像我们这样，过夜的地方除了水以外，既见不到牧草地，也找不到柴火。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太阳已从山上露出头来，正驱散着潮气。我用手杖支起外衣，挡一挡光线。

我们在泉边洗脸、刮胡子的时候，康斯坦丁和一个叫海丁的维吾尔人牵着3匹马走来。他们正要给赫默尔的驼队运送饲料。他们带了些柴火，我们终于喝上了热茶。前一天晚上，有几个商旅在离这里30英里的库米什见到过赫默尔。他因为生病，路上走得很慢，7月6日前是到不了阿尔依布拉克的，也就是说，我们还要等上24个小时！

康斯坦丁和海丁休息了一会儿，就起身赶往库米什了。两人带了一些粮食和给赫默尔的一封信。

这次我请了萨波什尼科夫陪同，一路上过得真是快活！他没能吃到什么好东西，也很少喝到热茶，一次也没有能享受到篝火的温暖，那天晚上给他提供的歇脚地方倒是很有吸引力的。7月5日夜里，雨一直下下停停，虽不是前一天那种瓢泼大雨，但也下得挺大。我们只能坐在车里，坐着睡又哪能休息好？我实在是太累了，都到早晨10点钟了，我还坐在车里打瞌睡。这时，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吐鲁番的富商木索尔拜走到车前叫醒我。他告诉我，赫默尔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一下子跳了起来，顾不得洗脸，便带着还未消失的睡意，向羊肠小道奔去，没走几码地，便看到两个人骑马向我跑来。前面骑马的是维吾尔人，他牵着后面的马，骑在那匹马上的人，黑得像个印度人，却用最标准的瑞典话招呼我：

“你早啊！怎么起得这么早？再去睡会儿吧！”

是我亲爱的大夫！我像欢迎皇家贵宾那样迎接了他。谢天谢地，他不仅活着，而且看上去精神很好，不过因为生病和旅途劳累，显得消瘦，有些倦容。萨波什尼科夫和赛拉特赶了上来，我们在悬崖脚下铺上毯子和枕头，给病人弄了一张舒适的床。不一会儿，驮着赫默尔行装的3匹马和5头驴到了。我们用牲口驮来的一副破担架生了火，煮了茶。最后，年轻的哥萨克康斯坦丁也回来了。他骑马赶到了库米什，却白跑了一趟，因为抄了一条近路，没能遇到赫默尔。现在好了，大家又团聚在一起了，可以痛痛快快地休息上几个小时。

从那座圆锥形悬崖方向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原来乌鲁木齐政府的两辆卡车已从阿克苏返回。其中一辆车在坡坎上——两天前我们也曾在那里止步不前——折断了后车轴，只好放弃了。他们费力整修了一下路，虽然走起来仍很颠簸，不过这第二辆卡车总算开过来了。车上有29名乘客；木索尔拜就是其中的一个，此外，坏车上的东西也全部装到了这辆车上。据说，乌鲁木齐政府从俄国弄到了80辆“阿莫牌”(Amo)汽车，有15辆已经报废了。

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公路还没有筑好，居然就从国外订购费用昂贵的汽车！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调查道路状况，然后向南京政府提出改进建议。然而，在执行这一对新疆至关重要的任务时，我们却没能得到新疆当局的任何帮助，相反，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设置重重障碍，不准许我们检验新疆境内的道路。

下午，我们驱车前往托克逊。晚上9点钟，宿营在沙漠上。第二天，即7月7日，我们通过达坂城附近的山口时，遇到了麻烦。汽车陷进了离对岸不远的河里。一支维吾尔的小商队正好路过这里，帮我们把车拖上了地面，我们付了报酬。5点后，我们开始踏上返程旅途，路的右边是博格达山，左边是盐湖。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打开了车的头灯。

车子驶进丘陵地带。离乌鲁木齐南门只有2.5英里时，车子

掉进了泥沟。这时天下起雨来。赛拉特使出所有的招，都无济于事。我们指望能有一支马队经过，帮我们把车子从泥坑里拖出来。但时间太晚了，天色一暗，城门就关了。赛拉特用铁锹铲去了车轮前的烂泥，车子还是一动不动，已陷得太深了。

我们关上车窗挡雨，点燃了蜡烛头，然后把剩下的一点儿吃的拿了出来，有饼干、奶酪、巧克力和一只甜瓜。吃的是不错，就是没有喝的。在一片漆黑中，也休想在这鬼地方找到喝的水，只能闻到那腐尸和污秽之物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我们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聊天，病人也只好跟着受罪。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逐渐感到困倦了，一个个闭上了嘴，睡着了。

真是糟透了的一夜。坐在车里熬上一个夜晚，本来算不上什么的，但是连续3个晚上就吃不消了。我刚睡着就醒了，看看表，原来刚过半小时。时间过得好慢，怎么也等不到天亮似的。最后，我终于可以依稀看到近处小山坡的轮廓了，有树林，还有花园。又过了一会儿，光线更亮了。这时有15个汉人从车旁走过。经过一番谈判，我们答应付350两纸币作报酬，他们才同意出力，就这样，我们摆脱了困境。

车一直开进城里，没有阻拦。刚过8点，我们就把萨波什尼科夫博士送到了他的医院，然后回到基尔凯奥尔德原来住的房子，我们外出期间，他的继任陈先生和他的妻子带着3个漂亮的孩子已经搬了进去。

我们动身去救助赫默尔博士时，刚从南门出了城，外事部门的王先生就奉最高当局的命令赶到尤这里，对他破口大骂，横加指责，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只有在乌鲁木齐才有。尽管尤对他解释了事情的经过，王哪里会相信，又急急忙忙跑到阿布列索夫先生那里。后来，这位总领事告诉我，王对他说：“盛督办得知，赫定博士既没有得到特别许可，也没有拿到通行证，就擅自出城，对此他极为震惊和恼怒。显而易见，赫默尔的病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是为了

给赫定博士找到离开乌鲁木齐的借口，使他能有机会回到探险队，然后越境逃到甘肃去。”

阿布列索夫嘲笑他说：“首先，是我请陈德立允许赫定博士离开乌鲁木齐的；其次，你应该清楚，他来此地是为了要油，他的探险队搞不到油，所以他们不可能逃到甘肃去。再次，我自己的医生萨波什尼科夫博士和他同行，他总不会逃吧！”

王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无言以对，只好不吭声了。总领事笑着把他送到了门口。



十四、赫默尔和贝格曼返回瑞典

以后这几天，雨一直下得很大，街道成了泥河。有一天，龚继成到了，几乎在同一个时候，贝格曼也来了。他们离开了孔雀河畔的70号大本营，带领各自的小驮队，从不同的路线越过了库鲁克山。可惜本书篇幅有限，我不能在此多讲他们的历险情况。龚一路历尽千辛万苦，在吐鲁番以南的地方，他驮队的牲口都渴死了，他和仆人们也差点丢了命。

在这段艰难时期发生的一切，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第三次被困的日日月月里，我们一直生活在紧张的气氛中。我只想从日记中摘录几件小事，向读者介绍一下我们当时在这座处于野蛮、倒退状态的城市中生活的情景。

赫默尔和贝格曼回瑞典的俄国签证很快就办妥了。不可一世的盛督办也对我们客气起来，答应发给他们经塔城离开新疆的通行证。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等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才动身。萨波什尼科夫博士开了一张诊断书，他以医生的良心证明，赫默尔患血中毒，必须立即到专治热带病的医疗机构接受全面治疗。要他离开探险队，是件痛苦的事，但为了健康，他必须走。他的确是在恢复，但是他的病情在路上也可能恶化，我必须对他负责，不能让他一个人长途跋涉，完成这趟艰苦的旅程。只有贝格曼能送他回国，这样一来，对我就意味着双重的损失。我不想细讲在如此危难艰险的时刻失去两位瑞典朋友和探险行家，对我意味着什么了。

我们该怎样报答那位帮了我们大忙的俄国医生呢？他断然拒

绝任何报酬,说他有领事馆发给他的工资。幸好赫默尔留下了一部分 1928 年配备的医疗器械,其中有一套一流的瑞典外科手术器械。这件礼物使萨波什尼科夫博士非常高兴,赞不绝口。外交部门的领导陈德立向我们买了药品,他用卢布付的钱。这就改善了我们的财务状况,当时我们正需要钱给赫默尔和贝格曼作旅途之用。

我们的钱按预算可维持 8 个月,而探险队出发至今已有 9 个月的时间了。新疆战时的生活费用是很昂贵的。100 斤面粉已涨到 10 000 两纸币。我们回南京去还有一长段路。因此,我们起草了一份电报,发给我们的上司、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博士,告诉他我们因为被困,耽误了时间,已经囊空如洗,无法离开乌鲁木齐或回到南京,为此要求再拨 20 000 墨西哥元。等了快 3 个月,南京方面才给了回音。

我们必须派一个小队去救援仍在孔雀河畔等着的生瑞恒、埃费和陈宗器。哥萨克人康斯坦丁负责用那位好心的县长免费提供给我们的大车,把搞到的汽油和润滑油送到 70 号营地,还带去了食物和钱,由两个维吾尔人赶车,另有 3 个汉族士兵作保镖。

我和尤一次又一次到衙门去拜见盛督办,他总是客客气气接待我们,满口答应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但是他从不兑现。后来我们给他写信,隔几天他在一封回信中答应给我们 30 普特汽油,还说要给探险队提供专门住处,结果,什么也没有。

人的心灵会在耐心等待中得到净化,得到锻炼,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知道终身监禁滋味是多么可怕,这些都可以说是大有裨益的。我们整天坐在凉台上看着下面花坛上的向日葵、番茄花和夹竹桃。时间是那么难熬!然而,却没有片刻的安宁感,总觉得很不安全,会有什么不测风云来临。我们多么渴望自由,眼看我们的幽禁遥遥无期。日复一日,我们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天山上的流云飘向“神山”,那么自由自在。多么希望我们能驾上那蓝灰色的似龙

又似船的云彩,重返沙漠,享受那超乎寻常的宁静!天色渐渐暗下来,一阵狂风向乌鲁木齐席卷而来,顿时沙土弥漫,像巫婆在庭院中跳大神一样,急速盘旋。向日葵也不得不在这疯狂的恶魔面前低头弯腰。霎时间下开了倾盆大雨,我们赶忙回到屋里。

从北面过来的人说,玛纳斯河的河水和准噶尔另外几条河的河水涨得很高。赫默尔和贝格曼能过得去吗?一辆俄国卡车在昌吉翻了车,死了两个人,伤了数人。

盛督办想说服龚继成留下来,帮他筑路。真怪,我们到此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偏偏把我们当犯人一样看起来,把我们看成是间谍,只要往城墙外探一探头,就会被认为是要密谋逃跑。

盛督办买下我们一辆卡车。我们力争卖一个好价钱,却被他压到2500墨西哥元。这笔钱说好付给俄国银行,而且说定“明天”付。可是没收到钱,几星期过去了,总是说“明天”。

阿布列索夫先生收到莫斯科政府的一份电报,询问我们探险队的情况。他们已听说,我们遭到袭击,处境危险,要求提供有关我们的全部消息。阿布列索夫回电说,他每天都和我见面,探险队全体队员都很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给南京发电,提醒他们有关追加经费20000墨西哥元的事。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单刀直入地说明我们被扣留在乌鲁木齐,因为每份电文盛督办都要亲自检查。但是,我们在电文中指出,如果南京方面再不资助我们,那就凶多吉少了。真要是这样,我们打算卖掉所有的车,盛督办和俄国人都想要。然后我们想坐上大车沿丝绸之路东返,或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去。可是天知道,我们能否获准离开乌鲁木齐?!经新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人被认为是无碍于事的,但往东去的人则被看成是危险分子。因为东边是南京,而当局又不愿意中央政府了解新疆推行政策的最新情况。

8月1日,乌鲁木齐召集了一个政治性的群众大会,一直开了7个半小时。盛督办发表了演讲,他说:“战争已结束,马仲英已被打跑了。现在到处都是一片和平景象,非常幸福。农民可以回家耕种田地了,每个人都可安居乐业了,这里是完全自由的。你们到哪里去都可以,你们有这个自由。现在,黄金时代已经开始,建设时代已经到来。”这种说话的腔调在欧洲并不少见。但他一点都没谈滥印钞票使商业陷于停顿的情况,也没有说到严禁去吐鲁番和哈密的命令。

讲话的人中还有一个13岁的女孩,她大胆地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大马”的头上。她大声说:“那些土匪对我们女人强施暴行,我们受的罪比男人多啊!”

一位南京派来和盛督办就上海—乌鲁木齐—柏林航线进行谈判的戈先生,讲了一番足以掉脑袋的话。

他说:“新疆的督办是位出色的省长,但如果他的部下都胡作非为,置这个省的民生于不顾,那么省长就会成为新的马仲英。……良好的陆上交通和空中交通,都同样重要。现在,到喀什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真不像话,其实坐汽车去只需几天,坐飞机则只要几小时就可以了。”

在他讲话当中,盛督办起身离开了会场,但戈若无其事,继续讲。更奇怪的是,不久他就获准离开乌鲁木齐,可是在此之前他却等了3个多月。

8月2日,又举行了一天庆祝胜利的活动。在省长衙门的前院集合了一支长长的队伍。走在前面的是1500名士兵,他们身穿灰绿色军服,挎着俄式步枪。有的穿鞋,有的穿靴子,他们的行军姿势并非无懈可击。队伍中有人挥舞着各式小旗帜,有人举着白色或红色的横幅,上面用常用的汉语、维吾尔语或俄语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

后面跟着的是学生军训队,他们奏着鼓乐,举着旗帜。接着过

来的是诸如邮电等各行各业的官员和职工；还有男女小学生，每人手上拿一面小旗。最后是满载学生的6辆卡车。整个场面一派节日气氛。6支乐队演奏着刺耳的乐曲。各个角落都贴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或宣传画，房顶上或铺面前都挂上了旗帜，有国旗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

5架飞机盘旋在城市上空，向人群投下了成千上万的红、绿、白3色、用汉语和维吾尔语写的传单。我们捡了几张，由尤给我们翻译，大家听了着实乐了一下。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帝国主义的前哨已被击败，但帝国主义自身还存在，还在企图颠覆我们的新疆，以便征服我们省和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的旗手们将会互相争斗，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将会全面爆发。同胞们，我们太弱小了，不可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任何影响，我们面临的命运将像在地狱里受煎熬一样。因此，必须坚持我们的要求——打倒帝国主义！坚决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另一张传单上写着：

同胞们！同志们！马仲英已被歼灭了，再也不会回到新疆来屠杀我们了，因此，我们理所当然要好好庆祝一番。胜利归功于我们新政府的精明能干。新政府也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到团结各民族的必要性，正因为这样，才使我们从马仲英的浩劫下解救出来。我们现在庆祝胜利，从此刻起，我们必须尽力支持新政府，帮助新政府发展新疆。这样我们才能享有和平，才能永远过幸福繁荣的生活。

第三张传单上写道：

同胞们！同志们！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双亲、手足和其他亲人惨遭劫掠，我们的土地家园被荒弃在一边，财物丢失殆

尽,商业瘫痪,财政已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所有这些痛苦和灾难都是马仲英这个土匪带给我们的。他多次被我们打败,最后出逃。但不久,他又率领一支装备齐全的新军队卷土重来。这都是因为他得到了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支持。日本给了他大量黄金和弹药,让他来屠杀我们的人民,征服我们的国家。

可是,马仲英是刽子手,而我们的真正敌人是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人。现在,马仲英已被彻底击溃,这证明我们的同胞头脑清醒,有凝聚力,也证明我们的新政府是英明的。尽管马被打败了,但他的帝国主义主子已在谋划再次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团结起来,保卫自己。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帝国主义要打我们,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变成帝国主义。为了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帝国主义将互相残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就要开始。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那场战争杀了多少人,消耗了多少钱财,多少人被迫无偿地干苦力活。要阻止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要消灭所有的帝国主义者,我们必须和他们进行斗争。粉碎了他们,我们国家才可以和全世界一样,生活在和平之中。

其他传单上印的都是一连串的政治口号:“打倒和平的破坏者!”“支持世界和平!”“支持新政府!”“庆祝胜利!”“努力保卫新疆的永久和平!”“新疆各民族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吸血鬼!”“打倒阴谋家!”“消灭马仲英! 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发展各民族文学!”“今日南北疆团结一心!”“残酷的魔鬼马仲英已被打垮,新疆人民可以享受和平了!”“加强西北地区,光复东北三省(满洲)!”“永远记住九·一八(沈阳,1931)!”“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东北同胞!”

这些口号出自谁手及其煽动性如何,是显而易见的。新疆各民族只求能在中国的治理下,像以往多少世纪一样,过上和平宁静

的日子。金树仁这个无能的省长，对骚乱和内战敞开了大门，困境中的人民只好求助于回族将领马仲英。新省长盛督办看到自己的统治受到马的威胁，便求助于俄国，得到了他所要求和必要的帮助。于是，新疆也和几十年前的外蒙古一样，在慢慢地，但确实是在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乌鲁木齐上空飘下来的传单，却没有对这种明显的帝国主义表现提出警告。他们的警告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日本的。

另一方面，1934年夏天没有发现俄国人有什么宣传活动。对俄国来说，新疆已从军事上、财政上和商业上落到自己手上，这就足够了。新疆的东部边境完全封锁了，严禁与中国内地有任何贸易往来。

就在这时，欢庆的队伍穿过市区狭窄肮脏的主要街道。街两旁是维吾尔人的小摊和店铺，商人和三三两两的顾客用漠然的眼光，看着这嘈杂的、五光十色的狂欢队伍。“帝国主义”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分量，他们也不会相信什么黄金时代已来临的诺言，因为马虽被打败，而面粉的价钱却已涨到每100斤要10000两，乡下人担心闹饥荒，手上有麦子也不往外卖，更何况他们还要向政府粮站交公粮。

8月4日晚，我们正坐在屋里说话，省政府秘书处送来封给“西北公路查勘队”的公函，尤翻译了信的内容：

我们接到南京外交部来电，电文如下：“外交部得知斯文赫定博士和西北公路查勘队的十名队员以及北京去的邮政局长基尔凯奥尔德和地质学家陈宗器在新疆遭到土匪袭击，被押到阿克苏关起来。现已查明，这些土匪系受命于一个回族头目。请立即派人调查此事，予以协助，盼复。”

电报于6月13日发出，由外交部签署。我们希望了解电文内容是否确切，上述邮政局长和地质学家现在何处，请调查后予以答复，谨在此致谢。

听着这封没头没脑的信，我们笑出了眼泪。南京方面的人应该知道基尔凯奥尔德不是我们探险队的成员，陈宗器不是地质学家，而是天文学家。这份电报或许只是对我们在库尔勒遭袭击和我们的汽车在去库车和阿克苏途中被征用这两件事最早传闻的反响。南京方面被这些消息搞糊涂还情有可原，可是每天和我们打交道的乌鲁木齐省政府，完全应该知道，我并没有被“大马”当犯人押到阿克苏，更不要说基尔凯奥尔德了。他在6月18日回哥本哈根老家前还去向当局告别过。

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在当局的眼皮底下，本来很容易澄清真相，这么简单的事都会弄得这么混乱，那么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决策和重大复杂的政治问题上会是怎样一种状况，便可想而知了。

尤给秘书处的回复也应在木偶滑稽剧中占一席之地。回信写得很长，很具体，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我们一路上的经历，还讲了邮政局长回国的情形，语言之简单，连傻子都能看懂，好像是专为学校低年级中最迟钝的学生准备的教材一般。

8月7日下午5点45分，我们3个瑞典人正坐在起居室，贝格曼在大声朗读，这时突然发生了相当强烈的地震，房子直摇晃，杯子里的茶往外泼出了一部分，墙皮东一块西一块掉下来，玻璃窗嘎嘎直响。赫默尔和贝格曼急忙跑到凉台上，然后走下去到院子里。一种古怪的好奇心驱使我留在原地不动，想看看天花板会不会塌下来。还好，天花板撑住了，但整个房子不停地来回摇晃，我有点头晕，觉得不舒服，也跟着跑了出去。地震停了。离我们不远处，有3所房子被震塌了，听说一间瓦房的屋顶倒了下来，砸死了4个人。

两天后，我们听说，有30个人在凌晨2点钟被捕，罪名是密谋反对政府。其中一个省银行行长苏先生，还有5名白俄。

省长和外交部长陈德立参加了审讯。省长问苏：“我一直是你

的朋友,而且对你还特别关照,是不是这样?”

“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可你是怎么对待省内可怜的穷人的呢?”

据说,被捕的人中有15个人被枪毙了。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设在省长的衙门内。可惜监狱的高墙不能开口讲话!否则人们就可听到许多横暴肆虐、滥施酷刑的可怖故事。被判死刑的枪决以后,尸体挂在城墙上示众。如果犯人病死在狱中——一般都是伤寒病——亲属可以领回遗体安葬。

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想给赫默尔和贝格曼寻找离开乌鲁木齐的机会。赫默尔的状况并不见好,总是发烧。动身的准备工作,也像其他事情一样,耗去了许多根本不必要的时间。最后,总算一切就绪。由10辆俄国卡车组成的车队,要在8月11日夜出发去塔城和巴赫特,再从那里换乘铁路。当天下午,总领事阿布列索夫来回访已向他告辞过的这两位上路人,这就证明,这次可是真的能成行了。

汉城的南门晚上8点关门。车队是从俄国领事馆出发,上路的人必须抓紧时间。我们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餐饭。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只剩下最后一小时了,我们必须告别,分道扬镳,迎着那吉凶未卜的命运走去。8个月之后,许是天意在冥冥之中发了慈悲,又让我们重逢了,在那相聚欢庆的时刻,1934年8月11日的夜晚成了过去的一页历史。

贝格曼不到8点就早早作好准备了;但赫默尔却平静地处理着每件事,到了8点半,他还坐在那里,让尤记录下他对我的治疗要求,当时我得了在乌鲁木齐司空见惯的胃病,可是犯得很厉害。贝格曼在一旁等急了,如果这次赶不上车队,他们就要再等一个月。到了8点50分,邮局的马车已在外面等候,他们准备带回瑞典的一点小件行李已放在车上。我一把抱住了他:感谢你啊,这样的体贴耐心,这样的忠于职守!请代我向家里人问好!灯笼照亮

了打开的大门。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一声鞭响，马车走了。

尤和龚乘一辆北京式马车送他们到城门口，万一遇到什么麻烦，可以帮一下忙。这样，就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整个院落寂静得像坟地一样。我回到起居室，坐到一把扶手椅上沉思起来。一个人有时会忘掉一些往事，可是当随着年复一年时光的流逝，又重新回想起当年这些事的时候，仍能感到生活的魅力，这该有多好！一小时后，尤回来了，才把我从孤寂中解救了出来。他告诉我，城门已关上，哨兵拒绝开门，说道：“谁也不许这么晚出城——你们有通行证吗？……噢，是这样，我们打电话问问衙门。”

他们挂了电话，城门打开了。马车又继续朝停卡车的地方赶去。一直到凌晨5点钟，卡车才出发，踏上了漫长而危险的旅途。这两位旅行家平安到达了阿亚古斯、塞米巴拉金斯克和新西伯利亚，还在那里见到了我们的朋友德国领事格罗斯科普夫，和以往一样，他们在旅途中得到了他的热心帮助。

直到8月29日，也就是赫默尔和贝格曼到达柏林的那一天，我们才收到格罗斯科普夫发来的电报，说他们已从他住的这个城市顺利地往下走了。谢天谢地，我们不用再为他们提心吊胆了。

十五、一件令人尴尬的突发事件

8月14日，南京铁道部部长来电，问我们打算把公路探险队的时间延长多久：

因为原定时间已经超过……你们要求获准回南京，但按原计划你们查勘队应该去塔城、伊宁和喀什。如果现在返回，意味着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即刻来电说明你们要求返回南京的原因。

我们已经向铁道部部长暗示过，这3条路，由于得不到许可，一条都走不成，因此，再在乌鲁木齐呆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不得不像先前一样，再次写信给盛督办，向他引述了部长电文的内容，并指出探险队的卡车尚停在孔雀河畔，而我们两个多月前就提出需要汽油，可是至今仍无踪影。我们问他是否能借一辆卡车和一吨半汽油，用20天时间去一趟喀什。我们在信中详细说明了安排这样一次旅行毫不费事。17天后，我们得到了答复，请求被客客气气拒绝了，毫无商量的余地，理由是省里缺车，现有的车要留作军用。

21日，铁道部发来加急电报，再一次坚持我们必须去调查新疆省3条路线中的一条。如果我们回复时说明真情，即省长是出于政治原因才封锁这3条路线，那么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因为盛督办绝不会让这样一份电文通过检查的。这里要提一件事，贝格曼在陪赫默尔去塔城的路途上对道路状况做了记录。这份记录后

来成了报告书的附录，因此，至少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所委托的任务。

我们的处境至少可以说是不正常。我们只不过要求去一趟喀什，却遭到拒绝。铁道部部长一次又一次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去，而我们却不能告诉他其中的原因。我们给盛督办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要求他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最后，他终于答应给我们两吨汽油和 8 普特润滑油，但要我们付了钱，他才交货。盛督办用 2 500 墨西哥元买了我们一辆卡车，但他要拿到汽车才付钱，何况车子在孔雀河畔，没有汽油和润滑油是开不出来交给他的。

又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根据指示，我们在来新疆的路上没有做任何考古发掘工作。但是，当我和贝格曼、陈宗器在新河（库姆达里亚）河岸上发现 6 处约几千年前的古墓时，我们进行了发掘工作，并带走了发现的东西，其中包括人的头骨，准备到南京后交给有关部门，因为我们觉得，任何一点发现总能向人们揭示一些古代丝绸之路的情况。

我过去就已经指出，在中亚地区绘制公路路线图这一任务本身，就是与考古紧密相联的。可以肯定地说，从西安府到喀什的公路，十分之九的路程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

8 月 26 日，我收到了铁道部部长 7 月 7 日发出的一份电报，由此引发了这台戏的高潮。电文中说：

我收到教育部来信，信中说：“斯文赫定博士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在罗布泊和塔里木河畔挖掘考古珍品。这是违犯本国法律和部长指示的。特向铁道部长指出，他所属部门应对此不当之举负责。”

教育部长要求我调查此事，并告知调查结果。斯文赫定博士和查勘队队员不得挖掘考古珍品，这在过去下达的指示中已有明文规定。我已要求调查此事。如果报告属实，我必须指出，你们此举纯属非法，必须立即停止挖掘。已发掘的，

应将每一件文物上交教育部。务请马上给我答复。

当我又一次仔仔细细阅读电文后，便决定了我应对铁道部采取什么态度。我告诉我的朋友尤说，我不会再为铁道部工作了，一天都不行，马上就要提出辞呈。尤寅照简直绝望了，根本不听我说。龚也同样感到震惊，他发表意见说，只有我的名字和外国国籍能拯救探险队，如果我离去，那么所有队员都会被无限期地囚禁起来。

不管我准备如何，大家还是决定当天就给铁道部部长发封电报，先作出客观的答复。电文很长。首先，我们回顾了这次探险的目的和目标，谈了我们是如何卷入内战漩涡，并差点被枪杀的，又是如何在3月底按盛督办的指示到罗布泊去躲了两个月的。我们当时分成了两组，一个组负责探寻一条向东通过库鲁克山的路；另一组则去孔雀河，调查新河是否适合灌溉。接着，我们告诉他是怎么发现那些墓地的，并指出这些墓地随时都有被风风雨雨的天气、尤其是被罗布泊湖游动的流水毁掉的危险。我们写道：

由于我们认为这些墓地有助于揭示中国的过去，所以我们觉得不能搁下不管，一走了之，于是进行了发掘，带走了发现的东西，准备交给您。……您的电报使我们非常吃惊。教育部长的代表并没有和我们一同去罗布泊。他既不知道我们到过什么地方，也不了解我们做了些什么，怎么能毫无证据就指责我们挖掘考古珍品呢？我们发掘的东西以后在南京面交给您，因为我们需要用它们来证明我们挖掘的是哪一类“珍品”。

我和中国队员都在电文上签了名，然后把它送交盛督办检查。两天后，电报被退回，说内容太长。于是，我们把它当信寄走了，尤写了份内容摘要，发了电报。

8月29日，我给铁道部部长发加急电报，电文如下：

我收到并考虑了您于7月7日的来电。它使我吃惊，因为它是以假报告为基础的。阁下轻信谎言，并以此在电报中指责我，这一事实严重损害了我的声誉和尊严。我不想再受到这一类侮辱，谨向您提出辞职，并通知您，一旦我获准离开新疆，将即刻动身回瑞典。

这封电报送出后，我才听说有一份只由中国队员签名的发给铁道部部长的电报也在同一时候送走。后来我拿到了这封电报的抄件。电文中说了我许多好话，此外还说明，如果我离开，整个探险队就会彻底瓦解。

这两封电报经过盛督办的检查，直到9月2日才送还给我们。电文的内容显然使他很得意，在我辞职的电文上他亲笔拟上“立即发出”，还盖上他的红印章；在中国队员的电文上批的是“立刻发出，不得拖延”。

我给铁道部部长顾孟余的电报于9月2日发出，9月5日就收到回电，比过去快得多。

电文是英文的，内容如下：

特急。时间：9月3日下午7:30。

发自南京。致乌鲁木齐绥新公路查勘队斯文赫定顾问。

8月29日来电收悉。绥新公路——如可能可延长至喀什——的调查工作非常重要。您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世界闻名。您对工作高度负责，不遗余力，值得称道和钦佩。我请求您留任，继续完成任务。顾孟余。

不久，我们又收到一封电报，说我们要求增补的款项已拨出，并汇入北京的德国亚洲银行。我们终于不用担心了。

9月4日下午6点钟，我和尤正坐在凉台上，忽然听到院门外一阵熟悉的喇叭声。我们赶忙走下去，打开了大门，我们的一辆卡车、值得信赖的“艾赛尔”开进了院子。生瑞恒、贾贵、乔克敦和哥

萨克尼古拉跳下车来。高个子生瑞恒快步向我们跑来，他晒得黝黑，显得那么兴奋。

“其他人呢？都活着吗？”

“都好，好极了！”

真让人高兴啊！我们的担心全都烟消云散了。

3个星期前，我们派赛拉特带上足够的汽油，坐上马车去库尔勒。他在那里见到了探险队所有队员。如果一切都顺利，他们本来能够立刻出发来乌鲁木齐，那么两星期前我们就可见面了。但是，别克迭夫将军的副官普罗希库拉科夫上校大概在一个月前坐了一辆卡车经过库尔勒，发现了我们留在俄国驻军那里的那辆卡车。普罗希库拉科夫就从这车上卸下了他需要的发动机上的关键性部件，安到他自己的车上。结果，生瑞恒不得不在库尔勒和托克逊之间跑了整整两个来回。这就是说，耗去了更多的汽油。整个队伍到托克逊就无法继续往前走了。生瑞恒只好驾着“艾赛尔”独自来乌鲁木齐了。9月6日，他又得再带些汽油回托克逊去接别的人。9月8日，我们终于相聚在一起了。陈宗器、埃费和卓木恰也赶到了，我们在一起进餐庆贺团聚。这是这次探险历程中最令人难忘的欢乐时刻。

我们留在库尔勒的一些行李被俄国士兵偷走了。普罗希库拉科夫拿走的发动机部件，我们再也没有配上，后来我们只得把那辆坏卡车留在了乌鲁木齐。其实，我们也应该明白，在这种地方交出去的任何东西肯定会被偷走。

真不知我们还要在这悲惨的巢穴中困多久？现在，我们探险队全体队员和5辆卡车都在乌鲁木齐，他们不但不帮助我们尽快上路，反而又想出了新的招术，阻挠我们动身。13日，盛督办的一名副官来到我们的住处传达命令，说所有考古发现都得留在省内，因为法律规定禁止带出省外。他还告诉我们，还有一二个副官已奉命去罗布泊，调查我们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事。真是绝

妙的主意，他们只会发现我们所到之处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

第二天，又传来新的命令，我们的全部行李都要拿到省政府去检查。只有装着我们在古墓中发现的考古文物的两只大箱子，仍原封不动地留在我们的凉台上。

有一个副官又一次提醒说，有一支探险队就要出发去罗布泊，寻找我们藏在那里的考古珍品。他说：“如果我们找到了，你们就要坐牢。”这就是说，这支探险队下去多久，我们就要在乌鲁木齐等多久。我们已经以自己的名誉和良心发过誓，无论在罗布泊或是其他任何地方，我们连一个领扣也没有藏过，可是这种发誓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我们6个人都受到邀请，到好客的阿布列索夫先生家去吃饭，我对他讲了我们的处境。于是他告诉我说，他已听到有人向盛督办报告，说我们在罗布泊挖掘时发现了珍宝，藏在库尔勒或是郊外；我们之所以反复要求去喀什，原因很简单，就是想中途在库尔勒停一下，把藏好的宝物挖出来，然后带到喀什，交给当地的英国总领事，再借他一臂之力运往印度。

盛督办听信了这种编造的谎言，之所以把我们在墓中发掘的东西封存留下来，其原因也在此。

9月17日，盛督办会见了我们6个人。当时他正坐在一张长桌边，和他的政府成员开会。有人带我们穿过旁边的一个套间，来到接见室。套间里还坐着10个维吾尔人和汉人，等着接见。

我们没等多久，省长就走了进来，坐到我们中间，照例上了茶。

盛督办一开口，就要求我们离境时，不得偷偷拿走黄金，因为黄金不得出口的禁令依然有效；他已经发现有大量黄金从吐鲁番走私出境。“我们需要掌握新疆的全部黄金，以便支付我们从俄国购买的其他军用物资。”

我们要求等两辆坏卡车修好后，就能获准离开乌鲁木齐。

“你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到通行证，”他回答道，“修车要多长

时间？”

“大约 10 天。”

“那么就先决定你们 10 月 1 日动身。”

他又补充说：“我已从南京中央政府接到命令，严禁一切考古发掘，特别是发掘古墓。谁违抗命令，马上就逮捕入狱。”

我们把发现古墓的全过程和盘托出。贝格曼发现一个颇具规模的墓地，大概十多年前，已被当地土著盗掘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些骸骨和碎布片。我们对盛督办说：“有人告诉阁下，说我们发现了珍宝，并把它藏在库尔勒附近。这是不真实的。”

最后，我们请求允许探险队经古城子返回南京。

盛督办很喜欢拿我们开心。他说：“博士，既然您这么喜欢新疆，这里的人民也喜欢您，就留下来帮我们开发和发展新疆吧！尤先生和龚先生对我们来说也是难得的人才。要把沿海地区的工程师弄到这儿可不容易了。我们过去要向苏俄求援。”

类似这样愉快的接见后，我们常要给铁道部部长发电报，因为我们知道盛督办要批阅每一份电报的。他会因此提高在南京的声望，而且会从电文上了解我们是多么重视他的一片好意。

9 月 18 日，是沈阳陷落 3 周年纪念日。笼罩在沉痛气氛中的游行队伍穿城而过，盛督办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连汉、维杂居的肮脏的东城也热闹起来。城门口挤满了“阿罗瓦”、俄式运货马车、北京式马车、骑手、来自吐鲁番的由驴驮载的棉花商队、旅行者、小贩、衣衫褴褛的孩子、伊斯兰教托钵僧侣和流浪汉。

一张火红的纸印的传单上写着如下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

三年前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我们的满洲领土，以摆脱他们的危险处境，完成他们占领我国的可耻计划。政府不加抵抗便放弃了满洲，使我们三千万同胞受尽帝国主义的蹂躏，这就是九·一八的后果。但是，侵略给帝国主义造

成了一定的经济困难。由于殖民地分割不均，帝国主义之间终将爆发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单凭军事冒险，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满洲。他们无疑会毫不喘息地继续推进对中国的侵略。例如，沿长城一线的战斗结束后，日本人便掌握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和军事特权。

现在日本又派官员到新疆来挑起事端，其目的也是要占领我省。日本帝国主义者计划把京绥铁路和陇海铁路延伸至星星峡^①，可由此入侵新疆。新疆同胞们，我们必须睁开双眼看到这一危险，置这些恶狗于死地，把他们赶出新疆。

为纪念九·一八，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新疆全省、保卫她的权利和领土，紧密团结各民族，打击帝国主义者，重新夺回他们侵占的全部领土。要使不同民族都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坚强的整体，就必须使他们有同等的地位，享受同样的待遇。如果做到这一点，无论帝国主义对新疆搞什么阴谋活动，我们都能粉碎。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回答。打倒帝国主义！

如此说来，我们探险队被骂成是走狗！事实是，我们是在完成南京中央政府委托的任务，是在为了中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各民族的利益而筹划修筑沟通新疆内外的理想的道路，可是，这样的事实却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我们被长期扣留起来，当局拒绝我们去调查我在前面提到的那3条路线。这充分证明，我们被当成了敌人、间谍，而不是纯粹为该省利益服务的朋友。

来到这枯燥乏味而又充满邪恶的城市，唯一的消遣就是观看那一幕幕适时而来的、发生在国民党青天白日党旗和红色国旗下的政治闹剧。这里没有电影院，没有剧院，倒有最简陋的咖啡馆和

① 位于哈密东南，邻接甘肃省。——译注

饭馆,还有娼妓,其中有俄罗斯人、汉人和穆斯林。入夜后,在昏暗冒烟的油灯下,人们无节制地寻欢作乐,酗酒,赌博,抽大烟,毫无道德可言,过的完全是放荡邈邈的夜生活。在盛世才统治下的乌鲁木齐真是块肮脏至极的地方。

在乌鲁木齐,人们在看到婚礼的同时,也常看到出殡。年迈的文职省长李溶于9月初丧妻,就在这一月的19日,这位和蔼可亲的、留着灰白胡须的矮胖老人却又准备结婚了。他娶的是一个奇丑无比的30岁寡妇。

12辆马车组成的迎亲队伍刚从我们门前经过,就看到一个法官的送葬队伍走了过来。队伍前面开路的是大红灯笼,然后是左右摇摆的花花绿绿的轿子和几面用长竿支起的大旗,后面跟着一群身穿红衣、头戴尖顶帽的小男孩、打伞以及穿着红袍的佛教僧侣和道士。法官的灵牌放在一辆挂着白幔的四轮马车上,一队士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旁护送。死者的近亲身穿白色孝服,头扎孝带,坐在马车上,别的亲戚在土路上走。接着,16个人抬着覆上白色棺盖的棺材走了过来,街上只听见法官的女儿和别的穿孝服女人的嚎啕哭声。法官的遗体被抬到庙中,等候另择吉日下葬。

外交署长官邸举办的一次宴会竟变成了一场粗俗的闹剧。饭菜是俄式的,厨子和招待员也是俄国人。大多数汉人都喝得有些醉醺醺的,其中有一个相当高级的官员跌跌撞撞地把白酒浇到他喜欢的那些人的头上,幸好我不在此列。木索尔拜和另外两个维吾尔人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像尊偶像。他们不沾一点摆在那里的烈酒,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不过,谁都能猜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为了求得平安才不得已出席宴会的,但是根本不和这帮人搭讪。他们憎恨举办宴席的主入,也恨他手下的人。他们为自己受这些醉鬼的统治而感到羞愧。

9月22日,我去拜访俄国军事顾问马林科夫将军,在那里坐

了相当长的时间。他是盛督办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是位很有权势的人物。

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将军谈了年轻的汉内肯的悲惨命运。1933年秋天，汉内肯从北京来到兰州，结识了一个俄国鞑靼人。由于语言相通，他对这个鞑靼人很有好感，却不知此人曾因杀人坐过8年牢。同年9月，汉内肯抵达哈密，后来又到了七角井子^①，从那里往右的路通古城子，往左通吐鲁番。汉内肯走了去吐鲁番这条路，刚走不远，那个俄国鞑靼人就告诉他要走去古城子的路。汉内肯听了他的诡计，但是根本没有走到古城子，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任何消息了。

天主教神父们尽了一切努力打听他的下落。他们告诉我，汉内肯有一条母猎狗，是他的忠实伙伴。马仲英的一个士兵从肃州来时见过汉内肯，特别注意到他那条黑白斑点的狗。这个士兵于1934年又转回肃州，讲述了前一年冬天碰巧在哈密的一家毛皮店看到了一张狗皮，他肯定那是汉内肯的狗，因为他不相信这一带会有第二张狗皮有那种特殊的斑纹。士兵很了解这条狗对他的主人非常忠实，所以他的看法是，连人带狗同时被杀害了。路易和哈贝尔神父也都肯定，这个年轻的德国人已遇害，杀手可能是七角井子和古城子之间地段上的哈萨克人，也可能就是那个俄国鞑靼人。他们对汉内肯的生还已不抱任何希望。

现在我把这个不幸的故事告诉了马林科夫。他听得十分出神，并问了我许多问题。临行时，我向他表示歉意，说占用了他那么多时间，他回答说：“不客气，是我该谢谢你。我一向对侦探故事很有兴趣。”

他记下了我讲的全部细节。

^① 位于哈密西北，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巴里坤山之间。通称七角井。——译注

“我会尽全力弄清事情的真相，”他说，“第一步，我要查清楚1933年9月和10月在和马仲英作战时，有哪些俄国军官驻守在七角井子和古城子之间的这条路上。”

“我觉得汉内肯已经死去的可能性很大。”我答道，“但即使如此，也很有必要找到他死去的确证，了解事情经过的真相。或许可以找到他的日记和其他遗物。”

我还告诉将军，失踪者的母亲，即汉内肯将军的遗孀弗劳·汉内肯曾派鲍肯坎普带了一封兴登堡总统^①的信来寻找她的儿子，已故的汉内肯将军和总统是老朋友。兴登堡此后不久就去世了。

前面我已提到，在我最后一次拜访盛督办时，曾请求他允许我走古城子和七角井子这条大路。我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遇到生活在这一带的哈萨克人，可以向他们打听汉内肯的消息。不幸的是，我打错了主意。我们在这里被扣留了这么长时间，那两处地方之间山谷里的泉水已冻结了，整个谷地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冰，我们那么重的卡车绝对通不过去。但是，我可以肯定，如果哈萨克人真的谋害了一个欧洲人，自觉有罪的话，一旦看到带上武器和卫兵的欧洲人走近他们的帐篷时，他们一定害怕遭到惩罚，会迅速逃往山里去。

① 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于1934年逝世。——译注

十六、在乌鲁木齐的最后时日

临近9月底，我们得到通知，任何收藏品都不得带出新疆，地质和植物标本例外。一辆卡车卖给了盛督办，另一辆因为被一个俄国上校偷卸部件已经无法使用了。车队只剩下3辆车来完成丝绸之路的归程了。我们丢掉了一切可以不用东西。有5箱东西运往驻莫斯科的瑞典公使馆，另外两箱运往北京的一家中国公司。赫尔·西蒙负责寄运这些行李。寄往莫斯科的东西中，有两箱是赫默尔博士在孔雀河畔采集的鸟类标本。

9月27日，一名副官和两名中国秘密警察来到生瑞恒、埃费、陈、龚、赛拉特和仆人住的宾馆，检查托运箱中的东西。他们查得非常彻底。赫默尔在每只鸟的身体里都填上了棉花和棉纱线，再用纸包好，用带子捆好，包扎得非常仔细。警察把每只鸟的包扎都打开了。其实这些小包轻得像羽毛一样，但我们的侦探仍坚持要看看我们是否在鸟肚里藏了金子！

这天我们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们接到命令，要把所有行李一样不剩地搬到盛督办的衙门去。装个人用品、仪器等物的箱子堆放在一个房间里，在另两间房的长桌上陈列着我们在罗布泊古墓的考古发现，有绢、棉织物的碎片、鞋帽、木制陶制器皿、弓箭、礼器等物，这些东西看起来很不起眼。这堆东西在外行人眼里不过是垃圾堆里的一些破烂儿。

戏现在就要开始了。这出小喜剧的编剧就是我们机智的同情者阿布列索夫先生。上午8点30分，探险队全体队员按预定时间

到场。不久，阿布列索夫先生来了，还有他在俄国总领事馆的同事亚西诺夫斯基、斯塔尔科陵和米切尔曼。接着出场的是陈德立，最后才是盛督办。

盛督办神情严肃，巡视了展品，看得非常仔细，显然不想让任何东西逃过他的眼睛。他在每一件展品前都要停一会儿，拿起来反复端详，还盘根问底。我和尤陪着他在桌边转，回答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曾在罗布泊参加挖掘的陈宗器有时也代替我们作些介绍。

我个人最担心的是我自己的行李，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日记、画稿和地图，还有陈在夏天绘制的孔雀河南岸一直到罗布泊一带的湖泊全图，十分出色。尤和龚的箱子里装了他们和贝格曼绘制的穿越戈壁的公路北线图，还有贝格曼画的孔雀河主河道向南流去的支流图，这条支流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地理发现。副官已经威胁过我们，任何这方面的资料都不得带出新疆，果真如此，那么这次探险就白辛苦一场，彻底失败了。我已向阿布列索夫先生谈了我的这种担心。他和往常一样友好，答应去和盛督办谈此事。这时，他抽身走到我身边，悄悄对我说：“你们的私人行李都不会打开。全部箱子都要贴上官方标签，盖上盛督办的印章，证明没有一件是禁运品，都可带走。待会儿你们的仆人可以把箱子再装上卡车运走。”

太好了！到此为止，探险队算是得救了。

现在，戏到了高潮。盛督办摆出一副在台上演戏的架势，右手在桌子上方一挥，说道：“先生们，这些东西对我们毫无价值，对我们省也毫无用处。你们可以装回箱子，我会发给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你们把这些发掘的东西和其他行装带出省界。”

然后，他像傲慢的凯撒一样退席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我们由衷地向总领事阿布列索夫先生表示了谢意，感谢他出力拯救了探险队。他和他的同事们随后也回去了。我们在新疆已呆得够久

了，很懂得盛督办对我们之所以这样客气和宽容，不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是碍于阿布列索夫先生的面子。在盛督办眼里，我们不过是一伙让他感到担心和烦扰的间谍，是不受欢迎的；而总领事却帮他赢了这场战争，如果没有这种帮助，他就得把新疆的宝座让给“大马”了。

离城两三英里有一处临时机场，是年初“大马”烧毁了旧机场后新建的。现在那里又建起一个有400米跑道的运动场。9月30日，在这里举行了大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接到了正式邀请，盛督办在入口处亲自迎接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大帐篷，里面是摆了桌椅的主席台，在一张桌上放着奖品、银杯等物。

新婚的文职省长、俄国总领事和全城的显要人物都到了场，跑道周围聚集着白俄、苏俄、汉族人、维吾尔人、土尔扈特人、哈萨克人等。

我在这里认识了和加尼牙孜阿吉。他是维吾尔人的领袖，当地穆斯林的首要人物，曾去麦加巡礼，还享有一个半宗教性质的荣誉称号——和卓。他给人的印象并不十分愉快，体形粗壮笨重，留着黑胡子。尽管我是用他的语言和他谈话，他也只回答“是”或“不是”。他在那里不和任何人说话。可能他怕说错一个字，就会引起怀疑，遭杀身之祸。

他的处境很难。战争中，他先站在“大马”一边，至少他还是个穆斯林，后来又反对马仲英，吃过几次败仗。他受到盛督办王侯般规格的待遇，有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卫队。但是他的本族维吾尔人并不赞成他倒向汉人。他们憎恨汉人，在祈祷中把汉人叫做异教徒，即“卡非尔”^①，意为不贞洁。盛督办机智巧妙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文职副省长的虚名，其实没有实权。这样就把他拴在了省府，置

^① 为穆斯林对非伊斯兰教徒的通称，即“异教徒”，含有贬意。——译注

于直接监控之下,一点都动弹不得。忠诚的穆斯林看到他进进出出都穿着欧洲人通常穿的米灰色大衣,头戴欧式帽子,十分反感,因为他们认为先知的头饰即头巾,才配得上和卓的尊号。因此,由于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的原因,他遭到了各方面的蔑视。他之所以喜欢保持沉默观望,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我们自己,因为受到了那么多的诋毁,几乎每个人都避开我们,不愿表示什么友好。

这场在亚洲腹地召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绩。有障碍赛跑、接力赛跑、摔跤、马拉松赛跑和一些通常有的体育项目。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这样的运动会就算组织得不错了。帐篷中举办了宴会,饭后我们终于可以脱身了。

第二天,运动会继续进行。盛督办参加了短跑。发奖时,他口若悬河地谈了体育锻炼对保卫新疆的重要性,当然也抓住这个时机说了帝国主义和日本做的许多“好事”。

10月2日,我病倒了,请了萨波什尼科夫博士来看病。他表情很严肃。第二天,他告诉尤该如何护理我的病,要求精心照料。

“是不是斑疹伤寒?”我问道。

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既然你已问起,我就说了,可能是斑疹伤寒,也可能是别的病。如果体温继续升高,必须进我们医院。”

10月5日,我被裹得严严实实地送进了医院。似乎什么事情都在和我们作对。我们原定10月1日启程,可现在呢?我给我的姐妹们写了长长的电文,万一这是最后的诀别,也好让她们思想上有所准备。阿布列索夫先生来看了我几次,电报交给他去发。我脱离危险后,他对我坦白说,电报没有发出去,因为他觉得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让家人担惊受怕。我很感激他,多亏他这样作主了。我的体温一度升到39.8度,幸好赫默尔在库尔勒给我们每个人注射了预防针。

斑疹伤寒——这是唯一没有载人我们事故记录的一项内容

了!“斑疹伤寒”这个词如同第度^①、帖木儿^②和台风一样,让人听起来不寒而慄,它代表着残忍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代表着席卷而来的灭顶之灾。要战胜斑疹伤寒杆菌,就像要抵抗帖木儿入侵或让一支帆船队抗住台风一样,是没有希望的。

我在医院住的时间不长。萨波什尼科夫对我的照顾细致入微,我简直无法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医院里有30张病床,10位俄国医生和鞑靼护士。他们不遗余力地精心照顾我,还对我讲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时间就显得不那么难捱了。

即使到现在,谣言仍在到处传播,像蜻蜓一样嗡嗡不停。有谣言说,我是装病,是要以此为借口,等候沿海某个铁腕人物的到来。有人断言,青海的马步芳将与哈密的尧乐博斯联合进攻,夺取整个吐鲁番盆地。又据报告说,在安西以东的地方,汉人和东干人发生了敌对行动,那里恰好是我们即将取道的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

日子一天天慢慢过去,冬天就要来了。10月10日夜的气温是零下3.2度,而到了12日夜,已降到零下7度了,但这天已是我住院的最后一天了。我的体温已恢复正常,并获准开车回到邮政局长的住所,全体探险队员都在那里等着我,迎接我。

最后几天是在道别中度过的。盛督办欠了我们3500墨西哥元,等了几个月,我们拿到了顶这笔款项的阿勒泰地方开采的金条和一张允许带金子出去的特别证明。带着这种东西到我们要通过的地区,是件很危险的事。

自从萨波什尼科夫宣布我已恢复健康,并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以后,我们认为已排除一切障碍,谁知这种想法过于乐观了。陈德立通知我们两辆客车将在21日出发,盛督办希望我们也在这一天动身,这样,护卫队就可同时照顾两个方面。我们经过反复

① 第度(39—81),古罗马皇帝。——译注

② 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建者。——译注

讨论,决定 19 日启程。就在这时,一个副官来告诉我们,最高当局要我们提交新疆道路状况的详细报告,可是要了解这几条路线正是他们百般刁难,禁止我们去的地方。

16 日下午,尤和其他几个中国人被叫去和盛督办一起开会。过了很久,尤才回来。这当然不是什么好兆头。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我们的返程、两辆客车走的路线和对我们的护卫问题。盛督办说:

“如果赫定博士出了什么事,我是要负责任的。如果他遭到袭击、被人杀害,全世界都会说是我一手策划的,我就臭名远扬了。我必须在我省范围内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今晚我将给辟展^①发电报,命令部队到七角井子和车轱辘泉^②去。命令要到 20 日才能执行,你们可以在 21 日出发。

“你们 21 日动身的事对谁都不要讲,因为哈萨克土匪团伙在集市上有密探,会给头目通风报信,然后就会按密报作好袭击的准备。我还要警告你们,在哈密到安西的路上要严加防范。尧乐博斯报告说,有一个 60 个人的匪帮的总部就设在星星峡。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情况。我建议你们原路返回,从戈壁走。一支 21 辆大车组成的商队,就在最近从古城子到七角井子的途中遭到哈萨克土匪的袭掠,旅客统统都被杀害了。

“在新疆北部和外蒙古的交界处以及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匪帮神出鬼没,活动频繁。那里的苏联当局叫苦不迭,问我对他们该采取什么态度。我的回答是‘杀了他们’。因此,这伙强盗在追击之下,可能已潜入新疆腹地。有一次,苏联飞机扔炸弹,炸死了 80 个土匪。我们已和外蒙古达成协议,在边境两边设警戒哨。汽车公司的车子只能从归化开到哈密,但绝不能再往前走。新疆自己的

① 当地居民称今新疆鄯善县为“辟展”,这里指的就是鄯善。——译注

② 在七角井子附近。——译注

客车可以在检查之后把邮件和旅客送走。”

我们担心，拖住我们的下一个办法将是推迟告别宴会。宴会不开，谁也别想走。但是，17日那天，一个副官拿了一张大红请帖来，上面写着所有被邀请客人的名字，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表示接受邀请。

宴会是在俄式的，美酒佳肴，十分丰盛。盛督办有一个长处，他自己不喝酒，不抽烟，但总让客人自便。宴会上有几个奇怪的讲话。主人第一个讲。他说：“这餐简单的饭菜是本政府为了欢送，也为了再次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斯文·赫定博士而安排的。他曾多次来新疆，研究这里的地理、自然史和考古学。这次他又回到这里，发现了许多文物。他们收集的这些东西带回中国内地经过仔细鉴别后，会对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作出解释，也会引起世界其他地区的关注。除了地理研究以外，赫定博士这次还考察了交通状况，对加强新疆和中国内地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盛督办最后几句话讲得是很体面的：“我很抱歉，由于时局严峻，我们没能给予他理应得到的更强有力的帮助和更好的待遇。”

翻译把他的话说成了俄语，我的答词被译成了汉语。

下面的讲话都非常有趣。大家在餐桌上用外交和非外交语言你来我去的寒暄，十分热闹。督办感谢前塔城领事在这场内战中给予的大力帮助，而总领事却表示不敢贪天之功，并对我们一口咬定，战胜马仲英完全是勇猛的中国将军们的功劳。年轻的土尔扈特王爷说的是蒙古话，他向俄国人表示感谢，说多亏了他们的军队，才把新疆从“大马”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话是不该说的，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南京和其他方面的抗议。但这位小王爷不懂得政治秘密的严重性，一点不知道这样说话要冒多大风险。

最后，当每个人把心中的话都讲出来，我们才认出了谁是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早晨8点钟，尤叫醒了我。他说：“盛督办带着夫人和

女儿来送行了。”

我立刻跳下了床，急急忙忙穿上衣服，连洗脸都顾不上，就往外走，看到这位大人物带着家眷在起居室耐心等着。

督办把他亲笔写的通行证交给了我，授权我们可以不经税关或军队检查把行李带出省去。通行证上最后还威胁说，谁要是不按通行证的规定办事，严惩不贷。

他还送给我两张他自己、他和家人的照片，一大块玉石和一张黑羊羔皮。

最后，他请我们和他一起去参加当天早晨在城外举行的阅兵式。但我们推辞了，说我们还没有吃早饭，过一会儿再去。

我们开车来到阅兵场，所有通常认为的贵宾都聚集在阅兵台上。受检阅的队伍在灿烂的阳光下行进着，约有 1 300 名步兵，后面是 12 个重炮兵连、骑着骏马的骑兵团、一列装甲车，等等。有军乐队演奏，一派节日气氛。督办特别客气，我们走时，他送我们上车，车子一开动，还向我们敬了礼。

最后一天终于到了。这段时间就像恶梦一样沉沉地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现在总算烟消云散了。据说，督办的弟弟和另外几个中国高官要搭乘我们的汽车，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失去行动自由。幸好最后还是决定让这几位先生乘客车走。

我们又一次向亨特尔牧师和天主教传教士们话别。晚上 7 点钟，最后一次拜访盛督办。

两辆卡车停在院子里整装待发。车上放着在阿布列索夫先生帮助下从俄国搞来的汽油，还有给养和行李。最后一个夜晚在我们“牢狱”般的院落里降下了帷幕。

十七、解脱的时刻

1934年10月21日是我们获得解脱的日子，一年前也是这一天，我们离开了北京。早晨8点钟，小汽车和两辆卡车开出大门，穿过汉城的南门，又驶出了回城南关和俄国洋行。各地区之间是由多少有些炫耀的城门隔开的。

我们在俄国总领事馆那里停了车，向阿布列索夫先生道别。他兴高采烈地跑了出来，完全是星期天早晨那种轻松的情绪。他说原来打算在城外10英里左右的地方截住我们。我们后来又在汽车公司营业部停下来和陈德立告别。正在这时，阿布列索夫的车子开了过去，他带了伏特加酒和葡萄酒，准备在路边为我们饯行。最南边的，也是最后的一道门岗，不加任何阻拦就让我们驶出了城门。一离开乌鲁木齐，我们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快。我们坐在舒适的汽车里，轻松地靠在座椅上，又一次看到东边远处天山巍峨的群峰，眼前又是一片壮观景色。我们兴奋地感觉到车轮在滚滚向前，每转一圈，就离乌鲁木齐更远，离南京、北京和自己的故乡更近。

我们没有再见到阿布列索夫先生。显然，他的司机过早拐到另一条岔道上去了，想必他在那里空等了我们一场。我感到很遗憾，没有能够再次感谢他给我们的诸多帮助。

我们沿着熟悉的道路，开往达坂城。天色渐晚，夜幕正向这个村庄袭来。月光的银辉越来越明亮。等到达河岸时，山谷里已经暗了。山谷左侧，有一小段路崩塌了，我们只好3次渡河。第一次

渡河时，我们的小汽车紧随在卡车后面，结果被卡在河当中，6个人把车拖了出来。第二次是要过激流，水涌进了小汽车，又陷在那里不动了。我们只好把能抢出来的东西尽快抢出来，然后用缆绳和一辆卡车把我们的车子从激流中拖了过去。

最后，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三次渡河，在岸上找了一块没有砾石的平地，大小足够支一顶帐篷了。我们在这里建起了第一个宿营地。贾贵端上了羊肉、馕、黄油、干酪和茶。我们又能在露宿时伴随着河水的奔腾声和树丛中的呼呼风声入眠了。

在凉气袭人的早晨，我们驶上达坂城山口的狭窄小路，然后沿着陡坡开了下去。路上我们遇到了运送面粉、布匹的马队和驴队，看来当地的贸易又恢复了。一个月前，两辆俄国的“阿莫牌”汽车由中国司机驾驶，开下了这个山口。由于汽车失控，以飞快的速度冲下山去，翻了车，4个人遇难。

车队穿行在风景如画的红色峡谷之中，扬起一片片云烟缭绕般的红砖色尘土。我们来到了三岔路口，右边的一条道通向托克逊，左边的一条通往吐鲁番。太阳已经西沉，一轮金黄色的圆月冉冉升起，银辉洒遍峰峦起伏、沟壑交错、像撕碎了似的大地。车子一直在顺着山坡往下开，不一会儿，测高仪已显示出，我们已和海平面处在同一高度了。

第二天，我们驶出吐鲁番的东门，很快进入了景色如画的胜金口^①山谷。辟展司令部有一个军官告诉我们，沿途已布置了哨兵，我们可以放心赶路。车队驶过一道道灌渠、一座座掩映在细长匀称的白杨树下的奇妙的桥，走不远便又到了荒秃秃的沙漠之中。我们走了86英里后，便安下了营帐。当晚很冷，最低温度降到了零下8.3度。

我们继续东行。一帮骑马的维吾尔人告诉我们，他们遇到几

① 在吐鲁番以东、博格达山南麓。——译注

个巡逻兵,是为我们扫清道路的。穿过一个个蜿蜒曲折的山谷,我们又在较高的地势上行驶了。

下午5点钟,我们到了七角井子这个要冲地带,已为我们派了50名士兵到这里。指挥官说:“如果你们要沿这条路去哈密,就必须带上20名士兵随车同行。路上不安全,我们要对你们负责。”

于是,士兵们爬到了车子的行李堆上面,我们又继续往前赶路了。月亮升了起来,我们转眼又进入了沙漠。

10月25日,一个天高气爽早晨,我们又开始上路。从计程器上看,小汽车已行驶了7000英里。

又一个夜晚快到了,天色渐渐昏暗下来,等我们到哈密绿洲边上的几家农舍时,已是黑夜了。那里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接待我们。赛拉特开的车走在最前面。我和尤、陈坐在埃费驾驶的小汽车里,紧随其后。车来到架在灌渠上的一座小桥时,十几个士兵跑过来,用步枪对准了我们。他们命令赛拉特停下车,他照办了。我们下了车,问出了什么事,他们反而用傲慢的语气问我们是什么人,要到哪儿去。他们派了一个人骑马到尧乐博斯那里去报信,并请求指示。我们只好等着。士兵们扣着扳机,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对我们开火。

过了一会儿,回话来了,说我们可以开进城去。一群士兵爬上了卡车,几个士兵站在小汽车两侧的踏脚板上。我们慢慢驶进黑洞洞的街道,街上只有店铺的油灯闪出一点点黯淡的光线。汽车停在尧乐博斯住处的门前,他就站在那里。这位将军就是人称“虎王”的尧乐博斯汗,是哈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四周站着30个士兵作保镖。我向他打了招呼,交谈了一会儿,便请他坐进我的车。但他回答说,他必须先去找由汉人担任的文职地方长官刘先生。刘将在他的陪同下到他为我们准备的住处拜会我们。

我们驱车来到2月份曾住过的房子那里。和我们同时离开乌鲁木齐的两辆客车,这时已停在那小院子里。

不一会儿,有权有势的虎王和刘长官到了,和我们交谈了半个小时。两辆客车要在哈密停留几天买点食物。我们本该再等一天,因为尧乐博斯要为我们设宴洗尘。我告诉他这一类宴席我们在乌鲁木齐已经吃足了,明天是10月26日,我们必须在这一天动身前往安西。于是就决定,第二天上午10点钟和尧乐博斯共进早餐,中午我们继续赶路。去安西的路是安全的。骚扰星星峡一带的土匪团伙已被赶走。安西的司令官要求用电话通知他我们到达的时间。南京政府已命令他要尽好地接待我们。

我前面提到,鲍肯坎普曾被汉内肯的遗孀派到新疆寻找她的儿子,他在哈密呆了3个月,就在我们到的前一天才离开,现在显然是在赶往安西的路上。他走时匆匆忙忙,像是逃跑一样,在他房里还留下两箱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要追捕他,就可藉此拖延时间。但是,尧乐博斯看来对追捕一事毫无兴趣。当我问到他是否有希望找到汉内肯时,他以外交辞令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他的尸体,所以不能发誓说他已死了。但是我想他不会还活着,我觉得他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我们离开乌鲁木齐时,有14个人要求搭我们的车,其中几个还愿出大价钱,但他们都遭到了断然拒绝,因为我们接到官方指示,我们无权载送旅客。其中一人是古斯塔夫·泽德尔鲍姆,他以去玛纳斯为由,骑着两头骆驼离开了乌鲁木齐,然后又掉头返回哈密,和我们同时到达。但是,在哈密西门,他跟上了一支商队,和他们绕城走了一圈,然后在城外东边的沙漠里宿营。如果他不抛头露面,和旅伴继续东行,也许可以一直到达归化。但是他太莽撞,自己跑到哈密集市上去买东西。我们走后,他是哈密唯一的欧洲人,自然逃不过秘密警察的眼睛,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随后又被送回乌鲁木齐,直到后来通过外交上的交涉,他才获得自由。

我们要赢得真正自由,还需闯过第二天的最后考验,这指的是和尧乐博斯共进早餐。桌上摆满了抓饭、烤羊肉、肉包子和茶。尧

乐博斯用维语讲了话，我作了答辞，心里仍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在这最后关头又被扣留。汽车公司的两辆客车的乘客也被请来进餐。他们一再请求与我们同行，经额济纳去归化，一旦遭到土匪袭击，我们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武器保护他们。但我们又一次坚决推辞了。我们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住处，整好行装，在尧乐博斯和刘的陪同下，驶离了哈密。他们跟我们走出十里地，便停下来向我们作最后的告别。整个车队开足了马力向前飞驰，恨不得离这两个危险人物远远的。

尧乐博斯送行时乘的卡车以及另一辆相似的车，是盛督办派到哈密来接和加尼牙孜阿吉的家眷的。尧乐博斯放走了一辆车和几个家眷，却扣下了另一辆车，还扣下了和加尼牙孜阿吉的一个兄弟、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妾作人质。

我们很快走完了这片耕作地带。在北面隆起的天山山嘴，如一个庞大的岬角插进这沙漠的海洋。

我们行进在哈密和安西之间古老的商路上。道路有时还算好走，有时难走，常要穿过干硬的黄草地带。晚上，我们在一个叫“长流水”^①的小村庄宿营，为第 109 号营地。

我们在离开乌鲁木齐时带了 500 加仑汽油，现在只剩 200 加仑了，到安西是足够了。但如果到安西后不能再搞到汽油，情况又会怎样呢？在哈密和安西这两个城镇之间杳无人迹的、无以名状的荒漠中行路，我们并非毫无畏惧，如果作最坏的打算，那就把车丢在安西，改换大车或骆驼赶路。

眼前一根草也看不见。沙漠如平静的海面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只有在北边还可看到山峦的淡紫色轮廓。我们遇到一个骑马的邮递员。他告诉我们他每月挣 16 块银元，但必须自己找马或驴，自己管饭。倒霉的差事！在这样一条鬼域般的、毫无生机的路

① 在哈密东南方向。——译注

上打发日子,这个人或者有一颗钢铁般坚强的灵魂,或者根本没有灵魂。

尽管最低温度已降到零下 5.8 度,但正午的日头仍火辣辣的。谁也别想找一棵遮阳的树木。有时候,沙漠的地表坚硬,车子开得很平稳;有时则颠得厉害,西北方向的山脉轮廓越来越淡,最后一点也看不见了。一路上我们不时看到破旧土房的断垣残壁,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在一座小山丘上残留着烽火台的废墟。到了苦水^①,道路开始分岔,右边的一条去敦煌,左边的一条去安西。我们宿营的苦水村已夷为平地,但有几个邮递员住在一个小棚子里。他们给我们讲了下面一段故事。

就在“大马”第二次沿这条路开往哈密之前,有 11 个来自哈密的维吾尔商人载着从安西采购的货物正往回走的时候,途中在星星峡获准可以通过甘肃和新疆之间的前沿阵地。我们的朋友、“大马”的参谋长黎海如当时是哈密的地方长官。他下令袭掠这 11 个人的商队。命令执行了。11 个人全部被杀,货物被抢。这一罪行在哈密传开后,死者家属要求赔偿,黎宣称商队是土匪团伙袭击的,此事他不能负责。这起事件对新疆已燃起的叛乱之火,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2 月 20 日左右,我们在吐鲁番,曾到黎某那里作客,如果那天他脾气不好,很可能也像对付这 11 个商人那样对付我们,但他没有,也许是我们的武器引起了他的敬畏心理,也许是因为“大马”在乌鲁木齐吃了败仗,他已自感处境岌岌可危了。

10 月 28 日,艳阳高照,我们迎着闷热的南风早早上路了。沙漠表层坚实,上面覆盖着一层坚硬的砾石。眼前是一片缓缓起伏的土地,就像海上行将平息的浪涛。左右两边都是低矮的山丘。我们遇到一支由 40 峰骆驼组成的商队,运载着茶和布。商队的主人是来自于阗的一个商人,8 年前自老家出走,往肃州运货。战乱

^① 在星星峡西北方向。——译注

使他无法踏上归程,直到现在才敢上路。商队的驼铃声如同葬礼上的丧钟一般凝重。

我们驶上 800 英尺高的坡地最高处,一眼望去是漫无边际、令人胆寒的荒漠。见不到一根草,也见不到一点野生动物的痕迹。这是死寂的家园。我们不时可看到烽火台的遗址或断垣残壁,这是过路行客可以暂避暴风雨的地方。沙泉子是这条路上屈指可数的一个好地方,有优质的水源。

从苦水行驶 30 英里后,我们爬上了 1 625 英尺的高地。到达小红柳园时,海拔已是 5 200 英尺了。接着,道路在低矮的丘陵、峰峦和坡坎中间向前伸展,随后又驶上一条凹陷的窄道,两边是细粒结构的灰色花岗石、伟晶岩和结晶状板岩组成的岩壁。山势越来越高,我们驶上海拔 6 040 英尺的一个小山口。右侧是星星峡的一座小寺庙,已荒芜废弃。沿路无数的敖包指明通向这块佛教圣地的道路。寺庙已无僧人管理,只有泛红的残垣断壁淹没在灰色的岩石中。近处的一个小村子只有几间农舍,唯一的住户是邮政所长。他手下的邮差都外出送邮件去了。他告诉我们,前一天晚上,几个从安西来的士兵曾到这个村子来接我们,因为听不到一点关于我们的消息,转身又回去了。

寺庙周围的山坡上全是从前碉堡的遗迹和围墙。两个省之间的边界线就在这里,如今已没有哨兵守卫了。

我们度过了气温为零下 8.2 度的夜晚,第二天一早便启程了。沿路可看到无数的敖包和金字塔形的土石堆。路面时而为沙地,时而为砾石。车子有时穿行在断块岩之间。过了一会儿,终于走完了山谷,眼前的地形变得开阔了,向南望去,伸展得好远好远。我们从隘口来到了平坦的原野,偶尔可看见星星点点的几丛杂草。行车路上发现一处报废的采金场和一处曾经战乱的明证——壕沟。

车队一直往东南方向行进。右边,很长一段路都可看见东西

走向的一条山脉,这就是北山的一部分。最后,我们到了这条山脉的东端,它转眼便消失在我们身后了。在浅谷中可偶尔看到些草。我们遇到一支由44峰骆驼组成的商队,正把面粉从安西运到哈密去。看来当地的贸易又有了起色。在大泉^①住着一个邮政所长及他的家人,还有3头驴。我们老远就看到路两边的小山上各有一座小小的烽火台。下一个村子是小泉,已无人居住。现在我们又置身于丘陵地带,绘制地图的速度只好放慢了。在几百码以外的地方可看到一群羚羊。

第112号营地设在海拔6080英尺的平地上。我们从小泉带了些水来备用。

10月30日,我们醒来时发现云层密布,异乎寻常,但到日出时云已散去。只听见车外南风劲吹,发出阵阵响声。红柳园以前是个大村子,现在已变成一片废墟,只住了一个邮政所长,还有几条狗。我们一路上看到的荒芜景象全是“大马”的“业绩”。他所到之处,连一间最小的农舍都不会放过。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毁掉了。1933年,他从安西开拔到哈密,走的是这条路,他毁掉了所有的村庄和农舍,以阻止南京方面派军队来追击,同时也为防范他自己的士兵开小差逃回家去。

上午11点刚过,我们惊奇地看到了一辆汽车在尘土弥漫中开来。这是来表示欢迎我们去安西的。驾车的是车主本人,一个叫赫尔·坦贝格的波罗地海沿岸人。他受雇于奥本海默肠衣公司,带了5辆汽车到安西采购新疆的羊肠。在他手下干的还有张家口传教士的儿子阿尔姆布拉德。车上坐的第三个人是一个德国人,叫赫尔·保克,负责欧亚航空公司在安西的汽油库。在中国人中要提到的是一位罗先生,他代表县长和司令官来欢迎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我们便结伴同行。车行驶在小岩脊和岩坎脚下,又越过了平

^① 在甘肃西端。——译注

坦的沙漠带,经过了几个村子,还遇到了一些小商队和牛车,前去供奉疏勒河^①河神的龙王庙。4点钟时,我们到达疏勒河右岸。

河两岸的地势平坦,寸草不生。河分成两条支流,部分河面结冰了,河的流量每秒钟只有27立方英尺。我们把卡车停在岸边,自己则坐小汽车渡过了河,往下走的路很糟,路边是筑有渠埂的灌渠,车子直奔围有雉堞状城墙的安西。到达西城门时,士兵们让我们停车,通报后才让我们进去。

随后,我们来到县长的衙门。他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准备好5间房。正在他和我及尤交谈时,赫尔·保克和我们的朋友鲍肯坎普也到了,鲍肯坎普用了15天时间,骑马从哈密赶到了安西。

安西是一块境况不佳的小绿洲。总人口估计有900户人家,其中300户住在城里。安西还有按西宁马步芳命令派驻的150名东干士兵。敦煌有驻军50名,地方比安西大,也更繁华些。驻军靠农民养活,无任何补偿。因此,农民要养活的士兵越多,就越穷,越悲惨。

据另一种资料估计,这块绿洲有居民6000人,其中4000人住在城里。当然,在一个无所谓人口普查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得到关于人口的准确数字。再往东走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税吏,他对我们说得很肯定,整个安西地区住着940户人家,玉门有960户,而敦煌有2500户,嘉峪关有100户人家。这些小绿洲城镇一般都有一两所学校。

在安西,针对我们的传闻和谣言如雪片一般飞来。城里的欧洲人听说我们被“大马”抓起来,已押解到喀什。几百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正从西安和肃州开来,准备夺回新疆。为此,肃州新建一个飞机场,已运到100000加仑汽油。我们的历险显然还未结束。在东去的路上,我们肯定会遇到这支部队,它的指挥官也许需要我

^① 位于甘肃西北部,是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流之一。——译注

们的经验,有可能强迫我们往回走,作他们的向导。

如果我们再早一些过星星峡,有可能倒霉。有 8 个土匪一直埋伏在那里。他们在哈密的一个密探报告说,和阗有一支 70 峰骆驼组成的商队,将载着毯子等货物和金砂离开哈密去安西。一天,商队来到星星峡狭窄的山谷时,匪帮发起了进攻,杀了几个商人,抢走了骆驼和贵重货物。商队的幸存者逃回哈密去了。哈密和安西都派出士兵去追击。他们抓到 4 个土匪,并押送到安西,不日即将砍头示众。其余的土匪带着抢来的东西逃进了马鬃山,军队的巡逻兵正在追捕他们。

赫尔·保克当时正在忙着建设上海—乌鲁木齐—柏林这条航线专用的新机场。该机场东西长 1 100 码,南北长 850 码。已经雇了 150 个工人。目前,飞机可从肃州飞往哈密,时间为两个半小时。今后如果预报天气不好,就可在安西降落。眼下还没有通航。

1883 年,贝莱·塞切内伯爵率领洛齐和克雷特内在跨越了整个中国内地和甘肃后,到达了安西。当时,地理学界都认为他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许多年前,我在布达佩斯时,多次听到塞切内和洛齐谈起那次硕果累累的出色旅行。现在,事隔 50 多年后的今天,我自己也置身安西,虽然感到离家乡还不是那么近,却也已经踏上了坦途。

我们从安西出发后,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探险。汽车西行经过敦煌,穿越北山和噶顺戈壁^①的南部地区,然后到达罗布泊。我们之所以能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得力于欧亚航空公司负责人的大力帮助。他答应我们可从赫尔·保克管理的仓库中随意购买汽油和润滑油。

总之,我们这些从新疆逃脱的人,经过了无数挫折和磨炼后,

^① 在新疆哈密盆地东南,为干燥的砂碛地带。又称噶顺沙漠或伊勒呼玛沙漠。——译注

现在又自愿回到这个省,但仍然很有可能被关进监狱。果真如此,我们无疑会死在阴冷潮湿的监狱里,直至尸体腐烂,因为他们更有理由怀疑我们是间谍。

不过,这次穿越陌生的亚洲腹地之行,在地理学上与罗布泊问题密切相关,有关内容我将在《游移的湖》一书中详述。



十八、丝绸之路

公元前138年，西汉的武帝派遣张骞率领一百人组成的使团，出使月氏。这个曾定居于河西的民族被匈奴击败西迁后，在大宛（即今之中亚费尔干纳）定居下来。

匈奴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汉武帝之所以派使臣出使西域，就是为了赢得月氏的合作，共同对匈奴作战。张骞未能圆满完成其外交使命。他历尽艰险，被匈奴囚禁十年之久，最后重返故里，向武帝提出了一份使他极感兴趣的出使见闻报告。

张骞不仅向汉武帝陈述了今日新疆所在地诸绿洲和百姓情况，而且禀报皇帝哪些路线可以通向西域诸国、印度、波斯和一直延伸至里海的广袤地域，还介绍了那些具有高度文明的各民族和丰富的资源情况。武帝立刻明白了这些情报对于中国贸易的发展和向西扩张势力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张骞告诉武帝的另一则消息是，中亚大宛有一种奇特的“汗血马”，是不可思议的牡马与牝马所生。

从前，皇帝的骑兵也和匈奴一样，乘的是蒙古草原小马。现在，他打算用大宛的汗血马改进当地的马种，建立一支占优势的骑兵，这样就能很快打败匈奴了。

汉武帝派了几个装备良好的使团去大宛，目的就是要得到一批良马，但都空手而回。

最后，武帝又派了一个使团去，给大宛王送去千金和金马。结果，使臣被投进了监狱，虽然他们设法逃了出来，谁知在归途中还

是被杀害了。

这起暴行传到汉武帝那里，他决心复仇，讨还血债，派遣了一支有6 000 骑兵在内的军队去征讨大宛。在穿越敦煌以西那令人恐怖的、滴水不见的沙漠时，丧失了大部分兵力，剩下的残部抵达大宛时已狼狈不堪，自然就打了败仗。整个军队只剩下十分之一活着逃回敦煌。

武帝闻讯，越发恼怒，又筹集了一支6 万人的军队，还有3 万匹战马以及运载供应的牛、驴、大车和骆驼。这支军队有一半到达了目的地，包围了大宛的首府，迫使大宛王和他的臣民献出了30 匹汗血马和略逊色但仍属良种的牝马。中国的威望保住了，武帝为改良本地马的繁殖找到了种马。

载于汉朝史书上的这两次远征，使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文明，由此为物资、艺术和思想的交流开辟了新的道路，它对佛教传入中原王朝也是举足轻重的。

正是由于张骞这位最伟大的中亚地理探索者，凭藉他的智慧、勇气和才能，才发生了这一系列伟大事件。

与此同时，匈奴已被赶出甘肃南部，一条与西域各国相连的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从秦始皇开始修筑的长城，由汉武帝继续向西延伸，并筑有烽火台，以保护这条道路和来往的贸易。20 年前，考古学家斯坦因^①爵士曾仔细调查并记述了这条皇家驿道以及沿途的烽燧和防护设施。

中国内地沿这条皇家驿道出口的商品中，无论在数量或地位上，都没有哪一样能与华美的丝绸相媲美。两千年前，中国丝绸是世界贸易中最受崇尚、最受欢迎的商品。

^① 斯坦因(1862—1943)，英国考古学家，探险家。曾受英属印度政府委托，四次赴中亚探险(1900—1901, 1906—1908, 1913—1916, 1930)，这里显然指第三次探险。——译注

大约在公元100年,马其顿丝绸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派其代理人到新疆。他们来到生产丝绸的赛里斯人^①的故乡,回去后给他们的主人带了一份旅途见闻。这份见闻以后落到推罗的地理学家马利诺斯手上,转眼又成了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境域志》(又译为《地理学指南》)所引据的珍贵史料。

公元220年,汉朝消亡,继之而起的是三国并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处于分裂割据、衰落萧条之中,但丝绸贸易却未受什么影响,从太平洋沿岸到地中海这条漫长的商路上,依然在继续进行着。直到公元260—280年,楼兰这个中国城镇,仍是市面繁荣,生活富足。1900年3月28日,我有幸在干涸的罗布泊以北的方向发现了楼兰王国的遗址。楼兰是交通大动脉上的一座要塞,是驻兵的重镇,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商队要到楼兰,必须要从中国文明圈最西端的前哨敦煌通过令人胆寒的漫长的荒漠地带,然后才能到达罗布泊。楼兰是塔里木盆地的第一块绿洲。

孔好古教授翻译了我找到的、后保存于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的文献^②,他曾谈起过这条古老的世界之路。这条路向西经过沙漠和草原,直通和阗,然后到印度、波斯和欧洲,向东则经敦煌和肃州进入中国内地。

我曾在楼兰古城一间房屋里发现了丝绸的碎片,有黄色的、海绿色的和深蓝色的。在当地发现的一封信中提到,为楼兰的居民买到的4326(?)大包丝绸。正如孔好古所说,“这说明那里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这种经由敦煌运来的丝绸对楼兰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要用丝绸向邻国交换麦子。

^① 古代希腊、罗马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赛里斯”一词指“丝”,中国因向西方输出丝绸而得此名。——译注

^② 见《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散物品》(1920年)一书。——译注

后来,不仅经楼兰的丝绸贸易中止了,而且连城镇本身也被居民遗弃了,原因是,曾是这整片地区水源的塔里木河流下游,约在公元330年改道向东南和南方流去,形成了喀拉库顺湖,也就是1876年普尔热瓦斯基^①发现的南罗布泊。

在楼兰被废弃之前,大部分丝绸贸易已开始从海路运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镇。

楼兰终究被人们完完全全忘记了,仿佛已从地球上清除了一般。1273年,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东方之行中,曾在离罗布泊以南不远的地方路过一座城镇,这位威尼斯人自然一点都不知道,楼兰古城已沉睡了1000多年了。自此以后,楼兰又沉睡了快600年,终于从长眠中被突然惊醒了。通过对楼兰遗址的屡次发掘,人们对古代世界道路和2000年前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有了新的认识。

我已经说过,中国人把西安经陕西和甘肃乃至长城西端门户嘉峪关的这条伟大的商路,称为皇家驿道。由此继续西行至喀什的这段路仍称为“天山南路”,新疆省天山以南的地区也沿用这一名称。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②提出的。他在一部关于中国的名著中使用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名词,并进行了论证;在一张地图上还提到了“海上丝绸之路”。1910年,阿尔伯特·赫尔曼教授出版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著

① 普尔热瓦斯基(1839—1888),沙俄总参谋部军官。1876—1877年赴新疆考察,重点为罗布泊、天山东路和阿尔金山脉,将喀拉库顺湖误认为罗布泊,由此引起罗布泊位置之争。——译注

② 李希霍芬(1833—1905),德国著名自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著有《中国——我的旅行志研究》(三卷,1887)及《中国地图集》(五卷,1885)。曾就罗布泊位置问题与普尔热瓦斯基展开争论。——译注

作，书名即为《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路》。

从西安往西北，再往西，直至敦煌地区，这一段的丝绸之路只有一条路线。从敦煌或玉门关往西行，正如赫尔曼所指出的，分成三条路：一条通过和阗，一条经过楼兰，还有一条走过北面的哈密和吐鲁番。在新疆的西部又开始分出另外一些支线。此后一条路经过伊塞克湖，乌孙人通过货物交易成了丝绸贸易的中间人。另一条路通过费尔干纳到撒马尔罕或塔什干，再经过威海沿岸的古奄蔡国土，然后从乌浒水即阿姆河的古河道乌兹博伊河至里海，再继续北上，沿库腊河至法息斯河、里海和拜占庭。

第三条路经月氏或吐火罗故地、大夏、木鹿^①，再过安息都城赫卡托木庇鲁斯^②、米提亚都城埃克巴坦那和帕尔米拉，到安条克或推罗，那里的丝绸交易非常发达。

赫尔曼还提到，有一条从莎车(叶尔羌)开始的古老丝路，它越过葱岭(帕米尔)到达月氏；另一条则经兴都库什山的悬道，到达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喀布尔、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布什尔或塞流西亚，然后抵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并在那里和埃及进行易货贸易。

毫无疑问，早在汉武帝之前，中国就已出口丝绸，在古代希腊殖民地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就曾发现过丝绸，亚历山大的战略家、海军统帅尼阿库斯也曾提到过从北方运到印度的“赛里斯布”。

然而，丝绸这种既易于运输、又深受欢迎的商品，却没有在中国的丝绸之路上留下多少兴盛的痕迹，而且越是深入亚洲腹地西部，随着丝绸从几条不同的商路分开运输，痕迹也就越难发现了。

上文中已提到，1901年我在楼兰遗址发现过几块丝绸碎片，

① 又译为谋尔夫，1937年以后更名为马雷，在今土库曼斯坦共和国境内。——译注

② 即《汉书·西域传》所载之安息国王治所番兜城。——注

可能这就是中国境内古丝路上发现最早的丝绸了^①。1906年和1914年,斯坦因又在老地方发现相当数量的丝绸遗物。法国赴且兰(帕尔米拉)^②的考古探险队曾在古墓中挖掘到中国丝绸,普菲斯特对此有记述^③。

科兹洛夫^④在他最后一次探险旅途中,在北蒙古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丝绸。福尔克·贝格曼1930—1931年在额济纳河畔发现了汉代文物,这批收藏品中就有不少丝绸碎片和一些其他织物。1934年春,我们沿孔雀河到新罗布泊去。我和陈宗器在楼兰繁盛阶段末期墓葬中发现一名青年妇女身上的丝绸裹尸布。与此同时,贝格曼也在库姆河以南沙漠的古墓葬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类似遗迹^⑤。

以下的章节将介绍从安西至西安长约900英里的一段丝绸之路。我们发现,从安西经北山,然后沿着新罗布泊北岸和孔雀河,直至库尔勒,也是这段丝路的一部分,它长约522英里,途经之处大都是鲜为人知的陌生地方。此行我又有机会重返这个路段,先是坐船走水路,然后换乘两辆汽车,穿越北山。在《游移的湖》一书中我对此有所记述。

丝绸之路全程,从西安经安西、喀什噶尔、撒马尔罕和塞流西亚,直至推罗,直线距离是4200英里,如果加上沿途绕弯的地方,总共约有6000英里,相当于赤道的四分之一。

① 孔好古关于楼兰的一部著作中刊有一张这种发现物的照片。——原注

② 在叙利亚境内。——译注

③ 见1934年巴黎版《论且兰织物》——原注

④ 科兹洛夫(1863—1935),俄国探险家。曾6次到中亚地区探险。1923—1926年(最后一次),曾在蒙古土谢图汗部诺颜山下发掘古墓,这是最早发现的匈奴贵族墓葬。——译注

⑤ 福尔克·贝格曼:《罗布泊沙漠中新发现的墓葬》。——原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结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2000—3000年前,在西安、洛阳和其他一些大地方的重要贸易中心,中国商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由他们的商队往西运送的无数大捆丝绸,到何处才是其旅程的终结。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第一个转手人那里拿到货款。吐火罗人、大夏人、安息人、米提亚人和叙利亚人再将这些贵重的货物送往更远的地方,但只有推罗和地中海其他港口的腓尼基水手才知道罗马是其主要市场。

罗马贵族用丝绸打扮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却根本不知道如此受欢迎的织物源自何方。他们只知这种 *sericum* (绸缎) 和 *serica* (丝织物) 是住在亚洲最东边的称为“赛里斯人”(制丝绸的人)的民族生产和出口的。对他们来说,知道这么一点就足够了。拉丁语中的 *Silk* (丝绸),显然源自汉语的 *ssu*、*sse*、*sse*。在朝鲜语中为 *sir*。

因此,丝绸成了连结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出现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商路。

中国编年史也和其他史料一样,对于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中丝绸路上丰富多采而又光怪陆离的生活,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但是,从本世纪头 30 多年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断出许多情况。我在《游移的湖》中还会谈到沿古丝路所存的贸易组织、客栈、避难地方、哨兵和运输护卫、行进的军队、使者和香客,谈到沙漠最干旱地区水的输送、在语言不通的各区域和帝国之间边界线上的翻译、税卡和检查;牛、驴、马和骆驼等通常的运输工具以及骑马送邮件的信使。我还会谈到长城以及还可指明里程的烽火台。

我在引言中提到我给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曾强调了复活古代皇家驿道的重大意义。这条路曾在若干世纪中把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我们现在所以置身于荒原,就是为了要研究把中国内

地和亚洲腹地连结起来的这条纽带,并找出如何改进或维修才能使它适应大规模的机动车交通。我们离开乌鲁木齐踏上归程后,才第一次来到了真正的丝绸之路。以下几章就是谈这方面内容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看到了长城,它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之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条丝绸之路最萧条的场景:见不到一点生机,商业已是奄奄一息,一路上的村镇,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在一贫如洗和朝不保夕的惨境中,人口越来越少。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看到过去那一幅幅丰富多采、辉煌繁盛的画面,那川流不息的商队和旅行者为每抵达一个新的绿洲而雀跃欢腾的景象。如今一路上我们每天都能遇到邮差,他们把信件放在皮袋里,挂在马鞍后,套在马脖子上的一串銮铃发出清脆的声音。此情此景不由使我们想起曾在这古道上回响了 2000 多年的美妙旋律。

我们又一次恍然听到了如流的岁月拍打着双翼疾驰而过。

下面几个数字可使读者了解古丝路如成为公路会是怎么样一番情景。从 1934 年 12 月 18 日至 1935 年 2 月 8 日,我们用了 53 天时间,才走完了从安西到西安的 930 英里路程。其中 35 天时间是在路上奔波,算起来我们的平均速度为每天只走 26.5 英里。绘制地图,标出房屋、墙垣、花园和又深又陡的狭谷,要用去很多时间,不然我们就走得快多了。到达西安的前一天,不需要绘图,可是路面一直很糟,这天的行程是 100 英里。可见,如果路上无需绘图,那么从安西到西安这段路程,就可缩短很多时间了。

我自己并不反对沿着丝路晃晃悠悠放慢步子走。这样一来，我就有充分时间观察路两边及周围的地貌，了解城镇和乡村的生活、沿途风土人情及交通。总之，我们目睹的全是真实情况。

但是，我也乐意承认，我的时光大部分是在幻想中打发掉的。我想象着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情景，憧憬着技术进步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灿烂前景，幻想着人的创造力将得到空前发展，使人为之目眩。

我已经讲过，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之内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修筑适合交通需要的道路，新疆的状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是极不稳定的。我已经从中国的不同渠道听说，政府已经开始此项巨大的计划，我为此感到高兴。首先动工的是西安至兰州的铁路。中国目前的财力还不允许把铁路线延长到经安西至乌鲁木齐和喀什噶尔，但还是有很多人支持这样一项计划。无疑，政府应该首先着眼于公路，因为修筑公路不仅可大大降低费用，而且所需时间也很少。

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仿佛已看到一条崭新的公路穿越草原和沙漠，一路上有无数的桥梁架在河川小溪和水渠沟壑上，仿佛路已筑到安西、敦煌、罗布泊北岸，然后沿着孔雀河到库尔勒，再继续前行至库车、阿克苏和喀什噶尔。公路的路线会忠实地沿着古代丝路上商队和车轮留下的足迹和车辙向前延伸，到了喀什噶尔，也绝不意味着它已到了尽头。

据说，俄国人正在修建或已建成从奥什^①经捷列克达坂^②到喀什的一条公路。不管怎样，修筑一条九曲回肠般的公路，越过海拔12 000英尺的山口，这对现代筑路师来说，并不是什么作不到的难题。

① 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离新疆西端很近。——译注

② 这是吉尔吉斯共和国和新疆交界处的一个山口。——译注

在奥什已可以看到俄属突厥斯坦原有的一些公路。沿着这些公路,可以毫不费力地安全到达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木鹿,再越过伊朗边境到达德黑兰,然后经克尔曼沙到巴格达。伊朗的公路非常好,经叙利亚沙漠到大马士革或阿勒颇的公路也很好。至此,公路穿越小亚细亚,到达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进入欧洲后,旅行者无论想到什么地方,都很方便了。

这条漫长的公路要成为一条连续的、完整的路,没有俄国方面的真诚合作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能作出必要的财政上的牺牲,苏俄又持理解态度,这项事业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技术成就相比之下,就显得很容易了。的确,和中国人完成的另一项建筑——长城相比,筑路就更是微不足道的事了。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汽车旅行爱好者可以驾着自己的汽车从上海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到喀什,然后穿过整个西亚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经过布达佩斯、维也纳和柏林,到达汉堡、不莱梅港^①、加来^②或布伦^③。如果这位车手在走完了直线距离为6 600英里或实际上因绕弯而走了8 000英里之后,终于安然无恙地驾着他那状况尚还可以的汽车到达大西洋海岸,那么,他也该过足车瘾了,起码在一段时间内不会想再开车了。

但同时,这位车手也会有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历,他以最近的路线穿越了整个旧世界的横断而,完成的是一次最有趣、最有教益的汽车旅行,也是这地球上最好不过的一次旅行。

待到归来时,他头脑中充满了各种回忆:风景如画、人潮如涌的中国内地,戈壁滩边缘上的绿洲,敦煌和楼兰之间神秘的大漠,野骆驼那孤寂荒凉的故乡。他眼前会掠过那游移的湖泊和那刚在

① 德国重要大港。——译注

② 法国北部港口。——译注

③ 法国西北岸的海港。——译注

孔雀河古河岸上重新长出的植被带。他会目睹塔克拉玛干北缘上连绵的沙丘和天山脚下塔里木人的绿洲。亚洲腹地的夏日会烤得他发烫，沙暴那鬼哭狼嚎般的怪声和冬日暴风雪的呼啸尖叫声，会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会和徒步或骑马的过路行客以及在路边静静地行进的骆驼商队结成萍水相逢的朋友。

从捷列克达坂往西，他会保留下对另一个世界的记忆——撒马尔罕帖木儿时代所建的华丽的清真寺和陵墓；布哈拉的一座座神学院，那里可看见鲜艳夺目的彩陶穹顶和尖塔交相辉映；依然保持着学问和知识传统的木鹿；建有伊玛目里达陵墓的清真寺——那里仍是伊朗全国朝觐者汇集的地方；作为阿吉^①巴巴故乡的波斯这方浪漫的土地；作为哈里发城邦和《天方夜谭》中主要场景的巴格达。

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他开始领略喧闹紧张的西方生活，那时就会留恋亚洲沙漠地带那种出奇的寂静安宁的气氛。可是，当他站在大西洋海岸上，任凭那清新的海风吹透他塞满沙尘的肺叶时，就又会满怀喜悦的心情了。

但是，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游乐而建筑的。它应该起到比这更伟大的作用。这条路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它将连结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在这因怀疑和妒忌而使各国分离的时代，任何一种预期可以使不同民族接近并团结起来的事物，都应得到欢迎和理解。

有些人说，这样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们不应忘记，这样的计划两千年前就已实施，西安和推罗之间的

^① 伊斯兰教对曾赴麦加朝觐的教徒的尊称。——译注

交通在丝绸之路上持续了达 500 年之久。丝路所经之地，许多国家和帝国之间不知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的战争，但是，和平往来却并未因此而中断，因为大家都懂得，这条世界贸易中最伟大最丰富多采的大动脉是最有利可图的，是极端重要的。

人们会去探索比起今天要容易理解得多的新领域，最落后的亚洲也会再次进入文明和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并使用上现代交通手段，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起一座丰碑。

当驼铃和马銮铃被代之以喧闹的汽笛和喇叭时，昔日的浪漫风情就所剩无几了。不过，浩瀚的亚洲腹地，还会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古老的交通工具，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平静，也只有飞机才能偶尔打破，因为除此之外的任何机动车都无法进入。从克拉斯诺沃茨克^①经撒马尔罕至安集延的铁路，就丝毫没有影响西突厥斯坦^②古老而美妙的风土人情。

我们正是带着这些想法，开始了沿着丝绸之路漫长的东行旅程。昔日的壮景一幅幅沉入西方的地平线，而新的灿烂辉煌的景象每天随着初升的朝阳，一幕幕展现在东方的天际。

① 位于土库曼斯坦共和国西端。——译注

② 泛指原俄领中亚诸国。——译注

十九、奔向长城

1934年12月14日，我们顶着令人窒息的风沙回到了安西，结束了在被上帝遗弃很久的沙漠中的探险旅行。在安西休整的几天中，我们修理了汽车，重整了行李并装了车。4天后，车队又出发了。我们驶出城南的绥远门，一小时后来到了三叉路口：去敦煌的往西拐，去中国内地的则经玉门往东走。

南边四分之三英里处，隆起低低的山脉，北边是披着深浅不同的黄色的草原。我们已踏上真正的丝绸之路，一路上全是覆盖着细沙砾的荒漠。南山的身影越来越近，而北山已越离越远，只隐约可见其轮廓了。左边有一条路，笔直通向安西的东门，但这时已被流沙堵住了。我们走的这条路线看来是一条被废弃的死路。不过还可不时看到满载柴火的大车或几个骑驴赶路的人，还遇到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徒步前行，他们又唱又说又笑，在这样贫困凄凉的土地上，居然还有心思说笑，真不可思议！根据我们所听到的，安西的驻军当天要带走收割上来的全部麦子和130头羊，不付任何酬金。我们很有可能在路上遇到新部队，会被那些半野蛮的东干暴徒抢得精光。

在荒无人烟的小王村^①，我们看到了东去路上的第一个邮政所。再向前40英里，路左边矗立着一座烽火台。这时，我们已可觉出，疏勒河就在北面不远的地方，地势也缓缓朝那个方向向下倾

^① 即小王堡。——译注

斜。另一侧的地势则缓缓向上，一直伸展到北山脚下。河两岸附近是低平台状的雅丹地形。

一个邮差骑马来到这里，马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一支 20 峰骆驼组成的商队正驮着面粉向西走去，铜铃发出铿锵有力的、节奏有序的声音。早在汉代的岁月中也曾响起过这悠扬的韵律，然而在如今的丝路上所驮运的再也不会仅是大捆大捆的丝绸了。

很长一段路的路面下陷达 6 英尺之深，也不知走过了多少牛车和驼队才把这土路踏成这个样子，可是这却是经住了几千年沧桑的古路。

12 月 19 日的早晨，碰到一起恼人的意外事件，使我们的耐心经受了一次考验。我和尤、陈坐在埃费驾驶的小汽车里。埃费还负责在路上插小红旗，为绘制丝绸之路地图标明方向。最后由坐在赛拉特驾驶室的龚负责收旗。车队压阵的是驾驶“艾赛尔”的生瑞恒，我们好一阵子没见到他的车子了。为了等他跟上来，我们走了大约 12 英里多路程，便在一个叫王家泉子的村子停了下来。原来他车子的发动机坏了，只好向我们求援。赛拉特不得不把车开回去，把“艾赛尔”拖进了村子。这里住着几户人家。我们的营帐就扎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一座小土房成了修理车间。“艾赛尔”的发动机被卸了下来，然后全部拆开。有两个轴承已经磨损，必须换掉。生瑞恒、埃费、赛拉特和卓木恰连续几天，又是锉又是旋拧，忙个不停。

这期间，天气变得更加寒冷。12 月 19 日夜，温度降到零下 21 度。第二天，原野上已是一片皑皑白雪。然而，耽搁一下，至少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避开前来换防的部队。到 12 月 23 日我们继续赶路时，队伍已经走过去了。

只有 10 英尺宽的路，还尽是很深的坑洼和辙迹。幸好来往的人很少，路边还常有小道，车马总算绕得过去。在这条像走廊似的路的最狭窄处，可看见有人站在马车前大叫大嚷，提前警告可能从

对面来的车子让路。

布隆吉小镇四周的围墙已损坏得不成样子，原来是城门的地方现在成了一个豁口。小镇是四方形布局，绝大部分地方已成荒野，到处都是古墓。只有东北角还住着 30 来户贫穷的汉族人家。当我们驶过也已毁坏的东门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看我们。

车队驶过地面坚硬的草原，转向东南方，这时，疏勒河已甩在了我们身后。路上我们遇到 5 辆从草原运柴火到镇上去的牛车。有几次，车队还吓跑了正在吃草的羚羊。北边和南边，都可看到远山淡淡的青灰色轮廓。距我们四分之三英里处还有一条商路，一支驼队正向安西前进。电报线路也是沿那条线路架设的。路上可看到野鸡在草丛中出没。我们的第 143 号营地就设在七道沟附近的一座古老的烽火台旁边。

圣诞前夕的早晨，气温降至零下 22 度，整个原野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

车队驶过 60 码宽的干涸的河床。陡峭的河岸上，一大群羊正在吃草。接着我们穿过真正的七道沟村。村中有几座灰色的土房，周围有些围墙和农田。在渠堤上驶过时，车子上上下下颠簸得好厉害，车身离地面很近，随时有陷进去或被卡住的危险。每一次抛锚，我们就得挥动铁锹，整个队伍的行动也就被耽搁了。

我们穿过一道简陋的城门，开进了三道沟这个大村落的弯弯曲曲的街道。我们的几个仆人下车到集市的铺子去为我们采购过圣诞节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可看到用竿子撑起外凸的篷顶的露天货摊、土坯砌成的房子和墙、肮脏的街道。这一切同新疆的维吾尔城镇和乡村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同样简陋的建筑，同样的尘土飞扬，同样的污浊，同样的贫困，连饥饿的可怜人伸出双手等待施舍的情形都类似。这里到处可以看见已成废墟的房屋和断壁残垣。我们听说这一带的耕作以前也相当精细，但由于迁徙、饥荒和治理不善，人口逐年下降。甘肃的诸多灾难中最严重的是，那些丧尽良

心的将军们为了维持自己的军队，对老百姓敲骨吸髓，榨干了他们的血汗。这些军队的唯一用途就是，在连绵不断的内战中去打别的将军。于是，事事都要靠纳税捐款，农民无法维持生计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可怕的战争一次又一次席卷甘肃，留在这里的稀稀落落的人丁受尽了统治者的压榨折磨。然而三道沟（“第三个谷地”）却被认为是安西辖境内最大最繁荣的村子。安西是一个县治，有一个县公所和一个县长。三道沟在本县东端，再往东去便是玉门了。

我们在集市的一家店铺前停了一会儿，我们出色的厨师拿来了圣诞节礼物——满满一篮子梨、调料和烟花。

随后，车队驶出村子的东门，越过一条宽 130 码并有若干分汊的河床。但是，河那边的路沙层很厚，汽车行走相当费劲。我们只得掉过头来，顺着河床往前走，河床的底部逐渐升高，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可以承受车子的重量。

走出河床，我们看到一番奇特景象。这里由于风和水的侵蚀，地面保留下来的粘土竟塑成了似平台、似垄埂、似圆球的各种形状的土丘，与罗布泊地区的维吾尔语称之为“雅丹”的地貌特征非常相近。

路两旁可看到几群羚羊。这些动物对我们的出现并不真的很在意，只是和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敢走近。埃费停下车，拿起枪，悄悄向羚羊走去，随即消失在灌木丛中。一声枪响，羚羊吓得如离弦之箭，四处飞逃，只有一只没有逃脱。宰杀这样美丽的动物，实在遗憾，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夕。我们把猎物宰了，取出内脏，这下子晚上可有鲜肉美餐了。

前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深色植被带，清楚地预示着，我们就要到达流经玉门镇的疏勒河了。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河的左岸。装着帐篷的一辆卡车走在前面，等我们到达时，营地已全部安顿好了。我们很愿意就在城墙外的露天场地度过圣诞之夜。

疏勒河河床约 30 码宽, 13 英尺深, 河水深约 2 英尺。从圣诞营地看去, 河床和对岸的园林尽收眼底, 景色十分宜人。一座小桥就横卧在这里的疏勒河上。我们宿营的地点是在玉门镇的东郊, 离城门只有几百码之远, 河和桥恰好在我们和城门之间。

1933 年的圣诞节, 我们过得很有排场。那时, 我们刚刚到达沙漠中的额济纳河畔, 帐篷就架在一片丛林中。当时, 赫默尔和贝格曼还没有离开我们, 他们为隆重庆祝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做好了充分准备, 可是他们现在已走了。我这支汽车探险队面临的第二次圣诞节, 与我为伴的瑞典人只有生瑞恒和埃费了。

我们都感到很疲劳, 也没有时间为节日做什么特别的准备。不过, 队里的中国人都是基督教徒, 他们对圣诞节的崇敬心情和我们相差无几。6 点钟, 我刚在小汽车里休息了一会儿, 便有人通知我, 在我的帐篷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走过去, 发现帐篷被许多烛光照得通亮, 一只包装箱权当桌子, 上面摆着蓝色的搪瓷茶具, 盘子里装满了从玉门集市上买来的点心。在我床铺上方的帐篷布上贴着用地道的瑞典语写的“god jul”(“圣诞快乐”), 这是陈用红纸剪了大大的几个字母, 然后贴上去的。一群纸做的小精灵悬挂在我们头顶上, 以示圣诞问候。这次可惜没有圣诞树。

8 点钟, 晚宴开始。我们舀着锅里用羚羊肉煮成的鲜汤, 还有烤羊肉、“皮尔美”^①、豆子、巧克力布丁等, 最后还喝了咖啡。深夜时, 电唱机奏出了《美丽的晨星》这古老的赞歌和其他爱国的、非宗教性的旋律和歌曲。

但是, 最好不过的还是我们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艰险后, 一个个仍都安然无恙。一想到只要再赶 6 个星期的路, 我们就能到达

^① “皮尔美”是新疆的一种面食。面粉和成面团后, 用大拇指按出一个个“猫耳朵”状的小面疙瘩, 煮熟后捞起来, 调以羊肉块、土豆、西红柿等菜肴。——译注

东海岸时，真是倍感兴奋。

最后，灯熄了，圣诞之夜的星辰闪烁在亚洲浩瀚无垠的荒漠的上空。

圣诞节的早晨，车队驶过疏勒河上的小桥，桥长 42 英尺，宽 19.5 英尺，坐落在 3 个粗大的桥桩上。接着，我们驶向玉门县城西门——绥德门，这里建有装饰性的牌楼。5 个身穿浅蓝灰色制服、头戴黑皮帽的士兵，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每人都背着一件捆成卷的大衣和一双备用的靴子。指挥官上来要我们出示通行证，不过见到我们的名片也只好认可了，并拿了送到县长衙门那里。我们获准把车开到衙门，一位秘书出来把我们引进一间像监狱似的接待室。镇上的最高文职官员李奇同（音译）走了进来，请我们留下来吃饭，我们谢绝了。接着，我们又去拜访司令官马耀林（音译），同样受到了热情款待。他告诉我们，镇上的驻军共 250 人，是青海的汉人和东干人组成的。据他讲，城里的居民约有 400 户，只有 30 户是东干人，其余都是汉人。玉门没有蒙古人和维吾尔人。老百姓很穷，买不起衣服和食物，年景时好时坏。这位司令官认为，改善交通是至关重要的，希望政府能在 3 年内建成一条横贯甘肃的铁路。孩子们在狭窄、肮脏、满是尘土的街上，在房屋的废墟之中，到处乱跑，有的穿着毛皮短上衣，有的干脆光着身子。

不久，我们从衙门出来，驶出东门，只见外面的水渠旁有几块碑石，还有一座烽火台。道路还和原先的一样，下陷得很深。沿途常能看到古城墙的残迹。有一个村子可看到几棵树。我们在那里还看到几个农民和几辆马车。在一条结冰的河上和泉水上架的桥极为粗糙，看上去摇摇晃晃的。

12 月 26 日，我们的右侧离南山很近，左侧是低矮的黑色丘陵。在结冰的小湖边有一个村子，村边有一口甘美的水井。这一带的老百姓看上去很贫困，这一年收成平平。6 个村子的名字和实际情况相反，居然都以“赤金”两个字开头。路面仍下陷得很深，

车子穿过草原，颠得够呛。这里原是牛、羊、马和骆驼的上好草场，然而现在却荒芜了。在一块破旧的路标前有 5 座小塔，一个个都像残缺不全的金字塔形状，显然已被严重风化了。

正午，我们到达惠回堡山谷，海拔约 6 000 英尺。这里有一座小镇，周围的墙呈四方形，镇上有一条集市街，我们去买了柴火。路的左边有一座小寺庙。这里的地势极为复杂，峡谷沟壑交错，行车时很难找到路。

几小时后，我们终于驶过岩石断裂的地形，又进入了微微向东倾斜的开阔的草原。沿途每隔两英里便可看见 5 小堆粘土作为路标。眼前是一道海拔 6 200 英尺的次生分水岭^①，再往前，地势缓缓向下，渐渐过渡到一片平坦的荒原，几乎寸草不生。最后，车队在石冢之间穿过了狭长的通道，终于到了进入中原帝国的著名门户——嘉峪关。我们来到了人类用双手建造起来的气势磅礴的建筑之一——长城。拱形的城门、城楼、雉堞状城墙的形状之所以能保留到今天，要归功于 100 多年前嘉庆皇帝的修缮和全面重建。就整体而言，这是一项结构很复杂的工程，要混新旧于一体。我们驶过左边的一座小庙。此处筑有双重城墙，我们穿过城墙的两道拱门。第 146 号营地就扎在小庙和墓地附近的旷野。

第二天一早，我们登上城墙，周围是很独特的建筑：新旧城门、城楼、角楼、拱状的马道、城门之间为戍边部队而筑的精致小院。站在城墙上，老城镇的壮观景象一览无遗，现代的土房和大街小巷就在我们脚下，像马赛克一样镶嵌在别致的四四方方的围墙之中，每一边长约 100 码。

每一样建筑都很精细结实。拱形城门、平滑的石料地面，结构奇妙的通道——一切都那么情趣盎然，那么富有魅力。城楼上部为木结构，雕梁画栋，整体效果无与伦比，确实是名副其实的中原

① 原文为 secondary watershed。——译注

前哨。原来入关的城门已不复存在，嘉庆皇帝又重建了新的城门，显得庄重雄伟而又结实，是一件建筑珍品。镇上的城门也依然残存，其中一处堪称杰作。

要到城墙顶端，必须爬上一段很陡的楼梯，就像北京的城墙一样。沿着台阶很陡的阶梯往上走，就可到城楼的高层，每一层铺的都是地板，但必须小心地板上的窟窿。有一座城楼上挂着一座相当大的铜钟，有几处还保留着像亭子似的小庙。在城楼的顶层可听到似古老旋律一般的大漠风声，从这里的窗口望出去，任何一个方向的景色都令人叫绝。我们脚下就是挤缩在方形围墙中的嘉峪关镇，墙外东北方有一片较新的房子。我们扎在墓地边的营帐离那儿不远。城墙上端呈锯齿形的粗线条活像一幅幅框架，从中可看到下面的一片片房屋和庭院。

我们可以看到长城向南延伸约6英里的地方就是北大河^①河岸，长城在对岸往东北方向又向前伸展6英里，然后往东南，继而往东，再折向东南偏东而去。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由沿途计程石柱准确标出的通向肃州的皇家驿道或丝绸之路。往北去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南边，地面上隆起披着一条条雪带的南山最靠近我们的支脉。再向南20—25英里以外的地方，是一片松杉林区，可供应肃州和嘉峪关的建筑材料。

在如此美妙的地方，一个艺术家可以住上几个月乃至几年，而且每天都能为他的画笔找到新的题材。这些出自能工巧匠的建筑创作，是值得为后代留下来的，这里的古建筑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正在风化塌坏。北京和南京都有古迹保护协会，他们一定会发现，这里是他们施展本领、倾注心血的最广阔的天地。这里有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城门已被马仲英那伙人破坏了，镶嵌的木板和门楣等物都已拆毁。我们亲眼看到城楼上的横梁和椽木硬是被

^① 即甘肃省西北部的临水。——译注

扳下来拿去当柴烧，城垛上的砖被敲下来去盖新房。这些精美的建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人破坏劫掠，当局居然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然而，如果一个欧洲人深入沙漠，找到几处已毁坏得不成样子的坟墓，甚至还不是中华先祖的墓，他也会被指控为窃贼、强盗，要受到羞辱和迫害。

我们到了嘉峪关后，才实地看到长城外侧的情景，那里就是斯坦因调查过的更古老的长城遗址。这段长城也有烽火台，一直延伸至远方的敦煌，也就是汉代长城的西端。

从前，到西域诸国远征的中国士兵常说：“但愿上苍保佑我重人玉门关。”那些从嘉峪关出发西行征战的士兵则说：“前面是戈壁滩，后面是嘉峪关。”意思是他们所爱的一切——他们的家，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坚实可靠的城墙内，也就是说，这一切都在嘉峪关以东，在长城以内，尽可放心。

无数军队和政治使者曾通过这道城门。商人们也是从这里带领着自己的驼队西行，在这道拱门下，不知有多少满载丝绸的牛车吱吱嘎嘎的呻吟着踏上漫长的路途，穿过亚洲腹地前往西方。如果拱门的墙会说话，就一定可听到讲不完的带浪漫色彩的历险记。

“天下雄关”几个大字就刻在城关正门外正南处的一块黑色石碑上，字体极为俊秀，为 120 年前戍守嘉峪关的李将军所书。

正午的日头提醒我们时间已不早，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此处高耸的景点，重新回到在墓地边等我们的汽车那里。

二十、肃州和甘州

刚离开嘉峪关,呈现在面前的又是寸草不生的荒漠,但还不是毫无生机。有时会有一群羚羊矫健地如一阵疾风从眼前闪过,路边的小道上还可看见骆驼商队在往前行进着。沿路也和新疆有些干道的情况完全一样,用一个个叫做“步台”(“步”的意思是“距离”,“台”的意思是“塔”)的锥形小土堆标志里程。大约每隔5里地,就有一座烽火台,古朴别致。它们是往昔兴衰的默默无语的见证者。这条著名的皇家驿道,也是中国丝绸穿越亚洲的主要路线,在那时是何等重要,而现在的人们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烽火台是长方形的,一般围有也是长方形的低矮土墙。烽火台朝大路的一边下面有5个圆球形土堆,密集地排成一行。

一条结冰的小河上架着一座挺新的桥,在这一带还是少见的。过了桥,地面随着向前伸展的道路逐渐下倾。路面比原先好一些。我们注意到这里显然有人下了功夫整治道路,石块都挪到了路边,垒成了并排的两行,中间成了狭窄的浅沟。在两边浅沟之间的路面约宽30英尺。

眼前又出现了如守卫哨兵一般的灰色烽火台遗迹,死气沉沉的。其中有一座烽火台看来是全部重建或彻底翻修的。每座烽火台正面都有一小块用像形文字书写的匾额。有一块匾额上写的是“备御墩”。

我们遇到了9辆牛车组成的车队,正往安西运载布、烟和小麦等货物。下一座烽火台的匾额上写的是“下坝墩”。越是往东走,

路上车辆来往越频繁。一支由 20 头驴组成的商队送的是煤。我们驶过了冻得很结实的北大河支流。再往南去,是供应肃州煤源的南山太皇口煤矿。这时在路左边已可看到肃州绿洲的房屋和树木了。

下午一点半,我们才真正到了北大河岸,这条河有主流和几条支流,它是额济纳河的两大源头之一。赛拉特没敢驱车过主流上的桥。他将卡车驶进桥下的小溪里,结果陷进了泥沙。生瑞恒驾着“艾赛尔”驶过更向下的砾石河底,然后才把赛拉特的车拖了出来。到了另一座桥,竟有 20 辆左右的大车在那里等着,我们的车队顺利通过了这座桥。

我们沿着右边的肃州城墙,驱车来到北城门,卫兵拦住了我们。照例,有一个卫兵上来拿了我们的名片,急急忙忙跑到县长衙门去通报。这时我们只好等着,从狭窄的城门中已可以窥见城内的生活,多姿多采的东方风情,忙碌而喧闹,连同飞扬的尘土,都那么富有魅力。慢腾腾的老牛拖着吱吱嘎嘎作响的大车,衣着破烂的乡下人、车把式挥舞着长鞭或长竿,起劲地吆喝着。邻近村子的农民用颤悠悠的扁担挑来了装在篮子里的洋白菜和别的蔬菜。这时,有一队士兵到河边去饮马,有的骑着,有的牵着。骆驼昂着头,耸着驼峰,或是驮载着东西,或是轻装前进,在车马人群的激流漩涡里呼啦着向前踏出自己的路。

去通报的士兵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我们可以进城了。我们径直去拜访县长,恰好他不在,于是便去找司令官马步康,这是甘肃的“大马”之一。他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并请我们第二天赴宴。回来的路上,我们有幸碰到了县长韦永骥,看得出这是一位很有教养,和蔼可亲并可信赖的人。

就在当天晚上,县长邀请我们去吃晚饭,席间,给我们讲了许多肃州的情况。

第二天,我们到马步康将军那里进午餐时,他彬彬有礼地接待

了我们,但是没有一起进餐,因为他是位虔诚的穆斯林,星期五几乎整天都要在清真寺度过。我们在肃州听说,甘肃的军事首领——五位“大马”——都坚决反对建设一条从西安经兰州和肃州至敦煌和喀什的铁路,因为这会增强南京在甘肃的势力,而他们自身的权势就会有名无实了。近来,由于广州事态平息,共产党人被逐出江西,南京方面的力量的确增强了。正是由于甘肃这些将军们的反对,从敦煌到西安的铁路迟迟不能动工。

蒋介石也是他们眼中的一个危险对手。这位将军常常只由一名副官陪同,像一颗炸弹似的突然降临在发生骚乱的地方,无论是沿海省份、长江流域、绥远、兰州或是西宁,他都以这种方式出现过,在24个省份中已经有12个省份是这种情况。他总是直闯虎穴,直接和老虎对话。今后他是否能够置甘肃将军们的抵制于不顾,成功地建成至兰州的铁路,并在其后修筑我们正为此勘察的西进公路,尚需拭目以待。

我们在肃州必须制定一项重要计划。已经调查并绘制的公路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北部的公路,另一条是皇家驿道。在这两条路线之间有一条路可从额济纳直通肃州,我们也希望调查一下,这条交通线是否适合修筑公路。

于是,我们决定由尤寅照带上司机赛拉特和两个仆人,驾驶一辆卡车去调查这条长240英里的路线,其余的人继续东进。我们从蒙古人那里听说,额济纳河秋季涨潮的大水再过十天才能到达木林河岸西边的寺庙。所以,尤毫不费力就可以渡过这条小河。他必须这么做,因为我们还有300加仑汽油和一大堆行李存放在河东的诺贡德利的营地。只是这么长的旅途才一辆车,是要冒险的,万一这辆车出了问题,就无法收拾了。不过,在这次探险中,我们常常是孤注一掷,所以也习以为常了。行李分成了两堆,一堆我们东行时带走,另一堆等尤和赛拉特从额济纳归来时再拿走。两队人马都可以得到足够的汽油,油价每加仑3.5银元,和安西一

样,相当于上海的3倍。

既然城里的权贵招待了我们,欧亚航空公司的代表自然也不甘落后,一顿宴席的菜肴有27道之多。穿越甘肃之行如同凯旋大军行进一般,每到一个城池,接二连三地宴请,多得不能再多。这种盛情完全出于好意,但如此大吃大喝,实在令人吃不消,再说也浪费时间。按照中国礼仪,在这里旅行的外国贵宾应该得到这样的款待,如果宴请的受害者很讲礼貌,对这种邀请就一次都无法拒绝了。

一次饭后,我们去东城门外的酒泉小游一番。泉池四周有石阶、围栏。古时,相传这里曾喷出过美酒。附近曾有一座完好美观的寺庙,据说被马仲英拆毁了,木料用来给他的部队点篝火。

肃州城看上去充满生机,街上车来人往,尤其做买卖的地方,更是热闹非常,马车、牛车、骡车挤作一团,从归化和额济纳来的一支支伴着驼铃声的商队也到这里凑热闹。据说,肃州绿洲有居民84 000人,其中10 000人住在城里。这是县长亲口告诉我们的。还听说肃州只有不到100个维吾尔人。蒙古人常到这里做买卖。驻军有2 000人。

马可波罗是在1273年路过肃州的。耶稣会教士鄂本笃神父^①是由葡属果阿^②的传教团派遣到亚洲腹地来的,沿途经过喀布尔、喀什、阿克苏和哈密。他想弄清楚Cathay(契丹)和China(中国)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帝国。他在肃州耽搁了18个月,1607年在这里结束了他的生命。当地的穆斯林视他为敌人,烧掉了他那内容丰富、很有价值的日记。

12月30日,我们和中国朋友聚集在县长的庭院里。尤坐进

① 鄂本笃(1562—1607),葡萄牙耶稣会教士,1602年奉命前来中国,并探察由中亚赴中国陆路传教的可能性。——译注

② 果阿在印度,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译注

了赛拉特的卡车里。李和刘嘉属于去额济纳那一队人马。刘嘉原是自额济纳随我们上路的，这次他是回老家，不再出来了。我们给了他报酬和奖金，并对他竭诚照料我们表示谢意。接着，把我们东行要带的东西全部装上“艾赛尔”，连同所有的床铺、帐篷、皮大衣、脸盆、铁锹和其他一些不可缺少的杂物也都一起装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东西已磨损得不像样子了。

我们经过坐落在县城中心的鼓楼，然后驶出了南门。车子沿着南城墙往前走，到了东南角城楼下，又驶上了空旷的原野。

路上我们遇到了一列列前往肃州的大车队，车上满载着柴火，上面盖着干草。我们驶离了古代皇家驿道，拐向左边。驿道自东城门向前延伸，我们则沿一条连结几个村子的道路向东南方向行进。

午后的阳光直射车子。我们驶过了西店子村，村里还有一座小庙。这一带居住的人更多了，可以看到众多的土房和树丛。车子常常要驶过小河和灌渠上的小桥。只是在被人群围住时，我们才不得不停一会儿。这些可叹的穷人在 20 种不同名目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过着饥饿线以下的生活。我们经过了一所有 70 名学生和 4 名教师的小学。

有一段路面凹凸不平，卡车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把坐在行李上的三娃子颠了下去，乔克敦不仅没有拉住他，连自己也跟着翻下了车。两人的头和脚都没有摔坏，但是三娃子的手扭伤了，只好休息一段时间。当天到达第 148 号营地，对他作了护理。营地所在地叫营儿堡，意思是“年轻士兵的宿营村”。这一带名声很坏，据说是个贼窝，所以我们把最值钱的箱子都搬到帐篷里过夜。

已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了。南山沐浴在晨曦之中，在村子的树丛和房屋的后面，映衬出柔和而又有魅力的山景。山的色调很淡雅，比它更淡的月白色的天空形如穹窿，高悬在披挂着雪带的山峰之上。村里的男人和孩子惊奇而又安静地围在我们的车旁。我

们做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后,就抛下他们这些在贫穷和屈辱下受苦的人继续上路了。

道路不久就分岔了。左边一条就是古代皇家驿道,蜿蜒在流动的沙丘带之中。另一条就是我们走的路。没走多久,又进入了寸草不生的荒漠即真正的戈壁,地面坚硬,有些地方是沙砾层。再往前走,偶尔有一些零零落落的草木丛。一路上都可看到像哨兵在警戒一样的烽火台。张三灵庙是一座小庙,里面缄口不语的诸神或许可以使疲惫的浪迹天涯的旅人感到一丝希望。

上河清(意思是“清澈的上游”)是一个有零星几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一堵城墙外面,沿墙筑有造型别致的角楼和城门,墙内无人居住。汽车驶过无数条由山上流下的小河,泥地已被冲出很深的河沟,河上架有桥梁。我们又驶过了几个村子,沿途越过一道道不容易通过的小灌渠和原来由山上流下的小溪干涸的河道,通过了阶地、山脊和深谷交错的崎岖地带。

清水堡村四周有围墙,有两道大门。照例,路可直穿村子,从一个门进,另一个门出。晚上,门是关的,以防盗贼。因此,路上设置了一英尺高的石头路障,底部深埋在地下,如同根植大地一般,十分牢固。这种路障常给我们制造麻烦,要搭起斜坡,车子才能开过去。可是,清水堡的路障实在太高,车子无法开过。幸好村南还有一条路可走。

1935年1月1日清晨7点钟,埃费到我和陈、龚共住的帐篷里向我们祝贺新年,并把炉子的火生得旺旺的。几分钟后,我们穿好衣服,到仆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向他们“恭贺新年”。昨晚过除夕时,贾贵为我们做了一顿不同寻常的美餐,有汤、火腿煎蛋饼、巧克力布丁,还有咖啡和点心。我们过新年的营地在村外的场地上。这是打谷场,地面坚硬平整,像地板似的。我们找了一个村民来放哨。

“县”是一级行政区划。肃州县有7个区,其中清水堡在最东

边,据说住有 1 200 户人家。我们上路时,人们几乎倾巢而出。此地海拔高 5 200 英尺。元旦这一天阳光明媚,似乎在欢迎我们。车子先驶过耕地和零星散落的农舍。不多一会儿,地面上越来越冷清,最后又到了荒漠。

汽车在一道宽阔的冲沟另一侧的马营村停留了一会儿,要在这里换一个向导。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差使,马营村的甲长决定亲自给我们指引去甘州的路。他先把我们带到架有桥梁的如刀切斧削的深水渠旁,情况很糟,连一辆空车都过不去。他又说渠下游还有一座桥,比较结实。但细细察看后,发现两根桥桩中有一根已经断裂。于是,我们又回到第一座桥,动员了好几辆大车上的人帮我们推倒,用拆下来的木料填满渠道,又用铁锹把渠岸整平。经过一番艰辛,汽车终于开过去了。我们付了一笔相当体面的赔款,作为拆毁桥梁的补偿。

摆浪河的河床相当大,在第 150 号营地的正东方向,而苦水则是丘陵地之中的一条冲沟,架有一座桥梁。

路边有 4 头羚羊在吃草。埃费停下车,提着枪悄悄走过去,旋即消失在杂草丛生的地里。羚羊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汽车上,所以没有发觉到,随着一声枪响,3 头羚羊向山那边飞奔而去,一头倒下了。贾贵和乔克敦从生瑞恒驾驶的车上跳了下来,向受伤的羚羊奔去,他们把它宰了,然后扛回车里。

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看到两头羚羊,埃费又蹑手蹑脚向前走去,第一声枪响,一头倒下了,一动也不动,看来已经死了,另一头忠实地守在倒下的伙伴身旁。随着第二声枪响,幸存的一头飞身欲逃,刚跑了几步也倒下了。这两头羚羊也被扛回车里,我们连着几天都有美味的鲜肉吃。

在我们背后乌云渐渐密集。一场暴风雪像是就要来临。我们的第 150 号营地就扎在离元山头村不远的旷野地上。晚上,飘起雪花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8 点钟雪还在下。我们每天的行程并

不长,一般只走 25 至 30 英里。与其说这是因为道路崎岖不平,不如说是绘制地图很费时间。在平坦开阔的荒漠上,罗盘测量的距离可以长一些,工作进度也就快一些。但在有人居住的地方,房屋、墙、树、阶地和狭谷就会挡住我们的视线,能测量的距离就很短,进度也就极慢了。

在新向导的带领下,我们顶着万里晴空,来到一座道观——三关庙。东边隆起一座孤山,叫“榆木山”。车子不时穿过砾石铺底的溪谷。现在我们正通过沙漠,向北望去,可以看到浩瀚无垠的戈壁滩上远处的地平线,如同在海面上看到的一样。整个大地像被积雪、沙和砾石铺成白色、黄色和灰色的一条条带子。再向前走,我们到处都可看到农田、树木、人群、小商队、过路旅人和大车。几辆大车组成的一列车队走过来,车上载着粗糙的棺材极。我们在一处农舍前停下来买柴火。一群穿着破烂的蓝色上衣和红色马裤的男孩子和一两个穿着红衣绿裤的漂亮小女娃,正顽皮嬉闹。我们在杨仙村扎下营地,这里离甘州 47 英里,离南面的小镇高台 4.75 英里。村长前来看望我们,并派了两个人替我们守夜。这一天的夜色格外清朗,天狼星突然在墙头闪过,在大地的上空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1 月 2 日夜,气温降到零下 22.1 度。整个原野盖上了一层白霜,在明媚的阳光下,一闪一闪像钻石一般。这条皇家驿道在结冰时,路面还可以,但在春秋两季,情况一定很糟,尤其是对载重的汽车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两个季节,沟渠涨满了水,有时还会淹没几英里路,过往车辆就有走不完的泥塘沼泽了。如果不好好设计筑路工程,不整治好沟渠和防护堤,这条路是根本不能行驶机动车的。

小镇高台有一个镇长,还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团。在高台和甘

州之间还有一个县,以前叫抚彝县,现在叫临泽县^①。

地面越来越开阔,住家也越来越稀少。每一户人家连同农田都用墙围起来。我们驱车通过了三城堡村。

这里也做过一些整治道路的工作。车道宽 23 至 26 英尺。有些路段挖有一英尺深的排水沟,而有些路段则根本没有。我们走的这条路在皇家驿道以南。到了甘州,这两条道就汇合成一条了,这就是说,皇家驿道从甘州开始就顺着长城往前延伸了。

前面的路如刀削出一般,越来越下陷,越来越窄。成了一条风景秀丽的黄土隘路。随后,眼前又开阔起来,看到了沙河堡村。有时,路顺着村里的林荫道向前伸展。村东头的大门上挂着 3 个用来放犯人首级的木笼,不过现在是空的。这个村子住着 300 户人家。因为缺少经费学校已关了门。大门外有一座很好看的庙。一支由 20 峰骆驼组成的运麦商队,正从那里经过。在东大门即东关外,我们驶过了沙河的河床。

又是一个气温低达零下 22.5 度的夜晚,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户外冰冷刺骨。我们宿营在西头号区,该区和甘州接壤。所以我们实际已经进入甘州县,即已在甘州的辖区之内了。两地以沙河为界。我们现在踏上了皇家驿道,左侧是电报线路。56 年前,左宗棠下令从河南至安西建一条林荫道,附近的许多树至今还挺立着。我们路过沙井子村时,还在右边看到了露天戏台,观众实际上是站在路当中看演出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山,我们离北面的山脉相当远。这里,遍野都是积雪。只有下陷 6 英尺左右的路面没有雪。

这里的地表已被削凿成典型的“雅丹”地貌,和罗布泊附近的情形完全一样。陡峭的呈脊状的土丘可高达 9 英尺。路上的交通

^① 该县在清代为抚彝厅,1913 年改抚彝县。后恢复晋时旧名临泽县。——译注

来往渐趋频繁。每个村子都挤满了大车、母牛、小牛、猪、狗和人群。我们的汽车朝东南方向行进，左侧是向东伸展的甘州绿洲。我们驶过一条干涸的河床，来到了一条较大的溪流左岸，只见一辆大车车轴以下都死死地卡在冰里，看到这种场面，我们也忧心忡忡。这条河叫黑河，是额济纳河东面的支流。

我们用了足足两小时功夫，才过了黑河的几条支流。可见，要想顺利通过与一条条支流交错在一起的大路，显然是不可能的。商队和大车改道往北走，那里可能有过河的桥。起初，我们跟在他们后面走，但一个去肃州的邮差忠告我们不妨往河的下游走。

眼前是纵横交错的沟渠、渠岸、小桥、弯弯曲曲的溪流和干涸的河床，我们彻底迷了路，只好小心翼翼地往前探路，摸索如何渡过这变幻莫测的小木桥，这桥看上去那么高，还直摇晃。对岸恰好有一两辆大车过来，他们根本没有理会这座桥，径直把车往河里赶，这条河宽 20 码，不过河深还不到 18 英寸。我们如法炮制，终于顺利地渡过了黑河。

甘州北门的哨兵见到我们时极其平静，甚至还对我们行了军礼。他们看到我们的名片很满意，并称南京方面已来命令，说我们很快就要来了，命令安排接待。随后，我们驱车来到县长衙门。县长出来迎接我们，并让几个下人带我们去看房子，一看根本不行，还是决定在衙门的一个内院扎下帐篷宿营。有两名警察奉命看守汽车。

中国通过了一项法令，废止中国的旧历年（春节），改成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庆祝新年。我们已经在肃州看到柱子上、门上和屋墙上张贴了红色的新年条幅。到了甘州，庆祝活动已达高潮。戏园子里在演戏；街上走着欢庆队伍；一群群乔装打扮的小丑和服装鲜艳的男孩子踩着高跷，招摇面过。庆祝活动要持续几天。但通常在 2 月份的旧历年一到，人们还像以前一样再庆祝一番。

我们在甘州停留了 3 天，修整汽车，补充储备。一天，我们去

和哈贝施特罗希和弗里施两位神父共进午餐。传教站是 50 年前由比利时传教团创建的，有房舍、学校和一座装有彩色玻璃的教堂。我们还拜访了 4 位德国修女，她们有自己的房舍和修道院，还办了一个孤儿院，收养了 60 个不同年龄的女孩子。我们在时，恰好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

在归化时，我们就已发现，将汽车运输事业引进亚洲腹地的时机已经成熟。那里的商人已成立了一个“汽车公司”，用卡车跑哈密和肃州。在甘州，我们听说凉州也开办了一个类似的公司，有 6 辆卡车，每月在甘州和凉州之间跑两次。据说，汽车两天可走 137 英里，路不被山洪冲断，一天半就走 137 英里。包一辆卡车，从甘州到凉州的租金是 160 墨西哥元；从凉州到兰州的租金为 180 墨西哥元，这段里程有 162 英里，交通比较拥挤。卡车在多数情况下运货，不怎么承载旅客。一辆卡车可载重 3 200 斤，一峰骆驼的载重量为 300 斤。因此，在道路处于很原始的状况下使用骆驼要便宜得多。

两位神父告诉我们，甘州约有 30 000 居民，县长衙门计算的数字是有 9 000 户人家。南山远处的山谷有几个维吾尔人村落^①。我们听说，除非有黄油、羊、羊毛或马匹要出售，不然，这些维吾尔人是不进城的。

甘州也像甘肃其他城镇一样，给人以贫困和衰落的印象。但有几条街的风景很别致，房屋画栋雕梁，很是精致。城里有几座颇具规模的庙宇，有一座叫大佛寺，里面有一尊身长 40 步的卧佛^②。有一座俯瞰全城的高 9 层的塔，叫木塔。在 70 里开外的南边的山里，有一座喇嘛教寺院马蹄寺^③。

① 这里的“维吾尔人”，实指甘肃的少数民族裕固族。——译注

② 身长计 34.5 米，居全国室内卧佛之冠。——译注

③ 又称普光寺，是肃南著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译注

1月5日下午,城里的权贵们别出心裁,以令人生厌的方式,为新年庆祝活动增添了内容,这也是甘肃省特有的节目了。在离我们最近的衙门庭院里,正在上演一场公审节目,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一伙罪犯谋杀了一个富豪,抢走了他的财产。真正的凶手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8个帮凶却被当地人告发了。

我们离审判的现场很近,那一声声惨叫,在衙门里一个个有围墙的庭院内回荡着,听起来那么逼真、那么恐怖,简直不像是人的声音,更像是受宰割的畜性的哀嚎。在一声声惨叫中还可以听见刑吏发出的命令:“再重一点!”接着又是拷打声,又是一连串含糊不清的招供声。

生瑞恒和埃费去看了一眼这人间地狱。那几个可怜的犯人被反绑了站在那里,全身除了一块遮羞布外,再无其他遮盖。我实在无法描绘这酷刑的惨状,更无法写出这些拷打者别出心裁玩的魔鬼般的新招术。最后,这些受刑的罪犯被折磨得实在经受不住了,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又哭又笑,又是吼叫,又是低声求饶,就是一块顽石,也会被融化的。其中一个壮汉,在酷刑下挺住没吭声,但额头迸出了许多冷汗,最后,终于被压垮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个人不断发出可怕的尖叫声,突然之间没声了,他是昏过去了。一两个小时,庭院重又恢复了平静。

甘州的县长我们所以不多见,就是因为他宝贵的时间都去忙着审判这类公事去了。沿海地区已废止了酷刑,但是在这亚洲腹地却一如往昔那么盛行,甚至更糟,因为过去的公共秩序和纪律比现在要好得多。在我们问及这方面的情况时,答复是,只有吓人的酷刑才能对杀人抢劫犯起点作用。我们还听说,这伙强盗自己对他们抄袭的富裕农户也用严刑拷打。他们甚至给各种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刑具起了时髦的西方名字,诸如“坐汽车”、“打电话”、“坐飞机”等,细节就不在此介绍了。

廖县长后来给兰州的省长去了电报,请示要不要枪毙这8个

罪犯,但还没得到回复。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的可怜人,只好再熬过一个吉凶难卜的夜晚。他们在受尽兽性般的酷刑后,反倒会觉得,如果死神降临到狱中,他们会像迎接一位宾客那样感到欢欣了。

我们在新疆的时候,目睹了那里内战的最后阶段,与此同时,另一场内战的战火蔓延在戈壁以东的地区。孙殿英是一名土匪将军,上次我们在归化时就常有耳闻。当时,他率领着自己的匪帮在河套西北一带活动。南京委派他率部前往青海,要他征服、驻守并“开发”该省。但是东干“大马”们——西宁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都反对。所以孙殿英先攻打马鸿逵,因为宁夏省是他去西宁的必经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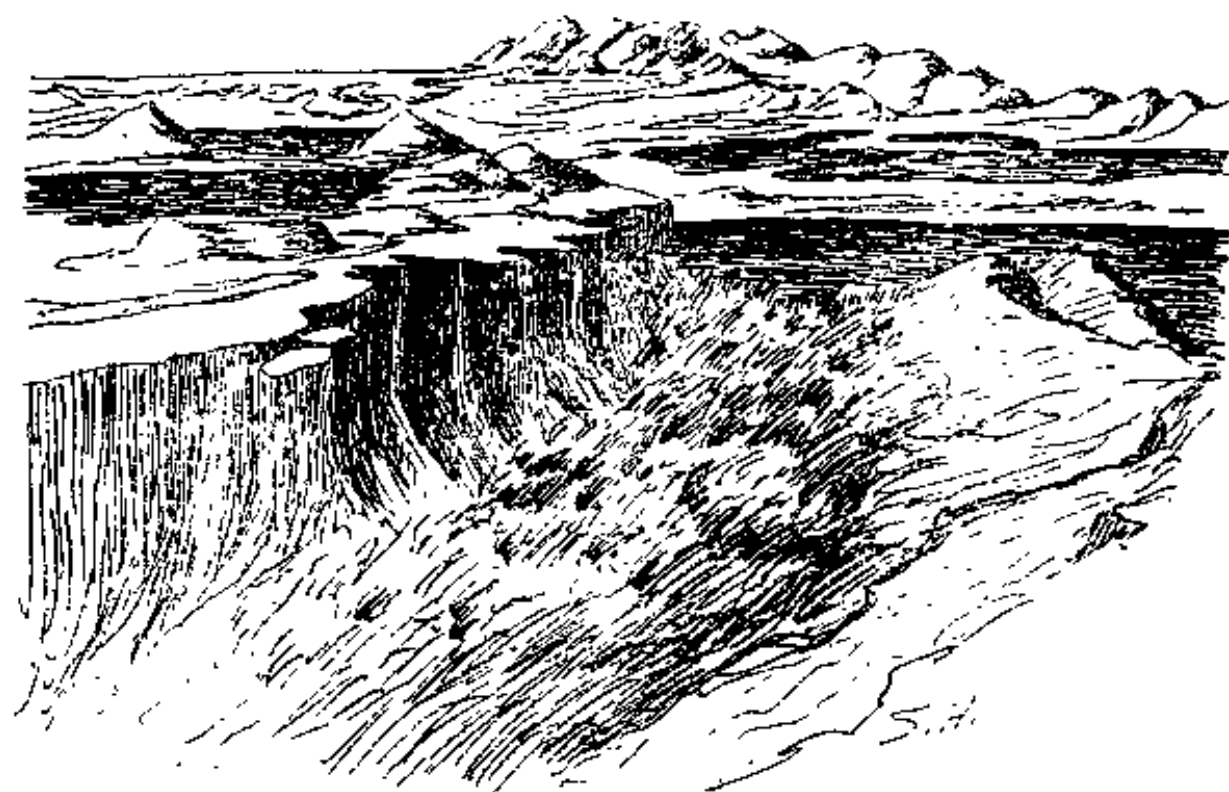
战争爆发了,最初,马鸿逵吃了败仗。处在绝境的东干人派使者去南京求援。于是,南京命令孙停止执行计划,但他没有服从,继续秣马厉兵,为通过宁夏地区作准备。南京就采取了强硬措施,派去飞机、大炮和军队,支持东干人。与此同时,归化城的傅作义将军奉命从包头方向去打孙。孙寡不敌众,只得作罢,最后同意撤向北京和天津。

中央政府通过强有力的干涉,增强了在东干人中的权威。有人担心南京会要求东干人去平定新疆,作为报偿。东干人对任何这样的计划都会抵制的,因为担心要是执行计划成功了,就会失去在甘肃的优势。但是,神父们认为,西宁的马步芳迟早会进击新疆,而且多半可能是出于他自己的盘算,并非是按南京的要求。

如果不是因为汽车,我们绝不会在甘州这可怕的炼狱中再多耽误一天。我们只好再忍受一下,去听那从旁边庭院里传来的惨叫声。这次惨叫的是已被提审的罪犯中情节稍轻的人,这些人都是农民,罪责是收粮后没有缴税。犯人手心朝上,绑在凳子上。当差的用鞭子抽打手心,抽了十鞭,又抽十鞭,一直抽到可怜虫招供为止。当差像唱曲子似的一鞭鞭数着,这些拖欠税金的人则一声

声跟着尖叫。有一个倔强的农民没吭一声，我们只听到鞭子的抽打声和计数声。

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当野蛮的惨剧终于结束，庭院重又恢复平静时，我们真是谢天谢地。我们当初在库尔勒险些丧命，从那次以后，在亚洲腹地所到之处，再没有比甘州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更残酷的了。



二十一、长城行

我们穿越亚洲腹地所走的这条主要交通线，划分为若干驿站，供商队和牛车歇脚。从乌鲁木齐至哈密估计有 18 个驿站，站上有旅店客栈。从哈密至肃州要走 18 天，从肃州至兰州 18 天，从兰州至西安也要走 18 天。邮差只需一半时间。所以从安西到上海的一封信，一般要 18 天寄达。

1935 年 1 月 8 日，我们从甘州出发。汽车在比较干净的通衢大道上径直往前赶路，路旁的露天货摊人来人往，买卖兴隆。中国的城镇一般都有一座鼓楼和一座钟楼。但在甘州，我们穿过的是一座钟、鼓合一的楼。车子驶过南城门的两道拱门，又穿过一道外城门。这时，一个哨兵拦住我们，盘问了一番，并说生瑞恒的卡车“艾赛尔”没有插上写有探险队正式名称的小旗。我们的两辆汽车都插了中国和瑞典的国旗。

出城后的路仍是一条街，有商店，这就是南关地区。车子经过一个戏园子和一个叫“常少寺”的寺庙。一条没有冰封的 12 码宽的小河从南门边流过，河上架有一座桥梁。往左几英里处，隆起一段短短的山脊，罩上一层浓淡有致的紫色外衣。路面相当平整，我们偶尔穿行在农舍和树林之间。路面足有三四十码宽。路边一座又一座烽火台忠实地追随着我们。

营发川村外正在出殡，乐队除了尖声的唢呐外，再无别的乐器。二十里铺村附近立着一座还很新的牌楼，这也许是行政区划的一个标志。接着，车子在沙地中穿越，路面下陷达几英尺深。眼

前既看不到农舍，也看不到树木。这里离南山的北麓约有 20 英里，离北面的山只有 5—6 英里远。我们穿过一片黄土地，路过几处残垣断墙和城门，跨过几条结冰的水渠和小河，有的有桥，有的没有。

长城开始断断续续地出现在邻近北山的南坡和山脚下，越往前走，一段段城墙就越显得平淡古朴，常可看到可能为山洪冲倒的城垣废墟。我们离长城南边仅 0.75 英里。

有一段路像走廊一般，两侧是高约 10 或 12 英尺的粘土平台。当汽车驶出这条狭窄的通道时，我们就看见了东麓村的围墙、大门、牌楼和庙宇。接着，路沿着一条河的左岸继续延伸，河右岸矗立着一道高约 16 英尺的岩壁，然后又经过几个村子和几处凹陷下去的较宽的路面。我们在海拔 5 500 英尺的密黄店村建立了第 154 号营地，就在汇入甘州河的山丹河畔。我们照例雇了两个守夜的。我们只要醒着，就可听到他们在帐篷外来回踱步的声音。

夜里气温降到零下 15.7 度。1 月 9 日早晨刮起了强劲的东风，刺骨寒冷。我急忙穿上皮袄，吃完早饭，就赶紧钻进了小汽车里，只有那里才是躲避风寒的最好的地方。

供奉夏朝禹帝的禹王庙离我们营地很近。禹用了整整 13 年时间治理黄河和长江的洪水，没有被任何险阻吓倒。他那造福人类的事业一直惠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区。为完成治水大业，禹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成功后，他要去过清静的隐居生活，但举国百姓要他做皇帝，迫使他登上了帝位。在两条大河沿岸，在甘肃，为纪念他建立了许多庙宇。

我们继续赶路，穿过村庄，越过河渠，经过农舍和树林，沿着凹陷的路向前行驶。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渡过了山丹河，它在这里已分成两条细细的支流，都架有桥梁。不一会儿，我们发现右边是山脚，左边是一条结冰的水渠。建筑别致的大佛寺坐落在山坡低处。我们停了车，走进了寺庙的庭院，院中供着几个香炉子，在一座亭

子的神坛上有三尊佛像。在寺庙的大殿上端坐着高达 68 英尺的大佛，脸上泛着梦幻般的微笑。

山又离我们渐渐远了。汽车到了山丹县，沿着县城的大街继续往前走。大街的中间有一条没有结冰的水渠，渠上架着许多小桥。渠两边都是货摊，只见人头攒动，十分热闹。我们匆匆忙忙拜会了县长，他告诫我们这一带不安全，晚上不要赶路。

一出县城，我们又看到了长城。城墙由土坯垒成，有些地方是双层土坯，但一般都是单层。墙基约有 6 英尺宽，墙头宽 3 英尺。墙高约 20 英尺。墙的大小变化很大。再略往前，墙的宽度未变，但墙身矮了许多。这段长城筑有一座高大的烽火台。

汽车一整天都沿着长城而行，它在我们的左边犹如一条笔直的黄色带子，时断时续。这是在历代最有权威的帝王的命令之下，在亚洲腹地大片荒漠上逐渐崛起的奇异的建筑物，令我感到永远也没有看够的时候。它时而高大，时而低矮。墙身的形状因受到风沙、天气和流水不同程度的侵蚀而各不相同。随着一天中时间的推移，城墙上光照的射线也不断变化着，一座座烽火台的方位和形状也因此显得多姿多采。

我们在三十里铺建立了第 155 号营地。大家觉得在村子的围墙内设营，要比在村外旷野安全些。但是从肃州跟我们来的警察，每到一地都能找到几个给我们巡夜的人。这次找了一个 17 岁的小伙子，新婚不久，他 19 岁的新娘在 5 个月前回娘家了，只许他偶尔过去探望一下。这个受气的丈夫向我们的帮工倾诉了他的苦恼，可是他们不但毫不同情，反而拿他开心。这一带大多数妇女还都裹着小脚，甚至连东干族妇女也裹。

我们继续向东南方行进，而前一座叫大黄山的孤山拔地而起。

据说，甘肃 90% 的人口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百姓是如此的贫困，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所以染上这种恶习也是不足为奇的。

长城犹如我们旅途中最忠实的伴侣，一直陪伴着我们，在左边不远的地方向前延伸。我们先后见到了3座烽火台。右边出现一座叫“胭脂”的山峰。胭脂是蒙古妇女从前用来涂嘴唇的红色颜料。左边的山脉叫赭头山，再往前延伸的部分，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山。接着是一片荒原，荒原上有一条凹陷的道路。几头羚羊飞奔而过，一只雄鹰向东翱翔而去。有一个地方的路是在两座挨得很近的烽火台之间穿过去的。下一个村子叫丰城铺，表示是个富有的村镇，其实住在村中的12户人家生活贫苦，令人感到这个村名颇具讽刺意味。

现在，这条古代皇家驿道把我们引进了一条闭锁在低山之间的砾石峡谷。左边的长城在一处山坡上蜿蜒向前，然后顺着陡坡直插谷底。皇家驿道之所以多在山地，是因为这里有人居住，而且有水。往北去，地势虽平坦，却是一片滴水不见的空旷的荒漠。

汽车不断往上爬坡，一会儿就到了8000英尺的高地。转眼之间又见到长城在我们左边的山脊上绕行，它又顺着一处陡坡往下插入谷底。修建长城的百姓和诸侯的耐心，的确令人折服。一路上都可看到敦实而又独特的烽火台。有些地方城墙已倒塌，但还可看到一堆堆土坯的残迹。

我们来到了这次旅程中最高的地方——海拔8775英尺。再往前走是一片更为开阔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已是夕阳西下，薄暮笼罩着这一片点缀着一座座古烽火台和无穷无尽的城墙的充满浪漫色彩的土地。等我们到第156号营地时，海拔已降到7800英尺。

我们度过了气温为零下17.4度的夜晚，1月11日继续朝东南方向赶路。汽车到达了水泉驿^①。这是一个萧条衰败的城镇，

^① 即水泉子，位于甘肃省永昌县西。原名水泉堡。明设水泉驿。——译注

原来颇为精致的城门已坍塌，住着 60 户人家。

路右边的山峰叫青龙山，这一带地形崎岖不平，我们不时穿行在山丘之中。烽火台仍然不绝于道旁，但长城却时断时续。路面情况有时不错，但有不少地段的路面被大雨和深陷的车辙破坏了。车子翻山越谷，还要跨过横在路上的一道道风雨侵蚀而成的沟槽，十分难走，周围时而是荒漠或草原，时而又是耕地和村庄。长城在这里折向东北，直奔镇番^①。在十里铺村子附近，在路的右侧是一排茂密的树木，使人们不由想起当年精力充沛的左宗棠。

在永昌县西城门，卫兵拦住了我们，提了一些惯例性的问题。他们看了名片还不满意，还要检查通行证。卫兵队长进去通报，我们只好在城门边等候，卫兵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监视着我们。20 分钟后，里面传令放行。于是，我们穿过几座牌楼和一座鼓楼，直奔县衙门。县长亲自出来看我们和我们的汽车。这是一位衣着干净利落的老人，一头白发，剪得短短的。他曾在乌鲁木齐杨增新手下干过几年。他给我们另派了一名警察，让我们继续上路。

又经过了儿座拱门，遇到了另一伙傲慢的士兵。我们终于离开了永昌县，在一家农舍那里安下营帐。县城的名称表示“永远昌盛”。城内住着 500 户人家，城外约有 1 000 户。然而这里看不到一点昌盛的景象，有的只是贫困潦倒。我们的警察找来了两个守夜的，又从对面的农舍那里提来了井水。我们在集市上买了柴火。大风刮了一整天。驾牛车和拉骆驼的人在风沙弥漫中赶路，满脸都是尘土。

第二天早晨，风还是刮得很凶，能见度很差，我们测绘的距离只好又缩短了。车子先穿过了一片墓地，一座座坟墩都是圆锥形的。棺材埋在只有 2—3 英尺深的地下。我们见到了几块墓碑，这

^① 即今民勤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东部。明置镇番卫，清改称镇番县。——译注

是为那些曾赢得人们感激或尊敬的死者而立的。其中有一位年轻寡妇，因能始终如一守节，被视为是高洁、忠贞和献身的明证。

这一带的路很好，是1928—1929年间“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修筑的。他奉行的原则是不能让士兵有一刻的松懈。在几座古老的烽火台附近仍能见到几棵——也仅是几棵而已——左宗棠下令种的树。路上，大车、驴和骆驼行进在急速的旋风中，扬起了一阵尘土，我们要走到很靠近的时候，才能看清它们。在风暴的咆哮声中，驼铃越发显得清脆悦耳。路面的宽度自21.5英尺至27英尺不等，路边的水沟宽3英尺、深18英寸。很长一段路被大雨冲毁了。桥梁统统断裂。有时我们只得避开原路，绕道而行，非常麻烦。

山峦完全被尘沙的屏障挡住了，根本看不见。我们又穿越在一片荒漠上。停车时，我们听到一面面小国旗随风拍打汽车的声音和风暴的嚎叫声。

半光着身子的孩子们，冻得脸色发青，直流鼻涕。我们的车子刚停一会儿，他们便蜂拥而上。我们把巧克力和干粮分给他们，伸过来抓食物的小手冰凉冰凉。村民警告我们，过村东的那条河要倍加小心，那里是我们必经之地。

汽车继续前行，很长一段路都被冰覆盖着。我们到达河的第一条支流时，遇到3个身穿黑袍、扎着黑色头巾的中国天主教修女。

到了第三条支流，只见一辆大车被死死卡在冰里。原来这就是修女们乘坐的车。埃费竟径直将车开进河里，马上被卡在冰里，动弹不得。生瑞恒不得不卸下“艾赛尔”的行装，然后把我们拖了过去。就在“艾赛尔”去帮修女们把大车从冰块中拖出来的时候，我们扎下了营地。这条河叫截河，我们宿营的小村叫昌路铺。这里海拔5500英尺。

1月13日，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使车子渡过了河，用去了

整整4个小时。开始时,小汽车卡住了,必须要拖出来。后来,“艾赛尔”又在乱石和浮冰中停住了。在过最后一条叫都兰河的支流时,全部行李又不得不卸下来,用一辆大车载过河去。小汽车在过这条支流时,又陷了进去,无法开动。我们动员了附近的村民,用长绳把车子拖了出来,并清除了车轮上的冰,用炭火烘热了发动机。与此同时,把行李装上“艾赛尔”,然后就继续赶路。路非常糟糕,很长一段都让水淹了,还得渡过几条小河。

路两边犁过的地里,有时竖着一大块冰,人们告诉我们,这是表示祈求上苍,保佑丰收。我们不时穿行在村子之中,有一个村落虽无戒备的设施,但每户农家都有各自的围墙。据说,明代蒙古强人常袭击这一带,因此才迫使人们习惯于常年处在戒备状态。

路旁出现了针叶树。5点多钟,我们驶进一条通向凉州北门的大街,照例被卫兵拦住,等他们终于相信我们并无恶意时才放行。我们去见县长,他热情接待,并请我们住在他的衙门里。

据说,凉州有4080户人家,计25000人。整个地区有32000户。1927年地震中有3000人丧生。

第二天,即14日早晨,我们收到了尤寅照的信,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他已在前一天晚上到达我们上面一个营地即昌路铺。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赛拉特的车在过第一条河时,把前簧弄断了,接着又毁坏了差速器,他的卡车就无法启动了。他要我们送去各种配件和工具。我派生瑞恒前去帮忙,他开着“艾赛尔”,带上了乔克敦和两名警察。可惜这样一来,我们在凉州耽搁的时间不可能像预期的那么短了。

我和龚、陈乘人力车去凉州的东门,从那里又走了5里路,就到了新城。1896年12月,我曾经访问过凉州。那时,旧城的城门上都有城楼,把城墙装点得很别致,但现在已见不到这些城楼了。新城只是围有四四方方的城墙。我们通过的西门,就是在城墙中开了两条通道。里面没有住家,只有兵营和军官宿舍。马步青将

军和他的幕僚就住在里面。他们的房前有带刺的铁丝网。我们在这里下了车，把名片递给了警卫。随后，有人把我们带进一间休息室等候接见，在等待的人中我们发现有一个藏族。

一位军官带我们到会客室。马步青将军个头不高，40岁，身穿灰绿色军服。他是西宁权威人物马步芳的哥哥。我们受到了礼遇，他询问了我们的计划和任务，并邀请我们当天去吃饭，他和我们围着火盆叙谈了半个小时，然后起身离去。

我们接着去拜访欧亚航空公司的代表。他们有3000加仑汽油。我们给上海的沃尔特和李去了电报，所以毫不费力地从这里补充了储备汽油。

晚上的宴会由高级副官代行主人之谊，因为马步青将军是一位穆斯林，不能和异教徒共餐。

15日，我去看望内地会的传教士约翰·斯坦利·米尔夫妇。他们就住在1896年我和贝尔彻夫妇共度圣诞节的那所房子里。如今，这房子的漆都掉了一层了。贝尔彻曾建造一座能容纳300人的大教堂。教堂外的墙上嵌有纪念这对夫妇——1929年4月去世的苏西·贝尔彻和在同年随后去世的她的丈夫威廉·贝尔彻——的石碑。在瘟疫流行中，贝尔彻夫妇先后因照顾病人染上斑疹伤寒而丧生。教堂有一口大钟，1927年地震时，从塔楼上掉了下来，砸穿两层楼板，却仍然完好无损。米尔先生告诉我，传教团的事务在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最终目的是要由当地人掌管整个机构。

我又回到38年前曾受到英国传教士热情款待的故地，不免有些激动；然而，这么多年后，我们拜谒的仅有他们的墓地，又觉得不是滋味。生瑞恒曾在1928年见到他们，带了一封他们问候我的信，结果，他们去世后，我才收到这封信。

在天主教传教团，我遇见了圣言会的阿洛伊斯·贝克尔和奥伯勒两位神父。还有3位神父在教会学校工作，有4名护士在学校的救护队。离凉州不远，即在县城以西90里的地方，有一个传教

站,1896年我曾去那里参观过一座很漂亮的教堂。当时的传教团由比利时人掌管,我的那次访问传教团是记录在案的。

神父们告诉我,最近3年的雨水多得出奇,毁掉了大面积的庄稼,而这个冬天,气候又反常地暖和。他们认为,夏季的雨水是这条设想中的公路的最大敌人。雨会冲毁道路,冲垮桥梁。此外,过往的旅客还会偷走桥梁的木料。只有水泥才能抵挡住风雨和小偷。

16日下午,我们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是尤寅照完成额济纳之行回来了。他们这次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卡车虽然撞得很厉害,急需修理,但赛拉特还是把它开回来了。尤的到来充实了我们的给养。他带回来的东西中,黄油和柑桔最受欢迎。

尽管事非所愿,但为了修车,我们只好在凉州再歇几天。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宴会上,和中国上层人士和传教士们在一起,又是拜访,又是回拜。我们的屋子常常宾客盈门。

我们从各方面听到的情况都是,老百姓根本付不起那些苛捐杂税,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许多人背井离乡,躲到亲友家去逃税。留下的人只能借月息为4%—10%的高利贷交税。有的农户,拥有400亩地(折合50英亩),还有几个女儿,光景虽然好过,最后也不得不把全部土地连同女儿一起送给让他们背上高利贷的贪婪的恶棍。

平番^①四野除了鸦片外,几乎不种别的东西。凉州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小麦的价格降到了过去的一半,所以种麦、卖麦已不合算了。局势极不安定,这一带越来越穷困,像样的灌溉和完善的道路根本就不存在,正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将军们之间的权力之争,在日益榨干中国百姓的血汗。

^① 即今永登县,在甘肃省中部偏北。平番是1929年前的旧县名。——译注

1月19日,龚出发了,由生瑞恒为其驾驶“艾赛尔”,随行的有卓木恰和三娃子,还有一个警察。龚此行的任务是要找一条途经黄河畔中卫^①的更近的路线。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西安和凉州之间的一条最佳铁路线。我们计划在兰州会合。

他们走后,尤向我讲述了他到额济纳来回路上的经过情况,我认真做了笔记。有趣的是,额济纳的土尔扈特王爷竟在去年4月份从那些自哈密到肃州、又到他辖地的旅客那里听说,我们整个探险队又遇难了,被“大马”的部下杀了。他对重见我们已不抱希望。因此,当尤和赛拉特突然出现在他的营地时,他惊诧得无以名状。在凉州,一个来看我们的税务官说:“你们在新疆呆了9个月,竟能平平安安出来,一个人都没有丢,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① 县名。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部,与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接壤。——译注

二十二、穿过险峻山岳地带

夜间气温已很少降到零下 16 度。1 月 20 日晚, 温度已只有零下 13.2 度。我们终于整装待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向各方面告别。离开一座大县城, 总要耽搁许多时间。快到傍晚时, 我们才上路。行至东关, 即东城门, 我们被一支骆驼商队挡住去路。这些高大而庄重的骆驼, 身披厚厚一层御寒的暗色皮毛, 高扬着很气派的头, 在城门口微暗的光线中, 真是显得美极了。

金关是这一带穷乡僻壤中一个村子的动人名字。我们两次渡过有几条支流的金水河。路上有个人牵着两头牦牛, 是从西藏来的。在几个地方看到有枫树, 这在中国西部是不同寻常的景色。我们在大河园村的对面扎下营地。

晚上, 有人给我们守夜。他们的工钱是 650 个铜钱, 铜钱是一种中间有方孔的中国小铜币。在凉州, 大约六七百铜钱可换一个银元。整夜都听得见在路上行进的车轮吱嘎声和行人说话声。

接着, 我们开始了前往兰州的新的旅程。这是去西安的漫长路途的倒数第二个路段。只有到了兰州, 我们才能确实感到自己在接近文明世界。

河东堡村的大门很平常, 没有拱顶。这里的百姓看上去也那么穷。他们衣服从来不洗, 浸透了连年的汗渍, 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 身上都是虱子。饥饿的孩子到处乱跑, 两条腿细得像柴火棍。地方当局和军方只顾肥自己的私囊, 致使可怜的百姓穷困潦倒, 无法维持生计。

汽车驶进一个开阔的砾石地。眼前是整座村庄的废墟。又是地震，又是洗劫，村子被毁坏得不像样子。靖边驿这个镇曾有过很讲究的砖砌的大门，可现在已是一片瓦砾。主要街道两边全是倒塌的房屋堆成的废墟。

凉州县县长告诫我们对古浪村要多加防备，因为这一带常有土匪出没，要尽快通过这个危险地区，不能在古浪附近过夜。当天宿营时，我们既没有守夜的，也没有警察或卫兵护卫。我们在肃州曾遇见作战部的宋先生。在西行途中，他就在平番和古浪之间遭到袭击，所有的东西，包括大牲口、钱、食物，甚至连他身上的衣服都被一抢而空，幸好逃了一条命。

半夜，尤寅照大声喊乔克敦，我被吵醒了。我钻出睡袋，询问出了什么事。“卡车上有人。”尤回答道。乔克敦立刻跑了出来。这时，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从几英尺高的地方跳了下去，小偷已逃到墙外或是跳进沟里，无影无踪了。我们检查了一下，没有丢什么东西，然后让乔克敦守到天亮，后半夜平安无事。

车子刚驶离村子，就又驶入一条回廊状的狭路，继续行驶在阶地和山丘之间，路面宽 25 英尺。我们临近危险的古浪村时，被没有带枪的士兵拦住了。我们问为什么不带武器，他们回答说，如果带枪，马上就会被土匪缴械。我们平安地通过了古浪村，进入了山谷。车子在河的左岸上蛇行向前。这条河有些地方结了冰，在离地平面 30 英尺的下面流过。山谷两侧是陡峭的山坡。山谷渐渐变宽，景致也越来越美。到了一处更开阔的地方，我们看到了盖有拱形草篷顶的 6 辆大车，这是一个走乡串村演出的马戏或杂技班子。

下午，我们遇到了更加不同寻常的一群人。他们一行 15 人，乘坐一辆雪佛莱卡车，这是在凉州和兰州之间跑长途的客车。汽车公司是马步青开办的。这类客车都要到位置坐满了才开，所以先买到票（票价 18 银元）的人得等着。

我们穿越在巨砾碎石中,在山丘坡地上一上一下行进。有时汽车穿行的通道是很窄的,后来沿坡驶入像沟槽一样的路,一堵起保护作用的墙挡住了视线。这一带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可以见到大车、驴、流浪汉、生意人,还可见到小男孩用颤悠的竿子担着两只篮子,里面放着一种像玻璃笛子似的东西,只要一吹,就能发出像布谷鸟叫一样的声音。

视野越来越开阔,山谷的两旁是悬崖绝壁,景色宜人。群山在夕阳残照下显得十分壮观,峰峦染上了一层桔红色,绚丽耀眼。我们沿着这条奇特的险路曲折而行,显然,这不是为汽车修筑的路。这里就叫作古浪峡。道路和峡谷交叉的地方都需急转绕行,要想让卡车转过弯去,而又能不碰撞峭壁,那真是太难了。我们见到一块石碑,是纪念一位捐钱修路的值得尊敬的善人。

我们从一座桥上驶过一道峡谷,再一次爬上又窄又危险的蜿蜒曲折的山路,路的坡度很陡,通向一处悬崖。我们的汽车究竟能平稳行驶多久,大家都心中无数。只要稍有差错,我们就可能冲下坡去,摔得粉身碎骨。

对面的山坡上有 15 头牦牛在吃草。阳光照不到的山坡上仍覆盖着积雪。路对于小汽车来说已太狭窄了,而卡车的宽度还要多上一英尺,我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平安走过来的。长城沿山谷右侧而下。

汽车有时驶下山谷,触到冰带,但每次又要爬上盘旋的山路。有一些地方巨石外突,路就窄得吓人了。我们停下来等卡车,并琢磨了这里的地形,小心翼翼地行车,终于开过去了。一辆大车出现在前面的高坡上,幸好车把式及时停下来,否则在这狭窄的山路上撞到一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们的勤杂人员贾贵、李和乔克敦蹲伏在卡车行李堆上。他们有自己的对付办法。当卡车接近最危险的地段时,他们赶紧用羊皮大衣盖住自己的脑袋,即使被突然甩出去死于非命,至少不会

亲眼看到这场灾难。要是能跳下来当然更好，但那也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赛拉特受了点儿伤，我们停下来稍事休息，有一个过路的年轻人问了我们许多问题：我们有多少人？带了多少枪？等等。埃费认为，这是土匪团伙的探子，准是要在晚上来袭击我们。

汽车驶过一条冰封住的河，岸上长着一排榆树。这里的夏天一定很美。我们在海拔 6 800 英尺的合水村附近宿营。

1 月 24 日晨，天气格外寒冷。夜里的最低温度是零下 19.6 度。一群骑手穿过山谷，正朝凉州方向而去。我们弄不清这是些什么人，后来才知道就是一些士兵。他们停下来，问了我们一大堆问题，还告诉我们，前一天抓了一个约有 30 个人的土匪团伙，全被镣铐起来，连成一串解往凉州刑讯审判。

汽车往下驶向河边。这里的河水流自西南方向，水面宽 35 码。大部分河面都已结冰，只有河中间还留着一条未冻的窄缝，流着涓涓细水。小汽车开动了。卡车准备在宽 60 码的地方通过，河面上结了几层冰，还有一些水。卡车刚走没多远，冰就压裂了，由于冰层厚薄不一，汽车行进非常缓慢，颠得并不厉害，不过车上的行李得卸下来，运到对岸去。整个过程耗去了我们两个小时。

然后，我们驶上山谷左侧的一座山丘。几块 18 英寸厚的大石头被搬到了路边。汽车又一次开到一条 12 英尺宽的凹陷下去的路上。我们遇到了飘泊在外的东干人、汉族农民和商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的是蓝颜色衣服和曾经是雪白的羊皮袄。他们脚穿毡袜毡鞋，头戴皮帽或小毡帽。我们从桥上通过了似刀切削出来的深沟中的一条溪谷，接着又驶上一条凹下去的路，上面是砂砾和粘土铺的松软地层。迎面遇到两辆盖有草篷顶的大车，旁边还有几个骑马的跟着。其中有一个是前去迎娶新娘的新郎官。他还有 3 辆大车，是用来装运自己的财物和新娘的妆奁。不管老百姓有多穷困，生活仍按常规运转，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一成不变。

汽车运载着我们,又从一个弯弯曲曲、陡得吓人的坡上往下驶入谷底。装得满满的大车是如何爬上坡的,实在难以想象。此时的海拔为7 150英尺。一处又一处的山泉结成了一道道冰柱,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亮。龙口堡是个只有几座小房子的村子。我们驶过几条冰带,其中一条宽10码。这些冰带承受住了汽车的重量。有几处景色很美,点缀着一片片树林,有些山坡上还长着针叶树。在南园,我们看到河岸上有两部水车,沿途都有古老的烽火台,还可不时看到喇嘛庙和佛寺。

5点30分,我们停下车来,在海拔8 450英尺的高地安下第163号营地。不远处是南年村(音译)。村里一个富户有200头羊,到了晚上,就把羊赶下来,关在羊栏里。这个富户答应给我们找两个守夜的。黄昏时分,他们来了,很快就和我们的勤杂人员混熟了,在一起说笑讲故事。夜间,每过一刻钟,我们就能听到守夜人的吆喝声,大概一方面是要吓跑小偷和土匪,一方面是向我们表示他们没有打瞌睡。

1月25日早晨,大家都冻得发抖。夜里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9.8度,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

我们出发后继续爬坡。山谷里到处都是野鸽,还有积雪和冰块。车子越爬越高,山顶也显得越来越圆。有几个年轻的汉人用扁担挑着大筐走了过来,两只筐随着他们的脚步有节奏地摇晃着,看上去很优美。10点45分,我们到达海拔9 000英尺的山口,是这次整个探险旅程中新的最高点。就在这乌鞘岭山口的顶点,立着一座小庙,叫汉祖庙。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和尚走出庙来看着我们。这个山口是古浪和平番的分界处。

在到达这个山口前,我们还看到了几段长城。等汽车往山下驶去时,长城已到了我们的左边。这里的长城有3道城墙,我们处在中层墙和外层墙之间。山谷已相当开阔,左边大部分是山丘地,一群群羊在吃草;右边是高山。我们在这里遇到8个骑着马、驮着

包裹的东干人，很难说他们是商人还是土匪。

不久，我们就在长城外面行驶了。这里的长城断了好几处。在镇羌驿村附近，我们从冰上渡过了平番河，又从桥上驶过了一条未冻冰的支流。汽车顺着相当开阔的山谷向东南行进，右边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上覆盖着积雪。这一带的长城是用粘土夯筑并用土坯垒砌而成，约高 10 英尺。平番河可算是一条大河，河谷宽阔，虽未封冻，但河面飘着大块浮冰。我们在几处看到碉堡、房屋和城墙的废墟。我们渡过了发源于西南方高山的一条冰河。长城也在这里跨过了主河道。汽车继续往前行驶，长城时而在路的右边，时而又在左边，离我们很近。这一段的烽火台比前面更多。

在有些地方，长城在离我们只有几码远的左边。有时看上去城墙呈锯齿状，但实际上是风雨剥蚀所致。在一处没有损坏的地方，城墙高 14 英尺，上宽 2.9 英尺，墙基的宽度则在 6.6 英尺以上。

我们在海拔 7 150 英尺的伏羌堡宿营。

又是一个寒夜，气温为零下 19.3 度。村里的一只狗一直对我们点着灯的帐篷叫个不停。待灯熄了，帐篷里也安静下来时，它便转过身去，又冲着过路行人狂吠。整整一晚上，这狗都没有歇一歇，叫得连声音都嘶哑了。我本想把狗赶走，但转念一想，它是自愿来给我们守夜的，也许它觉得我们这么宿营在大路边，又没有守夜的，未免太莽撞了。可能它正是这么想的，所以也就不必去赶它了。

路在河岸上两排树木之间向前伸展。河相当窄。河水没有封冻，河面上浮冰欢快地流淌着。河岸上有些地方仍冻得硬梆梆的。一路上，我们不断观赏着美丽壮观的山川景象。到了武胜驿村，河面变宽了，结着冰，看上去像一片湖。我们在河道变窄的地方，从高架在它上面的短短的厚木板桥上渡过了河。

过了丰堡村，我们又驶过另一条下陷 12 英尺深的路，幸好那

里没有大车,虽然来往的人是增多了,是我们一年半前离开归化以后看到的最热闹的地段。没走多远,路已下陷 18 英尺多了,弯弯曲曲地向前延伸。右边另有一条沿山丘而上的路,不过不能行车。一座小木桥横跨在下陷的路上。一条路凹陷入地下这么深,糟蹋成这副样子,一定是年久失修了。

我们终于走出这条走廊,这时,长城就在左边 100 码远的地方。过了十里店子村,汽车驶入了开阔的平原,河已经看不见了。我们经过了一座屋顶很漂亮的道观,然后就到达了平番的北城门。卫兵拦住了我们,不过看了名片就放行了。不一会儿,我们见到了县长,他一定要我们吃了饭再走。但是我们还是要求继续赶路,在他衙门喝杯茶就可以了。县长告诉我们:38 年前,平番有 100 000 居民,现在却只有 70 000 人了;城里有 1 200 户,有汉、东干、满、蒙、藏几个民族。

我们驶过几座非常好看的牌楼,出了南城门。城门有两道,里面一道,外面一道。38 年前,我从西藏和西宁方向进这座城镇时,走的是西门。这次旧地重游,走的是一条过去从未走过的路。

不一会儿,我们陷进了深 24 英尺的洼路。行车时,尘土滚滚而来。第 165 号营地设在海拔 6 175 英尺的德赈堡村附近。营地近处有一座上部为木结构的供奉魁星的塔,叫魁星阁。清代盛行科举考试,据说魁星就是判定谁可登科的神仙。

1 月 27 日,我们径直开进一条深 15 英尺的洼路。有几匹受惊的骡子拉着几辆大车不是向后退,就是在原地打转,把地上的尘土全都搅动起来,呛得人透不过气来。一座桥横架在一条河汊上。河右岸群山高耸,左边却是一片低矮的山丘地。

到了高金子村,路的一边是一排房屋,另一边是冰封的河流,高 20 英尺的河岸笔直垂向河面。岸上点缀着美丽动人的大树。

又是一条洼路,还横架着一块厚木板。路上积着厚厚的尘土,被过往的车辆、牲口和行人搅得满天尘雾,一切的一切都是灰蒙蒙

的。随便翻动汽车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要扬起一片灰尘。在这笼罩在尘土中的房屋、围墙、阶地和树木的曲折的迷宫里,能见度最多只有 20 码,我们就像蜗牛一样在向前爬行。这里的人竟能生活在总是有厚厚的尘土盘旋在上下左右的路边,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日复一日,他们的肺不知要吸进多少灰尘,只有到了夜晚,才能有几小时的解脱。

1 月 27 日晚,气温降到零下 20.8 度。我们继续在黄土坡之间行进,路过了观音寺。长城又突然隆起在我们的右侧。我们一定是在长城的某个中断处不知不觉地跨过了长城。平番河也到了我们的右边。这段路在大雨过后一定很危险,路边滑得像涂了油一样,汽车很容易栽到深渊中去。

凉州至兰州的道路是此次汽车探险全程中最艰险的路段。大部分地区是黄土,到处都可见到坚硬的岩石块。傍晚,天空渐渐暗下来,下了点雪。我们在一块坟地中的一小片平地上扎了营帐,这里埋葬了 18 个人。

我们出发了,通过了矗立着奇异的黄土柱的像峡谷一样的深谷。这里车水马龙,十分热闹,到处是开垦出的田地,随地可见一群群羊在吃草。我们从一道山脊上隐约看到东南偏南方向的那一片荒野的土地。

前一天夜里从崖壁上塌下的一方粘土,堵住了道路。大车仍然照走不误,但我们还是清理了一下路面。不一会儿,我们穿越了小芦池这个小村子,村民们正为迎接这一年的第二个新年(指春节)而清扫房屋。这里的女人都裹着小脚。

前面又是一个山口。车子开始爬坡,地势越来越陡,险得可怕,路又迂回曲折,尽是急转弯。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车闸失灵或是车子往回一倒,摔下悬崖。不过,车子终于开了上去,在半英里多一点的路程中,向上爬行了 195 英尺。过了山口,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东南偏东方向继续前进。一辆大车翻了

车,运载的油洒在了路上。赶车人在忙着手把地上的油捧一点起来。埃费停下车来帮他们一起舀油。

大车下面都挂着铜铃,驴也挂着铃,山谷中回荡着清脆动听的丁当声。右边的山坡上出现了几个洞窟。前面是红色的悬崖峭壁,似在峡谷上方高高耸立起的一座宫殿,像巧夺天工的古希腊卫城高大的柱廊式的人工建筑。

路穿行在灰蒙蒙的崇山峻岭之中;山上覆盖着厚厚的新雪。洼路越来越窄,凹陷得越来越深,寒气也越来越重。在路的尽头,又重现了红色山峦的如画风景。这种纯自然的粗犷的美令人难忘。两侧峭壁仅相隔 50 至 70 码。转眼之间,我们突然发现已走出了峡谷,南面就是和苍茫的群山相接的黄河河谷。

车子继续向东南偏东行进,四周一片辽阔的耕地,路的左边是绵延的山脉。西南方,黄河在落日的余晖下闪着波光。我们来到了二十里铺。这个地名表示这里离甘肃省会兰州只有 20 里地了,也就是 6 英里多地。我们在右边看到了长城,还和前面一样,耸立着一座座烽火台,有的有围墙,有的没有。

5 点半,我们到了黄河边。道路高出河面 30—45 英尺。汽车穿过了有城楼的大门,沿街向前,又过了一道城门。我们的第 168 号营地就安置在兰州城的衙门里。

第二天,我们拜访了省长朱绍良。他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们,并说他接到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命令,要从各方面协助我们,并要保障我们去西安途中的安全。路过所有危险的地段时,都会派军队护送。

接着,我们去看望天主教传教团。传教团驻地有一座壮观的大教堂和几幢设计简朴而庄重的房屋。布登布罗克主教十分热情和蔼地接待了我,和他几年前在给我的信中所流露的一般无二。他曾应我和郝德博士的请求,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甘肃气象的重要情况。此刻,我和他进行了长谈。他已在兰州度过了 13 年,在这

之前,他还在山东工作了 17 年。这个传教团有 4 个神父、4 个做杂役的帮工和 4 个修女。

兰州也是内地传教会的一个重要传教站。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基布尔先生和他的家人。

大家尤其高兴的是,龚继成和生瑞恒已经从中卫回来了,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险情,但都能逢凶化吉。1 月 31 日,我们和朱省长共进了西餐。他是唯一能制约住五位“大马”的人。

我们还去访问了内地传教会,在那里见到了沃汉·里斯博士及其太太、托玛斯·莫斯利夫妇——莫斯利太太是斯科纳^①地方的人。一家英国人的医院起初由兰德博士主管,后由里斯博士继任。医院坐落在黄河北岸的一处高地上,从窗户可眺望到黄河的壮丽景象。一两个星期前,汽车还可以从冰上过河,现在只有几条细长的冰带和几块浮冰了。河上横跨着一座五孔铁桥,长 240 英尺,宽 26 英尺,与周围的景观并不协调。

^① 瑞典最南部的一个省份。——原注

二十三、丝绸之路上的最后时日

2月2日,我们和兰州的新朋友告别。然而,和往常一样,准备出发的工作没完没了。一直到3点45分,汽车才驶过这座美丽大城市的拥挤的街道。路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和大红对联说明,离中国的新年只有两天了。

汽车驶出了双层的南城门,向东一拐,就出了东关门。城外可以看到无数立有石碑的坟墓,那里安眠着一代又一代的兰州人。我们顺着宽阔的黄河河谷而行,两边的山相当高。半小时后,车子折进右边的一道侧谷,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之中。路很宽,路面状况也很好。接着,我们一上一下翻越过一道道山脊、坡坎,通过一道道侧谷,山坡相当陡。地势渐渐开阔起来,不过有几处走的又是凹陷在地平面以下的路。在深谷和一些背阴的地方还有不少积雪。经过两小时,跋涉24英里,我们停下来宿营了。现在已不需要绘制地图了,因为人们对这一带非常熟悉。营地编号已到了第169号,海拔为6800英尺。这个地区叫马家宅。

车子顺着黄土坡边沿蛇行向前,我们好容易才弄明白为什么路的中间到处都是截成平顶的粘土堆。这表明已从这里挖走了多少粘土,插在粘土堆旁的作标记用的方木牌指明,还需取走或填满多少粘土才能把路面平整好。

汽车驶上一道山脊,山脊的两边都是宽敞的山谷,等到达山口时,放眼望去,我们已被包围在黄色粘土的山丘之中,在四面八方的辽阔空间,全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地。这里见不到一块坚硬岩石。

两侧都是耕地，积雪残留在地头的垄沟里，给黄土地镶上了一道道白边。

这里见不到人影，也很少见到旅行者。一只山鹰在荒野上空盘旋。有一段路是在黄土坡的最高处向前延伸，上面的路极为平整，向两侧望去，似乎置身于大海的黄色波涛之中。

我们沿着长长的陡峭的土坡向下行驶，绕着一个又一个急转弯，来到一处相当宽阔的谷地。从山丘顶上到谷底的高差约为975英尺。我们顺着一条洼路走了一段，又驶上另一处高坡。我们遇到了一辆道奇卡车，车上的人说他们出西安已有两个星期了，一路上一直在和土匪搏斗。

谷底一条结冰的河道上架着一座桥，但桥面当中有个大洞，大车根本无法通过。我们不时路过村庄或农舍。定西^①附近的一座桥也不能用，我们只好在泥泞的河床上行驶，结果车子抛锚了。

我们去拜访了定西县县长。他说前面18英里左右，路途是相当安全的，但再往前，就得多加提防，免得遭到袭击。为此，他派了一名军官和两名卫兵护送我们。

汽车爬行在极为陡峭的山坡上，后来爬不上去了，反而停住了，并开始向后下滑，踩闸也没用，车越退越快，眼看快到悬崖边缘了。就在这最后时刻，埃费掉转车头，擦着垂直的粘土崖壁全速向前驶去，好在粘土崖壁的质地是软的，汽车没有受到大的损伤。

汽车在险峻的陡坡时上时下，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每当越过一道侧谷或是绕过一个弯，大家都不由得暗自庆幸。

赛拉特不见了，出了什么事了？我们停下车来等他。啊，听到他的汽车声了。天色渐渐暗下来。天黑了是不能在这样的地势中继续赶路的。于是，我们在红土窑村停了下来安扎第170号营地，离开兰州已走了72英里了。当地海拔6500英尺。客栈院子里

① 甘肃省中部偏东南的一个县。——译注

闹哄哄的，挤满了大车，车上运载的是电线杆子，用来架设西安和兰州之间的新电话线。所以我们到另一处农家场院宿营，那里有足够的空间安置3辆汽车和两顶帐篷。

度过了气温为零下16.4度的夜晚，在2月4日破晓时分，我们又继续赶路了。有人告诉我们，到华家岭的这段路还算可以的，属安全地带。但是再往下走，道路状况就恶化了，而且有遭遇土匪的危险。出发前，3个卫兵坐在村外的一座塔上，打了一下靶子。他们显然是在检查枪支状况并试试手，作好应付土匪袭击的准备。

一出村子，我们径直沿一条狭窄而又陡峭的凹陷下去的路向前行驶，渐渐下行至山谷地，在谷底还几次跨越了冻冰的小溪。眼前又是一道陡峭的坡地。6个人下来推车，走了几码地，又把木块放在车轮后。小汽车的活塞环松了，根本发动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乘车是非常危险的，于是我选择了以步行的方式爬上可怕的陡坡。唉，这条路还算是新修的呢！在更高处是一条旧路，比这情况还糟。

我往上走了一段，停下脚步，等了又等，就是见不到一个人，只能时而听到喊叫声和撞击声。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出什么事了？我听到的是不是车子翻下坡去或是车子撞坏的声音？

啊，现在可以听清是发动机的声音了，是小汽车开上来了。尤寅照跑上坡，报告说路糟透了。

埃费飞跑下山，去帮赛拉特的忙。我们在原地等着，突然听到几声枪响，难道有土匪？

随后，10辆满载电线杆子的大车嘎吱嘎吱地往山上走来。其中两辆爬到我们站的最高处后，两匹马被解了下来，牵下去帮它们的同伙把载重拉上来。

尤回来了。他在一个急转弯处，被电线杆子碰倒了，失去了平衡，往下滚了好几码，幸好站住了。

最后，赛拉特驾着他的那辆卡车上来了。我们一起到了山口

(7 150英尺)。一座村庄环绕在耕过的坡地之中。这些中国农民真了不起,他们连一丁点能耕作的土地都不会浪费的。

我们在山顶上停了一会儿就又上路了。一个个转弯的地方看上去令人害怕,但这种山丘地并不难走。走一程就经过一个村子。过了左边的一座四方形碉堡后,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小山口,从这里看出去,每一个方向都给人以广袤无垠的印象。一切的一切都是黄色的——黄色的山丘、黄色的房舍、黄色的土墙。

一支由驴拉货的小商队走了过来。牲口的两只耳朵用红纸点缀着,表示庆贺新年。又过来了 20 峰骆驼,没有驮东西,它们正在向东走去。质地松软的山坡到处是被犁耕过的细长条的田地。

我们曾得到警告,从华家岭往下的一段路是土匪出没的地方。还听说,有 50 多英里长的路是在旷野中通过的。我们带了 4 名士兵,他们和我们都拿着武器,作好射击准备。

我们驶过了几道惹人注目的山岭。高处积雪融化的雪水像几条小溪往下流淌,路变得很滑。这一带倒还不完全是旷野,沿途经过了一两个村子,还常可看到耕过的田地。

有那么一棵树孤零零地立在路边,除此而外,这一带地上再没有看到长什么东西了。有时有牧羊人赶着绵羊、山羊群走过。雪水往下流经黄土地,使路面滑得像冰一样。我们老是担心汽车会从路边滑下去,掉进深渊。路边就有一辆卡车的残骸。

这条路真是令人害怕,有水时更是如此。眼前每一分钟看到的都是另一幅景致,然而就整体而言,是相当单调。小汽车经常陷进泥里,只有等赛拉特来帮我们拉出去。

在这一带危险地区,我们还得在漆黑的夜里赶两个多小时的路,真是令人紧张的旅程!我们时而爬上两边都是极为陡峭的山脊的最高处,时而又驶上至少在我们一边有一处深渊的陡峭的山坡,悬崖的边缘离我们只有 3 英尺,如果掉下去,必死无疑。

我们离开干燥的内陆,越向沿海方向走,越接近那湿润的海

风,雪量也就越来越多。即使在黑夜里,雪原也闪着白光。我搞不明白埃费是怎样驾车的,有时觉得他已经迷路了。我问他是否能看清路,他总是如往常一样,镇定自若,熟练地往下驶进一条横向的溪谷,然后向另一面山坡驶去。万一发动机或刹车失灵,汽车又像前一天那样向下滑坡,埃费又无法看清黑夜中的退路,汽车就会滑出路边,翻下山去,掉进深渊。

过了一会儿,我们遇到3个赶夜路的人。他们说我们再走3里地就有人家了。于是,我们在黑夜中继续摸索着行进。我们终于看到了几棵树和几所房屋。汽车驶进了村里的大街,在一户农家的院子里宿营。从兰州到这里已走了165英里地,再有86英里,就到平凉了。沿途我们必须翻越六盘山,车要向上爬行3250英尺才能到达山顶。此后,在到达西安之前,走的就全是下坡路了。

在马家堡旁边有一座有5个圆锥形小尖顶的烽火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类似的建筑了。这里也有一条大街,时断时续,我们顺着这条街进入了一道小山谷。那儿的路很好走,只是要通过弯弯曲曲的山丘地。

我们翻越了几座小山丘,又下行驶入谷底,路很好,约宽25英尺。汽车驶进了一座叫静宁的小城镇,我们在这里换了卫兵。碰上过年,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

为了找到新的卫兵,我们等了好长时间。县长一次次派人去叫,答复都是没有找到驻军指挥官,而没有他的同意是不能动一个士兵的。可是我们必须有卫兵,因为前方的路很不安全。

在我们等候派卫兵的时间内,县长给我们讲了许多情况。该县有60000人,镇上有14000人。这个地区有36所学校。驻军为一个团,有3500人,每年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150000块银元。士兵都是从土匪团伙中招募来的。

“有这样的人给你们做卫兵是件好事,”县长说,“因为他们和

土匪团伙关系好，他们护送的人是不会受到袭击的。从隆德^①到这里，沿途驻军都是中央军，很可靠。”

他又说：“如果你们在路上遇到6个或6个以上一伙的人，要多加小心，他们很可能是土匪团伙。”

当我们向他埋怨这一带的路太糟时，他回答道：“你们应该看看以后两个月的情况，那时这里简直是一片泥沼。现在倒是冻得结结实实的。”

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动身了，汽车从东门穿了出去。

我们沿着一条狭窄而深陷下去的路，来到到处是积雪和浮冰的谷底。路是好走的，它顺着山谷之上的土坡蜿蜒向前，还设有栏杆。

一支庆贺新年的队伍走了过来，队伍前面是一头黄纸做的大狮子，后面跟着打旗的。这些贫苦农夫看上去满足而高兴，享受着一年之中最重大节日所带来的一点点乐趣。但是，他们不喜欢新建的路，因为修路占用了他们的一长条土地，却不给任何补偿。

有时候，路的两边有树。我们遇到了131峰载着货物的骆驼，在寒冬的景色中构成了一幅欢快的别具一格的画面。

眼前是一条保养良好的宽阔的道路，两边是成行的赤杨树，很好看。一大群黑猪正被赶往西安去。路面真是棒极了，只是有时会缩成一条狭窄的凹陷的路。

这天是王月初二，路上来往车辆很少。大一些的店铺停止营业两个星期，小一些的店则只歇一个星期。门上贴着红色条幅和横披。就是商队也点缀着节日的气氛。每一支商队的第一头骆驼的驮鞍前桥上都披挂着红绸带。

天色擦黑时，我们到达隆德的城门，接着去县长的衙门。县长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房间的布置很一般，非常简陋。窗前放着

^① 县名，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与甘肃省邻接。——译注

一张桌子，桌上堆放着文件。一张小茶几，7把椅子。靠稍窄一些的里墙是他晚上睡觉的炕。窗户有木框格子，糊着白色窗纸。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是找不到玻璃窗的。有一面墙旁边有一个带烟筒的、构造原始的火炉。木头做的洗脸盆架子上放着一个马口铁做的盆子。小房间实际上兼作办公室、接待室、起居室、洗脸间和茶点室，而且是整个衙门里唯一有取暖设备的房间。甘肃的县长，即使是大县的县长，都过着同样简朴的生活——住处狭窄、家具简陋、室内又冷又脏又暗。

我们正和县长说着话，两名军官走了进来，询问能否搭我们的车。我们回答说，欢迎他们护送我们。

我们听说在过去两年半里，隆德被土匪洗劫过9次，因此，至今还有大片废墟。最后一次抢劫也不过是不到一年前的事。有的居民被杀，其他的都逃走了。现在，有些人已回来了。一般来讲，路上最容易遭到抢劫的是商人。官府和军方的汽车都平安无事。

据估计，去平凉的路程有43.75英里，其中10英里是在六盘山中穿行。我们被告知，道路不像我们翻越山口时所走过的坡路那样陡，那样难走，也不会有什么积雪挡住路，但夏季的道路常被雨冲坏，路面滑，很危险；甚至交通常常因此而完全中断几个星期或更久。

和我们见过的其他几位县长一样，隆德县县长也告诉我们，农民在尽量把自己的房屋和财产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逃避苛税的重负。他们也不送孩子去上学，因为读书费钱。

这个小城镇住着300户人家。整个隆德行政地区有6000户。中央政府在此驻军250人。

雪下了整整一夜。2月6日早晨，雪还在飘着。我们是住在衙门里。县长亲自出来和我们道别。他坚持让7名士兵护送我们，因为这个地区被认为是很不安全的。

我们从兵营接走了卫兵，便驱车驶人耀眼的皑皑雪原。一支

由 30 个士兵组成的队伍正向东开拔,兴许是去剿匪的。

公路上的积雪已有几英寸厚。我们先是凭着路边的树找路,但到没有树的地方后,路全被雪盖住了,我们就踏着由驴驮载货物的商队留下的脚印,向前摸索着走。一路上经过了几个村子。

地面开始升高。汽车在山丘地和拐弯处行驶时总打滑摇晃。路上的雪越来越厚,我们在小汽车的后轮上装上了应急用的防雪链。现在,我们要倍加小心地向上爬坡了,而且要在坚硬的岩石上行车。路呈锯齿形状向前延伸。路面铺得很平整,路边有低栏杆。一层穿不透的雪帘为田野披上了银装。我们的能见度最多不超过 30 码。雪仍在不停地下着。

在一两处陡峭处,路没有修完。土路相当窄,那些外突的岩石块还没有炸掉。汽车已无法继续行进,刚走几码远,贾贵就得用石头卡住车轮,防止汽车再一次向后下滑。成堆的雪必须清除掉。我们遇到的唯一过路人 是 3 个用竹扁担挑着箩筐的小贩。在这种天气,大多数人都是闭门不出的。

绕过了几处大转弯后,我们到了一个山口,高约 8 400 英尺。下山的路呈锯齿形状曲折盘旋。雪下得更大了。一团一团雪从汽车顶上滑落下来。

过了一会儿,雪下得没有那么大了。我们看到下面的山谷里有一个村子,还有一片片树林,村子叫和尚铺^①。我们过了一座桥,一支骆驼商队正在那儿休息。野鸡在离房舍很近的雪地里跑来跑去。同我们随行的 7 名士兵跳下了车。

我们又遇到了一支骆驼商队。驮载的箱子里装的是兰州产的烟草。我们顺着一条宽阔的山谷朝前走,两边有若干侧谷。周围有几只野鸡,都蹲在地上,等我们离它们只有几码远时才飞开。

山谷渐渐变窄了。在一处很窄的地方,是三关窟的 3 座小庙,

^① 在隆德县东北方向。——译注

坐落在这峡谷,真是美不胜收。这里的路筑在山谷的右侧,修得很好,有栏杆。

下午3点钟,我们驱车驶进平凉的西城门,沿一条长街而行,内地传教会在比设了一个传教站。我们在县城当局的衙门外停了车,结果里面没人。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这次是和赛拉特驾的车同行。这条很长的街简直是一片泥海。雪被铲到了路当中,影响了交通。这里又湿又脏,穷困得令人难以忍受。

出了东城门,车子过了一座坚固的桥。黄昏时分,我们到了四十里铺后就歇了下来。这里的海拔是4050英尺。行车已近8个小时,可是仅前进了60英里地。

2月7日早晨,照旧是阴暗的天气。气温一直保持在零下7.4度以下。

我们继续赶路,穿过宽阔的山谷,行进在越来越低的山丘之中。汽车驶过村庄、街道、农舍、矮小的树丛和桥梁。许庄(音译)是个相当大的村庄。街上见不到人影,人们都在家里打麻将,喝茶,抽鸦片。几天前,有一辆客车遭劫,乘客的钱财、贵重物品和衣服都被抢走,汽车倒放行了。

林荫小道一直向前伸展着,但是,汽车走的路是在它的外侧。

中午时分,汽车转了一个直角弯,往左下行至泾河。我们过了几条结冰的支流。接着,埃费驱车驶入主河道,不想车子越陷越深,水竟灌进了车里,放在底板上的东西及时抢救到了上面。我们只好把脚抬起来,搁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大家就这么坐着,看着水一点点涨高。幸好没等多久,赛拉特驾车过来,把小汽车拖了出去。

刚过一会儿,我们又得过河,于是,同样的一幕情景又重演了两次。赛拉特又来相救,但是有一次险些连他自己也搭进去。

汽车从塌了的城门口驶进泾川^①，顺着狭窄的主要街道前行，车子一过即成了一条凹陷的路。结果，我们走的路不对，只好掉头回去，经人指路，才找到了东关（即东城门）。车子沿着右边被雪覆盖着的山丘脚下而行。山谷渐渐变窄。右边耸立着泛红的黄土陡壁。左边是河。我们从架在一道侧谷上的桥上过了河。路顺着令人厌烦的陡坡爬上了一道山岭。眼前的景物因雾重看不清楚。一处处黄土峭壁形状各异，十分奇妙，有的似房屋、壁墙，有的则如碉堡、高塔。

汽车继续向上爬行。一条林荫小道上的树罩上了一层白霜，似石膏制成一般。车在山丘地顶部走了一程，上面很冷，积雪很厚。林荫道已走到尽头，要不是有几辆中国卡车走过，那就无法再找到路了。

甘肃和陕西之间的分界线正好穿过窑店村。我们经过时，看到几处孤零零的农舍。又过了一个村子，旁边有一座立有墓石的坟墓。还遇到一支 200 峰骆驼的烟草商队。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微微倾斜而又凹陷的路下行至相当开阔的山谷，流贯其中的一条河汇入泾河。车从破桥上过了河。

天色由昏暗渐渐变黑。经过一天 90 英里的奔波，我们驶进了邠县^②县长衙门。听说这里有 3 000 居民。海拔为 2 600 英尺。

汽车在一片红色粘土的景色中时上时下，我们又一次置身于迷茫的大雪之中。一群群猪正被赶往西安的屠宰场。

我们现在又在顺坡下行。山丘已经很低，与两侧地势趋平，我们已进入了平原。在乾村^③门口，士兵拦住了去路，提了些一般性问题。漫长的险路总算到此结束。我们再也不用揪着心在悬崖边

① 县名，位于甘肃省东北部泾河中游，与陕西省邻接。——译注

② 旧县名。位于陕西省西部。1964 年改称彬县。——译注

③ 即乾县，在陕西省咸阳市西北。——译注

赶路,也不必担心土匪的袭击了。车马来往越来越频繁,大车、卡车一应俱全。头顶上,一群大雁从西南向东北方向飞去。

我们行驶在一马平川上,大雾在四周形成了淡淡的地平线。

一路上,我们穿村子,过城门,回答士兵的盘问。在一个村子,士兵说,他们在等3辆瑞典人乘坐的汽车。但从兰州出发后,我们便再也没有见到生瑞恒和他驾驶的卡车,所以只有两辆车。因为车辆数目不吻合,士兵们疑惑不解,经过了一番交涉,才放行。

下午2点钟,我们路过了四周围有高大城墙的咸阳。汽车驶过3座筑有城楼的城门,来到渭河上的一座木桥。渭河真是一条大河。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了西安的西城门,此城又称为长安。这里可以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我们探险的终点。

我们下榻西北饭店,住在半欧化的小房间里。

西安,其意是“西方平安”。这座汉、唐等朝代的著名古都成了我们勘察公路漫长旅程的最后宿营地——第175号营地。2月8日这一天行程80英里,是我们丝路行的最后一天。

因此,我对此旅途的记述也该在西安告一段落。

在西安逗留几天后,我们乘火车前往南京,受到了政府如对帝王一般的欢迎。我自己有幸受到高龄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接见,并应邀谒见蒋介石将军,当时他的总部设在汉口。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邀请全体探险队员赴宴,并且在他的同僚面前发表了欢迎我们归来的演说,令人难忘。在另一次庆祝活动上,出席的有行政院院长和250名政府官员,我在这次会上以讲演的形式就这次旅行作了第一次报告。我70岁生日时,人们诚挚的关心也深深留在了我远东之行最值得骄傲和最珍贵的记忆之中。

随后,我和曾在北京见过面的艾利克·那林博士前往上海。瑞典总领事林奎斯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后我们启程经北京回国。在北京,我们受到了许多老朋友的赞扬。我们取道满洲到新西伯利亚,在德国领事格罗斯科普夫那里做了一天客。过去8

年中，他给了我们探险队极为有力的支持。

1935年4月15日，我们又踏上了瑞典的土地。从到的那一刻起，瑞典人民一路欢呼把我们送到了斯德哥尔摩。长期担惊受怕的亲朋好友就在那里迎接我们。当晚，我们所有住在瑞典的探险队员都参加了在我家里举行的晚会。我不能不为他们都活着而感到庆幸，同时也由衷地感谢他们在以往的岁月中对我所表现出的忠诚。

至此，从我第一次离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考察最边远的亚洲的事业起，正好过了半个世纪。

后 录

关于 1934 年我们实地考察的情况,就到此结束。看来外省不可能得到什么有关新疆事态的可靠消息。即使对整个中国的事,也很难了解得非常确切。

中国内地和蒙古的古代商路在进入新疆的东部边界线上被封锁了。在新疆设有领事馆的两个国家是俄国和英国。在莫斯科和伦敦的外事机构一定掌握确切的第一手情报,但是,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这类情报是保密的。传教团——喀什和莎车的瑞典传教团、英国内地传教会和德国在乌鲁木齐的圣言会——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危,在报告消息时,必须谨慎小心。有时,英国报纸上会偶尔披露一段关于亚洲腹地这块封闭地区的报道或一则似是而非的传闻,在游记中这类消息更是凤毛麟角,又何况在目前这种政治条件下。这方面有例在先:英国的女教士盖群英和冯贵石的报道^①,新闻记者傅勒铭的《鞑靼通讯——北京至克什米尔之行》(1936 年

^① 两人均为英国内地传教会女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 1880—1952),在华传教多年。1926 年与冯贵石(Francisca French, 1869—1960)及其妹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 1872—1960)自甘肃酒泉出发,经乌鲁木齐至中亚。3 人曾合著《玉门和中亚之行》(Through the Jade Gate and Central Asia, 1927)。另,盖群英与冯贵石合著《戈壁沙漠》(The Gobi Desert, 1942)。——译注

出版)^①;而欧文·拉铁摩尔的精彩记述^②,却是完成于叛乱暴发之前。

埃里克·台克满爵士^③的《回疆旅行记》,是记叙新疆叛乱达到高潮后情况的最好的一本书。该著1937年出版。它记述了一次沿着中瑞汽车探险队的足迹而完成的汽车旅行。这条路线从百灵庙开始,经戈壁滩,过额济纳河,到哈密、乌鲁木齐、吐鲁番、焉耆、库尔勒和库车,然后经巴楚到喀什。生瑞恒帮助组织了这次探险队。台克满雇用了赛拉特和卓木恰这两名蒙古族司机,拿走了我的一辆1933年福特卡车。台克满曾任大英帝国驻中国领事约30年之久,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人的心理了解得十分透彻,并且深谙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中要取得成就所必备的老练机智的外交手腕。

台克满是在1935年最后4个月完成这次旅行的,正值我在《马仲英逃亡记》、《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3本书中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不久。为观察新疆近来的动态,在这里概述一下台克满记述的要点,是极为重要的。

他记述了1932—1933年的形势,当时维吾尔人、柯尔克孜人同东干人结盟,在塔里木地区对抗汉人。1933年初,维吾尔人在喀什占了上风,围困了新城即汉城中的东干军队,里面还有汉人的堡垒。

1934年春,马仲英(“大马”)被打败,据说他后来撤退到喀什,

① 傅勒铭(1907—?),一译弗莱明。英国新闻记者、作家。30年代以《泰晤士报》特派员身分来华,到东北、新疆等地采访。还著有《刺刀指向拉萨》、《北京围困记》等。——译注

② 指《通往新疆的荒漠道路》。——译注

③ 台克满(1884—1944),1907年来华。还著有《一个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1921)、《一个领事官在藏区东部的旅行》(1922)等。——译注

给当地的东干驻军解了围,推翻了维吾尔政权,自己掌管了政府。

然而,东干人在喀什统治的时间并不长。1934年7月,一支由俄罗斯人、满族人、维吾尔人和蒙古人联合组成的省辖部队进击喀什,赶跑了东干人。东干人不战而退,逃到了叶尔羌和和阗。出人意料的是,马仲英和俄国总领事达成了协议,可能还得到了人身安全的保证,他逃到了俄属突厥斯坦^①;结果,他和120名随从全部被缴了械。据传闻,他被押解至塔什干,后又送到了莫斯科。马仲英从舞台上消失后,马虎山统率了东干军队。

1935年,东干人和汉人之间没有什么激烈的战事。新疆在其军事总督盛世才的统治下比较平静。除位于叶尔羌河和塔里木之间离罗布泊不远的南部地区外,盛的势力已控制了全省。

因此,当时被认为是英国发挥影响的大好时机,应该派遣一个外交使团,到乌鲁木齐谈判在新政权统治下的新疆和印度之间的边境问题。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有:印度贸易、留在新疆的印度商人所需的条件、印度西北边境的和平与安全以及英国在中国沿海地区和新疆之间在贸易上的通讯联系。

从1890年,英属印度就在喀什派驻了总领事。第一任总领事是荣赫鹏爵士(当时是上尉)。1903—1904年,在寇松勋爵^②的支持下,他率军入侵西藏,占领了拉萨,由此闻名。1890年,我曾和他及乔治·马嘎特尼爵士^③在喀什共度圣诞之夜。1935年,总领事换成了汤姆森·格洛弗上校。他奉命到乌鲁木齐会见台克满爵士。他们和盛世才谈判后,两人一起回到喀什,台克满随后又赶往印

① 指原苏联中亚一带。——译注

② 寇松(1859—1925)于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1919—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著有《1899年俄国在中亚及英俄问题》等。——译注

③ 马嘎特尼(1867—1945),中国名字为马继业。后曾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译注

度。

台克满发现乌鲁木齐与南京方面的关系很冷漠,这和我们在1934年所见是相同的。理论上,该省在南京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和中国其他边远省份一样,新疆是自治地区。杨增新死后,公开的独立运动有增无减。新疆和中国内地隔着广袤无垠的荒漠。这个省份之所以与中国背道而驰,并因经济上的依存与邻国俄国靠拢,正是这种地理位置造成的结果。此外,俄中边境地区居民的人种和语言相同,为政治上的友好关系提供了基础。盛世才坦率地告诉台克满,在他和马仲英的生死之战中,他没有从南京方面得到过任何帮助,倒是俄国给了他慷慨的支持。

1932至1937年间,喀什及其周边地区诸多磨难,瑞典传教士和他们开办的学校和医院几乎一直处于危急之中。

1935年年底台克满到达喀什时,那里名义上是3人执政,实际上政权牢牢控制在乌鲁木齐手上。这3个人是1934年率领一支败于满洲日本人的军队来乌鲁木齐的刘彬将军、优柔寡断的道台徐廉和上了年纪的吐鲁番商人马赫穆德。

俄国总领事特斯科洛夫是个强硬而有影响力的人物。英国总领事尽力支持中国,抵制俄国影响。台克满认为,俄国在沙皇时代对新疆施加的压力比现在厉害,不过,我在这点上不敢苟同。自1928年以来,俄国的影响显然日益增强。1934年,俄国人提供卡车、武器、弹药、飞机和军队,帮助乌鲁木齐政府击溃马仲英,从此,他们在新疆的政治势力更是无可置疑地扩大了,几乎没有限制。要知道,是俄国人打败了东干人,而不是盛世才。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汉人和东干人之间的战争进程就大不相同了。

1935年有人担心,新疆的命运兴许会和外蒙古一样,变得完全依赖俄国。俄国人当然否认自己有占领该省的任何意图。我在1934年得到的强烈印象是,俄国人的欲望是要掌握该省的全部贸易,并能左右其经济事务。如果他们能够得手,就完全没有必要花

昂贵代价去装备军事占领所需的一切——守卫队、军用道路的建设、民政组织的建立等等。

但是，自 1934—1935 年后，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时起，日本攻陷了察哈尔、绥远和山西。这些中国北方省份是以往前去新疆的贸易大道和商队所走的主要路线的起点。如果日本人对亚洲并不就此罢休，继续以目前的速度推进，新疆就可能成为日本和俄国争夺的一块骨头。

和瑞士一样，新疆也位于大陆的心脏部位，同时，它也像瑞士一样，处于利益各异的列强的包围之中。但有一点不同于瑞士，新疆不能自立。它的军事力量少得无足轻重，因而与它相邻接界的英属印度、俄国、中国西部其他省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有增无减。日本自占领华北各省和商道后，也可算作是与新疆相邻的一个国家了。

新疆对印贸易已近乌有，无需予以重视。对俄贸易几乎已占绝对优势。对内地省份的贸易已被卡死。俄国与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通往该省各中心的贸易路线，因此，对它来讲，要挤掉这方面的竞争对手是轻而易举的事，也是顺理成章的。甚至到 1934 年，俄国在新疆的势力都是南京中央政府根本无法与之相比的。战争爆发后，可以有把握地说，南京的影响已没有什么作用了。

但是，1934 年至 1935 年后最大和最为重要的变化还是新疆战略地位的改变。这是中日战争的必然结果。很可能是已经攻陷满洲、热河和内蒙古的日本，企图将外蒙古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就可以从侧翼包抄西伯利亚和俄国在远东的主要交通干线——横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要完成从侧翼包抄并使之有效，也必须纳入新疆，即形成阿勒泰和准噶尔地区与西伯利亚、塞米巴拉金斯克和苏尼尔吉茨钦斯克相对峙，新疆南部地区与俄属帕米尔、费尔干纳和俄领中亚相对峙的局面。

1930年,俄国建成了塔什干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之间的土西(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铁路沿新疆西北边境而行,离那里不远。这样就使俄国在战略上比日本更容易支配新疆。在铁路没有出现之前,日本的漫长交通线就只能穿越戈壁沙漠。

但是,如果现在或在将来某个时候,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能否主宰亚洲,新疆的地界纵然难以到达,却也不足以成为日本或俄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了。新疆在古代常常是血雨腥风的战争的舞台。1934年中瑞汽车探险队的成员有机会亲眼目睹了那里打仗的情形。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有牵着满载枪支弹药的军用骆驼到孔雀河和罗布泊岸边饮水的情景出现,那也许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而在1934年春天,我们却是那一带方圆125 000平方英里内唯一的涉足者。但是,很难想象竟是我们1934—1935年为这些骆驼筹建规划了穿越沙漠和山岳地带的道路。

我们已经看到,早在75年前,英国就希望阿古柏^①的领地——占今日新疆省的大部分地区——得到加强,使之成为对付俄国南进势头的缓冲国。阿古柏的王国破灭后,英国关注的同样是,中国能否维持和强化对该省的统治。对于英国来说,日本也同印度西北边境的邻国俄国一样,是不受欢迎的。然而现在,中央政府的影响被挤出新疆,俄日之争有可能越演越烈时,英国却无能为力,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了。首先,运送军队、大炮和汽车越过提尔吉特^②和喀喇昆仑山口^③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其次,大英帝国

① 阿古柏(1821—1877),中亚浩罕汗国安集延人,曾任汗国高级官吏。1867年于喀什自立“哲德沙尔”(意为南疆“七城”)汗国。勾结英俄帝国主义,出卖中国主权。1877年在当地人民和清军打击下被部下击毙(一说自杀)。——译注

② 在克什米尔境内。——译注

③ 在克什米尔与新疆的交界处。——译注

在印度境内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没有能力再翻山越岭进行任何汉尼拔^①式的冒险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喀什及其四周近年来的事态,可从瑞典方面得到许多可资补充的信息。

那是在1934年4月,马仲英和马虎山两位东干将军率残部来到喀什。马仲英几次拜访瑞典传教团,还和传教士打网球。他的球打得很好,也玩得很高兴,给人的印象是有礼而又专心。他和俄国总领事交谈过几次,有可能已被说服在伊尔克什塔姆^②这个地方过境。马虎山不同意离开新疆,但是当马仲英坚持己见,而且真的付诸行动时,马虎山就成了东干军司令,并控制了叶尔羌河和婁羌之间的地盘。至1937年8月,和阗一直是他的总部的所在地。

1936—1937年,红色俄国在新疆开始进行“无神论”宣传。喀什地方上了年纪的维吾尔人和商人抵制了这一运动,但年轻一代却屈服了。老木索尔拜的一个兄弟、我们在吐鲁番的一个朋友麻木提师长或麻木提将军^③,是喀什维吾尔居民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完全站在乌鲁木齐一边的红色俄国人和追随他们的中国人的反对者。

麻木提师长及其维吾尔军队和马虎山及其东干部队联合在一起。这支联军有15 000人。马率领自己的军队前往喀什。那里的老城投降了,四周围有高墙的新城即汉城却一直对抗,被围困3个月之久。马虎山自己乘一辆卡车,率领部队经伽师和巴楚前往

① 古代迦太基元帅,长期转战意大利各地。以越过阿尔卑斯山隘行军著称。——译注

② 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与新疆邻接。——译注

③ 麻木提(?—1944),新疆吐鲁番维吾尔族,商人出身。1932年在和加尼牙孜手下任师长。1934年5月投靠盛世才,任喀什警备副司令、第六师师长。1937年反盛世才兵败,逃往印度。——译注

阿克苏。他攻占了这个地方,不过新城没有能拿下来。这时,红色俄国的宣传生效了,东干人和维吾尔人吵翻了,但都退到了喀什和莎车。一大部分东干军倒向了俄国红军。

1937年春天,麻木提师长告诉他的随从,他要到山里去打猎,然后朝英吉沙的方向走了。他走后,驻守喀什的维吾尔军队全部出发去莎车了。麻木提师长在莎车城外见到了自己的部队。他将指挥权交给了一两名得力的助手,自己则在木索尔拜的陪同下出发去印度了。

俄国红军和汉人军队以及马虎山东干军的许多逃兵联合占领了新疆的西部地区——莎车和喀什。维吾尔人是狂热的穆斯林。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法调和,不肯倒向红军,因此很多人被杀害。约有1000人想方设法去和阗,结果经过沙漠时就被追上,全部被机关枪撂倒,一个人都没剩。喀什所有抵制过“无神论”宣传的维吾尔人都遭杀害。其中包括当地的全部富商,他们在晚上从家里被搜查出来后就失踪了。许多人被推进坑里活埋了。一些无辜的人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也被卷入这场残酷野蛮的清洗。

当我们这位自吐鲁番和库尔勒就相识的朋友马虎山发现大部分将领和部队已背弃了他时,他感到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便带着1000名亲兵越过喀喇昆仑山口去拉达克了。途中,他有根据地怀疑他的参谋长是一名被俄国人收买的间谍,亲手枪毙了他。

英国联合特派员在拉达克迫使马虎山离开他那支不得不在列城^①周围的山中野营的部队。他本人获准去印度,但他随身带的300磅金砂被没收了。英国正当地认为,这些金子是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那里偷来的,尽管这个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治着新疆。

能干的白俄青年沃罗特尼科夫1928年在乌鲁木齐参加了我

^① 位于克什米尔境内。——译注

们的探险队，给赫默尔和郝德两位博士当助手。1933年前，他又一直是尼尔斯·安博特博士的助手。他离开探险队后，又到喀什的瑞典传教团印刷厂工作，当时正在印刷《新约全书》的一种维吾尔文新译本。沃罗特尼科夫在各种场合的谈吐似乎有失检点，说了些诸如不重视教育等等的批评红色政权的话。1937年夏，有一天一个红色俄国人来到沃罗特尼科夫在瑞典传教团的住处看他。这个俄国人受到了很有礼貌的接待。他进屋坐下来闲聊了一杯茶的功夫。他走后不到一刻钟，替俄国秘密警察当差的约50名维吾尔人包围了传教团。其中8个人闯进了那个年轻白俄的屋里，没收了他的全部书籍和文件，并命令他跟他们走。犯人心里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请求准许他跪下来做祈祷。维吾尔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对作礼拜（“乃玛孜”）是尊重的。然后，他被投入了维吾尔监狱。传教士们尽了一切努力营救他，却很难与他联系上。后来他们从和台克满爵士一起来喀什的英国总领事格洛弗那里获悉，我们年轻的俄国朋友被红色俄国人押解到阿克苏枪决了。

这段插曲能让人大致了解喀什目前的状况。有一次，150名犯人一起带出牢房，还没有走到露天，刑警队就开枪扫射，只有20个人逃了出来。

在其他方面，新权贵们对传教团还算尊重，这大概因为他们发现传教士们根本不关心政治。传教团约有100名改信基督教的教徒，其中7名是去年改宗皈依的。多数维吾尔族基督教徒都在大屠杀期间失踪了。

今年^①初刊行了《D—Anoy 飞机征服帕米尔——德国人的一次冒险飞行探察记》这本值得称赞而又令人激动的书。作者冯·加布仑茨男爵使我们窥见了1937年8月和9月间新疆南部的形势。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他和两个同伴在8月28日迫降在和阗绿洲

^① 指1938年。——译注

东缘的洛浦巴扎附近。

这些德国人从滕珀尔霍夫^①飞到西安，目的是要开辟柏林——上海之间的定期航线。这条航线比我在1927—1928年为汉莎航空公司所规划的还要向南^②。他们在返回柏林的途中，在洛浦出了故障而着陆，一下子落到了东干人的魔掌之中。

他们被当作犯人，关在和阗的碉堡里达一个月之久。但在此期间，他们还是弄到了一点消息，探明了外面的局势。他们听说阿克苏那里正在打仗，交火双方是乌鲁木齐和喀什的军队。他们还看到士兵们正在使劲加固和阗的防御工事。不久，附近也响起了枪声，士兵的尸体抬进了碉堡。

犯人们了解到，“大将军”马上就要从喀什来了。他们还听说来的人是东干军第36师师长，也就是我们在吐鲁番结识的朋友马虎山。此人已从喀什动身，到阿克苏去打乌鲁木齐的军队。后来，他打了败仗，他的部队背弃了他，经皮山向和阗开拔，打算再经且末和婁羌去库尔勒，和那一带的叛军会合。冯·加布仑茨的这些记述证实了先前根据其他消息来源所作的报告。

和阗指挥官马福元将军在这些德国人迫降后就把他们关押起来。他原来一直听命于马虎山，现在听说他吃了败仗，于是就背弃了他。当败军逃到和阗时，马福元拒不放他们进城。这就是德国人听到交火的枪声、看到尸体被抬进碉堡的原因。

和阗准备迎接的那位有权决定德国人命运的“大将军”叫马生贵^③，是他在阿克苏打败了马虎山。

马生贵将军到了和阗，下命令释放这几名德国飞行员。就这

① 在德国柏林郊区。——译注

② 这是1927年开始的瑞典—德国—中国探险队的由来。——原注

③ 马生贵是马仲英旧部，随马虎山占据和阗。后背叛马虎山，成为36师代师长 —— 译注

样,他们在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终于又能踏上归途了。

就在冯·加布仑茨在和阆遇险之前不久,还有一个德国人即从事地磁观测探险的费通起博士^①也到过那里,也被当成犯人关押了一段时间。他最近才返回德国,有关他探险经过的详情还没有对外发表。

2月中旬,已有消息表明,瑞典传教团的处境已不那么危急。但似乎可以肯定,喀什—莎车地区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俄国的影响正向东推进,红色恐怖已到了最野蛮的地步。可以预计,如果喀什的屠杀在亚洲腹地拥有穆斯林人口的其他城镇重演,穆斯林和红色俄国之间必然爆发一场殊死斗争,因为我已说过,穆斯林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天然的敌人之一。一场宗教战争会像燎原烈火一样燃烧到俄领中亚的穆斯林领地和甘肃的东干人地区。由于俄国是中国对日本的拼死之战中唯一可以取得有效支持的国家,中国人同情布尔什维克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这种联盟会使中国在将来面临某种危险,目前也顾不得许多了。

远东的这场战争,是由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戏剧性事件组成的,其影响远及大陆腹地的新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果断、精力最充沛的国民和一个作为战略家、政治家和爱国者的当代领袖中最伟大的人物之间的决斗。

1937年12月22日上海来电说,中国人决定修筑一条穿越亚洲心脏直达俄国边境的公路,以便从俄国运送武器弹药到中国。规划的这条路线从四川出发,经甘肃首府兰州,到新疆的第一座城镇哈密,再经过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到达俄国边境。

连结兰州和哈密,并可服务于上述目的的唯一道路,就是古代连结中国和西方的那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从前,在西安和长城

^① 费通起(1877—1957),音译为“威廉·菲尔希纳”。曾多次到中国西藏和帕米尔、尼泊尔考察。——译注

西端的嘉峪关之间的一段路,被称为皇家驿道。道路由此向前延伸,经“游移的湖”罗布泊和楼兰古城,到库尔勒、库车和喀什,然后通过几个国家,直达地中海沿岸。“丝绸之路”是后人给这条路起的名字,因为大批的中国丝绸经这条皇家驿道运往西方,前后持续500年之久。

丝绸之路东段是一条道,路线是:西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敦煌。但到了敦煌这最后一处绿洲时,分成3条支线。中线过罗布泊;北线经过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南线则路过婼羌、且末和和阗。这3条支线在喀什再度汇合。

上海电文中提到的这条路,到了安西就要与皇家驿道分叉,然后沿北线到哈密和吐鲁番,接着偏离丝绸之路,往右而行直达乌鲁木齐。此后,道路继续向西北延伸至玛纳斯,再往北至塔城,这里离俄国边境已很近了。俄国境内第一站是巴赫特,离阿亚古斯站180英里,这个站与土西铁路线上的谢尔吉奥波尔很近。

电文中提到,所规划的这条路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两个终点站之间的距离为3000英里,似乎有所夸大,不过这取决于终点站设在哪里。1927—1935年瑞典探险队考察期间,我驱车走完了这条路的全程,还几次探察了北线的几个路段。我已说过,从谢尔吉奥波尔到巴赫特和塔城的路程为180英里;从塔城到乌鲁木齐有372英里;而从乌鲁木齐到兰州则近1200英里了。那么,从俄国铁路线上的谢尔吉奥波尔到兰州的总长大约有1800英里了。最简便的计划应是从兰州通到西安,但是西安离黄河太近,极易受到日军的侧翼进攻,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电文中才谈到了从四川出发,而不是西安。

然而,读了电文,不能不产生某种惊讶和怀疑的感觉,因为从兰州到四川首府成都要通过岷山等山岳地带,把山路变成能够承受大车的道路,都已经是一项费时又费力的工程了,更何况是建成公路了。

从谢尔吉奥波尔到兰州,全程 1 800 英里。关于这条路的情况,在我撰写的《戈壁沙漠之谜》和《马仲英逃亡记》两本书,特别是在本书中均有记述。因此,没有必要再在此多谈它的价值了。事实是,我和瑞典、中国同事能够驾着卡车奔驰在这条路上,每辆车的载重量是两吨多,而且是在冬天。这就足以证明,用这条路线运输沉重的物资是毫无问题的。

如果电文所说属实;确实已在动员 70 万劳工、监工和专家去筑路、养路,并尽全力护路;这就清楚地说明,此项巨型筑路工程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要把一条 2 000 英里长、原来是为骆驼商队和靠牛、马、骡拉的两个轮子的大车所准备的路,改造成为现代化公路,这种努力不能不令人钦佩,它充分显示了中国最高当局的意志和力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是下定决心,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抵御处于优势的敌军的侵略,如果不是深信他们可以依赖愿意为保卫国家作出一切牺牲的人民,他们就不会在隆冬季节动员 70 万人开展如此浩大的工程。

我不能不指出,这次探险和电文所谈的筑路的伟大工程之间,不管怎样,显然在事先早已有一种奇妙的联系。在从兰州经哈密到乌鲁木齐的一路上,也就是要修筑的这条公路沿途,都有我们留下的车辙,或许就是在现在,在不受风雨侵蚀的山谷中,还可以看到松软的地上残留的车轮痕迹。

1933 年 8 月,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指派我这个外国人率领一支汽车探险队从中国内地开赴新疆,并规划两条穿越沙漠的道路。这可能说明,他已预见或猜测到事态的发展,并意识到,修筑通往中国西端的省份新疆的公路,在某种形势下是有用的。

当然,1933 年夏,当由我领导的汽车探险队计划制定出来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要和日本打仗,更想不到这场战争来得如此之快。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明智作法应该是,根据我们 1935 年 2 月 12 日返回南京后提交的方案,立即动工修路。当初他们要是这样做了,

那么在战争爆发前,就可及时修通到乌鲁木齐的公路了。

现在不得不十万火急地完成这个工程了。等路修好,会不会太迟了呢?这项事业需要做庞大的组织工作。可以想像,一个个卡车车队满载人员和工具,投入亚洲腹地,绿洲居民的劳力也将动员起来,这样就可以在沿线的各个路段同时开工。

有些路段已经完成得相当不错了,无需再做什么或只要稍加修整即可。俄国地区的谢尔吉奥波尔和塔城之间这一段是一流的公路。实际上,计划在那里修筑的铁路可能已经在运行了。塔城至乌鲁木齐这段路可能正由俄国人修筑。可以断定,俄国人当然会像在新疆内战中所做的那样,为工程提供“阿莫牌”汽车。1934年,我和尤寅照被扣押在乌鲁木齐达4个半月之久,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俄国对这个省份的影响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路段可能起用的是俄国工程师和劳工。实际上,由他们修筑的路段甚至可能更远些。

在甘肃的肃州和凉州之间,“基督将军”冯玉祥1926年修筑了几段路,旨在今后开通公路。冬季筑路的一大困难是地面冰冻。但这又是这个季节的一大优势,因为在别的季节可能会淹没道路的数以百计的用于灌溉的水渠,此时却被冰封住了。

电文中说,假设道路状况良好,两星期就可走完全程。这并不夸张,中国司机的驾车技术非常熟练。

在丝绸之路上度过的漫长而辛劳的几个月中,我哪里会料到这条公路在短短的3年中竟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我接到上海的电文时曾为此感到惊诧,如果我比任何一个欧洲人更关注横越世界上这块最大的大陆,并在那里顺着我们探险队破旧的汽车所留下的车辙探索着筑路工程的走向,那么,我就应该得到谅解了。

尤寅照和龚继成这两位中国工程专家,是我探险队的队员。他们的任务是绘制地图,研究并描述我们建议的各条路线的细节,

测量所有需要架桥的河道、灌溉沟渠和峡谷。简言之，他们的报告中要包括筑路工程开工所需要的全部资料。

尤给我寄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37年12月25日。他告诉我他奉命去西安，从那里沿我们过去留下的车辙，一直到乌鲁木齐，然后再乘飞机返回西安。3年半前我们曾被扣留在乌鲁木齐，遇到过诸多让人烦恼的事，如今在那里等候他的却是盛世才和蔼而热情的款待了。

从不同渠道来的报告都一致认为，1937年秋天，苏俄代表不只是在商业上，而且也在政治上主宰中亚。《泰晤士报》德里2月10日电证实了这些报告。电文内容如下：

作为中日战争的一种结果，俄国在新疆的影响正在得到巩固。近来在喀什反叛省政府^①的东干军领导人现正准备支持中国军队。

喀什东干军的前领导人马仲英将军曾在莫斯科被苏联当局扣押了一段时间，后从那里到达新疆，为了援助中国军队，正在前往甘肃的途中。他的异母兄弟马虎山将军在东干军反叛失败后，已在前些时候逃往加尔各答，现在也请他去支持中国军队，据人们的看法，他前往甘肃已是确定无疑的。

据报道，塔什干有150名新疆少年正在俄国人保护下接受教育，他们正被转入当地的军事学院，不久还将有200名新疆青年和他们一起学习。

如此这般，马仲英这个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在莫斯科幽禁了近4年之后，突然又出现在中亚辽阔的幅员之上。

有一份电报简要地提到，他“已从莫斯科抵达新疆”，那么他走的哪条路线？也许是先乘火车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和谢尔吉奥波

^① 记者指的是乌鲁木齐的省政府。——原注

尔,然后搭俄国的汽车到巴赫特和乌鲁木齐。1934年初,马几乎就要攻下乌鲁木齐,和盛世才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结果以自己的失败告终;而现在据说是被盛世才当作一位贵宾和同盟者来接待的。

德里电文中提到的另一位东干将军是骑兵司令马虎山,并不是马仲英的兄弟,不过有可能是他的亲戚^①,在《马仲英逃亡记》一书中也提到过他。1934年2月中旬,他被俄国飞机的炸弹弹片击伤,曾在吐鲁番接受我们的医生大卫·赫默尔的治疗,也许是救了他的命,因为当时他的伤口已生坏疽。在库尔勒,赫默尔又一次给他治疗。他还曾搭我们的一辆卡车,跟着“大马”和他的败军来到喀什。

马仲英(“大马”)不顾马虎山的意愿和忠告,抛弃了他在喀什的军队,越境去了俄国,这时,如前所述,马虎山接任指挥东干败军,并统辖了从叶尔羌河到离罗布泊不远的婁羌的整个新疆南部地区。以后他又在1937年夏天率军在阿克苏附近和乌鲁木齐部队较量,结果吃了败仗。在这些地区,与喀什的汉人结成同盟的苏联人的宣传占了上风,极有势力。大多数东干将军和大部分东干部队都背离了马虎山,倒向了俄中集团。如前所述,马虎山在自己人背叛他后,带着1000名忠实于他的支持者经喀喇昆仑山口逃到印度去了。他被那里的英国人关押起来,他的卫队则被关押在拉达克。

现在,德里的电文说,加尔各答的马虎山已接到邀请,要他去甘肃支持中国军队,并说他肯定会应召前去的。

中亚荒漠这个大舞台已经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开场,两位主角已经在幕侧站好,戏就要开始了。

了解一下俄国人出于什么原因要掌握住这位东干将军的行

^① 马虎山正是马仲英的亲戚——姐夫。——译注

动,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许他们认为,在以中亚为奖赏的这盘棋的大赛中,他可以成为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现在正值中日战争,已到了移动这颗棋子的时候了。

如果德里这份发表了许多议论的电文准确无误,那么,在战争中和俄国一样站在中国一边的在印度的英国人,已经效法苏联,允许马虎山回甘肃去了。

我在《马仲英逃亡记》第247页写道:“他会不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突然又在沙漠的心脏地区东山再起呢?在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一个一切事物都可能出现的时代,什么预言都是徒劳无益的吧!”

然而现在他又回来了,而且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还有他那位骑兵将军和朋友马虎山。最近会发生什么呢?下一步的行动又是什么呢?

人们可以得出的判断是,中国人已下定决心要尽最大努力保卫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一流的军事业绩,但是坚韧性却使他们在4000年间维持了自己的国家,而古代世界中其他的伟大国家都已崩溃。这种坚韧性看来也和往昔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会有所建树的。

中国人到什么时候会承认自己失败,并甘愿缔结使自己国家处于绝境的和约呢?等日本人占领整个华北地区和所有沿海省份的时候,中国人会这样吗?看来不会。即使日本人已经得逞,中国人似乎也是下定了决心要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这样想象是否过于唐突?不,一点也不。如果对来自硝烟弥漫的战场的一条条消息加以综合分析,就能得出这种看法。

据估计,新公路将在一个月之内建成。这条路以印度洋海岸

为起点,经缅甸、云南和四川并到达四川省首府成都^①,然后在这里连接现在正在修筑的通往兰州的公路,再往前就是丝绸之路了。公路建成后,就可以乘坐汽车从印度洋沿岸的仰光一直到波罗的海岸边的列宁格勒,斜穿亚洲。如我几年前梦想的一样,与这条路配套的另一条路是从上海到布伦或不莱梅港,它们之间的最重要的纽带也正是丝绸之路。

简言之,正在建设中的从缅甸到俄国西伯利亚边境的塔城的路,会在中国已经被侵蚀的领土上增添两处供应物资的宽敞的入境大门,中国就能在内线继续这场战争。

如果战争的最后阶段真的是在中亚决一雌雄,侵略军面临的将是他们不堪承受的任务。只要想一想漫长的联络补给线和北边的俄国侧翼,就够危险了。

这就是马仲英将军、我们的朋友“大马”和他的骑兵将军马虎山在又一次获得显示自己的机遇时所面临的形势。

1938年6月

^① 1938年6月1日,我从一位极可靠的中国人那里获悉,从俄国边界的塔城到印度洋沿岸边的陆路已全部投入使用。在中亚路段,据说有1 000辆卡车在行驶。去年冬天,从俄国边境到乌鲁木齐大雪纷飞,动员了几千名当地人扫除积雪,丝毫没有影响交通。——原注

译 后 记

1933年1月,斯文·赫定从美国返回北京,投身于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队即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3年)的结尾工作。1933年8月,他受中国政府委托,组建西北公路探险队,勘察通往新疆塔城、伊犁、喀什的公路路线。这是斯文·赫定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亚探险,时间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关于这次探险,他写了三部著作:《马仲英逃亡记》、《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

《丝绸之路》一书主要记述全程16 000公里旅程中的见闻。探险队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取道额济纳,由甘肃明水进入新疆。后由乌鲁木齐出发,经由哈密以东星星峡进入甘肃安西,途经肃州(即今酒泉)、甘州(即今张掖)、凉州(即今武威)和兰州,最后抵达探险终点西安。此行正值盛世才与马仲英交战之际,新疆处于兵荒马乱、动荡不安之中。作者本人先后被幽禁于库尔勒和乌鲁木齐达数月之久,对许多事情有过亲身体会。他在著作中对新疆当时的战争、政治等状况和盛世才、马仲英等历史人物的记载,生动翔实;对沿途所到城镇村落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人口等以及旅程中的道路交通、自然地理等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作者对两千年前把中国这一丝绸之国和罗马帝国连接起来的古丝绸之路,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笔触酣畅,联想翩翩,使人读来饶有兴味和启发。卷末附有后录一篇,对1935—1937年新疆的政局态势乃至日本侵华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均有阐述分析,不妨可看成是正文

的续篇。本书对研究中国西北地区和新疆的现代史,尤其是对研究当时的“盛马之战”和外国插手新疆的争夺,提供了一份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作者在领导和完成查勘公路这一艰巨任务中,历尽千辛万苦,为西北公路的勘察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应该肯定,作者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在事业上是合作的。但在一些问题的阐述上,诸如边疆民族问题、抗日问题等以及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看法上,均有其局限性、片面性。我们相信读者是有鉴别力的。

本书最早的版本为瑞典文本:“Sidenvägen”,1936年于斯德哥尔摩出版。同年于德国莱比锡出版德文本,“Die Seidenstrasse”。1938年于纽约出版F.H.莱昂所译英文本“The Silk Road”,增印了上述的那篇“后录”。日文本先后有高山洋吉(1939)、桥田宪辉(1944)、西义之(1965)和福田宏年(1984)译的4种译本。这次的汉译本系根据莱昂的英译本译出,并参考了福田宏年的日译本。

对著作中的人名、地名等,译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几经核实资料后译出。但是,大量的小地名,事隔半个多世纪,不少已屡经更改,或是出于其他原因,已很难查找。对这部分地名,一般予以音译。英译本中的气温测量,系取华氏温标,考虑到当前国内外通用情况,参照日译本,一律改成摄氏温标。

译者水平有限,如有疏漏误译之处,望学界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马大正先生、杨镰先生及罗致平、范玉梅、米海力、朝克等学者的帮助。谨在此一并致谢。

编 校 说 明

一、本书是杨镰主编的“瑞典东方学译丛”的一种，并收入于“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二、本书中文版独家版权由斯文·赫定著作权所有者——瑞典斯文·赫定基金会提供。在联系版权及确定底本时，得到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瑞典驻华大使馆的协助，瑞典友人沃尔特斯、秦碧达、倪尔斯、席沛德、雷默斯、阎幽磬等给予过具体的帮助。

三、本书系据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Inc. 的英文本 *The Silk Road* (1938 年版) 译出，英译者为 F. H. Lion。个别地方在校订时参考过瑞典文本、德文本及日文本。

四、书中的“原注”，为作者自注；“译注”为中文版编译者所加。由于具体的技术问题，原收的地图及地名等索引均未收进中文版。

五、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后录”，是作者于 1938 年所写的有关 1935—1938 年这几年间新疆情况的续篇，由于那时作者已回到国内，这部分内容不是亲见亲闻，而是有关资料的汇要。而瑞典文原版及德文版都没有这部分内容。

六、书中对距离的标注，除极个别地方，均是采用的英制，在编译过程中，没有改为公制。英制与公制的换算是：1 英里 = 1.6093 公里，1 英尺 = 0.3048 公尺，1 英寸 = 2.54 公分，而 1 码 = 3 英尺。

七、新疆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何富麟、陈重秋及石晓奇、李春华等先生为本书及“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编辑出版出力尤多，特致谢意！